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军向北行动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一）此次向北行动的第一步目标，已见昨日作战命令。

（二）在这次行动中，必须使方面军全体红色军人认识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罗、吴、周[1]各部，冲破抚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配合红十军、闽北独立师、红八军、十六军与中央苏区各作战地域红军的胜利行动，切实联系闽浙赣苏区，援助响应长江北岸各苏区红军的英勇战斗与全国工农斗争，争取新占领区域群众的赤化，瓦解和夺取广大的动摇和不满的白军士兵，并加紧征集资材，特别是努力筹款与节省费用，以充裕长期作战经费。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各级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要使全方面军动员，集中一切注意与一切力量都为着实现这中心任务而战斗。

（三）为着实现上述任务，首先须兴奋起全体红色军人最高的战斗热情，要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精神，争取每一战

---

* 这个训令是周恩来起草的。

斗的胜利到底。即使敌人少至一营一连，甚至是游击队、靖卫团，我们必不应丝毫放过消灭他的机会，因为小战斗小胜利正是大战斗大胜利的引子。敌人如多至三师四师，尤其是敌人主力，我们更要以决死的勇气，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来求得消灭他的全部或大部，以崩溃目前江西敌人的“进剿”部队的全战线。这正是给敌人大举进攻中区尚未布置就绪（特别是进攻部队尚未调齐）的严重打击，这正是粉碎敌第四次“围剿”的必要手段。要使这次胜利进行得完满，全方面军的行动必须在绝对的统一指挥与协同动作之下，力求坚决迅速与秘密，充分发展部队的攻击精神，同时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必须在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与完全了解上级意图的原则之下，发扬机断专行的能力，以不失任何先机地取得每一战斗的全部胜利。

（四）要使全方面军的行动都如上述的一致，这必须对红军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鼓动宣传，加紧军事、政治的训练，一直到严格地执行红军中铁的纪律，来提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来保障红军的坚固和阶级的团结。因此，在这次行动中，各级政治机关要不失时机与极度紧张地来进行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适时地提出宣传鼓动口号；各级指挥人员要利用一切战场实地经验与两个战斗中的间隙来进行军事训练与各种动作的指正和教育。各级军事裁判所在部队中的威信与作用要立即健强起来，来保障红军中的纪律的执行与紧严红军的组织。每个红色军人或各部队的英勇战绩，须极力表扬，犯纪律的也须严格制裁。

（五）为扩大这次行动的胜利，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必须领导全体红色军人及政治工作人员，努力争取占领区域的赤化，加紧这些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不放松任何时机来进行瓦解与夺取白军士兵的工作。这一切应由总政治

部另发单独训令以规定实施方案。同时各部队在其占领区域必须尽力肃清和消灭当地及其附近地区之反动武装，必须得到政治机关的帮助，尽量扶助当地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和繁殖赤色武装游击队，并从当地斗争的工农分子中直接扩大红军（但必须经过红军中政治机关的检查）。

（六）为支持四次战役的长期战斗，在这次行动中各部队须于其占领地域努力征集资材，即便是一天一晚的停留，也不应丝毫放过可以征集资材的机会，尤其是筹款与节省费用，更要以最高的速度与最紧张的精神来争取最大的成绩，要认识多筹得一分经费，多节省一分支出，即是对于争取战争全部胜利多了一分保障。在这一切工作中，各级政治机关要尽领导与鼓动的责任，尤其是要注意筹款纪律与阶级路线的绝对保持。

（七）强健全方面军的战斗力，以保障红军的继续扩大与胜利，各部队须特别注意部队的卫生健康与管理，务使各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不许有一人随便落伍，不许有一人不知下落，不许有一人武器失掉，不许有一人破坏军纪风纪，不许有一人不注重卫生清洁。要保护身体，有病即治，要发扬部队中阶级的互助与亲爱，特别在部队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之后，不仅要注重各个战士身体疲劳的消除，并且要在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进行充分鼓动与娱乐，以消除其精神上的疲劳，以提高各个战士的战斗热情。

此令

总　司　令　朱　德
总　政　委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这一训令一直发到连一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至柔。

向建（宁）黎（川）泰（宁）行动中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王　稼　祥

此次行动是消灭敌人，求得与敌主力（陈诚、吴奇伟等）决战而消灭之，以开展四次战役的胜利，同时赤化光泽、资溪、金溪，以切实贯通中央区与赣东北、闽北的苏区联系，此外又利用这个机会多筹战争经费。

关于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有如下的指示：

一　本军中的政治工作

要说明此次行动的意义，要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以及党的组织来做扩大的宣传鼓动，要说明我们须要积极进攻敌人，以开始四次战役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积极进攻敌人！

开始四次战役的胜利！

消灭敌人的主力——陈、吴！

赤化光泽、资溪、金溪！

---

* 这是王稼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训令。

打通赣东北、闽北与中央苏区！

筹足经费！节省经费！

争取白军士兵到红军方面来！

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不断的工作，要加紧进行鼓动与娱乐工作，以减少行军疲劳，以发扬战士的生气。具体工作计划由各军团、军政治部规定。

二　在地方群众中的政治工作

在光泽、资溪、金溪、黎北等区域的工作，要以创造赤区，贯通闽北、赣东北与中央苏区联系为目的，因此必须：

1. 进行广泛的深入的通俗的宣传鼓动。要抓紧当地工农群众的痛苦来进行宣传，要以群众所受的压迫、剥削、痛苦的实际材料，来启发白区的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吸引他们来拥护共产党与苏维埃，来拥护和帮助红军。

2. 宣布没收地主反动分子的财产、房屋、土地，宣布废除高利贷与苛捐杂税，发动群众来没收和分配地主反动派的财产。

3. 与该地的党的秘密组织发生关系，帮助秘密组织整顿、训练和发展，成立和发展工会与赤色农会的秘密组织，扩大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些组织的秘密与公开应根据该地斗争深入的程度条件来决定，过分公开是有害的。

4. 在城市大镇市上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委任之，可以红军中的同志及能够并愿意离开生产与家庭的本地同志充任之。

5. 摧毁国民党政权机关以及国民党改组派等等反动政党，

消灭反动武装，要加紧反对反革命的宣传，经过群众路线来进行肃反。

6. 要加紧筹款，经过党发动全体战士来加紧调查及筹款工作，筹款中的纪律要特别严格起来。

7. 要加紧扩大红军，必须严格审查成分，以免反动分子混入红军，尽可能的速度来成立本地游击队。

8. 要进行工人斗争，关于分配土地则须经过一时期的宣传鼓动与调查工作。

9. 组织到中央区的参观团，由每军团或每军组织一个五六十人的参观团，发给路费，派队伍护送。

三 在敌军中的工作

全部执行总政治部的训令，过去执行的非常不够，要照规定的数目派人到白军工作，在白区中布满标语及宣传品。

此训令直发到连指导员，必须根据这一训令在党内报告讨论这一时期的工作，每一星期报告一次，重要问题电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周恩来关于我军歼敌计划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

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

（甲）我方面军消灭黄狮渡周士达旅全部后，乘胜恢复金溪城，逼近贵溪、东乡、浒湾、南城，威胁抚州、南昌。预计我游击部队亦已占领光泽，资溪已成空城。敌人目前部署为九十、十四、二十五三师各一旅，共八团，于五日赶到浒湾。第八师守南丰。二十四师于六日赶到南城，二十四师与十四师之另一旅集结南城附近。第五师之另一旅集中贵溪。五十三师集中余江、万年。九十师在崇仁一旅、二十五师在宜黄一旅，准备向东开动。十一师准备由永、乐向宜黄开动。七十九师准备在必要时增援贵溪。似其进攻计划准备以主力出浒湾，另一路由南城东出策应，再一路由新丰街东出截击。

（乙）我军原拟消灭周、李[1]后乘胜于五日先机占领浒湾，嗣因四日围攻黄狮渡未能当日解决战斗，故不及争取先机。敌增援队于五日下午已赶到浒湾。现我军改取战备姿势，集结于金溪、左坊营、后车、黄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三十一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丙）已电令红十军赤警师首先消灭乐平、万年间的保二

团，调动余、万之敌北向增援，以便十军南向贵溪袭击敌侧背，并打通信江南岸。已令闽北红军速加紧邵、光北部游击和赤化，与我占光泽部队联络，并派队至资溪城，争取赤化中区。各作战区的协同动作已见另电。

总此迅速、敏捷、坚决、主动与协同动作，为全部红军争取四次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

恩 来

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周浑元、李云杰。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轰及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山海关的占领及日本军队向华北增加，长江沿岸及其他区域中日本的军事示威，都指明着山海关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中国的强盗战争的许多步骤之开端。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现在是在占领整个的华北，北平与天津是直接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的威胁之下。由于经济危机的极端的紧张及资产阶级没有方法用旧的自由竞争的方法去克服危机，更加加强了各国统治阶级——首先是日本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国内国外的暴力来解决危机的企图。满洲的占领还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欲，而正企图着席卷华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强盗行为是得到法国帝国主义及英国帝国主义的公开的拥护和赞助，另一方面使得日美的冲突更形紧张起来。帝国主义列强间分赃的强盗战争的危险是更加严重了。同时，华北的占领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来巩固他在满洲与整个华北的统治，将满洲及华北变成为有力的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并且极端的增长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公开的直接武装干涉的危险。

二、国民党统治，以一年来的不抵抗的政策替日本帝国主

义清除了武力占领华北的道路。他以无耻的投降断送了满洲，他用一切方法去破坏、妨害义勇军的战斗，他血的残酷的压迫全国的一切反帝运动，他集中一切武力去“围剿”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众的武力——工农红军。所有这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暴行的有力帮助。显然的，目前以及今后国民党的政策将继续他一年以来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张学良已经下令“一切部队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促使此事件之扩大”，并禁止一切平津的群众的反日争斗。南京政府则更是淡然置之，或者照例向日本抗议与报告国联。同时，他们将更加凶残的镇压群众的反日反帝的争斗及进攻苏区和红军。一切孙科、广东派以及其他军阀们的空谈抵抗与“请缨抗日”，只是使南京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彻底实行的烟幕弹。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宣传的破产，将更加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争斗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党的正确的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子。同时，反帝争斗及国民党地域中的一切群众运动的开展，将使国民党的统治更大的削弱与造成国内阶级力量的新的变动，这变动毫无疑地将更加的有利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党在这个情况之下，基本的任务：在苏区中，应该是巩固和扩大联系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开展红军对于国民党进攻的反攻，以加强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国民党区域，应该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开展一切形式的群众的反帝争斗，组织吸引并提高他们到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去。中央认为，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的“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新进攻的紧急通知”中所提出的任务依然是全国各级党部的主要的任务。中央更一次的着重的指出下列的紧急任务：

（一）开展最广大的群众的宣传鼓动，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华北的严重及其意义，揭露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为帝国主义侵略清除道路的作用。号召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罢工罢课，自动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群众的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反帝国主义的或反日组织，在各种形式之下（检货纠察队、义勇军等）来武装群众。中央着重的指出在一切现存的在改良主义派别影响之下的反日组织中去进行坚苦的工作，提出我们的口号、纲领、行动纲领等之极端重要的意义。

（二）特别应该着重的注意到在工人群众中——尤其是在停工关厂威胁中的日本企业中的工作，在天津、唐山、北平，在矿工、铁路工人及纱厂工人中，党与赤色工会必须十倍的加强自己的活动，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党应该不失去时机的号召与进行各该区域中的反日总同盟罢工。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为着总同盟罢工的进行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即使在这样时候同样亦绝对不能忽略工人群众迫切的日常生活的要求条件。必须将工人的反日反帝争斗与失业日及年关争斗紧密的联系起来。应该在开展群众争斗的基础上尽量的扩大赤色工会与将他变成为真正的群众工会。

（三）动员工人及劳苦群众组织反日义勇军或参加东北与热河的义勇军去有极重大的意义。一切党的组织首先是河北、上海、山东等地的党的组织，必须最大限度的开展工人自卫团、义勇军、工人纠察队等的组织，这种组织应该是广大的群众武装的组织，他可以用一切武器（从石子、棍子到新式武器）武装起来。这些组织应该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保卫者，并

选派自己的积极分子到东北和热河的义勇军去。党必须组织要求武装的争斗，组织工人、农民、学生、青年要求武装，在一定条件存在时，他应立即开始夺取武装进行反日游击战争。不仅在工人中应发展这些组织，同时在北平、天津、上海等等的近郊农民中亦必须广大的组织群众的武装组织。组织农民委员会，领导农民拒绝一切政府捐税。大批的动员产业工人去参加东北和热河的义勇军是党的战斗任务之一。同时必须积极的参加与争取援助义勇军的运动及救济东北难民的运动。党必须在满洲、热河、榆关等战事损害的区域中去进行难民的工作，组织难民的食堂，领导难民的要求救济争斗。组织难民委员会，难民的示威与失业日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四）必须加倍地在一切白军部队中工作——特别是张学良的部队中工作，号召士兵反对长官的不抵抗主义，及驱逐反动官长，建立士兵委员会，自动进行反日战争，配合着我们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及日本军队中的革命工作，这将给我们极大的可能去真实的开展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

（五）广大的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运动，指出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能够求得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将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清楚的对立起来，号召与组织群众的拥护和联合红军和苏维埃，同时必须十倍的加强宣传苏联的和平政策及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学生们，工匠们，城市贫民们！

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将山海关轰成一片焦土。随着东三省的占领，日本军阀正在侵入热河。这个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结果，是千百万中国民众的恐怖，灾难与被屠杀。由于国民党军阀及政客们的灭除民众武装，破坏一切有效的抵抗，以致数十万中国的士兵、男女、小孩惨遭虐杀。

但是，山海关的屠杀仅仅是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夫们，马上就要扰乱整个华北，使它牵入战涡。他们不仅企图将热河变为傀儡“满洲国”之一部分，他们下一个步骤，就是占领平津，占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的土地，并创立他们对于中国极大部分的土地的血的统治。

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瓜分中国的步骤，是镇压中国劳苦群众生长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步骤，是将中国变为反苏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红旗周报》临时副刊。

联战争的作战根据地，并使中国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牺牲品的步骤。

英法帝国主义政府公开的援助日本这个政策，仅是为着自己的强盗利益，企图在瓜分中国中夺取新的地域。日本如不得到那些希望瓜分中国与实行反苏联联合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援助，它是不能够进行这种战争的。

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国际联盟及李顿报告书给了日本以实际的帮助，他们提议国际共管与瓜分中国。

美国想创立它自己在远东的统治，想夺取整个的中国。虽然，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有增长着的矛盾，但是它并不像国民党的走卒们所说的，它愿意帮助中国。美国一样想奴役别的国家与人民，正如它奴役菲列宾等等一样。

只有苏联与中国的苦难的、被拷打、被压迫的民众真正亲爱地携着手。俄国的工农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驱逐了帝国主义者，给了农民土地，给了工人面包与工作，给了国家以和平。他们正在建设无阶级的社会，巨大的城市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消灭了失业、剥削、饥饿与文盲。中国劳苦群众的社会与民族的解放没有别的道路，只有俄国工农兵走过的道路——革命的道路。

中国工农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广大的苏维埃区存在着。强有力的工农红军英勇地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血战着。只有加强与扩大苏区及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能够救中国。

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地大人众的中国能成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品？原因是在国民党的血的统治。国民党的封建资产阶级联盟、买办与银行家、军阀与地主吸尽了中国民众的膏血，屠杀与镇压民众，消灭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抵抗，出卖中国，破坏、妨害每一个有效抵抗，替帝国主义屠夫们的残杀清

除道路。

记着：在这个国难紧迫之时，国民党动员了八十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与苏维埃区域。记着：去年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被蒋介石及他们的卖国的高级军官所镇压。记着：南京政府拒绝给满洲义勇军任何帮助并尽力阻止义勇军参战。记着：国民党的压迫抵制日货。记着：热河汤玉麟公开出卖中国给日本侵略者，土匪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破坏一切抵抗日本的方法。这些事实，我们必须记着，为得使我们能够适时的做出结论来。你们不应该相信孙科、广东派及汪精卫之流口头上空喊的抵抗的空谈。这些反革命派别在上海战争时，企图剥削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但是，记着：十九路军士兵七千人是被驱散了，因为他们反对国民党与他们高级军官的出卖。记着：十九路军士兵好几百人是被枪毙了，因为他们不愿与中国工农作战。而且就在今天，广东军阀口头上空谈抵抗，而实际上把所有的军队用在镇压闽粤赣的工农。

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革命学生们，工匠们，城市贫民们，联合起来！为着你们的日常利益而争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反抗饥饿与痛苦的不断争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国民党军阀的混战、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战争使新的千百万劳苦群众陷于完全的饥荒。工人痛苦的增加、工厂的倒闭、手工业的破产、农村经济的崩溃与千百万农民之饥荒亦是由于国民党的政策。国家税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用来供给军队，而这军队又仅仅是用以残杀民众。没有一个钱用来救济饥民与失业工人，反而国民党的军阀官僚侵占大批款项，另外的钱，便用来残杀中国民众。许多新的税项及增加旧税都放在劳苦群众的肩上——特别是农民的肩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斗争起来，反对这种情形。

工人们！反对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特别在帝国主义的工厂中！要求米与失业救济！准备与组织罢工来达到你们的要求。为着工农学生青年的武装而争斗！在每个工厂中组织你们自己的自卫团！

农民们！反对重税、重租、封建剥削与高利贷！抗租抗税！夺取土地，组织农民自卫团，反对地主与国民党政府。创立苏维埃，与现在的苏维埃区联合一起！

士兵们！不打中国兄弟姊妹！要求与屠杀中国民众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作战，组织士兵委员会来执行这个决定与建立和民众的亲密关系，准备与一切帝国主义压迫者剥削者作战！联合兄弟们大队的整排整连的到红军中去，同他们一起反对卖国的国民党军官与帝国主义者！

学生们！工匠们！城市贫民们！与工农一起建立广大的反帝战线，反对国民党的恐怖制度！组织完全的抵制日货！组织抵制帮助日本的一切帝国主义的货物！

灾民，难民们！组织起来！组织你们自己的委员会来领导争取要求的争斗！与失业工人、城市贫民联合起来争取津贴！要求惩罚卖国将军们！要求津贴和救济！

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一切劳动者们！

你们如果想活，那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你们如果想活，那必须推翻国民党统治！

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卖国贼如蒋介石、张学良之流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他们的同盟者的。

只有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够战胜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士兵积极抵抗，反对一切他们的卖国长官！我们必须准备武装民众、工人、农

民、学生、青年来进行长期与艰苦的争斗！

建立群众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中国的劳动者们！准备起来，武装起来，为着这个争斗——千百万群众须动员起来！千百万群众须武装在手地参加争斗！他们能够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推翻国民党走狗及卖国贼的政权！

革命成功，就是从几世纪来的压迫与剥削中解放起来，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之终结，就是中国的自由、统一与领土完整！我们的争斗在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国家中都有同盟者，这些国家中的工人、农民都团结着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争斗！与日本军阀及法西斯蒂的战争和恐怖作英勇争斗的日本工农，亦是我们的同盟者！

武装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国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万岁！

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与苏联民众的兄弟联盟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

（一）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之下，动员极大的反革命军事、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与准备长期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为着党能充分动员和组织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进行和准备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并且要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来争取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回答帝国主义对于苏联的进攻，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强固党对于整个战争的领导，是目前党极端重要的战斗任务。

（二）苏区党在去年[1]苏区党大会以来，特别是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发展党改造党的运动之后，是有相当转变和进步。最主要的表现是：党在数量上很大的发展，成分上的改善，领导和动员群众力量的增强（表现在扩大红军发动运输队、推销公债、修桥补路、慰劳红军及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上），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工作方式的转变，红军中政治委员制的建立，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些进步，使党与群众的关系比以前要密切些，党的政治影响更为扩大与巩固。

（三）然而党的转变与进步，还是远落在革命与战争日益开展局势的后面。特别是在这次战争紧急动员当中，更暴露了

我们党还有许多极为严重的弱点：

1. 党的一切决议的执行异常迟钝，缺乏警觉性与顽强性，还很浓厚的反映着农村中落后的散漫性与和平保守的意识。

2. 地方与红军中党的组织还很松懈，在群众中组织上的领导与推动作用还是薄弱，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不能迅速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随时发现。

3. 党员群众自觉的积极性没有必要的发扬。在战争紧急动员中，党内动员非常不充分，一部分党员的积极性比群众还要落后，有些党员表示动摇愿意脱离党的组织，红军与地方上甚至发生党员叛变反水的事实！

4. 党的组织与工作不能适应战争的胜利而迅速发展与巩固，新赤化的和不巩固的老区域工作进步仍很迟缓，白区白军中工作不能引起全党严重的注意。

（四）我们应警觉的认识这些现象存在的严重性，同时必须了解这些现象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由于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地方党部特别是支部生活不健全，工作方式的转变不够，党内缺乏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工作，反倾向的思想斗争还极不深入。

（五）为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完成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党必须在组织上更加巩固自己的队伍，增强其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力量，以一切方法保障党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长期艰苦持久的战斗中，充分能够掌握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毫不动摇的团结在党的周围，排除一切困难去以一切牺牲与努力来争取这次战争的完全胜利。

（六）中央局特唤起各级党部，必须以极大的努力纠正党

在组织上表现的弱点与错误。要使整个党适用于目前正在进行和日益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在与敌人艰苦决斗的现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的执行以及居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对于在游击队或红军中的党更是特别重要——应当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国际东方部决议）。

（七）党必须于极短期间以内，使全体党员认识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及目前革命发展形势，了解当前党的中心策略任务和每个党员所应负担的责任。这里首先要根据中央局所发关于反倾向的思想斗争决议，深入发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严重打击一切动摇消极怠工，不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和整个战争动员任务，忽视巩固无产阶级基础与领导，以及对于豪绅地主富农妥协现象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与观点。

（八）为着适应紧张的战争环境，迅速巩固严密党的组织，增长党的领导力量，各级地方党及红军政治部必须坚决迅速执行下列几项工作：

1. 省委及红军政治部应严格检查各级指导机关干部的社会成分，政治积极性与坚定性；执行上级决议情形；对下级党指导督促工作的能力与领导方式。对于表现消极怠工、腐化动摇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撤换其工作，同时必须坚决提拔积极坚定的工农干部，特别要坚决培养和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以巩固指导机关中无产阶级意识与领导上的坚定性。对于政府地方武装的检举运动，地方党应切实去领导，这是巩固革命队伍的重要办法。

2. 各级地方党部，红军中党务委员会，特别是边区及新

区党部，必须审查一次党员成分，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洗出党外；个别的工农成分的党员，如政治上表现动摇消极怠工、违抗或拒绝执行党的决议、经过长期斗争教育而不能转变的分子，亦应开除其党籍。

3. 在战争紧急动员与艰苦战争中，吸收群众中表现政治上坚定、积极、努力、忠实于革命的工农分子入党，特别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分子以增强和巩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党必须纠正忽视青年运动的观点，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领导青年团将政治上发展和工作能力强大而成分好的团员，大批的介绍入党，增强党的力量。纠正过去只有二十三岁以上的才能入党和团不将最好的团员介绍入党的错误现象。

4. 健全支部工作，加强支部领导力量，是党的组织上最迫切重要的问题。一切工作要推动支部去进行，特别是区委要以全力去帮助支部的经常工作，建立起中心和模范支部。务使支部成为工厂、作坊、乡村、街道群众中和其周围一切群众政权、武装组织中强有力的领导者。每个党员必须担负一部分经常和临时工作，消灭少数党员积极、大多数党员挂名不工作的现象。农村中人多的支部，可以成立支分部（人数过多的小组或是由距离较远的几个小组组成）。农村圩场上的工人党员应单独成立小组。为着建立支部经常工作，特别要健全支部干事会组织。支部干事会或个别干事不积极工作的，应坚决改造或个别更换，使干事会健强而有工作能力。

5. 红军中应努力巩固政治委员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纠正过去不以政治上和阶级成分上去选择和培养干部，对政治上不坚定阶级成分不好的动摇异己分子，甚至有反革命嫌疑分子不

坚决洗刷而采取调和妥协的错误。要发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打击一切反政治委员制度和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与观点。各级政治机关须充实和健强其组织与工作，加紧在政治上领导红军和训练红军，以实现其提高红军战斗力的最重要的任务。特别要注意使我们的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充分适应长期艰苦持久战争的环境，纠正过去因战争而使政治工作放松甚至停顿的现象。要使战时政治工作不间断的能在正确的高度的集中原则之下，精密迅速及时而准确的去进行。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根本机关乃是党，党的支部小组及每个党员必须在政治机关领导之下，随时特别在战斗中要负起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因此，健强红军中支部组织与工作是各级政治部应特别努力的任务。并且要注意使红军中党的组织适合战时的需要，不致因战争的牺牲而使支部工作停顿。为着强固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可以采取从战斗力较强部队内抽调或对调一部能力强大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进去的办法。

6. 地方党部特别是县区委员会的健强，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这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健全巡视工作，纠正过去走马看花的巡视方式，深刻去了解和考察党的每一决定在群众中执行的情形，检阅下级党每一具体工作执行的方法与程度，经常给所属党部及党团以实际具体的指示。要改变一切脱离群众与下级党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切实深入群众深入支部，广泛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增强各种工作进步的速度，严厉纠正一切强迫命令的恶习。同时要严紧党的纪律，对于一切违抗党的决议与纪律的分子，应加以必要的处分。要用一切方法提高党部和一般党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区委要把各支部中积极活动分子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能够牺牲一切去为着实现党的决议和训令而

斗争。

7. 各级党部要注意对于地方武装、政府和工会、贫农团等工作的经常领导。政府工会和其他组织中的党团，必须健全其组织与工作。对地方武装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干部的选择与训练，党要负起最主要的责任。中央局决定江西、福建党应调出一部最好的特别是工人雇农干部，到红军中做军事与政治工作，以加强红军中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并以一部派去担任游击队、独立师团的干部，以保障这些武装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工会组织应努力扩大，要健全各级工会、雇农工会特别是工会支部的经常工作，增强工会在整个战争中领导的力量。贫农团应扩大而发挥其苏维埃柱石的作用，严厉打击对贫农团工作的取消观念。各级政府特别是乡代表会议工作的健全，巩固政府中无产阶级领导，党必须与以最大的注意与努力。城乡代表会中的党员应成立党团以加强党的领导（乡代表会的党团于必要时召集开会，但每月至少要开一次），切实纠正一切忽视对政治工作领导的错误现象。

8. 党在最近一年来党员数量上是增大了许多，但党内教育则异常缺乏，下级党部尤其是支部，在只做实际工作不谈政治和理论的错误之下，造成党内忽视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政治水平极低弱的严重状况。这种情形，尤其是在现在敌人特别注意政治欺骗与收买以破坏革命队伍的时候，是异常严重的现象。各级地方党部及红军政治部应严重注意努力在政治上来巩固党的组织，必须采取各种必须的方法使每个党员对于党和党的基本主张有初步的认识。各级党部与政治部必须讨论中央、中央局的文件，对每一上级党所发出重要的政治文件，除自己应详细讨论外，必须召集活动分子会或派人到支部中报

告，充分的传达到支部中去，联系到实际工作的讨论和决定。启发党员发表意见，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观点与倾向。中央局、总政治部与省委应经常供给关于党内教育的各种材料，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内容以后应求通俗实际，建立党报的实际作用。

9. 在我们现在进行和准备与敌人作长期艰苦斗争当中，应当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去建立白区白军中的组织与工作。各级党部必须从党和群众组织内选择适宜的同志或群众，派往白区及白军中去进行这一工作。坚决来纠正对这一工作的消极，以消灭中央苏区对于白区白军工作的落后。党必须争取在短的时期内，动员最大的力量，迅速去巩固新区域和基础不巩固区域的工作。除应由基础较巩固区域加调干部派工作团去加强这些区域的领导力量外，并可由好的老区域组织突击队，到工作落后和新区域去帮助工作的转变与建立。

10. 在党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下，主要的是努力扩大发展苏区。但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战线不能有固定的外形，要相当的注意秘密工作的准备。敌人万一进入苏区，通过的地方应坚壁清野，短期占据的地区应领导可以立足的群众留在原有区域，进行反抗白军的斗争，特别要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去进行白军的士兵运动，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红军的进攻来各个击破敌人。反对一见敌人就带少数群众退往苏区内地，而不坚决领导群众在本区域内与敌人作最顽强斗争的逃避斗争行为，因为这是利于敌人来巩固占领地区。同时党必须计划不能立足的群众或领袖分子，组织游击队围绕在敌人周围和侧后方去经常向敌作不断的游击斗争，直到完全消灭敌人为止。这里我们要反对一切借口建立秘密工作而走入纯粹防御路线的机会主义错误（关于秘密工作问题另有专门训令发出）。

以上的当前组织任务，各级党部及政治部直到支部都应详细讨论执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时间有误。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召开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
军事委员会宣言*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帝国主义强盗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的侵掠，这种侵掠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残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极残酷的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于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军阀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的侵略与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抵货运动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红色中华》。

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周恩来、朱德关于目前战局分析与今后行动建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甲、关于赣方敌情已见前电。粤桂军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红军在施、鹤、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1]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

乙、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使赣、抚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丙、我全国红军尤其江西红军在此时机应集中全力，先发

制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

丁、因此，全国苏区更须有配合地发展红军，更须绝对集中与统一指挥。我们建议中央并中央局：

一、迅速派得力同志尤其军事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从三万支枪的地方武装中速组织起几个独立师。每一个独立师开始时要有消灭敌人一两团的能力，然后逐步扩大成为地方领导的中心苏区，要向着麻、罗、黄梅、广济与豫东扩大，使鄂豫皖成为面式的发展。

二、应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中区可将回族同志及甘陕同志吸引到四方面军去），要二军团在川东的一部与四军团[2]速行会合，除留一部红军在川北扩大与进行赤化外，应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兼以一部赤化甘肃，并采取我们前几电的建议。

三、派人到贺龙处，指示他们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要注意赤化湘西，造成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更有利条件。

四、对洪湖苏区，应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吸引一些艰苦斗争分子，组织游击队或到贺龙红军中去。

五、对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红军，要粤省以大力来领导，并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六、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3]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

七、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八、中央办一经常的少数人的游击队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

九、为统一与集中指挥起见，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戊、各项同意否，望复。

（王[4]赴十军去，他大体是同意的。）

周 朱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红三军，一九三四年十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2〕指红四方面军。

〔3〕即张闻天。

〔4〕指王如痴。

周恩来、朱德关于集中力量消灭抚赣敌主力是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关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

甲、据二十一、二十三日两电敌情，敌之主力仍在抚河，将有两个纵队挺进，每纵队三个师。在赣江则以一个纵队挺进赣南，闽方亦必有配合。在此时机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更证明调红十军南渡，十二军、二十一军北上之绝对正确。有此右翼与中路之配合，也更证明中局派人到河西领导红八军、十六军及两苏区实行左翼配合之绝对需要，请中局立即决定本月内即动身前往，不容再有迟疑。

乙、除昨、今长电关于全国配合建议外，我们更建议：

一、中央局、中央政府立即派人分赴各县，尤其北面各县，加紧紧急动员，凡一切动员计划均须本月内布置完毕并检查。中央局、省委应以最好干部去主持中心县委，宜乐、南广仍须两得力干部去任县委书记。宜乐军区尚缺分区政委一、独立师长政委各一、军区参谋长一，均请由红校立即解决，派去

前方。已派四分区指挥员一、参谋长一，并还要补充闽北军分区干部。对各作战地区，中央局、中央政府应加强其领导干部，使其能独立担当长期战局。

二、由中央局、中央政府合办一苏维埃训练班，由红校选一批地方干部教以如何领导群众参加长期战争，限二月十日以前批发各地。省委、省苏亦可效办，首批应着重闽北一线。

三、扩大红军须于一月底计算送二千人、二月半送二千人到建宁。归队兵（伤病兵及开小差的）须大力争取，并再将有一团少先队参战。

四、红校训练须加紧，每日须加课二小时，二月底毕业的提前到二月半。

五、军事后方的迁移存储，须急速于一月底布置完毕。兵工厂、被服厂须发动加工，坏枪赶紧修好，发出子弹。加造一切材料，急需的速购办。

六、谷、油、柴、盐的存购，须督促各作战区再切实计算，并估计到春荒困难，发动群众节省，并准备供红军与必要时的坚壁清野，现时就应移动到偏僻乡村中存储，使一粒米、一根柴都不被敌人抢去。

七、六个月长伕还要二千五百，必须月底到齐。建宁另发动瑞、石、广临时伕子，去建宁将重伤病兵及胜利品运送后方，要多少，请电问范[1]部长。

八、苏区军事交通应与邮政合办。邮政在战争时不能以八小时自限，快班信一日夜要能达一百八十里，并多辟小路捷径。

九、宁都东部及石城、广昌、宁化与宜乐之间的工作深入如何？此是东北战区的中心，望特别检查加紧。

十、动员工作的鼓动宣传要通俗、普遍与深入，计划要切实，尤其重检查与督促，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一切服从战

争利益。

十一、肃反要严防边区及城市中敌探之探入及反革命组织之活动。思想斗争要为党的路线求得一致与团结。

丙、关于财政问题当另电建议。各作战区的军事布置与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已另电给各军区、作战区。

周 朱

二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范树德。

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满洲一般的状况

满洲已经被日本占据一年零四个月了。日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企图把满洲变为他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冒险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战争，以及为着争夺太平洋上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而最后是对本国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等等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计划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范围，这首先要依满洲的内部为转移。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有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完全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抵抗”而能在短期间占据全满洲，那么现在他不得已而承认了，须要十万武装整齐的正式日本军队，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在满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来，这个承认是十分有价值和十分值得注意的。满洲现在的经济状况，正和侵略者所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四期。

应许的“经济兴隆”相反，而是沿着经济危机继续加紧的道路前进着。危机几乎扩大到了灾难浩劫的状态。抚顺、穆棱等煤矿井关闭了一半。铁路（南满、北宁）不但减少了运输，而且还不经常的通行。奉天的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九个商店关闭了七千余个。北满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二分之一。在整个的北满这项损失超过了农产品的商品余额，这些余额通常是出口的。因水灾而受害者在八百万人以上，城市和乡村中的失业者、贫民饥民逐日的增加。在政治管理方面，借口铲除军阀而进行着真正的殖民地制度，保存着一切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关系统，更加上日军直接血的统治。“满洲国”傀儡政治的压迫，不但未按着侵略者的应许而建立“廉洁政府”和减轻捐税，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和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等等。不但没有侵略者所应许的“和平秩序”，反而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各样的扰乱。劳动者所受的压迫竟如此之深，农民甚至不能自由的种高粱和使用器具家什（如三五家许可共用一刀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般的白色恐怖竟如此之甚，如抚顺煤矿的成百甚至成千的工人被活埋了。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他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

因为这个，以及因为国际方面以及日本内部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日本国内不仅经济危机猛烈的加深和扩展，而且

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以及意见纷歧日趋紧张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意，以及革命情绪和波动迅速的增长起来（工人罢工运动发展着，农民不断的骚动，而且有些地方竟变成了武装斗争，先进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反战争情绪正在加紧，日本共产党的发展等等），这些教训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宝贵，而且对一切想用战争走出危机的人都十分宝贵。

虽然国际间和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却继续用加紧的速度准备着满洲的大本营，首先是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的计划，占据山海关和进攻热河以及准备割据中国北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

（二）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十九路军兵士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着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三十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

（1）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

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2）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种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于工农的政策如何。

（3）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也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彻底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和道路。

（4）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彻底反帝的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国”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比如许多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队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奸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怒潮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口“肃清后方破坏分子”而加紧进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和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的腐败和垂死的统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伴——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军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认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和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企图这样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种帮助的可能，并借此以减小满洲和全国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他。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在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强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同时大喊反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其目的是在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以陈济棠、胡汉民等为首的广东派，武断的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其目的是引诱群众视线和注意脱离所谓康藏纠纷，以便英帝国主义能安心执

行在中国西北的占据西藏、西康等计划，另一方面取得些政治资本以作反南京之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及非国民党的（段祺瑞、吴佩孚）军阀官僚们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者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国即变相的第二“满洲国”。

上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满洲事变的策略与立场绝对正确的，即是“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义的是说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满洲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软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他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因为实际情形如果继续不变，则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失败的前途，不仅由旧吉林军将领及国民党的必然叛变投降而产生，而且还可以因为运动本身致变成散漫和政治绝望及组织瓦解而产生出来。

为避免失败和瓦解，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便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彻底革命的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极广大的民众是战胜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而我们党是他们唯一的可靠的组织者和领袖，满洲事变使我们党负起极大的任务。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提出夺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联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借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等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

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

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

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的计算到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尽量扩展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党现在在满洲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在数量上，工业、运输、小手工业内约六十万，乡村工人约一百二十万，在质量上主要的干部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等等，和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铁路、煤矿、兵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大产业工人和大部的林木工人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上作工，与乡村的关系密切）。虽然他有一定

的弱点（没有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等），然而，无条件的他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基本上还带着自发的性质。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工和武装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例如：按时发工资和发现洋；同等劳动同等工资；成年八小时工作日，青工六小时，并保留已有的工资标准；反对裁人和关厂，在裁人和关厂时，业主须付工人六个月工资；反对用白俄和日本工贼代替中国工人；要求增加林木工人和雇农的工资，并且业主应当供给工人及其家属满意的住所；“满洲国”当局及业主须给失业工人免费的饭食、衣服、烧柴、住所；反对宪兵、警察在兵工厂、作坊、矿井上的压迫；反对逮捕和屠杀工人；要求工人言论、集会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工人拒绝运输和服务于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人劳动；并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尽量的把工人组织在上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找出、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赤色工会、民众革命政权骨干，并这样来保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

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

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东三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的反对其队伍间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得不够（如说满洲有很多荒地，因此土地问题不紧张）以及对土地革命运动已达到的程度估计得不够。必须计算到满洲作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大，并且他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一部，在乡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组织满洲的农村工人特别注意，经过他们来实现我们在农民土地运动上的领导权。除了斗争没有方法挽救农民脱离饥饿、贫困与死亡。党的任务在于提出最切实的要求和口号——譬如：百分之八十的收成归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及军阀纳任何的捐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大批的屠杀农民，反对焚烧农民的住宅及抢劫农民的财产和牲畜，停止还高利贷，自由种高粱及农民所愿种的其他东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对待奴隶的法律（禁止自由使用刀、锤、铲等农具和家具），并在这些口号的周围组织和联合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成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他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为数极多（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他们正在为米，为高粱，为衣服，为烧柴，为住所而作着生死的斗争。那些能动员他们和组织他们与侵略者及

剥削者斗争的口号，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货物给饥民，没收民族叛徒的财产给饥民，饥民自动的打开财主的米仓和高粱栈拿米吃，大家合力来抢财主的煤、木柴、衣服、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饥民、难民建筑铁路，修飞机场、汽车路、工厂、制造厂等等，如作这个建筑工作时，则日本侵略者须给他们和铁路及工厂工人适合的工资，反对关饥民在收容所里等死，要求日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无代价的发米、粮、衣服、煤、劈柴、住所等等。所有这些口号，我们党必须广泛的传播，他们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饥民会”、“饥民灾民联合会”等等。

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反动军官所领导下的尚在斗争着的旧吉林军兵士们，可提出下列的要求和口号：兵士弟兄们！组织兵士委员会来监督各种反帝团体为我们捐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进款和用途，不要压迫和杀害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学生和饥民！和工农联合及友好，不服从反动长官的反革命命令去投降和压迫工农！小心你们的长官和国民党党官的叛变！最后，兵士选举长官的口号要小心仔细和有准备的提出来实行等等，便把他们夺取到革命方面来，并加紧武装革命与全副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对小资产阶级提出停止和减少各式各样的捐税（首先是盐税、粮食税、户口捐），无代价的退还当铺里的衣被器具，反对城市里戒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出反对关闭学校，反对屠杀学生和新闻记者，

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习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式的教育计划，因为这是对学生的污辱和讽刺。反对孙文主义，因为它是流血的白色恐怖和卖国辱国的旗帜。不要忘记，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学生，在扩展群众反帝运动上能起很大的作用。对高丽人（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中国人，而另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经常的与中国劳动者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蒙古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已定的使满洲及蒙古殖民地化的计划，而进一步进攻的最近和最先的对象）须提出特殊的斗争的口号，即是一方面借此可以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内蒙自立，间岛自治区）的武断宣传，和它之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恶感及冲突，以利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强盗事业，另一方面组织和联络他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应当提出如下的口号：第一，一致抵抗日本国政府及“满洲国”政府的捐税和命令；第二，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奸细——中韩蒙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第三，苏联的工农与中韩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为朝鲜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大致是：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为蒙古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日帝国主义侵入热河和内蒙！中国革命、外蒙人民共和国及内蒙群众友谊的联盟万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北方军阀的压迫，不给国民党及一切军阀纳税，不给本地王公督统纳税，反对喇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蒙古民众的民族叛徒政策。

计算满洲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的日本工人，他们比中国工人

及其本国日本工人都处于特权地位，并且顾及建立他们的革命斗争与日本国内斗争的联系，而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组织共同的罢工，在满洲的日本工人中间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同时必须提出共同的要求，在满洲有建立工会组织之权。

根据上海所有的经验和满洲的事实，满洲反日会等等能成为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同时必须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到我们的手里。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那些是群众最感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党还必须慎重的估计到满洲的复杂国际关系与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正为着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不怕是极小的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的群众运动。

党必须经常的和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的口号，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同时党必须在满洲的民众间作广泛的解释运动，来解释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党必须根据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一二八”上海防守以及满洲游击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朱霁青等将军——国民党、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每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实，来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张学良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对于满洲事变投降叛卖政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广泛的宣传苏维埃的中国在解决一般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

革命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问题，以便向广大的群众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和他的英勇的红军是中国唯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军队。假如国民党不是四面围攻我们的苏区，那么，我们的红军早已和全国反日游击队及义勇军在一起在第一道战线上直接的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并且要指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同任何的军队和队伍缔结作战的协定，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有两种条件：（一）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二）给他们自己领土内的民众以一般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示威的自由）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样，党不但能冲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而且会得到满洲民众对我们党广大的同情和拥护，并且真正准备满洲革命发展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灵活的完成上述的任务，我们党才不仅能夺得和巩固自己在反日游击队内的领导，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的反日游击运动才能变成千百万武装民众反日的及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才能造成真正民众的和真正由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所选举出来的政权，有一定的适合的领土基础，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由最好的游击队所构成的民众革命军。并且只有在我们领导之下，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完全胜利。

此外，党必须在全中国在这运动中灵活和勇敢的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以便把援助满洲游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都夺到我们手里，以便一方面揭穿国民党的手腕和欺骗，而另一方面利用这运动而公开的派革命分子和我们的人、钱去帮助满洲的游

击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党必须立刻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一种运动来解释，组织所谓“北方独立国”，即是变相的“满洲国”。这运动的实质在于：借此以动员广大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热河及内蒙古的全部领土和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北部和全中国。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里，党应当发起一种运动和举动，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满洲的游击队。这运动不仅给满洲的游击队以有力的帮助，同样也会掀起和提高国民党中国里反帝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情绪，而同时也提高苏维埃中国里的红军兵士和劳动者的精神。募捐援助游击队，不应当只限于金钱，而应该普遍到各种东西——米粮、衣服等等。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了，满洲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前途，在基本上要看我们党如何的执行目前阶段上伟大的基本的革命任务。因此我们党在满洲必须有自己的能执行上边为满洲提出的任务的组织。然而可惜，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还远远的落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不大，群众组织非常薄弱。因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应当加强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以便这领导真能和真会应付这复杂的环境和极端重大的任务。顾虑到了军事的环境及在满洲省委和地方党委员会间时常没有必须的联系，省委须在各地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及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党委员会，譬如在南满、东满、北满各处，以及在各主要游击区域和抚顺等，同时在各大城市——大连、哈尔滨、奉天、长春等等。所有满

洲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以及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全力和一切政治方法，努力的打入一切游击队伍（首先是最大的）和一切重要企业（首先是南满铁路，抚顺、穆棱等煤矿，大连、松花江的航业等等）以及一切群众组织（反帝同盟、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等）去，以便和群众发生联系及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这些支部要十分的秘密，然也必须能扩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对于找出、提拔和教育，以及正确的利用党组织的干部的问题，特别要严重的注意。应当消灭那种以为满洲“无人”可作我们干部的不正确的意见，在满洲天天有更多新的力量被吸进游击运动和反帝运动中来，为什么能说在满洲没有先进的工人和劳动分子呢？满洲党的组织须在群众反日游击战争、罢工斗争、群众的农民骚动等发展的过程中，找出、训练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党的教育工作，经过党校训练班、研究组和个人的帮助教育每个党员以基本的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知识，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满洲党的组织须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在正发展着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党员和积极分子能很快的了解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在满洲目前极复杂的条件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材料（如满洲省委关于五一运动的决议案），省委本身对这问题也没有正确的提出，他简直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对立了，从他们的决议案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是公开工作，或是秘密工作”。这毫无疑义的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现在在满洲，一方面因为日帝国主义直接警察统治的关系，我们必须深深的加紧我们的秘密工作，另方面，因为有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广泛的发展，我们就能利用很大公开的可能，在群众中作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作。在游击队的区域里，

这问题的作用也不比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统治的区域小。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得不足）。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的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的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同时必须顾到满洲党组织与苏维埃中国和中国南方中部比较要年幼得多和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或某些同志特别是年青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时，要多有忍耐心，而说服之和给以解释。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和托陈派的斗争必须是不留情的，和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奸细一样，不但在思想上与他们宣战，而且在组织上也要断绝我们组织和他们的一切关系。只有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只有我们在满洲强固的党的组织，才是革命运动彻底的唯一的和有能力的领导者。

满洲党组织的基本弱点之一，在于他未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学校。然而满洲党是我们党不可分离的及组织的部分。因此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极丰富的教训，以及最近几年中国中部及南部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极宝贵的经验，和联共伟大胜利的经验，都应当有系统的被我们在满洲的组织在中央指导之下所利用。

同志们！满洲的客观环境对于扩展胜利的群众斗争是十分顺利的。

我们相信，满洲的党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着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案和中央这一指示，在广大的劳动者工人

武装的广大群众中进行着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而首先是最勇敢最牺牲最努力的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奋斗，在满洲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 * *

国民党签订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承认了“满洲国”，最后出卖了满洲、热河、平津、华北，进一步的更无耻的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造成更严重的民族危机。除发表反对“华北停战协定”的一切文件以外，中央认为把本年一月给满洲党部的信公布出来是必要的。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与策略适宜的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去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周恩来关于我军北出金溪调动敌主力决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央局速转中央：

急电悉。

（甲）我们并未未估量敌人恢复坚守城防而进攻，已报其“进剿”、“清剿”并施，有待新增援队到，大举出击；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

（乙）敌人始终未占领黎川，我们更未自动退却与放弃。只在一月八、九两日我集全力与敌决战于金溪，洵口敌曾由南丰出一部分兵力企图袭击黎川。我在黎川有两独立团，向敌游击，敌到黎川三里外即缩回南丰。黎川城已拆一部，地形不同于两南[1]。在目前敌情之下，我军本日北出金溪，调动敌人之主力决战，获大胜利，并接应十军渡河配合，并无错误。

（丙）昨、今两日敌主力三师进至浒湾附近暂止，更证明我们估量无误。

（丁）防止敌人截断，中央指示是正确的，三月来我们时时注意及此，并未疏忽。

（戊）作战计划另电告，中心正如中央要求，时时以求得

消灭敌人主力、击破抚河之围攻线为目的。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江西省南城和南丰。

周恩来关于金溪战役后红一方面军部署情况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

（甲）金溪战役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1]三师仍在浒湾、琉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乙）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丙）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

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联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2]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丁）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

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吴奇伟、罗卓英、周至柔。

〔2〕指曾洪易、邵式平、唐在刚。

周恩来关于前方同志不主张过河攻城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甲、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1]、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玕、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许坊、琅琚之线，陈诚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乙、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

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丙、上述意见，朱、王[2]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恩　来

三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罗卓英。

〔2〕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等关于苏区作战区划分及对中央局的要求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

中央局：

甲、依确实敌情，蒋[1]来赣后将增调兵力组织“进剿”军，吉安方面至少以一个纵队（三个师）向苏区深入，而以兴国为第一步目标来配合其主力向抚河进攻，这是主要方向。赣州粤敌进攻兴国，必在其信丰部队已向于都前进与宁敌已入苏区之后，故赣南令成一个作战区才便指挥。我们认为江西应分三个作战区。

一、永、吉、泰、兴、万为西北作战区，以周子昆为指挥员，曾山或古柏为政委，一分区属之。

二、宁、石、宜、乐、南、广为东北战区，军区放宁都，即以陈毅兼指挥，富春[2]只兼作战区政委，军区政委可不兼，以免妨碍省委工作，因军区工作实繁重。二、四两分区属此战区。方面军转移作战地区后，黎、建、泰警备区可撤销改为六分区，亦应拨归东北战区管。

三、东南战区，由赣江直管辖则岩、永战线太长，莫如改为赣南战区，管辖三、五两分区。闽军区现派刘畴西去，可独立直属劳战会[3]指挥。江西三个作战区，在经常行政上应使各

分区与各县军事部仍与赣军区发生隶属关系。

乙、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劳战会，在中央局决定原则下或经前方请求与提议规定一切动员计划。至军事指挥系在前方无法经常顾及之区，如闽西、赣南则由劳战会代行指挥职权。似应如此划分清楚为妥。

丙、中央各同志多数来此，提议中央局会后能有人来前方一行或即留前方，切盼。如何，望复。

周　朱　王[4]

三日九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李富春。

〔3〕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4〕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等关于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唯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1]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周　朱　王[2]

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秦邦宪、张闻天。

〔2〕指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关于执行中央局强攻南丰命令的部署意见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

中央局并转沪中央：

甲、中央局命令攻南丰，我们部署意见：

（一）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二）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

（三）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四）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

（五）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

牵制。

乙、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丙、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丁、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恩　来

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

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历次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全中国反日反帝浪潮的激烈的高涨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有力的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四次“围剿”。在全中国革命形势的前面，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只有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加紧对于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进攻，来维持动摇崩溃着的它的统治。在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侮的旗帜之下，蒋介石已经同广东、福建、湖南各派国民党军阀分力合作地向着我们中央苏区进行大举进攻了。

这是国民党军阀更残酷的与绝望的进攻，这是国民党军阀在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与国民党军阀决定四次“围剿”的胜负的战争，是在我们的前面。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是有着完全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已经到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已经终结的阶段，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革命与战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中，而且在中国已经有着革命的形势。在这一决战中间，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这一决战的我们的胜利将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前面开展一

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整个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

为了争取这一决战的胜利，中央局认为必须立刻执行下列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这一总的目标之下，赣闽两省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必须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赣闽两省必须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赣七千，闽三千）。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必须迅速按照劳战委员会[1]决定，将赤卫队少先队改编完毕，完全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中去。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之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的群众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与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充实独立师团扩大游击队，改造它们的成分，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必须立刻进行。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会宣言，必须更普遍的散布出去，来

揭破国民党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的真相，来争取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借二十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应该是目前战斗任务。土地税、公债票必须在规定日期内完全缴清，动员工农群众节省每人一个铜板捐助红军，购买飞机军械，以争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在三八妇女节以前，必须发动妇女群众制造五万双草鞋，五万双套鞋运往前方。整顿税收，开发财源，节省浪费，都是充裕战费必须采取的有效办法。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土地生产力，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着胜利的执行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先进的区域动员大批的查田或分田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与新建立的苏区。关于春耕运动的具体布置，须依照中央局中央政府的单独指示迅速执行。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委应以最大努力立刻加强对于新发展区域的领导，特别是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如像赣之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黎川、石城，闽之建宁、泰宁、宁化、连城、归化、清流等县，集中力量在这些县中创造强有力的中心县委以领导其他县委。这首先是在肃清残余地主武装，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劳动法，建立苏维埃政权。两省委必须对中央局负责，在二月底在那些区域的工作有显著的转变，同时各级党部必须准备抽调大批干部随红军政治部建立新胜利区域的工作。对白区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始。

八、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必须动员群众于二

月底以前完结，同时要有断桥，断路的技术布置，准备于必要时断敌前进与后退的交通。作战地区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及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的战士及白军俘虏等工作，使主力军能迅速的转移战地，连续消灭敌人而无所顾虑，且不致有所损失。

然而中央局必须着重的指出，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

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同时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也是完成这些紧急任务的主要条件。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党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领导与监督这一决议的每一条文的实现。革命竞赛的方法应该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应该成为先进提拔落后的运动，应该成为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来完成我们目前紧急任务的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信

——关于召集全国民众团体的救国会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各级党部：

（一）在英法直接帮助之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满洲与山海关以后，近又大举进攻热河与华北，在北平、天津及汉沽一带，公开进行各种军事上的准备与示威。英法帝国主义亦亟于进行囊括西南诸省的强盗计划。美帝国主义也正在费尽心血，在“门户开放”的旗帜之下，企图将中国独享，不让别人染指。这些事实都证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紧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宁肯一再调遣百万军队去“围剿”为中国争独立和解放的工农红军，而不愿发一兵一卒去抵抗帝国主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是救中国于危亡的唯一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给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他们不惜以一切残酷方法来压制群众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运动，摧残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国际联盟原来是瓜分中国及一切殖民地的强盗机关，素为英法日等帝国主义所把持，而国民党却至今犹装势作态，指望国联，散布各种幻想，硬要民众“静候国联解决”。在世界上真正同情于中国之解放

的只有苏联，而且也只有按照苏联的道路，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

在这一个情势之下，去年十一月间在上海所举行的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议上就一致通过了下列的决议：主张恢复中俄邦交；电请政府退出瓜分中国之国际联盟，反对共管中国之李顿报告书；电请政府保护民众抗日团体，要求政府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行动之自由；电请政府将全国军队除于重要都市酌留少数驻军（最多不能超过全国军额百分之四十）外，其余应全数开赴东北以武力收复失地；电请政府重新厘定全国军费，划出全额百分之八十为抗日军队之用；电请政府将东北义勇军编为正式国防军队，事实上予以充分接济；电请政府准许全国民众自动武装抗日。这一会议虽并不是由我们党来领导，在这次会议上还可以看出对于国民党的幻想，但上列的主要决议却是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时日易逝，试问这些重要决议除中俄复交因种种关系业已实现外，其余仍徒具空文，南京政府何曾要想到把它执行？这种违反民意、丧权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正是中国民族求得解放的大大障碍。

我们的党应该发动全国民众检查这些决议之执行，经过这一检阅运动来具体的揭破国民党政府清道夫的作用，以掀起猛烈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浪潮，因此就决定了召集全国民众团体的第二次救国会议。

（二）全国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这种强盗的侵略是要抵抗而且已在抵抗了，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之伟大的进展，满洲的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中英勇作战，广大白军士兵的不满与抵抗，以及工农学生贫民和一切革命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高潮，表现中国的反帝革命正在大大地开展着。党必须抓住目前这个紧急关头，用全党的力量来开展和组织广大的群众反帝

运动深入到最广泛的群众中去，争取和团结他们到党的领导之下，实际地进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

但是，目前党在反帝运动中之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巩固情形，还远不能使我们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也正因为我们党在反帝运动中工作比较薄弱，才使国民党易于在“安内攘外”和他种武断的民族宣传的方法之下得以欺骗群众，压制群众的反帝运动。中央号召各级党部必须以最大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来检查和执行过去所有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更广泛和深入地来发展反帝运动，确立这个运动中之无产阶级的骨干和领导。

这一次全国民众团体的救国会议之筹备与召集，便是推动这一反帝工作的武器之一。各级党部应立刻战斗地动员起来，号召民众自动检查去年救国大会的决议案之执行，并组织群众，以群众的力量要求南京政府马上全部执行以上所引举的重要决议。

（三）因此，这次救国会议之筹备与举行的意义：第一，便是要在最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根据着将近两年来的事变发展的具体情形，揭破国民党一切欺骗民众的武断宣传，证明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推翻国民党是组织民众武装的民族战争之胜利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要着重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才是中国自求解放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第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死敌，且不顾任何困难一往直前，致引起阶级敌人之残酷的进攻：一方面大事包剿苏区，企图歼灭新中国的生命；另方面在白区里加紧白色恐怖和组织各种卑鄙下贱的阴谋破坏。我们党应该在筹备这一个救国

会议的运动中发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来拥护中国苏维埃和我们的党。只有在组织和扩大工农群众拥护我们的运动基础上，才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给敌人以有力的反攻，才能冲破白色恐怖而胜利地向前发展。第三，因此各级党部应利用这一个会议的筹备与召集，努力在各地建立和扩大各种反帝的群众组织，抓着对这些组织的领导而团结他们于党的周围。中央认为这是各级党部在发动这一运动中所应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且据此以判断各级党部是否真正地执行党争取群众的总路线。

（四）这一救国会议的中心口号应该是：（1）争取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2）要求立即派遣全国军队百分之八十到华北去收复满洲与山海关并防卫热河及华北。把这些口号与武装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之绝对自由及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联系起来，并组织群众为实现这些口号而斗争。

同时这一救国会议的筹备与召集，必须好好地联系到宣传和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一次的宣言；第二，应与反帝非战大同盟预计今年在中国举行之反战会议联系起来。

（五）在发动筹备和召集这一会议的运动中，各级党部必须严重注意的：

第一，这一会议的召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和一切可能的范围内争取公开活动，绝对防止关门主义，自己束缚自己的毛病。因此，应毫不畏惧的广泛地利用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和个人（如一切反帝的群众组织，义勇军、左翼作家、各工会、学生会等）来发起这个会议。中央责成江苏党立即在上海成立筹备总会，尽量吸收一切同情的分子来参加这个工作，同时，各地党部应动员所有党、团、工会的下层组织加紧在各工

厂、学校、兵营、机关及一切群众团体中去活动成立筹备分会。

第二，在召集各组织、各区域之救国代表会议时，绝对禁止由我们党组织自上而下地委派或指定代表。要广泛地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发动群众自动选举自己所信任的代表。如此方能提高群众的政治自觉和斗争的积极性，而这一反帝的救国会议，才真是广大的群众运动。

第三，这一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与“听其自然”的机会主义的立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各级党部应绝对防止各组织之负责人以争取公开和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为口实，而放弃党对这一工作之指导和在这一运动中模糊我们党的政治面目。要切实了解：整个反帝运动以及这一会议的成功，没有我们党及每个党员之努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积极地加以统一的有计划的指挥是决不能达到的。因此在这一会议的筹备与召集中必须有我们的坚强的灵活的党团的组织，同时要有得力的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指导党团活动。

第四，各级党部必须将这一会议的筹备与召集与领导广大群众为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我们党、赤色工会及其他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更努力地发动工农士兵的日常的经济的部分的斗争，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战斗力，才使反帝运动愈有力量，愈有巩固的基础。

第五，各级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在各重要工业部门中（如铁路、矿山、五金、兵工厂等）发动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如在兵工厂里应提出“不准用一粒子弹去打红军”、“武装工人抗日”等口号，在铁路轮船上必须提出“不运一个士兵进攻苏区”。最主要的不要将力量分散，要集中火力向敌人的命脉处打去。

第六，要在黄色工会及其他反动的群众组织内，真正利用

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发动会员群众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揭破黄色领袖之各种武断的民族宣传。

第七，各级党部必须在群众的拥护之下，将各区各组织之救国代表会在闭会后变为经常的反帝组织，同时将全国的救国代表会变成经常的群众的反帝领导机关，将选出来的代表紧紧地握住，加强他们的政治教育，把他们变成这些群众组织的中坚分子，而经过他们使党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广大的群众。

第八，全国救国代表大会拟于今年“五七”国耻日在上海召集，各级党部应动员我们的下层组织在各工厂、各组织召集群众大会，选举各区或各市的代表会议的代表，并由区代表会或大产业单位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不限。同时，各地应组织示威、飞行集会等群众行动来拥护这个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中国面前的两个前途：或者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的苏维埃的中国，现正在非常紧张迫切的情势之中，你死我活地相争斗着。我们党的责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是否能很顺利地推翻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建立新的苏维埃的中国，都要看我们党及每一个党员是否能在国际的正确战线之上，以最高限度的积极精神去动员千百万的中国工农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我们的党在决定中国的两个前途上，实具有左右一切的作用。中央号召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艰难困苦，奋往前进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为着布尔塞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红色中华》社论）

春天快到了，是怎样一个剧烈战斗的春天呵！一方面，革命战争走到决定胜负完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大举进攻的紧急关头，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勇敢、敏捷、觉悟，坚强地同敌人血战着。另一方面，在流血的争斗中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来的苏维埃土地，正等待全苏区的劳苦农民群众，以革命的劳动热忱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春耕。正因为我们处在革命战争严重紧急的关头，正因为在我们面前是长期艰苦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时期，今年的春耕对于苏维埃与革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千百年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豪绅、富农的奴役和剥削之下，终年忙碌勤劳的结果，只是供给地主豪绅的奢侈宴饮，而自己依然是饥饿着，冷冻着。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劳苦农民群众第一次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自由的吃自己的耕种的收获。这便造成了劳苦农民群众勃发伟大的耕种劳动热忱的基础。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在组织、激发、提高这个伟大的自发的群众的劳动热忱，提早春耕，扩大耕地，争取收获量的增加，要使得没有一寸苏维埃的土地荒弃着，没有一分人力闲暇着，用与进行战争同样的热忱与英勇来开展在经济战线

---

* 这篇社论是秦邦宪起草的。

上，生产战线上的突击。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是前方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我们的党、团和一切群众组织紧急的动员起来，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为着胜利的进行这个运动，党、团与苏维埃的组织，应该立即的努力来组织和领导这个运动，用一切方法来开展群众的劳动热忱，提高运动的组织性、积极性，群众的创造性到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我们：

一、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与新发展区域中的迅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将其平均分配给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必须要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正确的土地分配是激发与提高群众生产劳动热忱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的春耕与生产的宣传，使每一个农民了解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扩大耕田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亦即是为着战争的胜利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要鼓动基本农民群众以比他在地主资产阶级奴役之下，增加十倍百倍劳动热忱，来耕种从血的争斗中得来的自己的土地。这种广大的生产宣传，必须包括着广大的传布农业改良的科学智识。

三、发动最广大的群众的生产竞赛，经过党、团及一切群众组织来发展生产突击队，订立各村各乡的生产竞赛条约，给与一切先进的乡村以物质的精神的鼓励，并责成他们具体的帮助落后的乡村，来达到总的生产的增长。

四、为着补救目前耕牛、耕具的缺乏与鼓励农民的集体生产，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必须最大限度鼓励、帮助农民的集体合作的各种形式——共同耕种、联耕、组织犁牛站等等。首先特别应该注意到给红军家属以切要的帮助。

五、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除掉必须在这个运动中开垦种植各个组织自己的菜园之外，须得对于他附近的乡村负责帮助，

组织帮助委员会，派选自己代表到乡村去宣传鼓动农民，在农业知识上帮助他们，直至组织特殊礼拜六去帮助各该乡村缺乏耕具的雇农、贫农及红军家属的土地耕种。

为着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向苏区的大举进攻，红军正在与敌人血战着。开展我们在生产战线上的进攻，来配合红军胜利的战斗，在生产宣传与春耕运动之中，我们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忽略战争的紧急动员。在边区尤其应该发展群众的武装争斗来保卫春耕。

春天来了，是怎样一个剧烈战斗的春天呵！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让我们苏区千百万劳苦农民的劳动牧歌与英勇的工农红军的凯歌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根据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红色中华》刊印。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同志关于“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决战前面的党的紧急任务”和反“罗明路线”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这一报告。

会议认为目前革命形势正处在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已经终结的时候，世界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革命与战争的过渡阶段，并且在中国已经有了革命形势的存在，在很大的地域中苏维埃的革命胜利了！

党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所提出的总的进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最近中央局通过的“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决战前面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是党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战争，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江西邻近数省首先胜利，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最有力的领导和号召。这些紧急任务也就是在执行总的进攻路线之下的具体战斗任务。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斗争》第八期。

一九三三年方面军及各地红军所获得的光荣的伟大胜利，更证明国际和中央所指示的积极进攻路线的绝对正确。

为了保障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充分执行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完全实现，必须坚决开展和深入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对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最近闽粤赣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便是完全脱离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

罗明机会主义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这一路线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计是悲观的，对于群众力量是不信任的，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现可耻的动摇与惊慌失措。因而主张抛弃苏维埃根据地，向后方逃跑，不主张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反而公开主张取消群众团体的组织，取消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对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坚决领导。

毫无疑义的，罗明这一路线完全是对敌人的屈服与投降。对罗明路线采取了自由主义与调和倾向的闽粤赣省委的大多数同志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因此会议完全同意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坚决在党内发展反罗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严厉打击对罗明路线的调和倾向与自由主义。

会议认为在红军党里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彻底肃清红军内党的组织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右倾，才能保障最大限度的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因此在反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必须集中火力反对红军内党的组织里对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的犹豫动摇；反对对自己阶级力量及其胜利估计不足；反对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与其改良欺骗作用；反对因为小的局部的损失而产

生的动摇；反对以准备战争为中心的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引进和教育新的工农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与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犹豫动摇；同时亦要反对因为胜利而热晕了头脑以致发生盲动主义的情绪等“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这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虽然没有在红军党里形成一种路线，但这些倾向是存在的，若不严厉肃清这些倾向，是会障碍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执行的。对这些机会主义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与调和倾向必须严厉反对。

所以会议除一致接受并拥护中央局的决议之外，应深入反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斗争到每一个支部中间去，使红军中的党团员从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更深刻的认识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并坚决领导红军为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实现党的紧急任务奋斗到底。

会议更宣称：我们坚决的在党进攻路线下领导着方面军全体党团员全体战士去与敌人在战场上作殊死的战斗，争取四次战役的全部胜利，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苏维埃的新中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周恩来关于改变强袭南丰为佯攻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甲、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乙、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丙、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

消灭之。

恩　来

十三日二十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产业支部的现状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一、在最近国际和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指示中，曾将产业支部的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正因为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与发展，没有党在企业中的坚强的堡垒，就不可能迅速完成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为着切实了解目前产业支部的状况和我们工作的弱点，中央曾以最大的注意力来研究一切关于产业支部的材料，同时经过支部巡视员的直接考查和几次关于产业支部工作的会议。根据这些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中央认为党在四中全会以后，在产业支部工作上的确已经获得了以下的成绩：

（一）不仅恢复了党在立三路线时代所削弱的或失掉的许多阵地，而且开始了一些新的企业中的工作（如轻工业、市政、印刷及个别的重工业）；（二）为全国无产阶级首都的上海，最近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党员较四中全会时增加六倍）；（三）产业工人入党比以前更踊跃了，因此党在白色区域中无产阶级的成分相当的提高了（根据最近的统计十八个城市的党员，已占全国白区党员百分之二十以上）；（四）从产业支部中提拔干部在几个地方已经得到相当成绩（如上海区委成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是新提拔的工人同

志，其次如山东、河北亦有一些成绩)；（五）上级党部对于产业支部的了解和具体领导，在几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如检查支部，建立支部巡视员，创造模范支部等)；（六）产业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支部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更加提高了（如领导罢工、参加反帝运动、拥护红军、发展党员等)。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的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的支部同志的积极性所造成的。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十分警惕的指出：尽管有上面的成绩，产业支部工作在目前党的白色区域工作中，仍然是非常薄弱的一环。在这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一）许多大城市，尤其是环绕苏区的大城市与铁路、海员、矿山、兵工厂等重要产业中，我们工作的薄弱，个别的产业甚至于没有工作。（二）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的工厂里，党与革命反对派没有强固的基础。（三）在许多轻工业中（如丝厂、纱厂）女工占着极大的数量，但是吸收在我们组织内的非常之少，至今最大多数的女工仍然与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四）支部一般的微弱，许多支部没有完全握住厂内的重要部门，在许多产业中很久只有我们个别的线索或两三人的单位（特别是许多重工业)，不能形成支部，缺乏经常的有计划的征收工作。除掉个别的地方（如上海)，一般的还不能完全抓住目前顺利的条件，造成产业工人入党的潮流。（五）支部组织的零乱与散漫，差不多成了现有支部普遍的现象。这里最主要的是缺乏巩固的完善的领导机关，许多重要的工厂支部没有支部干事会，甚至于没有支部书记，或者形式上有干事会的存在，但由于这种干事会的产生没有经过支部的有准备的民主的选举，干事会的分工与组织的不适当，缺乏地方党部有力的帮助与领导等等，以致不能执行支部的领导工作。同时支

部全体同志没有实行必要的分工，每个同志缺乏经常的具体的任务，一般的在厂内与革命的群众组织没有适当的关系，时常表现着分离的现象（如党、团、工会在同一个厂内的活动常常不一致）。（六）厂内群众工作的薄弱，是产业支部目前最主要的弱点。首先对于工人群众的生活没有锐敏的感觉，缺乏与工人群众最亲密的适当的联系，不能抓住工人生活的脉息，来时时为着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同时产业支部一般的还没有把赤色工会的工作当作支部最主要的工作。有些支部的同志至今还没有加入工会，许多有支部的地方没有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不了解怎样去分别的接近赤色群众、黄色工会会员以及无组织的工人，不了解怎样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在具体要求的周围。因此，许多支部不仅不能很好的准备和领导工人的斗争，而且时常罢工或斗争的发生对于支部是出乎意外的。此外，支部不能随时抓住厂内厂外的事变，向工人群众做深刻的有力的宣传鼓动，经过各种各式的组织方式（如失业工人委员会、反日会等等），把工人群众团结在支部的周围，就是对于已有的群众组织，也时常缺乏坚强的正确的领导，甚至于没有领导。（七）缺乏经常的应有的政治教育，支部对于上级党部的决议很少作深刻的讨论，甚至于很久看不见党的文件。许多新同志在入党后得不到任何的训练，很少支部有经常的刊物（如壁报、小报之类）。同时支部不能根据自己的工作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与自我批评。一般的产业支部目前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路线强有力的积极的支柱。（八）忽视秘密工作，不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地方党部与区委不仅没有教育支部同志注意秘密工作，而且时常自己破坏秘密工作。支部同志特别是积极分子差不多完全向敌人公开，不能很好的取得群众的掩护，因此时常被资本家开除，为工贼走

狗所暗算，遭受拘捕和破坏，结果使支部不能稳固和壮大起来。（九）地方党部与区委对于产业支部的领导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没有彻底执行国际的指示："改变工厂支部在党的工作系统上的地位开始"，还没有真正的面向支部，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去改变党与群众的工作，缺乏与支部灵活的联系，不能具体的了解厂内与支部的情形，对于支部时常采用包办命令的方法来抹煞支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经常以空洞的一般的领导来代替分别的具体的领导，同时又不能依靠在主要的支部的积极分子上来改造一切厂内的工作，以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因此，地方党部与区委虽然在形式上跑得很忙，可是实际的领导是异常薄弱的。所有这些弱点，必然是而且已经是反映到整个革命运动上，对于汹涌澎湃的罢工不能给以强有力的领导，对于正在发展着的苏维埃与红军不能给以适当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对于广大的反帝运动与劳苦群众的斗争不能给以充分的无产阶级的骨干。这种严重情形，在目前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党如不能迅速地克服这种弱点，那是没有法子保证争取革命的决定胜利。

二、因此，目前彻底转变工厂支部的工作，创造和加强工厂支部，成为全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党要巩固和发展我们在产业支部工作上已经获得的成绩，采取一切有效方法来根本消灭所有以上的弱点，以便在工厂的基础上完全转变党与群众的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应该从改变工厂支部在党的工作系统的地位开始，应该以工厂支部为基础来执行党的任务，使工厂支部真正成为党与无产阶级群众联接的机关，来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执行上面的任务，中央认为在现有的产业支部方面必须立刻进行以下的工作：

（1）彻底转变厂内的群众工作，使每个产业支部能够经过

无数的桥梁，真正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核心。这里，第一，必须整个支部的生活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厂内的活动，切实了解厂内的情形，与大多数工人发生最亲密的联系。每个同志应该与工人建立个别的关系，能够预先体察到工人情绪中任何的变化，抓住厂内极小的风波与不满，来小心地准备与领导工人一切日常斗争与罢工。第二，必须坚决的进行建立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的工作，不容许一个同志不加入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同时要利用一切时机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群众的赤色工会或革命反对派，培养为群众所信仰的干部来充实工会的领导。对于一切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必须打进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揭穿他们的领袖，夺取他们的下层群众。第三，必须抓住厂内厂外的事变，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斗争委员会与群众组织（如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苏联之友、红军之友、反帝组织等），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于支部的周围，举行或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与集会，提高工人阶级政治的觉悟。第四，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紧和扩大厂内的宣传鼓动工作。这里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小报或壁报，每个产业支部应该建立小报委员会，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编辑或投稿，组织小报的读者和通信，以最浅显的有力的鼓动文字，来描写厂内的工人生活和事变，使小报真正成为党在厂内组织工人的斗争，夺取工人群众到党与赤色工会领导之下有力的武器。

共产国际在支部工作的问题上指出："如果党能在工厂支部中，确定了工厂内的工作任务，以及规定出加强党在厂内工作的一切的具体方法，那必然会在工厂基础上转变党的一切力量与工作方法"，这一指示是我们转变工厂支部工作首要的前提。

（2）巩固和改善支部的组织，使每个产业支部具有一定的正确的组织形式和适当的联系方法。这里，第一，每个工厂支部必须在区委直接帮助之下，经过有准备的民主的选举，建立真正有信仰的有工作能力的支部委员会（在没有车间支部的工厂一律称为支部干事会）。委员会的分工，一般的可以是：书记、宣传、组织、工会干事及群众工作干事，在女工特别多的工厂内，除尽量选举女工为委员外，妇女干事应该参加委员会，形成经常的集体领导。此外，对于C. Y. 必须互相派代表经常参加会议。第二，要根据生产部门（或班次，以易于集合为原则）成立党的小组（在七人以内而无特殊困难的工厂支部可以不成立小组），选举组长一人指导该组的工作。在大的部门内有七个党员以上的，必须选举三个人的车间（或部门）干事会，成立车间支部，以便在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指导这一部门的工作，并管理这一部门的小组。干事会的分工可以是书记、组织及宣传。第三，除了支部委员会、干事会及小组组长外，其余的支部同志必须实行精细的分工，例如建立小报（或壁报）委员会、宣传员、发行员，以及参加各种群众工作等。第四，特别要注意工会党团小组的形成，集合各车间做工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在没有这样分子的车间应该指定同志），以支部委员会的工会干事为首建立党团小组。在这个小组内经常讨论工人的日常斗争与工会工作问题，一方面自己在工会中去执行，同时反映到支部委员会和各个小组中去讨论执行。对于其他的厂内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反帝分盟、红军之友等以及其他的辅助组织（如俱乐部、读书会等），均应有党团的建立，由支部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干事管理。如果这些群众组织的人数很少，则可以不立刻成立党团，而只指定一个同志对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党团的方法，除群众工作干事经常的分别领导各

党团或召集各党团书记联席会外，支部委员会必须按时听这些党团书记的报告。第五，支部委员会、干事会、各小组、各党团应该整个生活在工厂内，利用厂内时间，经常接头或举行短时的会议，传达党的指示，解决厂内日常发生的问题。支部委员会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形，来调剂会议的时间与次数，务使工人参加会议不感受很大的困难，并能适应秘密的条件。第六，为着在秘密条件下永久保存支部的领导，每个支部委员会应有一个候补书记及两个候补委员，他们平时不要积极的在外部活动，以便在支部委员会破坏时，继续支部的领导工作。

（3）加强和改善支部的政治教育，使每个产业支部真正能成为党的政治路线有力的积极的支柱，努力不懈的耐心的去教育和培养工厂支部的中心干部，依靠着工厂支部新的强有力的干部，作为改变支部工作的支柱。这第一，就要每个产业支部有充分的经常的政治生活，按时研究和讨论上级党部的每个决议和文件，依照中央或地方党部所发的大纲，来求得每个决议深刻的了解。同时这种讨论应依照上述的车间（或班次）小组来分别的进行，每组组长事先应督促本组同志做准备的工作，同时支部应指定一部分同志（或要求区委派人帮助）帮助那些文化程度低的同志解读文件。第二，政治教育与实际工作是不能分离的，支部委员会必须根据一切工作的进行与各个同志的责任，领导和发展支部同志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启发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注意支部中的优秀分子，随时给以个别的训练，并提拔他们担任较重要的工作。第三，对于党报或其他定期刊物、革命的理论书籍，必须采取集体的研究与互相帮助的方法来鼓励同志们阅读，提出各种有趣的问题，征求同志的回答，同时在放工或休假的时候，支部亦可根据自己的力量举办短期班或谈话班。第四，对于新加入党的同志，支部

必须特别给以政治教育，应将共产党员起码的常识很仔细的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很快的同化于共产党的队伍。

（4）必须把征收党员的工作当作一个战斗的任务来进行，使每个产业支部都能握住企业中主要的部门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第一，必须抓住目前的顺利条件，反对各种各式的关门主义与官僚主义，实行大规模的征收党员的运动。每个产业支部应该根据自己的弱点，有计划的打入主要的生产部门，加紧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大胆的吸收一切先进的觉悟分子入党，不让一个群众的领袖留在党外，特别的征收运动（如“九一八”号召）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必须采取的。在上海成立纱厂工会的运动中，当场有八十几个工人热烈的加入共产党，这种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能加紧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加紧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越能使征收工作得到极大的成功。必须与将征收党员的工作和领导斗争加紧群众工作分离的倾向坚决斗争。第二，经常的个别的征收应该是支部征收党员的主要的方式，一切认为个别征收就是“和平发展”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每个同志都必须负起征收党员的责任。第三，要加紧征收女工入党，特别在纱厂、丝厂、烟厂等产业里，一切对于女党员征收的忽视，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第四，对于新入党的工人同志的工作必须有最大的注意，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使每个新同志都能受到一定的教育，具体地考查他们的来历与能力，分配以适当的党的工作，遇有流动现象的发生，支部委员会必须仔细的讨论，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方法来消灭它。

（5）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努力争取公开的活动，使每个产业支部完全适应于秘密条件的存在，成为地下党在企业中不可动摇的堡垒。这里第一，在工厂中的党员，除非在必要的时候

须以党的名义向群众说话以外，不应在举动上使其他工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第二，支部会议与支部委员会等等的会议，必须选择适当的时候与地址，以防备工贼走狗的暗算。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宜过多，应尽可能的缩小分开举行，在会议或谈话时不要用真名字。第三，支部同志必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时时争取群众的拥护，经过工厂小报、个别谈话及其他公开或半公开的宣传向工人群众鼓动。党的秘密文件应该特别小心保存。第四，最大限度利用公开及半公开的可能（如互济会、反日会、识字班……），对于一切厂内的敌人组织必须设法打进去。第五，对于新同志必须给以秘密工作的常识，考察他们的履历与政治面目。第六，必须加紧反对白色恐怖，尖锐的揭穿一切叛徒的言论与行动，号召工人组织防御团，同时在同志中加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

三、估计到许多大产业区域与个别的企业中，至今没有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失却了很久的阵地，或者只有个别的线索与同志，因此，与上述的任务不可分离的就是要进行坚苦的创造工作来建立新的产业支部。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

（1）各地党部立刻提出战斗的计划，动员全党来讨论重要企业的创造工作。在每个支部中同志中找出当地的重要企业的线索，推动支部同志向他做工作。同时要多方面来动员青年团、工会、互济会等，用同样的方法在自己组织内找出线索来。从上海沪西大罢工、电话报馆的罢工以及其他工厂的斗争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坚决的去领导和参加工人的斗争和罢工，我们便能在那些企业里建立我们的强大的支部，恢复我们在立三路线中失掉了的阵地。这个宝贵的经验各地党部必须采取。

（2）决定有能力的党员设法打入生产，如果不可能，就要

在工厂附近工房中设法接近工人，去了解这一工厂的环境、工人的痛苦，同时集中各方面的线索，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

（3）动员工厂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街道支部，在上工放工的时候，工人休息吃饭的地方去与工人接近、读报、谈话，进一步到工人家里去，建立经常的关系，向他做工作。

（4）在自愿的基础上，动员强有力的支部同志广大组织突击队。突击队要完全到群众中去，接近各种工人。突击队要讨论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接近工人的口号。领导机关对于突击队要有经常的监督、具体的领导，用各种方法鼓励同志的积极性。

（5）把所有工厂线索集中化，最迅速的形成组织。开始可以先建立群众组织或附属组织，使他们经常与我们接近，了解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同他们讨论解决方法，发动厂内斗争，抓住他们中间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

（6）对于没有我们组织的大工厂，党应当经过各种方法传播党的影响。在工厂附近与工房中，散发传单与写贴标语，运用各种公开路线到群众中作口头宣传，把飞行集会与分区示威的时间与地点，适应大工厂的工人群众，吸收他们参加政治运动，这一切工作必须紧紧与组织工作相联系。

（7）另外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经过组织工作团来创造和加强企业中的工作。要运用这种工作方式，必须坚守以下三个条件：1. 选择两三个适当而能坚苦工作的同志，给以必要的训练，同时这些人过去必须有某种产业的经验且适于当地的环境。2. 与上级党部保持最亲密的联系，同时受当地党部的指导。3. 在开始工作时必须确定具体的任务，为着一定的目的而斗争。

每个产业都有特殊的不同的情形，党去进行创造工作时，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在群众中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才能完成

我们的任务。

四、为着产业支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求一切领导机关实行“面向企业”的口号，集中最好的力量放到产业支部的工作上，应该根据上海的经验实行对于支部的直接检查，区委和地方党部必须依照以下的方向和办法来转变自己的工作：

（1）彻底实行新的领导方式，根本消灭与工厂和产业支部隔离的情形。区委要用一切方法深入到支部中去，与支部同志详细谈话，具体了解工厂环境，群众的情绪与支部的情形，帮助支部同志解决一切工作上的困难，回答支部同志一切工作上的疑问，坚决的为具体的分别的领导而斗争，同时要尽量发展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养成支部自动独立工作的精神，肃清任何官僚主义的包办与命令的方式。这种具体的方法应该是：第一，根据秘密环境，建立区委与支部亲密关系，尽可能的把区委机关建立在支部同志的家里。区委的个别同志应该与主要的产业支部书记生活上打成一片，利用工房召集支部的各种会议和谈话，详细的解释党的一切决议。第二，无条件的消灭仅仅由区委委员（或扩大区委）来管理支部的办法，立刻从产业支部中选出一批积极分子为支部巡视员，给以经常的训练，并保证对于他们的固定的领导（区委委员每人应该领导一部分巡视员）。这些同志一般的应该不脱离生产，不拿生活费，每人只管理一两个支部，他们平时是区委最好的帮手，在区委破坏时就成为支部的唯一的直接的连系者。第三，抓住支部的中心分子，给以特殊的训练（如夜班、短期班、谈话班等），使每个产业支部都有一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区委依靠在这些分子上，就能开展和巩固支部的工作。第四，在开展具体工作的基础上（如征收党员运动），组织支部同志的革命竞赛，永远抛弃纸头上的空喊。第五，经过产业支部广泛的建立中央与

地方党报的通信网，使厂内的情形与产业支部的工作状况以及支部同志的意见，能够经常的反映到党报上来，同时支部能够从党报上得到许多具体的指示与帮助。第六，估计到秘密环境，区委管理二十个以上的支部是不适宜的，各地党部应根据实际情形缩小区委的工作范围，建立新区委。

（2）在地方党部与区委下面，坚决的不懈的创造几个模范的产业支部，使这些支部在实际上能够成为这一区域一切政治运动的中心，能够首先响应党的一切政治号召，能够作一切产业支部的榜样，这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为实际的进行这一工作，中央认为：第一，必须永远抛弃以为这个任务可以用决议或通告解决的思想，应该在几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并由这几个工业中心决定几个最主要的工厂开始。第二，保证给指定的工厂以强有力的支部巡视员。第三，区委与地方党部都应指定一个常委同志为指导员，对这个指定的工厂专门负责，经常帮助该支部巡视员的工作，并与他一起制定改善这个工厂的一般的工作计划及最近的具体任务，假若为秘密工作所不许，省委或类似的地方党部可以经过巡视员与支部巡视员发生关系。第四，地方党部及区委必须经常的（至少两星期一次）听指导员关于指定工厂的工作报告，每次立即采取迅速的办法来加强工作，并纠正所犯的错误，同时必须重新分配党的力量及做出组织结论等等，并广大的在党报上及党的会议上散布这个工厂的经验。

（3）尖锐的提出考查现有领导干部的问题，这考查的观点应在他们是否能在产业支部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是否能直接在工厂中组织工人，配合一切秘密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作。党应该勇敢地提拔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起来的新的力量，坚决的排除那些在目前阶级斗争紧张中表现不能领

导党的工作的分子，经过有准备的区或地方党部的代表会以及随时的提拔，来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与区委的领导。同时要坚决的进行训练新干部，重新教育老干部的工作，肃清一切哭诉干部恐慌，不了解干部的倾向。

（4）加强对于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使他们一样能够把最好的力量放到主要的产业中去。为达到这一目的，地方党部和区委应该有系统的召集这些组织中负责同志的会议或谈话，讨论一切关于在工厂中工作的问题，务使这些组织的工厂内工作特别是中心厂的工作，能够与党的产业支部工作很好的配合起来，消灭一切厂内工作的分离主义。

（5）各地党部必须根据这一决议，开展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检查当地产业支部工作的状况，并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保证这个决议的执行。同时中央责成江苏、河北与满洲的党在“五卅”以前完成考查上海、天津、唐山及满洲的主要企业与工厂支部的工作，供给中央一切必要的材料，以便在中央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制成关于这些地方产业支部工作的专门指示。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广东军与十九路军的欺骗宣传已经深入了广大群众，一切发动群众斗争的政治工作必然失败，所以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

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是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是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深刻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斗争》第三期。

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就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指出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斗争的不坚决，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

（三）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的顺利进行。

（六）立刻撤消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七）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中　央　局

二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罗　明

省委：（杭龙工作另作报告）

依据敌人在大举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这是巩固闽西与闽北打成一片发展计划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这个最好的时机来进行这一工作。

我虽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据震林同志说东南指挥部和省委、省苏这一方面还是采取缓进的计划。我认为缓进是失了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抽出很多力量（关于军事力量、党和政府的力量）应该采取猛进急进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

我的理由是这样：

（一）这一带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直接的混合，很容易消灭他，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斗争中，可以锻炼我们汀、连、新泉一带的地方武装（只要一个小的主力来领

导），在许多小仗当中来强大他们的战斗力，以便很快的能与白军打仗；同时，可以在这样的发展斗争中，取得许多小小胜利，来提高连、汀、新泉一带群众斗争的情绪，锻炼群众中在战争的自信力，这是大战紧张中一点非常必要的工作。

（二）这一带区域的争取与开展，不但是汀、瑞最及时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开展，可以威迫敌人打击敌人，对新泉以及对白砂的前进，使我们多很多时间来加紧长汀、连城，新泉、上杭各地紧急动员工作，多发挥我们战争的力量，威迫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不能前进，不能急进，不能顺利与各路配合，使敌人疲倦削弱，暴露更多的弱点……争取时间……，一天一点钟都要争取。

（三）要在这时才比较好争取这一带新区域的群众工作，和巩固我们党和政府在这一带群众中的强固领导。

（四）过去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虽然在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但失了时机，不能及时的争取与巩固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错误。

现在争取连南、汀东南……这一工作，要学习北四、五区与岩西北的严重教训，再不要失了这一最好的时机。自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进行。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抓到这个时机，我们可以得到多倍的成绩。

过去因北四、五区工作垮台，以及北四、五区邻近区的工作很差（上杭的华家亭，新泉的新泉、芷溪一带）。十九路军和傅柏翠最近就有可能向新泉方面游击。如果敌人向这方面游击时，就要增加我们在连南、汀东南工作一带的困难：一方面团匪、地主、富农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要更加活动起来，在我们后方，侧面及内面来捣乱；主要的群众方面，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弱，在战争紧张中，生活方面和情绪方面都要受到大的

影响。我们要估量到那时的情形，及时建立这一带工作，不要到那时来慌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消灭那时慌张应付的状态，这也是龙岩和宁化方面所得到的教训。

根据上面四方面，我们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集中红军行动及扩大红军方面：我们应注意到十二军头上了，我们要迅速造成新的主力，要抓紧第八师、第七师，扩大和加强政治军事上的领导，使这两师能扩大到三师，成为能集中行动、与十二军一样的主力。这个主力的行动，应该向闽西与闽北之间一带积极行动，以争取永安、消灭卢兴邦为比较常定的目标，这样就更加更有利与北面主力配合而又能与闽西联系。

我认为这要迅速做到：

我认为独立八师可以留一团配合特务营（可改为八师第七团）在杭、永行动，配合杭、永二个独立团及岩太游击队（永定独立团只有一连配合游击队等有一团的兵力。上杭不久即可成立一独立团。岩太游击队有二百余人，等于一个独立团，我认为名义可以不拘束）来行动，来打击向杭、永进攻的敌人。同时，要配合各种力量各方面力量以夺取龙岗、上杭城为比较常定的目标，配合第十师向武平与江西会昌、寻邬联成一片。

在杭、永应保存八师的名义，使在群众中不致产生不好的影响……。

现在的八师可抽一团，及再扩大一团，由七师调一团，新成立一师，可以用十二军第××师的名义。因十二军在闽西有威信了，很迅速的调动连城、□□来行动。在连城方面还有第三、四独立团及第九师一团来配合。

必要时，第七师、第九师可以配合起来集中行动。我认为军区指挥部应立即搬到南阳来和政治部一块，多注意布置新

泉、连城向闽北发展的军事行动及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一定要迅速加紧这一方面向北发展，使闽西、闽北巩固的打成一片，积极的与北面主力来配合行动，来消灭敌人从北面的进攻；同时，消灭十九路军向闽西方面的进攻。

如放松一点，如放了这样最好发展的时机，那就是大大的罪恶！

这样不但不会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不致使杭、永孤立。

在杭、永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分区来指挥。

上述的意见我已和谭震林讲述几次了，他还没找到这个时机，及时的迅速的做到这一点。

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不要放过这一时机。长汀在目前战争环境紧张中，比较容易进行政治动员，打破党内小群众太平享乐的观念；同时，又不会产生很恐慌的状态。这是最好动员的时机。

上杭环境就比较不同了，扩大红军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我们要加紧动员……。

省委请作多帮助长汀进行这一最中心的工作啊！

我们在上杭会再找到扩大红军最有经验的来长汀，帮助扩大红军工作。以前派了五个人，不知工作如何？

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主力红军，不但在群众比较容易直接动员，就是独立团、独立师、赤卫模范营、模范少队中也可以比较有组织的抽调大部分来到主力红军（过去有这样的事实，鼓动中来抽调不

是改编硬编)。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我们强大地方武装中要与主力红军的扩大和联系、宣传鼓动中与组织上都是如此。

关于扩大红军问题我以前有两封信，此处不再说了。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际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

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不愿打，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仗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分兵保□自然是绝对错误；不估量地方武装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一定要地方党和政府很小心的领导，在比较内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参加作战，最好时常配合比较能打的部队多打仗。

照中央政府命令，加紧政治军事训练和党的领导是对的，特别是检查阶级成分和政治军事成分。

同时，我们应特别注意：

打一次胜利的小仗，胜过关门训练十天，胜过打三次野操。

先有一连基干能打的赤卫军来领导，胜过三五连大家同样的赤卫军。

上杭过去编了很多赤卫军模范营、模范队，也打过了一些仗，这次打大仗大散特散，这是因为实际作战没有中心基干能打的部队来领导和配合。

我们要了解推动地方武装发展，不断对主力红军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推动群众斗争，转变当地群众斗争情绪一个主要

的工作。“比于江西打两次大胜利，对这方面群众中自然一个大鼓动，但如果当地地方武装时常打败仗，群众时常受摧残，群众斗争的情绪还不能更积极发挥，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关于各县区工作：我认为整个任务之下，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

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以找到各县区特殊的任务。

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还是不好的。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各区……，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的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永定上下溪南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近来永定、上杭工作比较有点[1]

如果这样来领导当地工作，又会进步又更好，出更多红军。

近来上杭、永定方面，我们就靠这样的领导来转变，来在

目前的环境中来动员群众斗争，已得到了许多战绩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根据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周恩来关于积极佯攻南丰以引敌增援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中央局并慎转中央：

甲、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乙、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干。

丙、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

丁、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戊、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

恩　来

十五日一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秦　邦　宪

同志们！

在我们了解了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之后，我们必须说到党在目前所应采取的总路线的问题。大家知道，党的策略路线是随着整个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而变动的，是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与低落而变动的。斯大林同志说：

“策略是随着运动的高潮或低潮而变。譬如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时（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是不变的，但策略则经过几次改变。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那是革命的高潮，运动继涨增高，策略必须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的形式是革命的，是适应革命高潮要求的，……斗争形式变了，组织形式亦随之而变……

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这一时期，党不得不采取退守的策略，因为那是运动的低潮，革命的低落，策略不能不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能不变。”（《列宁主义概论》）

我们现在要问，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进攻的呢？还是退守的呢？没有问题，在目前我们党的策

---

* 这是秦邦宪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政治报告的一部分，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斗争》第三期。

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

目前正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终结，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条件迅速成熟，整个的国际形势正是处在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所以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面前极端锐利的提出实现各国共产党在目前基本任务的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众，去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十二次全会决议），这就是说要各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的进攻路线，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要不失一刻的去加强并促进为夺取工人大多数，为提高工人阶级革命积极性的布尔雪维克的群众工作”（同上）。

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着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式之下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这就要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一，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斗争；第二，必须动员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来反对与粉碎国民党对于苏区和红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苏区，将各个苏区联合起来，争

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加强巩固与猛烈的扩大红军；第三，必须在非苏区中，在发展工农群众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之中，去准备和领导他们配合着红军的胜利的进攻，来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第四，必须一分钟一秒钟不迟缓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这就要我们采取坚决的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组织与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黄色工会内工人的路线；第五，在农民中，党必须经过一切为保护农民日常利益的斗争来广大地发动游击战争。在满洲更需要提出农民委员会反抗一切捐税和政府的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与组织民众选举的政府的口号；第六，就是要把苏维埃建设的成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传播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并且最广大的解释和宣传苏联与中国工农兄弟联盟的口号。所有这些，就是共产国际和党目前所采取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我们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怎样把这个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在全部党的实际工作中间具体化起来和实现起来呢？

在目前我们正处在与敌人大举进攻作坚决争斗的时期，正处在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关头，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屡次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及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增涨的时期。反革命的国民党最无耻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军事上的力量，向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苏维埃进攻，特别在目前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大举进攻。反革命的大头目——蒋介石第二次到了南昌，新的几师军队正向着江西，向着抚河流域开动，这是国民党军阀在所谓第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虽然，我们武装上数量上还远赶不上敌人，但是在全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上，显然现在比以前更加有利于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不满，工农红军英勇善战

和历次战役的丰富经验，以及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都告诉我们，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切条件。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全部的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

所以，目前苏区党面前的重大的历史的任务是“最积极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及准备组织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和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作坚决无情的胜利的争斗”（中央八月指示信）。这在目前就要求我们抛开一切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去求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来开展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局面与形势。

根据目前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中央局在二月八号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下列的立即执行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从二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闽赣两省必须输送一万（赣七千闽三千）新战士到前方。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着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照中革军委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

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的工农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生产。……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应以最大力量立刻加强对新发展区域的领导。……

（八）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应以二月底前完结……作战区域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兵及白军俘虏工作……”

所有这些便是我们主要最紧急的任务，亦就是进攻路线在目前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要的内容与实质。只要我们能够以布尔雪维克所特有的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我们将有一切的把握，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正像我们粉碎一二三次“围剿”一样！

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雪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哪里呢？

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

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罗明同志对于闽西上杭、永定几年来与敌人作长期坚决争斗的工农群众，作了以下的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大池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接着罗明同志用慷慨激昂之笔写道：

“同志们！听一听我们群众的呼声呵！在群众这样的痛苦中，在群众的痛苦的呼声中来了解自己的主要错误!”

到底什么是自己主要的错误呢?可惜罗明同志没有说，也许是我们没有及早的妥协屈服以使“群众”受这样的痛苦吧!!这正是罗明同志的退却路线的实质，而这段话同时又给说明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社会根源，这种社会基础便是那些“心里是红的”而实质上是白的，或者心里是白的，表面上是红的那些人。我想大家都明白的，这些人便是那些地主豪绅的残余与富农，或者受着他们影响极小一部落后的农民群众。这些人便是罗明同志的“我们的群众”!为着解除他们的“痛苦”，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痛苦”，罗明同志便主张逃跑退却，好让他们去“妥协屈服”，得到在国民党政权下“解放”。在另外几个地方，罗明同志亦用同样的笔调去污蔑英勇斗争着的劳苦群众，如说：

“少先队改装，不戴少队帽，妇女装假发，用布包头，恢

复旧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罗明同志对于群众情绪与群众力量已经有这样的估计，那么怎样去实行党的进攻路线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岂仅罗明而已，就是全世界上最好的革命领袖亦没有办法，罗明同志正是这样大言不惭的写着：

“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既然这样，那区区罗明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大概高明得不多吧！），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是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所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主张：

“（一）……二四军团必须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以便更大的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中央区的行动，……

（四）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的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

（五）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六）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见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有许多训练与组织不好，不但不能配合红军主

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是无益的。因此地方武装不要只顾数量的多，而要顾作战能力，……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这便是罗明与杨文仲同志的政纲，自然罗明同志在他信里有许多地方要委婉曲折一点，但是基本的立场是一样的。这个政纲不能不说是完全反对共产国际与党的进攻路线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退却路线的政纲。

党的决议写着：“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二月八日决议）

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下命令一般的要“二四集团军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更进一步，那当然是调赴中央区，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立三同志过去要苏联出兵蒙古，红军出动响应的提议了。不过右倾机会主义者更懦弱一些而已！

党主张：“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第一，扩大红军边区应该例外，边区是不能扩大红军的。第二，“扩大三百主力红军还不如扩大一百地方武装”。第三，党不应管扩大红军的事，这完全是党代替了政权。

党主张：“号召所有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及“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不见得少”，而且多了反难组织好训练好，“不但不能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是无益的”。所以，

“关于地方武装方面目前最中心的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罗明信）。

党主张：独立师团等等应该积极的进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路线……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边区要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机会主义者说：“因为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在内——古[1]注）过于软弱，一打就垮”，所以他们只能用来去打连南、汀东南的团匪，这一带的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和白军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并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中，可以锻炼地方武装的战争力……以后很快能与白军打仗”（均见罗明信），关于组织强有力的运动防御战，那更可不必，只要向北发展。军区指挥向北一迁，那就“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这样不但不会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能不使杭永孤立”。

党主张：最广大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群众组织。

机会主义者说：“反帝同盟拥苏同盟及青年部，革命群众团体名目太多……必须尽可能减少或合并”。其实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又简单又少麻烦，或许更合杨文仲同志的胃口吧！

党主张：党应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机会主义者主张：党应该从领导国内战争——阶级争斗的最高形式中脱离出来，而去研究各种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就是要党从领导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布尔雪维克的群众的党，回到从前那种学究主义的研究性的小组织去。

同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

向取消主义去的退却逃跑的路线。

为着要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我们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传播到党里面来，传播到群众中间去。布尔雪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因此，对于这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的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外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雪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同样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会在敌人大举进攻的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雪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使命！

在今天红校第四期学生毕业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应该说：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支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更加

坚决的更加积极的为着党的路线而战，为中国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战。同志们！高举我们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我们工农红军的光荣的旗帜，团结在中央和中央局的周围，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实行布尔雪维克的全线的进攻，走向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秦邦宪（博古）。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

（一）

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革命的阶级斗争中之革命理论与策略”（列宁）。“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争求解放的旗帜和武器。我们党应比前加倍努力与更广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劳苦群众中去，来武装他们，以争取伟大的解放。

中央号召全党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宣传，要将这一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联系起来。要切实了解和执行列宁所给予我们的遗训：“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与一般庸俗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向盲目无知的群众宣传日益成熟着的革命之必要，证明它之必不可免，解释它对人民的益处，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及被剥削的群众来进行这一革命。”

二、四年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之日益深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转成或迫近革命的危机，使科学、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遭受极端的厄运，而苏联五年计划之伟大成功，使政治、经济、学术皆蓬蓬勃勃地向上发展。国际革命运动与中国

苏维埃运动之伟大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之日趋于死亡。在这些影响之下，便形成了表现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与深入的中国思想界里的左倾运动。另一方面，为了在这一狂风暴雨中挽救旧的统治，便以托陈取消派及各种共产主义的卖淫妇为骨干而形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呐喊与满身血腥的法西斯蒂运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加紧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战线上，向一切假冒的马克思主义和公开仇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攻（如“读书杂志派”、“苏俄评论社”与野鸡的“社会新闻”等），这一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今后在我们全盘宣传与鼓动工作中要真能做到与敌人的言论思想针锋相对，坚决去掉“关门说道”的毛病，另一方面要利用和争取一切公开可能，以加强与扩大思想界的左倾运动，树立在这一运动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领导。

三、孙文的三民主义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孙文以自己之“民生史观”、“劳资合作”及否认中国社会里之阶级与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的整个革命学说对抗。而孙文的信徒们更发挥了孔、孟、孙文之正统，谓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惟三民主义足以救国的“理论”，以为国民党刽子手用铁血手段来摧残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及一再大举“剿赤”的张本。中央号召全党要努力解除国民党在思想上的武装，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数年来统治之下的具体事实来揭破和粉碎孙文的三民主义，即刻动员我们党的优秀的理论力量对三民主义加以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同时要向一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败类和公开投降国民党的叛徒们作残酷的斗争。

四、马克思主义之发扬光大，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

党数十年内在国际舞台上与党内党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支流艰苦斗争的结果，而布尔塞维克主义正是从这一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是分截不开的。布尔塞维克党之发展与巩固也正由于在两条战线上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为基础与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斯大林）。

在目前革命阶段上，右倾依然是党的主要危险，立三路线的残余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以及各种形式的“左”倾关门主义，都正在妨碍着我们党顺利地执行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所给与我们的六大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与深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联系起来。

五、革命愈往前发展愈深入，我们党组织也越发扩大。为了教育新党员，使党在组织上更形巩固，彻底克服党员的流动性，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因此以加强全党的战斗力量，加速和加深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来配合中国的革命形势，所以加强党员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实为我们党在目前非常严重迫切的任务。

六、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已完全叛卖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在真能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的共产国际。中国党也只有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才能获取中国大革命的胜利。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将十二次全会的决议传达到每一组织、每一支部。而本此决议中之六大任务，对准各地的具体环境制出各地每一组织、每一支部的具体的工作计划，并切实为实现这些计划而斗争。

（二）

中央根据上列的各个任务，更有以下的具体决定：

一、责成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的纪念大会，根据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年纪念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预先指定同志向各纪念大会作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解的报告，在每一群众的纪念大会上必须组织强有力的党团来尽政治上和组织上指导的责任。

二、在各地各组织所召集的群众纪念大会上，党、团的同志须以说服的方法，向大会建议应在各该组织里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当场征收发起人。在这些组织中，各级党部须派得力同志参加，传达党的影响。

三、向文委提议发动左翼作家在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组织马克思逝世五十年纪念大会，报告“马克思的学说”，并向社会科学研究会提议经常地组织社会科学演讲会。

四、各地党的刊物应立刻筹备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并由文委设法动员同志及左翼作家多投稿件到许多非党的刊物及设法与这些刊物建立经常的联系，用一切方法打进去影响他们。

五、各级党部应即刻在广大群众中发起拥护党刊和其他革命刊物的工作，并组织群众的募捐。组织工农士兵学生的通讯网。改善发行的工作。

六、责成中央宣委立即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和“十二次全会”各种小册子，并印刊斯大林同志与美国工人代表团之谈话的单行本，须于马克思逝世纪念日前散

布出去。“三民主义之批评”一书尤须于最短期间内完成。

七、各区部宣委应帮助各支部出版纪念马克思壁报，文字要非常通俗，尤须与支部的生活和他的具体任务联系起来。特别要经过支部发动拥护救国会议的工作。

八、委托中央宣委考察党内教育系统与概况，且拟定加强党内教育工作的具体建议，在中常委会讨论。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中央局完全同意党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中央局认为：现在党省委内一部分同志的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它的形成，已有了长久历史过程。远在闽西特委时代（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在卢德光领导之下，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对群众力量根本不信任，依靠军事力量的观点出发，从机会主义的退却的观点出发，而放弃虎冈一带苏区根据地，向汀连退却，即是这一退却路线的萌芽。由于阶级战斗的日益尖锐，敌人的大举进攻，由于省委不能坚定的站在中央和中央局的正确路线上，领导全党迅速的给予布尔塞维克的猛击，使得这种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观点，逐渐发展，而到最近最后的形成了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而且这一机会主义路线一开始形成，便表现了他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这一路线，现已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的道路。最近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这一取消主义的政纲。

党省委大多数同志，以刘晓同志为代表，不能站在党的路线上，坚决反对罗明路线，为党的路线斗争到底，而对罗明路

线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态度，这实际上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投降，而且助长了他的发展。

这里，中央指出：团省委书记陈荣同志，虽然几次的在党省委中对罗明路线作了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他缺乏布尔塞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彻底性和顽强性，没有能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

中央局为加强团省委的领导，决定派冯文彬同志任省委书记，刘帮化同志去任省委组织部长。要求团省委全体同志，在党和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之下，坚固团结一致，为拥护党和中央的路线，反对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而作坚强的斗争。

中央局并责成省委将这一斗争，开展到闽粤赣全团去，在团内作广大的解释工作，向全体团员正确的解释党的路线的唯一正确性与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领导全团为着党和中央的路线斗争，集中火力向着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

为深入这一斗争，中央局决定在党临时代表会议之后，举行团省委扩大会，中央局派一同志去领导这个扩大会。

中央局认为必须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要求各级团的组织讨论中央局这一决议，并向全体团员解释这一决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周恩来、王稼祥关于政治工作给各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聂罗李，滕贺，朱刘旷，萧，李，黄，李，蔡，谭[1]：

蒋介石大举进攻的部队已向着苏区开动了，决战就在这两天开始。这是连续残酷的战斗，应号召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给反革命的进攻以迎头痛击。这必须：

一、坚强红色战士的胜利信心与斗争决心。

二、要求全军行动达到最高度的坚决迅速与秘密，并绝对服从上级命令。

三、为不放过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机会，要克服一切疲劳困难进行战斗，在这儿党员应当以身作则。

四、要利用行军宿营与作战的瞬息时间进行鼓动，以消除疲劳与提高士气。

五、要提出最实际与鼓动的兴奋口号。

六、在上火线前，要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开各连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与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会。

七、要揭破敌人欺骗，由师政治部派人有组织地在火线上向白军士兵宣传。

八、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一分钟也不要失去与群众的

联系。

九、要执行行军宿营尤其是火线上的纪律。

十、在战斗中实际检验并坚决洗刷一切动摇异己分子，反对对进攻路线动摇的退却与纯粹防御路线。

十一、领导党员在战斗中成为绝对的模范作用。

十二、要反对慌乱，要与开小差及一切闲杂人员堆积在后方机关与妨害行军序列做斗争。

十三、不准未得许可扶伤兵下火线，教育士兵不要因受伤而啼哭，以免影响其他战士情绪。

十四、要负责收容落伍病员，不容有一个落伍人失了联络。

十五、各级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机关保障上述各项绝对的执行，成为顺利地争取四次战争全部胜利的先决条件。

周 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聂荣臻、罗荣桓、李卓然，滕代远、贺昌，朱瑞、刘伯坚、旷朱权，萧劲光，李井泉，黄甦，李富春，蔡树藩，谭震林。

周恩来关于黄陂战役胜利后的部署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中央局：

甲、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故在第二日消灭五十二师及五十九师大部后，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十一师增援队，致昨日战斗未完全解决，只继续消灭五十九师，但胜利是空前的。本日，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开始向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准备继续战斗。

乙、因此胜利，敌已纷纷调动，除十一师、二十八师已来河口外，第九师由南城今日抵杏坊；二纵队由南丰、里塔圩、新丰移至永兴桥、饶坊之线，明日逼近东陂、黄陂；三纵队一部一日已占领硝石；今日五师又被调龙骨渡；六师、七十九师则改在南城河西集中。

恩　来

二日二十三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与青年们！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又在轰轰雷鸣。城市的焚烧，士兵与贫民的被残杀，广大的无家与饥饿的群众，都表示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和平与秩序”。轰炸上海与席卷满洲之后，征服热河的战争是在全力的猛进着；长江的要塞与沿岸的海口，受着炮轰与封锁的威胁。中国的民众又一次的不得不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热河，是进一步瓜分中国之决定的步骤。热河是帝国主义在军事上与经济上支配北部中国的锁钥，有计划的进攻蒙古的关键。

日本军阀在攻取热河的过程中，它将掠夺平津与华北，它将进攻蒙古，作为重分中国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准备之新的步骤。中国的群众很清楚的知道，强盗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要征服整个的中国，是要在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利用中国的富源与人力，是要驱使中国的群众去作进攻苏联战争的炮灰，正像驱使满洲的士兵来进攻中国的兄弟一样。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三十五期。

国民党政府及其报纸颂扬国联的决定是中国的大胜利，这完全是欺骗民众，作为它继续依靠国联的无耻的借口。事实上国联的决定——这一准备战争与缓和帝国主义内部对立的工具——只不过给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自由的处理。国际联盟的决定是没有丝毫的价值，因为国联不仅拒绝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行动，而且其有力的会员，英国与法国的政府，在日本尊重各该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与最近将来开始进攻苏联的谅解之下，保证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全力去实现它侵略中国的计划。同时英国与法国之赞成国联的决定，只不过为对美取得战债之有利的解决与欺骗中国及其本国民众来掩盖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干涉中国革命之真实目的！

美国政府——不管它对英国的竞争与敌对日本是如何增长——拥护国联的这一欺骗政策，它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战争，称为"日本与中国间的纷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是愈益强硬了，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加者了。最近美、法、英、意在中国的代表者会议决定要求本国政府增派军队来华一事，就是明显的证据。各国政府已经决定增派更多的军队与军舰来华了，在"保护其利益"的口实之下，准备着中国的"国际共管"与中国民众之进一步的奴隶化。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增大着的对立，是要在中国民众的身上决战。

在这民族危机的时间，国民党及其政府做些什么？它帮助武装民众并组织武装义勇军部队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么？它允许了民众以最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来使民众团结起来，做有效的抵抗么？

没有！恰恰相反，国民党使用一切力量，镇压中国劳苦群众的抵抗，以鼓励帝国主义的进攻。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大军进

攻江西、福建的工农群众，进攻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武装力量——工农红军。他想粉碎他们的苏维埃，他想把土地归还给历来剥削与压迫群众的地主与豪绅。全部飞机、大炮与军火都用在这个战争上，而坐视义勇军和武备不整的军队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与炮火之下。其他军队不是遣去进攻鄂豫皖及北部四川的苏维埃以及其他红军，就是镇压各省的工人与农民。

在国民党这一罪恶——这一背叛民族的罪恶之下，热河要镇如北票、南岭、开鲁、朝阳、赤峰等遂相继失陷，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平津亦告危亟。蒋介石则拥兵于江西，进攻苏区，只在宣言上空谈抗日，何曾真地去援救热河？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汤玉麟则为要保存其直属部队的力量，已经一再下令退兵，让地方的义勇军去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与大炮的牺牲、轰击。北方的总指挥张学良也是一样，他所想的不是抵抗日本，而是如何准备其在北方各省的地盘及如何维持剥削贫困的工人、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统治权。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对于这些军阀的卖国行动必须完全负责，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政策。蒋介石以虐杀江西、福建的工农向帝国主义表示，他乐意与帝国主义谈判共同剥削中国群众的协定。他拒绝指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因为他要留下和日本讲出卖中国条件的门户。

但是抵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意志，在广大群众中增长着。要求政府派遣全部飞机、最好武装与军备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军队去抵抗日本的侵略，集中力量保卫中国，收复满洲与热河的要求，是一天天的增大着。中国共产党拥护凡可以增加抵抗力量的群众的一切要求和行动。中国共产党因此完全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

会的最近提议，即在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之下，愿意与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任何部队缔订作战的协定。这个提议完全指示出了国民党的欺骗，说工农红军的权力一天存在，就一天不能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于这一提议之回答，是更加疯狂的派遣大军去进攻苏维埃及其红军。

只有完全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指出的条件，才能有效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条件是：

一、立刻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因为只有派出所有的力量去抵抗外国帝国主义才有挫敌的可能；因为苏维埃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民主的国家机关，他防卫工农兵及一切中国劳动群众的利益。向苏维埃进攻，就是直接进攻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一切劳动群众。

二、允许民众以民主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释放政治犯）。因为这些民主的权利，为发展工人、农民、士兵、城市贫民及学生为其经济的利益与要求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权利，在唤起并组织劳动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是必需的；因为要组织成功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必须破坏并打倒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拷问，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统治。

三、武装民众与组织武装义勇军队伍。因为没有武装民众，没有武装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帝国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只有这种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铲除帝国主义的进攻与支配。

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劳苦群众们！

我们必须为这些要求组织起来而斗争。中国的命运，你们自己的命运，依靠这些任务的实现。这一斗争的胜利，要求你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为中国的统一、自由并完整而斗争，为劳

动群众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要用你们一切力量拥护苏区的工农群众与反对新的“围剿”的英勇的工农红军。要建立并加强你们的阶级工会，扩大工人反对雇主与国民党黄色领袖的日常要求的斗争。要求你们组织抗租抗税的斗争，夺取和分配地主豪绅的土地，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要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日常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被派去打自己的兄弟姊妹的斗争。要求组织失业者、城市贫民、战地或其他难民要救济的斗争。要求你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做反帝运动，建立强大的群众组织，参加并领导一切活动的方式，如抵货与义勇军运动。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及群众的获得民主权利的斗争，组织武装的义勇军及参加现存的义勇军。

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们！在这一斗争中，当你们完全认识情势的严重，认识我们当前的任务，认识武装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与推翻血腥的国民党统治联系起来之时，那就是我们的成功。那时，我们将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之下获得中国的统一。

起来，为中国民族之自由、统一与领土之完整，为劳动群众之解放而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和背叛民族的血腥的国民党统治！

中共中央委员会
共产青年团中央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一、根据可靠的国民党方面的消息，在这几天蒋介石在江西开始决定胜负的进攻，除掉福建、广东与湖南的军队，现在又集中了将近二十万人在江西，目前并从北方增调军队。根据没有证实的报告说，蒋介石与闽粤的军队已经订立了亲密合作的协定。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但似乎是分着三路前进：

（甲）中路以陈诚为总指挥，从赣东北向抚河的总方向推进，左翼主力向金溪、资溪、黎川，右翼向乐安，这是最危险的一路。

（乙）左路以蔡廷锴为总指挥，从福建向三个方向推进，即邵武、建宁、旧汀州，主力在左翼即汀州。

（丙）右路以余汉谋为总指挥，从赣东南推进，广东第一第二两军在第二飞机队帮助之下进攻会昌、雩都，此路不甚重要，目的是在于两个月以内打击我主力，以后包围中央苏区。更详细的消息我们正在搜罗再电告。

二、我们不能取得南丰，也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失望，第一，因为战略上的必要，此种企图是必须的；第二，政治影响无疑的是很好的，他能加速国民党军队瓦解的过程；第三，此

种行动足以扰乱敌人的指挥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月内，我们的策略应有以下的暂时变更：

到处发展游击战争，以便切断敌人交通，扰乱和削弱敌人，并以经常的袭击、埋伏和突击敌人的前进。假若我们能够适当的配合防御，我们的要点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并以我们的游击队削弱敌人，我们至少能够保持现在的苏区。

三、目前国民党进攻决定的战争目的是要最后消灭中央苏区及其军队数量上的优势，要求党与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非常的步骤。我们提议执行以下的任务：

（甲）在苏区内开始扩大的政治运动，来防御苏维埃政权，动员所有的群众组织来参加与进行物质上的供给等。

（乙）动员所有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民警等，派他们到相当的边界上去。他们应该武装起来并受到训练，以便为红军的经常部队，特别是红军的补充。如他们没有正式的武装，则编入游击队。各游击队没有充分的武装，则须利用原始的武器，如戈、矛、刀、剑、工具之类。

（丙）利用短期班动员和训练新的干部，以便在四月一号给红军五百指挥官和一万个士兵，在五月一号亦给他同样的数目，军校及军事训练班应为这个目的动员起来。

（丁）加紧在国民党士兵中与俘虏中的政治工作。

（戊）在苏区内加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增加赤色恐怖和防止作战军队的后方任何反革命暴动的企图。

四、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消息，所以对你们不能有今后作战详细计划的建议，你们自己应做出此种计划，一般的我们向你们建议下列各点：

（甲）建立三个战区，每区设一司令部，直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1）北区包括梅江以北的所有地域，即赣江与抚河之间以及信江与抚河之间，司令部在广昌，这是主要的战线。在这里我们必须企图反攻打击敌人的主力。

（2）东南的战线从宁化到南方的边境，司令部在汀州。

（3）西南的战线从雩都到南方的边境，司令部在会昌。

（乙）赣北区应该再分为：

（A）赣江与抚河中间的游击区，要二十一军与相当的独立师，任务是在宜黄、崇仁、乐安、南丰以及沿赣江流域，破坏敌人的力量、交通、物质的供给。

（B）信江以南的区域，包括金溪、资溪与光泽的三角区域，十军新十一军与相当的独立师，任务是在以下面的城市为根据，以进攻的方式来防御这个区，如若可能必须巩固和防御这些城市。假若敌人占领了这些城市，那么这个区域即变为游击区。

（C）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十二军与相当的独立师，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这些城市仍须大大的巩固起来，特别应该注意广昌。方面军没有固守的区域，因为这是我们行动的力量，他应该找到最有利的战场击败敌人，目前有两个可能的方向：

第一是抚河以东，此地的便利是与敌人主力作战，保护新的苏区；但是危险如以前一样，假若敌人从福建与抚河能够成功的前进，那将切断与中区的联系。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可能的方向，去抚河以西对着宜黄与乐安。

（丙）东南的战区清流、连城、上杭必须巩固和防御起来。这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汀州，他是从东南方到首都的唯一的一把锁钥，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保持他。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力量太弱，不能执行积极的反抗，因此我们提议从苏区内调一

万枪左右和几千游击队去增援他们，正式军队应该集中起来，对着龙岩，游击战争应向武平、永定溪沿战墟一带。

（丁）西南的战线寻乌、会昌、安远必须巩固起来，我们的独立师必须以安远为根据，在广东边界三南的城市附近进行游击战争，另一部分应以雩都为根据，沿赣江进攻敌人的部队与交通，应与八军建立联系以便合作。

五、为着建立堡垒，每个司令部应组织工兵营，当地民众也可利用。每个应该巩固的城市，必须委任一个负责的指挥官，在必要时宣布临时戒严。迫击炮、机关枪等首先应安置在城墙上，其次应在城市周围，二十里至五十里以外，以便在外面的堡垒未被占领以前，防止飞机队的轰炸与袭击。这些堡垒，必须对敌人的飞机很好的隐藏起来，周围的小山与河面的河岸，必须为堡垒所利用。此种工作应该立刻开始，在战区司令部与军队的重新组织，大概可在三月十五号完成。因此，方面军不应迟于这个时间，就要向北前进。

中 央 局

三、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周恩来关于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中央局：

甲、这几天，敌完全处于被动。二纵队三个师原拟由新丰市截击我归路，嗣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消灭，乃改向黄陂开进。及闻我军已离黄陂，敌十四师急由党口、饶坊北开演口，十师、九十师停在崇五都，十一师进黄陂，九师赶到河口，今日均未动。三纵队之第五师被调龙骨渡，今日又令由岳口回南城。三纵队现已改向南丰进，先头明日可到。

乙、闽敌刘和鼎昨日率一旅一团进泰宁。十九路军以区寿年师及张炎旅三日集中永安为右翼，以沈光汉及张贞师为左翼。右翼定八日进连城。这一部署是黄陂战役前预定的。

丙、陈诚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已改变。三纵队改走南丰，一、二纵队（现只五个师）或将更靠近，出东陂、黄陂、新丰市，求我主力决战于东韶、河口，而以三纵队趋广昌，出头陂、东山坝，截我归路。

丁、我军拟俟集中后（一军团带胜利品，经招携路较远）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伍　豪

四日十七时　于田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毛泽东、项英关于汀州不能轻易放弃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

朱周：

昨晚与中央局及剑英[1]商决：

（一）敌七十八师及张炎旅之右纵队将到连城，有进攻汀州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同时配合其左纵队从岩永杭三县向我苏区大举进攻，实行摧残之企图。

（二）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现任命李韶九为汀、瑞卫戍司令，负防御之责。敌如前进，当号召汀、瑞广大群众及武装以困阻之，决不任该敌钳制我方面军之行动。

（三）将宁石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岩、永、杭前进之敌。不论汀、连何种情况，我十九军必须在茶地、太拔、白砂、旧县、新泉一带坚决作战，争取大的胜利。

毛　项

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叶剑英。

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朱　德

有些工农出身的中级和初级指挥员，对于战斗间指挥和掌握自己的队伍感觉困难，曾发生了以下的现象：

一、当展开为战斗队形时，指挥员就失去掌握队伍的能力，就像手中的豆子撒到难拾的地方去了，于是听任部属自己去活动，成为没头没脑的混战。

二、有了上述现象，指挥员本身就成了一个“孤人”，即或随手抓到几个战士，也没有好多。就照打胜仗来说，统率几个战士去追击敌人，不一定与自己的队伍凑巧会合，且常无后续部队，不免为敌人所反噬（曾有二三战士如此追击而失败，遂有人借此反对追击者）；又当敌人实行反冲锋和反突击时，而指挥员手里又无队伍，或有也无几人并且紊乱，则刚用血肉换来的胜利，势将化为乌有。

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特别是火器进步，战斗队形已形成疏开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自战斗开始的展开时起，经过冲锋前各分队略为集结，以至战斗结束的整顿部队时止，是很重要、很难指挥和掌握队伍的阶段。所以通信联络在这一阶段上占有

---

* 本文原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六期。

特别重要地位。苏联战术备考讲到通信联络时开头就说："如没有通信联络或有而不完备，则指挥军队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从此又可以明白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三章把指挥与通信联络写在一起的意义了。

我们拿步兵连进攻防御的敌人来说，连长到了进攻出发地，而其部队还未展开之前，应先在行军警戒部队或战斗警戒部队掩护之下，尽可能地集合诸排长等就实地指示敌情、地形，并说明我们如何攻击并分出主要方向（突击队）及次要方向（钳制队），定出攻击目标以及如何与各部队协同动作。这样亲自交谈，发出号令才易使排长等正确了解任务，各部队一致动作。所以，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二三五条所述通信联络法十三种，以指挥员与部属当面交谈和指挥员亲自观察为最有实效的一种，而列入第一。正在进攻时，连长的指挥所，应在便于观察敌人和容易观察并指挥自己部队，特别是主要方向之部队的地点，并随时使部属知道这一地点，以便彼此利用各种通信联络发出新的命令和报告。此时，诸战士的耳目除了注意敌人外，应随时注意自己指挥员及毗邻战士的通信联络。总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要利用各种通信联络手段才能使指挥员与部属的动作如同一个人一样。特别在冲锋时，部属更应注意追随指挥官的动作，力求一致；冲锋后，指挥员应迅速整顿部队，实行追击或巩固所占阵地，防敌反冲锋或反突击。

在现代疏开战斗中，指挥和掌握队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指挥员不但要使部属明白通信联络的方法，而且要在教练部队特别是教练小分队时，遂锻炼其成为习惯。南京译自日本《步兵操典》连教练第二章疏开战斗第一百六十六条说："班散开，教练之着眼，在使其班无论在何时何地均能听从班长之指挥，举止俨如一体，以利战斗，尤以在轻机关枪班，纵

然发生缺兵，亦应使之互相奋勉，协力一致，毫无涩滞，得以遂行战斗为要。”又第一百六十七条说：“班之散开教练，系训练散兵，使其耳目活动，随时注意敌兵及指挥官，并顾虑邻兵，且复习各个教练所修得之战斗动作，益增进其能力，以完成其教育为要。”我们从此也可以知道，日本对于指挥和掌握队伍的训练已十分注意。

莫斯科大戏院的乐队指挥，在指挥其所属持各种乐器的一百余人时，他的指挥棍婉转自如地旋舞空中，各种乐器随其抑扬顿挫而辅翼翕和起来，一丝不乱，如同一人玩弄一样。我们的指挥员若能如此指挥掌握军队，那真算名将了。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Ⅰ　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时我们所犯的错误

（一）党与军事指挥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初，对于敌人的力量与计划是估计不足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次“围剿”是决胜负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最后消灭苏区，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红军最初的胜利又估计过分。这些胜利实际上具有地方的和战略的意义，以这种对于环境的不正确估计中，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指挥，完全没有充分的准备苏区，以便进行军事上的抵抗，特别没有进行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去积极的参加作战。保护苏维埃领土，不仅是红军（常备的和游击的部队）的事情，而且是全国一切劳动群众的事情。就是说，他应当发展成为真正的民众战争。只有这样的抵抗，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力量。

（二）在八月十一和十六日黄安附近胜利之后，本来应当去努力追击被击破的敌人部队。无论哪一个袭击的进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已经消灭了敌人。完全消灭敌人，只有无情的追击敌人的方法，才能获得胜利的。红军不去这样做，反而退却了，和给了敌人有充分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部队。

（三）敌人的用兵计谋，主要的就在于：（1）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包围苏区。(2) 占领一切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的苏区，使其成为许多彼此互相隔离的小苏区。

红军曾企图抵抗这种计划和到处打击敌人。这便成为偶然的无计划的进行战争。弄成在苏区周围之很大的行军。这便使纵然打破了敌人许多部队的红军，不能将敌人任何一个部队完全击溃。当时最好是在一方面集中一切常备的兵力，去反对一批敌人，直至把这批敌人最后的和坚决的消灭为止。同时应当用牵制、政治的分化与游击队的袭击等方法，去骚扰和削弱敌人其余的进攻部队，直至常备的红军消灭第一批敌人和能够打击第二批敌人为止。在这样战略之下，我们便能够顺利的利用占有内部交通线与战场之苏维埃结构所给与我们的优势。

（四）最初对于敌人估计不足，以及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弄成后来相当的慌张。这表现在对于敌人过分的估计，表现于领导干部的动摇，表现于红军的无根据的消极。敌人以九月中旬起赢得了约三个礼拜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实现自己的集中进攻，而没有遇到我们方面重大的抵抗。人们借口说，红军不能继续不断的斗争，以此来宽宥上述的消极性，这正表示出对我们武装力量之机会主义的不信任。反之，对于后来作战活动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在我们方面：敌人几次被我们击破了，他们遭了几千死伤，失了数千步枪，他们的战斗精神降低了，我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我们得了群众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这样的消极行动是丝毫没有理由的。

（五）由于上述一切错误，在十月间在麻城与黄安老苏区中行军疲竭之后，红四方面军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受白军包围，和没有充分的物质积蓄。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不定战术”

和兜圈子的结果。但是就算有这种情形，也不能证明放弃苏维埃领土——虽然是暂时的——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决定，反映了领导中的取消主义的情绪。

应当把有常备军的基本苏区与游击区分别清楚。前者是我们的政治的和物质的基础，应当尽一切可能保持起来，而且在保护这些苏区中的军事战略，应当具有进攻的性质。后者依军事上的必要，可以暂时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党、苏维埃政府与军事指挥之决定红四方面军无目标的西进，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六）根据鄂豫皖苏区的现状，党应当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包剿”的目的已经部分的达到了：（1）鄂豫皖苏区被包围了；（2）他们部分的已被扰乱了，诚然，敌人此刻还不能把他们恢复起来；（3）苏区的主要武力即红四方面军被排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今后为这个领土而作战的战斗中，已经不能再指望这个武力了；（4）保留着的苏区之周围及其内部的一切的重要城市与交通路线，都操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他方面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下及国民党军队的痛苦的教训之后，农民是大大地倾向我们方面的，游击运动正在生长造就着常备红军的新干部。在正确的战略之下，我们有充分的可能去支持保留着的苏区和重新扩大与联络这苏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准备反攻，以反对国民党的占领部队。

Ⅱ　目前的军事形势

（七）中国的革命危机，比去年更进一步的加深着。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放弃一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集中自己的莫大的武装部队去反对苏区。试简单说明各省的军事

形势：

（八）四川。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部开始创造新苏区而依靠着农民的革命运动，南江、通江、巴中诸县操在红四方面军手里。川军两师已被我们击溃，一团投到我们方面，与川东游击队的联系已经恢复起来。敌人集中川军和陕西湖北两省军队的大部分的力量，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再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的权限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

（九）湘鄂西。以汉口之西为根据地的贺龙第二军团，完全被扰乱了。现在长江南北进行顺利的作战（镇坪、鹤峰、五峰）。

（十）中央苏区（江西和福建）。在十二月和正月的过程中，红军不但能够保持基本的领地，而且能够夺取抚河与信江间的新区域。这样便能与赣东北红十军取得联络。我们的军事力量大大的增展了。现在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之下，又开始了国民党的新的“围剿”，蒋介石集合很大的兵力。这次的“围剿”是第五次“围剿”，因为它是在完全新的政治环境之下，部分的在新的领土中，按照新的计划，在另一种方面用改造过的军队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以有力的反攻去回答这个第五次“围剿”。

（十一）革命的农民蜂起和较小的游击战争，存在于陕西南部、鄂西北、江西北部和山东。

（十二）关于留存着的鄂豫皖苏区的环境，必须特别指出下列各点：（1）苏区及其武装力量，现在专门建筑在华阳山（即鄂豫边界的山脉）的山地带及其南北倾斜面上。这些地理的条件给与天然的保护，因为它们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深入。另一方面，缺乏适宜的道路人烟密的地方和充足的积蓄，这便使

我们的武装改组、增加和作战的活动，发生很大的困难。（2）敌人不但包围着我们的苏区，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握有战略要点和以前我们的中心，如黄安、新集和商城。敌人占领麻城、黄安的道路，把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与黄安以北的主要苏区隔离起来。最后，敌人占领了在苏区腹地本身中如此强固的地点，如黄安、河口和七里坪。这种分布给敌人一种可能逐渐侵入现存着的苏区。他方面，这种分布又使敌人力量相当的分散。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3）近来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七十五师和七十六师开到河南北部去了，十师和八十三师开到江西去了。此外国民党手里又缺少了五十八师和新编二十师。这样一来，除了当地武力之外，留下的敌至多不过七师或九师。这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地位。

（十三）国民党对鄂豫皖的“围剿”并没有完结，仍在继续着。也绝对不是你们所估计的，他们已完全陷入失败地位。在最近数月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如不遇到充分的抵抗，必然虽然缓慢的，归结到苏区之继续缩小（消灭整个的乡村与整个区域的收获，对于农民大批的屠杀等等）。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空喊准备与帝国主义作直接战争，而忽视目前完全冲破国民党的“围剿”的任务，那是完全错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的继续与加强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以便保持现有的和恢复以前的苏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苏区。

Ⅲ　目前的军事任务

（十四）基本的任务就是：（1）保护与巩固保存着的苏区。这是鄂东北的第一个责任。肃清敌人的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

队。(2)联结这些区域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3)扩大现有的区域和逐渐完全恢复他们过去所有的区域。

用各方面游击战争的方法，彻底解决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只有集中的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在一方面反对一部分敌人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些任务。游击队的行动是须要方面的补助形式。为执行这些任务，必须动员苏区一切居民给与各方面的军事准备，武装他们，统一各种现在的独立师和队伍而为一军。并且按照一定的用兵计划而动作。

（十五）为的要领导这种全部的活动，必须在党的省委之下，立即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当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以下的同志……此外，以前任十二师师长的同志，很快要到你们那里。

（十六）武装力量的改组，应当这样进行：一切常备的武装的和有组织的联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第六独立师，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和黄陂等区的独立师）都归并到二十五军里去。在改组以后，二十五军应当由三个充足的师部组织而成。每师应有三个步兵团，每团至少应有一千步枪。重机关枪和过山炮（如果有的话）应当组织为特别的队伍，而并入师部或军部中。二十五军的全数至少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步枪，和现有的机关枪与大炮。用这种方法，我们便成立强固的突击的军队，用这个军队，我们可以顺利的进行必需的进攻的军事行动。

（十七）我们认为在河南的东南部创造新的二十八军，在目前是不适宜的。此刻有好的组织和武装的一军，胜于在几方面分散我们的力量。如果二十八军已经存在，那么无论如何不应当拿二十五军的力量去加强二十八军。

（十八）一切其余的武装力量，赤卫军、少先队、民警应

当组成游击队。在二十五军中，应有最大限度的固定武装，而在游击队中这是不要的。如果在游击队中没有充分的固定武装，那么必须应用一切补助的手提的武器，剑、刀和一切劳动器具，都是革命农民手中很有用处的武装。甚至现代作战条件之下，拒绝这样的武装是政治上的错误。

（十九）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任务如下：（1）在苏区内外的劳动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吸收群众加入红军和游击队，以便经常的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2）在红军兵士与指挥员和游击队中进行努力的政治工作，必须特别趋向于使红军指挥员加入党，并且使他们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去指挥他们自己的下层。（3）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广泛的政治工作，以分化他们。这种工作每次应当集中到敌人的那些部队中，即我们的常备军的主要打击所向的部队。为进行这工作，必须集合训练可靠的同志们的部分的专门干部，把他们时时派到敌人部队中去。在这里，他们和士兵发生联系，利用士兵们的直接需要（薪金和饮食问题，军官的过分要求等）以引起他们的不满。组织秘密的支部和散布革命的口号。

（二十）因为没有充分详细的报告，我们不能从此给与确切的指示。以下的指令，只带有一种方针的性质。其余的地点，你们应根据目前的情形再加以详细的研究。

第一次军事行动。（1）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的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2）此后应当恢复和巩固河口。（3）在湖北的东北部，我们苏区内部的这些重要地点的敌人已消灭之后，二十五军应当坚决去打击在黄安的国民党的十三师以夺取现存苏区的中心的这个城市，尽一切可能去巩固和保持这个城市，反对一切将来敌人的进攻。

在这第一次军事行动时，游击队的任务是：(1) 用牵制袭击和埋伏的方法，去骚扰宣化店、新集、麻城、黄陂的敌人卫戍兵，以障碍敌人侵入苏区和障碍被我们二十五军所袭击的敌人队伍之增援。(2) 用重复袭击敌人的运输，破坏电话线、桥梁和其他的道路设备的方法，去截断黄陂、麻城和黄安间，光山、七里坪和黄安间，以及罗山和宣化店间的敌人交通路线。我们特别指出，这些游击动作，不应当用了我们武装力量的大部分。我们军队的基本群众，应当集中起来去解决基本的军事行动的任务。

（二十一）依这种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适宜的进行，第二次进攻反对新集的八十九师。这种第二次行动的目的就是：(1) 夺取新集。(2) 夺取光山与麻城间的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3) 准备把黄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络起来。

这种进攻应由新的二十五军的全部力量去进行。地方游击队帮助这种第二次军事行动的最好方法，就是骚扰宣化店、麻城、黄陂和光山的国民党的卫戍兵，以障碍向新集的一切行军。

（二十二）二十八军（或驻在赤南的红军）在这两次军事行动时的任务，就是骚扰金家寨和商城的敌人五十八师和八十师。为的要帮助对新集的进攻，二十八军的一部分应当向新集进兵，其任务是发展新集以东的游击战争。

（二十三）将来的作战行动，只有依照这两次军事行动的结果才能详细决定。在原则上说，他们应当恢复一个通盘的苏区为目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急激的扩大东方的领土和消灭商城区域中的敌人。要做到这点，必须把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统一起来，在一个军事行动的领导之下，以及经常的数量上的增

加和政治上与技术上的完善。

在我们西及南边界上（即对宣化店、铁路、黄陂和麻城），此刻只要保持现有的区域和打破敌人侵入我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企图，就完全够了。

（二十四）关于选择时间以转为反攻，那必须注意到每天都是很宝贵的。改组二十五军，不能作为推迟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原因。对于我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是现在。一般的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现在忙于江西之战，忙于四川之战，忙于鄂西之战或忙于中国北部之战。国民党现在要加强河南与湖北之卫戍是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有很大的机会去恢复鄂豫皖的苏区和保持这些区域，在将来去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充分迅速和坚决去执行我们所提议的军事行动的话。

中　央

一九三三、三、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周恩来关于草台冈战斗的行动部署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央局转中央：

甲、北面敌两纵队各三个师靠拢并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今日其前纵队十四师始达新丰市，九十师达侯坊，十师达草台冈；后纵队九师达东陂，五师达黄陂，十一师达安槎、蛟湖。预备队七十九师在宜黄，有两团在河口，六师在抚州，许克祥全师在南城，刘绍先师在乐安、崇仁，余无变动。

乙、我们已调十一军，十八日可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丙、我方面军昨日已开始移动，因敌两纵队太靠拢，故尚在待机中。但这是四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斗，已下最大决心，准备一切牺牲，部署与敌三个师决战的阵势和动员。

恩　来

三月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朱德、周恩来关于草台冈战斗的命令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局转中央：

甲、敌情另电告。

我十一军已于十八日到广昌附近，拟于二十日起领导地方武装牵制向广昌去的敌人前纵队，并以主力阻敌回援，以掩护我军右侧背。

乙、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丙、五军团、十二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朱[1]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冈、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十二军（附宜黄两独立团）应于二十日黄昏时到斜蕃附近，二十一日取捷路到侯坊上游适当地点渡河，占领灵埂山、三角砦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并以一部领导宜黄老独立团，往石背、摇篮寨游击东陂之敌。新独立团往新丰市西南地带，挖毁由东向西的交通路（防敌回援），并警戒我右侧背。

（2）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端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游击。二十一日拂晓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侯坊、徐庄、雷

公嵊之敌。

丁、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归彭、滕[2]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先迅速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三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界上、雷母山之线，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东边岭、亮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冈之敌。

（2）第一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三溪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大坪、徐坊、沚洲之线，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突击铁石坳附近之敌，以截断东陂与草台冈敌人之联系。

（3）二十一军（直受林、聂[3]指挥）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王都、上堡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达古王坑、邱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

（4）独立第五师（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左翼侧。

戊、两翼队战斗分界线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右侧（道路归左翼队）。

己、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二十日在现地不动，二十一日随第一军团左后方前进，必要时由林、聂直接指挥。

庚、第一军团卫生部准备在长罗开设野战医院。三军团卫生部准备在徐庄、荫水开设兵站医院。后方联络线仍照作战计划规定。

辛、总部拟明（二十一）日到亮溪附近。

朱　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董振堂、朱瑞。

〔2〕指彭德怀、滕代远。

〔3〕指林彪、聂荣臻。

中革军委保护与收集无线电、有线电战利品的通令*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

苏区交通不便，而区域日益扩大，专赖无线电为通讯工具。无线电随着革命发展，所设电台已非少数。红军中除无线电通讯外，有线电功用亦渐有发展。目前反革命特别加紧经济封锁，材料供给大多数是由敌人处缴获。故通讯工作常因器材缺乏补充发生困难和障碍。惟当无线电在苏区方开始应用时，莫不视为通讯利器，特别保护与注意收集。今其作用更加发展，反因数量已多，工作尚能维持而不顾目前更多困难，对此类战利品多有忽视收集之倾向。如最近黄陂、草台岗二次伟大胜利中，缴获无线电机全副二架，有线电之被复线、电话机亦甚多，但因不注意收集与收集后不妥当安置，以致机器残缺、材料损失，尤以草台岗一役为甚，实为不容许现象。特此通令各级指挥机关，今后在每次战争胜利中须将这类战利品全部收集，不得置之不顾，任其散弃，并须负责妥交兵站运回后方或送来总部，并具报告。一切无线电器材非经通讯总队允许，不准擅自携取与调换，有线电之皮线、机器，在规定数目已补足

---

* 这个通令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的。

后，仍多器材或换出坏旧器材，亦应一律上缴，不得得新弃旧，或瞒数不报，务望切实遵照执行。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在“五一”我们谨向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血腥统治之下的工农与城市贫民，被迫反对中国工农的士兵，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学生与青年，成千成百的被监禁和虐待在国民党牢狱中的革命犯人们致革命的敬礼！

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使我们不得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日帝国主义毫无阻碍的长驱直入平津的区域，同时英帝国主义正在新疆进攻，并经过西藏以及其他的傀儡准备占据中国的西部。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所进行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强盗们作了一笔生意。国民党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期。

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唐有壬代表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与日本代表芳泽谈判。蒋介石——中国工农的刽子手、一九二九年要求日本军阀占据山东与一九三二年在背后屠杀上海防卫者的罪魁，现已抛弃了北方战线，重新升用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开路的卖国贼汤玉麟。蒋介石到北方并没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而是承继他的朋友——卖国贼张学良的产业。

西南政府与福建的军阀一样是不反对日本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的。最近他们的“北上抗日”的宣传完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实际上，是为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和进攻苏区与红军。

为什么蒋介石要回到江西呢？为什么他抛弃了北方军队，使他们没有武装徒手对着日本的大炮飞机呢？为什么国民党及其政府集中了大批的军队、所有的飞机与军事技术来反对江西的工人和农民呢？因为他们正在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商量要把中国当着他们的私产出卖干净。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也如对“满洲国”一样，允许他们作几省的傀儡统治者。因为他们要屠杀中国的民众来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国民党为着掩饰自己的投降与出卖，造谣说日本帝国主义帮助红军金钱与军火，污蔑中华苏维埃政府与日本军阀进行谈判。这种无耻的下流的造谣，早已被许多铁的事实粉碎了。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民众政权与武装力量，在历次英勇的战争中，证明中华苏维埃红军与任何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我们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因为他们同样是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是受统治阶级的掠夺、压迫、虐待和屠杀。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正在为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利益而斗争，为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而斗争。目前正需要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作战，谁反对这个战争，我们就要打倒他。

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兵士的斗争以及红军的英勇防卫，能够阻止帝国主义、蒋介石与破产的国民党实现他们的瓜分中国的计划。

在最近三个月中，江西的工农及其红军击破了敌人九师以上的兵力。在几次的战争中俘虏了人、枪各在三万以上，以及大批军需及其他武器无算。一万左右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已经自愿的加入江西红军。在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的红军也在迅速的增长着。从最近在江西被俘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长及其师部人员的宣言中，完全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的瓦解是怎样的深刻，他们责骂国民党与蒋介石，懊悔自己过去反对中国工农的罪过，要求白军的士兵与官长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调转枪头去打出卖祖国的国民党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等卖国贼鉴于最近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前线士兵的动摇以及全国民众的忿怒，又想以“剿共即抗日”、“在共未肃清前，不许言抗日”的武断宣传来阻止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化，来掩盖自己的出卖和投降。但是这种欺骗和威吓是不会成功的，恰恰相反，只会更加暴露他们的罪恶。

根据目前的情形与我们的胜利，必得重述今年一月间我们的提议，来粉碎国民党关于红军及苏区工农阻碍有效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蔑。我们认为只要能依照我们过去的提议，积极抵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刻是可能的，因此再将我们的提议向全国宣言：

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战争的作战的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之自由与释放政治犯等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每一个工人、农民、兵士都会了解，没有以上的条件，想与帝国主义作胜利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政策是破产了，他引导瓜分中国与更加奴役中国的民众，继续增加民众的痛苦、饥饿与屠杀。

我们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我们号召一切劳苦群众拥护我们防卫中国及民众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做好在运输员中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王　稼　祥

此次后方发动了四千名运输员到红军中来参战，我们必须在运输员中进行不疲倦的、耐心的、不断的政治工作，坚决反对忽视这种工作的倾向。

运输员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一）提高并巩固运输员参战的积极性和热忱，消灭运输员的逃跑现象；（二）努力争取他们当红军，当红军的战斗员或长期运输员与给养员；（三）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在六个月中完全消灭文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即使回去能够变成先进分子，能够参加苏维埃及各种工作。

因为这些运输员刚从乡村中出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以及心理和兴趣同红军战士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对他们进行政治工作也应当采取许多不同的工作方式。一切工作的进行，应当根据他们的认识程度、兴趣和生活，许多工作如识字课、政治课、列宁室工作等都应当与运输员单独进行，而不应同红军战士混在一起，我们的政治工作应经常联系农村中的各种问题。

对运输员的政治工作的内容应注意以下的问题：

（一）识字运动应当经常不断的进行，首先要使运输员认

---

* 这是王稼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指示信。

识识字的利益，提高他们识字的积极性，在六个月中要做到完全消灭文盲，个个能看报、写信的程度。

（二）政治教育，除了给运输员以普通常识外，应当特别注意共产党和苏维埃对土地问题的政纲，对农村中的设施等等，乡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合作社的组织与农民的关系，苏维埃的税则等，这样使他们来积极拥护共产党与苏维埃，并且来积极参加这些工作。

（三）反宗教迷信的工作，必须加紧注意，以消灭农民的落后的、固执的迷信观念。但是这种工作必须从灌输科学知识、说服解说工作做起，任何破坏宗教外表（如打菩萨、挖祖坟等）以及耻辱信仰都是无益而且有害的。在反宗教宣传中应灌输运输员以一些农业上的自然科学常识，如风、雨、虫、旱等灾以及农业改进方法，如人造肥料、机器耕田等。同时与反宗教运动有联系的便是卫生运动，说明疾病来源与如何避免，以打破信神、信命运等观念。

（四）对运输员同样的要给以军事常识，如行军宿营须知，防空、防毒方法，步枪的使用，简单动作，以及怎样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等。

（五）运输队中的党的组织必须建立起来，巩固运输员的情绪，消灭运输员中的一切不良倾向与现象，特别是逃跑，参加运输员的一切政治工作。运输队中的党应当吸收那些积极的先进分子入党。

（六）必须尽可能吸收运输员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可能时须从运输员中组织宣传队，去向地方群众作宣传鼓动。在苏区应当以宣传红军胜利及动员群众参战为中心。在白区则应以广泛的传播苏区影响及说明苏区工农群众的解放与生活改善的具体情形，以发动白区群众反地主资本家反国民党的斗争。我们

要认识，这样具体的通俗的宣传鼓动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七）在战时对运输员中的政治工作，是时刻不能放松的。因为在战时运输员的工作是特别繁重。所以应当经常的将红军的胜利及作战任务，运输员在战争中的作用及任务，向运输员解说。消灭逃跑现象以及躲避工作（如五六个人抬一个担架等）的倾向。在战时对运输员的给养及宿营等问题必须特别注意，各战斗部队与机关应给运输员以帮助，因为给养与宿营等困难，运输员自己时常是不能解决的。此外还应教育运输员，使他们很亲爱的细心的待遇伤兵，并向伤兵做安慰及鼓动工作。

总之，运输员中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工作中重要工作之一部分，无论在计划工作、检阅工作、报告工作时，都应将运输员中的工作列入。各单位应当订定对运输员工作的竞赛条约，如竞赛消灭逃跑，争取他们当红军，消灭文盲等项。对运输员的来去，应当组织欢迎欢送。平时亦应组织娱乐工作，组织适合于他们的程度与兴趣的晚会，对运输员中工作特别积极的分子应给以奖励，以鼓动全体运输员参战的积极性。

为要使这一工作顺利的完满的进行，必须坚决反对忽视这个工作的倾向。尤其是首先消灭对待运输员的一切不正确的关系，如谩骂、鄙视等。任何犯有这些错误的分子，都应坚决与之斗争，并给以严厉处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张　闻　天

正是因为中国苏维埃政权所统治的区域，是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区域，而且在土地革命之后，地主经济的完全消灭与广大中农、贫农、雇农等的分得土地，所以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

此外，我们一方面是处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形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这两者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经济的特点与它的发展，使苏维埃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变为更其复杂。

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斗争》第十一期。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是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我们不但要使农民分得土地，而且要使农民从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得到更多的生产品。在这里，苏维埃政权应该成为千百万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种子、肥料、耕牛、耕具的解决，荒田荒地的开辟，生产队的组织，生产特别有成绩的农民的奖励，都是提高农村生产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苏维埃政府还应有计划的进行春耕夏耕以及秋收等运动，来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提高。

在目前工业品特别缺乏的情形之下，小手工业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尤其是那些对于军事，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如煤、铁、石灰、农具、布匹、竹木、油、纸、烟等必须用一切方法来提倡与发展。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应该帮助失业工人、小手工业者与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各种重要的生产。苏维埃政府也可把没收来的企业，交给他们自己去管理经营。在可能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本身可以计划一些生产的作坊，来适应目前民众的特别需要。苏维埃政府也奖励小手工业者生产的扩大，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发展。

在敌人经济封锁之下，工业生产品的极端缺乏与昂贵，自然会影响到苏区内工农的生活水平，使他们的生活恶化。这对于广大的农民群众，尤为严重。这种情形的继续，对于工农联合的巩固是不利的。苏维埃政府现在还是非常贫困，它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在目前，它还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它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动私人资本家的投资。

但是随着发展生产而来的，即是关于商品的流通问题。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与竹木，如若不能很好的流通，那结果必然会

发生某种生产品的过剩与生产品的跌价。如像江西产米的赣县、万泰、公略等县，因为生产品的过剩，每担谷子往往跌价到一块钱都不到，这样，农民不但赚不到钱，而且每担谷子要赔五六毛钱。这样，农民对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就失去兴趣，荒田荒地因此有时会增加起来。

在苏区目前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苏区许多生产品，如像竹木、油、纸等，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不能出口，而另一方面白区的日常必需品如像洋油、盐、布等的输入也发生极大困难。因此，生产竹木、油、纸等的农民工人，陷于贫困与失业，而苏区一般民众则因输入的日常必需品的昂贵，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同时苏维埃政府因输出入的不平衡，现金的大批出口，而感觉到现金的缺少。

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在这里，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扩大合作社的组织到每个乡村与圩场，成立总的县的省的以至中央的合作社组织，加强党与政府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粮食的流通，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有计划的经过国家的粮食调剂局来调节市价，供给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本身的需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粮食合作社的网，为国家粮食调剂局的基础。苏维埃政府还应设立各地的运输站，来便利商品的流通。

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封锁。这里苏维埃政府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去输出苏区的生产品，与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的建立，完全不是为了垄断赤区与白区的对外贸易，而正是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

卖出。

国家对外贸易局自然应该同合作社与粮食调剂局等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合作社与粮食调剂局可经过国家贸易局输出它们的生产品与输入日常用的工业品。但苏维埃政府也赞成每一合作社与粮食调剂局自己到白区去采办商品，把他们的商品出卖到白区去。商人如若不进行反革命活动，也可以自由进行他们的买卖。

只有工商业的发展，才能更有力量地在经济上帮助革命战争的胜利，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并在经济上巩固他们的联合。

但是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在苏区占优势的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小的商品生产仍然有使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然地不断地重新恢复和产生的可能”（列宁：《左派幼稚病》六十八页），“它可以每日每时不断地自然地大量胎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种子”（同上，五页）。而且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那末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发展，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当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么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

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但是苏维埃政权不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领导苏维埃政权的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政党，争取中国苏维埃革

命的胜利，不是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经过劳动法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改良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吸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其次，对于资本家的企业，必须尽可能的实行工人监督生产，防止资本家利用它的企业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活动。最后，苏维埃政权对于资本家的企业，还征收累进的工业税与商业税，抽取他们的利润的一部分来巩固苏维埃政权。

随着苏区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的，除资本主义的企业而外，还有生产的与消费的合作社与国营的企业。在苏区内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因为资本家与富农的加入合作社是完全禁止的。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集体的经济，这种小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但是它的发展趋向将随着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走向社会主义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在目前，无产阶级在其中的领导作用，集体的生产与消费，社会主义的教育，同资本主义的投机与高抬物价做斗争，已经使我们的合作社，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

至于国营企业之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那当然是更为明显的事。这种企业，目前对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还不是那些比较大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生产的机关，而是银行与各种营业的组织。国家银行是苏维埃政权手内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它可以帮助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发展，使这些企业同私人资本做竞争。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以及合作社工作的开展，对于团结千百万劳苦群众于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有最大的作用。最后，苏维埃政权采取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资本家的投机，故意高抬物价，以及一切扰乱苏维埃经济，使千百万群众生活恶化的企图，在这斗争中以社会主义的教育来教育

广大的群众。

显然的，在苏维埃经济内部，就是在现在有着两种倾向在斗争着，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一种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倾向，在苏区经济中占最大优势的农民的小生产的经济，现在是站在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十字口上。正像斯达林同志所说的：

“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假若我们说的只是大多数的农民，那末农民经济就是供给市场上的小规模生产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农民经济是站在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上。这就是说，农民经济可以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像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似的，它就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又好像在苏联，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它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列宁主义概论》，二百十三页）

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两种倾向的斗争现在还不过在开始。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方才开始有系统的来进行这一斗争。在过去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权对于商人、老板、富农只限制于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而对于自己经济力量的组织则毫未注意。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分子除了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之外，还应该利用“利诱”与“让步”的办法。我们必须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线索”、经济的力量与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流通赤白的贸易。我们现在应该学习如何根据不同的环境同时并进的，互相为用的利用这两种对付资本家的不同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系统的来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应该经过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为将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创造一些前提和优势。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的设立，

就是为得要有系统的来进行苏维埃经济的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这用军事上的名词说起来，是在苏维埃经济中的司令部。

当然，正像共产国际所说的“这两个倾向的斗争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但要由国内的条件来决定，而且要由国外的条件来决定”。但是同时共产国际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内外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倾向的胜利是非常有利的。国际战后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终结，革命与战争的新的阶段的日益逼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指出目前国际的形势，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有利的。

在中国内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建立与巩固，将是保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条件。同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使在中国革命向前开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步骤的采取成为必要，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长期国内战争中，中国“农民的主要群众，将要受革命进程的推动，而来赞助那些反对外国和中国资本的过渡性质的必要的革命政策”。（国际路线二十页）

这两个倾向的斗争，现在不过还在初步的开始。这种斗争将随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占领，而更加发展起来。无疑的，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之下，社会主义的倾向必然的将会得到胜利。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关于作战总计划与任务的指示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朱周：

沪电讯转如下：

（一）我们推测方面军已安全移动，因此给你们以下的总计划，请你们注意和顺次采用。最近的教训告诉我们，应在六月和七月两个月内迅速改良我们战略上的地位与准备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争，在目前此种决定胜负的战争仍应展延。

（二）这一计划的任务，是在蒋介石以其游击队从北方和东北的行动，来零碎打我们的苏区。为使此种计划无效，我们自己应有相当的对策，为此目的我们应从独立队伍和方面军中选编一个特别队，人数一千，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独立的、自动的工作，执行以下的任务：

甲、此特别队应分成许多小队，每队二十人至五十人，同时应有两大队，一队一百人，又一队一百五十人。特别队的行动，必须笼罩南丰至宜黄、乐安至永丰的全线。上述战线又应分成三个部分：南丰至宜黄以南为第一部分，宜黄至乐安为第二部分，乐安至永丰为第三部分。每部分均应有司令部，第一与第二部分并应有后备队。

乙、被指派到每个部分的小队，应依地形的条件与预料敌人前进的主要路线同时向北行动。每队相距十里至三十里，第一与第三部分的力量，应比第二部分强，同时第一与第三部分的分配线应有较强的后备队。

丙、这些背后有其相当部分的后备队的小队。他们的任务即在有系统的打入敌人。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巡逻他们相当的区域，打击敌人小的队伍与地方豪绅的武装，在驻扎敌人大队道路上埋伏、袭击、扫荡，袭击敌人的司令部、指挥官与供给的根据地方，进行宣传工作，保卫民众，团结地方上的革命力量，集合和武装他们，为着共同的武装行动反对敌人，主要的是在动员积极行动与互相呼应，在两三个邻近的小队中间应该互相合作，为着援助邻近的小队，反对较强的敌人，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指定的方向。为着较强的敌人力量被我们的小队肃清和驱逐的时候，各部分武装好了的并有轻机关枪的后备队，即应迅速消灭此种敌人的队伍，在同一地方在一短时间内不要重复没有成功的袭击。各个小队的前进，每日平均应走十里至十五里，勿因其他小队被敌人牵制而停止前进，最好的援助是更向前进，然后转入被牵制邻近小队的方向，给了邻近小队援助此后即应转回自己的区域，万勿抛弃自己的区域。各个小队与后备军的距离，不能超过三十至四十里。俘虏敌武装应解到各个部分的司令部中。各司令部应从群众中征收游击队，形成新的队伍与加强自己的游击队。

丁、此等在前线上改编的策略，凡遇我主力已在作战的地方，其目的即在隐蔽我们的计划牵制敌人的前进，以许多小的瓦解敌人的力量，集中与武装民众的革命力量。而最高的目的，是在为我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将来进攻时准备阵地。

戊、我二十一、二十二两军，应作同样性质的活动，而且

同上一样，从北方向东南与西南总方向挺进，给我特别队间接的有力的援助。以上所述是抚河与永丰之间的北方战线上六月与七月间的任务。

（三）六月初在东南战线上的力量与全部的模范师，应开始新的作战，反对福建的敌人新的各种进攻，应立即在福建开始宣传运动。苏维埃政府应向福建和广东的军队根据以下各点发一号召宣言：停止进攻红军，去打蒋介石。根据过去宣言的条件，我们提议在战争中与他们联合。我们向福建敌人的进攻，开始应以我十九军的主力与模范师给上杭与连城之间的敌人以突然打击。第二次进攻应从宁化向永安的总方向前进，其目的是在给福建的军队以严重的打击，使他们将来与蒋介石共同反对我们的行动为于无效，同时使我模范师能依其他战线的形势，自由的进行以后的活动。如若可能整个的行动，不要超过六月到七月中绝对要完结。

（四）在我们的准备工作中建立坚强的后备军，是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要立刻开始形成第二与第三模范师。为此目的，应有最好的有一年以上作战经验的红军士兵与从方面军和军事学校中挑选的官长，以充第二、第三模范师的干部。应有一千二百人并有官长及武装，将他们分成（四百二十一队）编入每个模范团。在六月十号前，将第二模范师送到宁都瑞金区域训练，将第三模范师送到雩都、兴国训练，同时派遣三千个动员来的赤卫队到宁都，一千五百个到雩都，应将第二模范师形成和训练两个模范团，替三模范师训练一个模范团。如若在七月则同样进行此种工作，到八月底我们将有两个新的模范师准备好了，为着行动每师的力量都有六千人以上。

（五）甲、方面军当着停留集中在永丰的时候，应进行该地改编。乙、方面军当着停留集中的时候，应派小的队伍到北

方与东方侦察，以便监视敌人，遇有危险能在一天内准备大的行动，在赣江东岸应有小的游击活动，以便与赣江西岸我军作战互相配合。

（六）第八军与十六军应继续增加活动，为进攻湖南敌人的较大行动准备阵地，这种行动应在适当的时机立即开始。

（七）请告诉我们关于这一计划的意见，经常告诉我们关于准备行动及组成新的队伍上述战绩。

（八）在各区进行拥护红军家属的政治运动，加紧反对一切可能的阴谋、叛徒与敌人的奸细。

中 央 局

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红军中的团与青年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

王　稼　祥

在执行三个月团与青年工作的竞赛中，一般的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团员在节省经费退还公债的运动中，在提倡卫生减少病兵的工作中，在反对逃兵保障红军的努力中，特别在战斗中的英勇奋斗，充分表现团在青年战士中的积极领导作用，使团成为党在红军中的得力助手，帮助党更加加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获得这些进步与成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团内有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团员积极性一般的提高了，在团员中造成了执行“四不、五要、三努力”[1]的热潮；更由于团内生活的改善与青年特殊教育的内容与方式的改进，模范组的建立与团的发展的质量的增进；特别是党对团的领导的加强，实是团的工作进步的最重要的前提。不正确估计这些进步，而依然认为团与青年工作停在取消的状态中，这毫无疑义的是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悲观估计。

可是我们决不能以这样的进步认为满足了，决不能以进步来掩盖目前团的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

第一，没有了解“青年化”的主要精神在于全部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到青年工作中去，而是很庸俗的把青年化了解为仅仅是适合于青年情绪的一些青年工作方式（如唱歌、讲笑话之

* 这是王稼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训令。

类），这样毫无疑义的将降低了团的任务，阻碍了团与青年工作在政治上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团内部分的先锋主义倾向的存在，这表现在部分的青年干部，在个别工作上的离开政治机关领导的独立工作倾向，这表现在随便滥用取消主义的名词来与党的领导对立，甚至于借口党对团的取消主义来掩盖团与青年工作中的清谈倾向。

第三，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尚无彻底的转变，缺乏具体的领导，缺乏工作的督促与检查。革命竞赛尚未能真正基于团员与青年战士的积极性，很实际的活泼热烈的去进行，竞赛的条文太多，不具体，缺乏中心内容，以及官僚主义的一般领导和巡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还是浓厚的存在着。

第四，因为有以上的错误和缺点，在团与青年工作中的落后现象，便不能彻底肃清。这些落后主要表现在团的发展的迟缓与关门主义，直到现在团的组织不但没有超过党而且落在党的后面。对地方青年工作表现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忽视了争取广大的地方青年工农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团的无产阶级基础尚很薄弱，在大胆吸收工人苦力入团方面，在积极培养并提拔青年工作干部方面，尚不能引起团内经常的严重注意。团内反倾向的思想斗争还没有深入于每一个列宁小组中去，以及个别团员的犯纪律、开小差、工作消极、不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等落后现象，还不能彻底肃清。

目前红军中的团与青年工作：

在红军中青年成分占绝对多数，在巩固与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历史任务下，青年工作在红军整个政治工作中实占重要的地位。“谁有青年谁就有军队”，我们说青年工作做得好，政治工作也就做得好。因此，目前团与青年工作在红军中总的任务，

是要把党的进攻路线全部运用到青年工作中去，发扬团员在一切工作中战争中的模范领导作用，经过青年群众最大限度的来保障红军，巩固红军纪律，提高红军战斗力，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斗争。因此必须向着下列的工作突击：

（一）健全列宁青年组的组织作用，加紧团员教育

1. 列宁小组的一切工作必须依据党的战斗任务去执行，首先必须使每一个团员认识党的进攻路线。经过小组会议并分配团员去进行青年战士中之政治文化运动，尤其要与部队中一切落后现象作斗争，抓住每一个具体问题（逃兵问题……）到青年战士中去进行耐心解释教育，开展思想斗争。一切工作进行（认字、墙报、比赛等）必须经过小组的作用，去实行经常的督促与检查，以保障其准确的不间断的完全实现。

2. 加紧团员教育，团的一般任务之一是“学习共产主义”（列宁），但这一教育必须与斗争环境互相联系起来。

（1）小组会最主要的内容是教育，因此必须把党的进攻路线，使每一个组员深刻了解。报告要抓住每一个政治问题的中心，联系到团员日常生活，发动团员讨论。在战斗中，组长必须密切与团员的关系，及时告诉团员的任务，小组会同样的要派政治水平高的党员参加。

（2）开办新团员训练班，分配组员加紧新团员的个别教育。

（3）加紧模范组领导与教育，发动模范组帮助落后的小组，并用比赛的方式建立新的模范组。

（4）对干部必须开办流动训练班、问答讨论会、组长联席会，使深刻了解某一时期党的政治任务。

（5）发动团员、青年购买并阅读《青年实话》。

（6）在某一工作落后时，必须组织突击队，向着落后工作突击并帮助落后者前进。

（二）为增加团员的一倍而斗争

在青年的数量上，在青年的积极性上，在团的性质上都具体的决定了团的发展的条件，因此必须打开门来，进行征求团员运动。实行一个团员介绍一个（另发大纲），吸收青工、雇农入团，特别注意新战士的战斗员中以及团员少而青年多的部队中发展，总支部必须具体的讨论与分配，在红五月中要为增加团员一倍而斗争。

（三）每个青年扩大一个红军，帮助一个新战士

1. 在白区工作中必须运用活泼的方式去接近地方青年群众，每个团员都会做扩大红军宣传，实行小组与小组比赛，并可发起扩大红军冲锋队的组织，猛烈的吸收白区的青年工农加入红军。

2. 在苏区，团员战士必须经过联系制度，与本地团员和青年群众密切关系，每人每月写一封信回家，告诉红军胜利及前方情形。推代表到该地区去，号召地方少先队加入红军与做归队运动。在住地吸收青年参观红军生活与工作，给他们以宣传鼓动。

3. 对新战士必须做到帮助新战士的军事、政治学习，帮助他们习惯军队中的日常生活，解决其一切困难问题（疾病、写信），吸收他们参加列宁室的活动，只有提高他们政治上的自觉才能消灭逃兵现象。

（四）提高军事技术，加紧体育运动

1. 在团内外进行提高军事技术的宣传工作，检查每次战斗中的进步与缺点，运用军事游戏提高团员与青年战士对军事学习的兴趣。

2. 在列宁室中设军事研究组，专门研究军事常识的实际

问题，发动他们讨论发问，尤其是军事好的团员，分配其帮助落后的。

3. 实行每个青年做到射击准确、刺枪熟练、会打手榴弹、懂得防空防毒的常识，要使一切公差员工作人员均须努力学习军事，在青年晚会中实行各种军事比赛。

4. 在列宁室实行沙盘作业，学习识别地形和战术，学习用各种方法来发动红军战士学习军事的兴趣。

5. 领导青年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缴到自动步枪则陈列于列宁室，发动大家来学习使用，并举行各种兵器常识的研究。

6. 每个青年皆须注意强健身体，加入体育组，学习跳高、跳远、赛跑等。

7. 在夏季举行运动大会，发动各种运动的比赛，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比赛。

（五）加紧反帝教育与青年特殊训练

1. 在青年队、青年晚会中，必须将帝国主义强盗的每一行动告诉青年，尤其要利用各种图表来详细讲解这些问题（如日本多大，人数多少，东三省好大，热河在哪里，失地好多……），要教育青年战士，如何在火线上来答复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

2. 吸收青年参加反帝拥苏同盟工作。

3. 青年队的课材，须采取活泼的，把一个问题编成故事、绘图来讲。青年晚会也可用政治游戏、军事游戏去进行。

4. 红军中青年队、地方少先队、儿童团时常通讯讨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扩大红军的问题。

（六）地方青年工作

1. 发动广泛青年红色战士参加地方青年工作，反对过去对地方青年工作的机会主义消极。

2. 地方青年工作主要任务在于发动青年工农斗争，进行对青年群众宣传与组织少先队、青工部等，建立团的支部。

3. 在赤区中密切与地方青年群众组织的联系制度，帮助驻地少先队政治军事训练，举行各种联欢会。

4. 在地方工作落后的区域，红军中的团必须在政治机关的同意下，组织突击队，帮助该地工作的转变。

（七）每天节省一个铜片，个个不生病

1. 实行每天节省一个铜片，每个团员不吃零东西，人人去找柴子、笋子，捉鱼、虾、田螺给公家吃，节省公私一切日常用费。

2. 深入经济动员，热烈的退还公债捐助给公家。

3. 在青年晚会中实行卫生检查与比赛，在墙报中发表文章，提倡卫生。

4. 每个青年须读卫生须知，要做到不吃酒、不吃烟、不吃辣椒、勤剃头、洗衣、洗澡、不吃冷水等，尤其是防止暑天的瘟疫病，只有在这些工作中能实现“一个青年不病到后方”的口号。

战争迫切要求我们不放松一刻的时间去紧张的进行这些工作。我们必须以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起青年群众的热情，各连各师抓住几件中心工作，经过团员大会去决定短期的简单的具体工作比赛。尤其是要彻底转变一切工作方式，发展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的消极，反对有害的先锋主义倾向，反对官僚主义的方式，为全部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到青年工作中而斗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注　释

〔1〕四不，指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五要，指要团结友爱，要遵守纪律，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三努力，指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中共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

省委审查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明书后有如下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他在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七军的行为，挟着派别观念到苏区与谢唯俊等结合，在苏区党大会时反党的活动，在去年十一月会、寻、安三县党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中所宣布的有计划的准备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这些一贯的错误始终是未由他自己揭发的。经过党大会与谢唯俊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一致，经过会、寻、安机会主义路线与小组织的谢、毛、古的一致，和直到最近对自己错误掩盖的一致，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这是他自己始终不愿意去了解和向党承认的。在他的第二次申明书中仍然以“感觉自己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来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

毛、谢、古三同志二次的申明书始终没有系统的全部的揭

发他们由于对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和目前革命形势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上，与党有了根本不同的观点和估计出发，所形成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反国际反中央的小组织，并且始终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因此省委认为邓、毛、谢、古四同志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塞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省委认为四同志是否真正站在党的路线上，组织上成为无产阶级坚决的先锋战士，现在是没有保证的！

因此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的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省委号召全党团聚在国际的中央的进攻路线上，无情的彻底向反党的机会主义和任何派别观念小组织的活动作残酷的斗

争，从实际工作中开展党内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保证江西工作的彻底转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北方各级党部的信*

——论纱厂减工关厂与北方党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

各级党部的同志们：

在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急剧形势中，资本家更加紧的开始了残酷的进攻，将经济恐慌与战争的灾祸完全架到工人阶级的身上。最近国民党、资本家以停工、关厂、减工、南迁的手段来进攻工人，来分散工人阶级反日的队伍与团结，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平津与华北清扫道路。

全国纱厂资本家一致以减工，削减工资向纱厂工人的进攻中，华北纱业资本家更进一步以关厂的残酷手段来威胁北方数十百万的纱厂工人，企图使数十百万的纱厂工人和其他各种企业工人在资本家新的进攻下完全屈服与停止反抗运动。

天津的恒源已经正式关厂，宝成和日本裕大也正在准备与计划中，唐山华新已经实行四日班，石庄大兴已开除数百工人，其他青岛、郑州、太原各地的纱厂亦在实行或准备采取一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三期。

致的步骤向工人进攻。

这一减工、关厂与各种形式的进攻的结果，是使全国纱厂工人工资大大的降低，以至完全沦于饥饿、死亡、失业、痛苦的惨境，这必然要激起广大群众进行决烈的反抗，走向斗争的更高阶段。在资本家正在进行减工扣薪的运动中，天津裕元工人首先表现了斗争的伟大决心与力量，五百余工人自动的武装起来，准备铁尺木棍、煤油火把，决定于扣薪时和资本家拼命。这一反抗力量的表现，结果使全天津纱厂资本家一致声明"决不扣薪，经常工作"，使天津资本家决定的"五一"全体实行减薪的计划宣布暂缓执行。其他各厂与唐山、石庄各地的纱厂工人，同样在自动的酝酿反抗的运动中。

另方面，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黄色工会正在准备动员很大的力量，采取各种方法来防止，破坏和镇压工人的反抗运动。帝国主义、国民党除了以"维持地方秩序"、"巩固后防"、"严防捣乱"为借口，派遣武装军警、便衣、探狗来严密监视与残酷的镇压外，更以"集议救济"、"保证劳工利益"来进行武断的欺骗宣传。黄色工会则以"静候党政调停"来压制工人的独立行动与自由（如恒源颁布取缔工人互相谈话与一切自由的"斗争纪律"来控制和出卖工人）。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一致声援，使资本家敢于大胆的采取关厂的手段来进攻工人。

工人阶级丰富的革命火焰是在燃烧与爆发着，尤其是纱厂工人的反抗运动，极有形成北方各主要城市以至全国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前途与可能。北方党目前所处的紧急形势下，真正深入企业中、群众中去，努力争取这一可能变成实际。这不仅是保证纱厂工人反攻冲破资本进攻与反动压迫的胜利，而且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平津与华北一个有力的无产阶

级的回答，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然而北方党对于这一客观环境的严重性与斗争的伟大意义是估计不足的。党、团、工会对于纱厂工人反抗资本进攻的领导与布置是远远落在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后面，落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破坏斗争的活动的后面的。

河北省在红五月的决议中和紧急通知中提出了“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总同盟罢工反对……”等口号，而且规定了“准备一企业一区域的反日的总同盟罢工”，决议、通知通过了，口号提出了，但是没有真正采取任何办法去准备的，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准备了罢工的群众工作基础与广泛的动员。纱厂减工、关厂与工人自发的反抗已经半月了，党的省委还没有作过讨论，亦没有采取一切必要与可能的步骤，迅速的去加强与巩固天津市委的领导。在纱厂斗争紧急形势之下，天津党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的状态。团的组织同样没有真正的动员与具体工作，天津团的市委与党的对立，与个别同志先锋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状态而不及早的纠正。河北工会办事处对于纱厂斗争虽然注意了，而且获得相当的成绩，半月来在天津广大纱厂工人中普遍的建立了组织的初步基础，但亦没有唤起全工会的组织的动员，对于恒源关厂斗争并没有积极的给以应有的可能的领导。其他河南、山西、山东的党的组织都没有严重的来注意这一问题。

这种严重的错误是不能一刻容许的，必须开展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与空谈的斗争，反对对于纱厂工人斗争不足的估计与忽视的斗争中，提高全党的积极性，勇敢的深入企业与群众中去，把组织纱厂工人的反抗，争取党在这一反抗运动的领导，真正去准备罢工的群众工作基础来实现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用这个罢工来推动和开展各业反日斗争条件的总同盟

罢工，加强工人阶级对于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和反帝运动中的骨干作用，成为北方全党第一等严重的战斗任务。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纱厂问题的全部指示，具体布置下列工作：

一、立即在提出反对减工，反对关厂，反对减低工资，反对开除一个工人，在已经关厂的纱厂如恒源特别提出马上开厂，关厂期内工资照给，不准减少一个子工钱与不准开除一个工人等迫切要求，来与黄色工会一切出卖工人的纲领对立起来，广泛动员纱厂群众召集各厂群众大会讨论斗争纲领与斗争步骤，组织各厂的群众行动和示威，来反对资本的进攻。特别在已经关厂的纱厂如恒源应当号召群众，以群众力量包围资本家马上开厂，以动员群众冲进工厂占据工厂和堆栈，限期开厂与按照全数工资发维持费，一直到自动拍卖分配存货救济工人及其家属，依靠群众的威力以反攻和进攻的步骤，来威胁资本家马上开厂。

二、在群众大会中必须向大会提出成立反对减工（或减薪或关厂）的斗争委员会，广泛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各车间成立斗争委员会的小组，吸收一切积极分子到斗争委员会各部工作，经过各斗委与代表团结每个下层群众，严密斗争委员会与下层群众的联系，以充实斗委会的基础和力量。特别恒源应当抓住黄色工会控制包办拍卖斗争的一切事实广泛告诉群众，动员群众自动要求改造与扩大反对关厂斗争委员会，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包办把持，以一二百委员而包含数十以至十数人的健强主席团的斗委会代替着数人以至十数人的黄色工会包办的斗委会，建立各部与组织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募捐队的组织和工作。

三、建立我们党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乃是保证反攻胜利，冲破资本进攻与反动压迫的主要条件。因此“要从各厂产业支部的同志中挑选最有信仰和工作能力的到斗争委员会工作，并由他们成立强有力的党团，支部干事会应从经过这些党团来指导斗争委员会的全盘工作，推进各该厂的斗争。各车间小组应由干事会有计划的分配得力同志去领导，按日向干事会和斗争委员会报告各车间的工作情形”。在同一区域和城市有几个纱厂的时候，要挑选各厂斗争委员会中最有威信的同志到某区域和城市的总的斗争委员会工作，并由他们组织某区域纱厂总斗争委员会党团，在某区或某市党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在没有党的支部而只有赤色群众的各厂，党的区或市委员会与工会应用一切方法来和这些积极分子建立关系，同时经过指定的同志与他建立严密的关系，经过这些关系来发动各该厂的工作与斗争，并动员一切这些厂的邻近党的支部或赤色工会小组、反日会和互济会组织突击队来帮助这些厂的工作。

四、在一般的号召与发动中特别要艰苦地抓住一二个斗争条件高涨与党和工会组织比较健全的工厂做中心和骨干，加紧领导这些中心厂的一切工作以至经常讨论和解决该中心厂的一切困难问题，以推动和领导其他各厂。如天津恒源已经关厂，我们首先要采取一切办法来争取恒源斗争的领导。这里，第一，天津党和工会应当加紧领导工会最近发展的群众，把他们组织革命反对派小组或全厂革命反对派委员会，经过这些群众与会员提出我们主张与斗争纲领与黄色工会对立起来，艰苦的说服群众，使他们与黄色官僚对立和到我们领导下来；第二，广泛的向其他各纱厂宣传，告诉群众恒源纱厂关厂是整个纱厂资本家的一致计划。只要恒源工人失败了，那么其他各厂便要一样进行。经过恒源公开代表的活动与该厂厂内党和工会的发

动号召群众大会，成立该厂斗争委员会，向资本家示威与威胁资本家保证不关厂，不减薪，不开除一个工人，进一步以群众力量一致援助恒源斗争，一致怠工、关车、罢工、示威，包围恒源资本家，占据恒源工厂与堆栈等同情行动，来威胁恒源资本家马上接受全部群众条件；第三，以恒源为中心，以各厂厂内活动的基础公开号召天津各纱厂工人代表大会以至于全体群众大会，讨论一致斗争纲领与斗争步骤，组织群众总的反攻来回答资本总的进攻；第四，以天津为中心派遣代表发表告纱厂工友书与通电，召集华北首先是河北、青岛各中心城市纱厂工人代表联席会议，在代表会上选举全天津以至华北纱厂工人斗争委员会及其分会，实行以广泛的红色统一战线来对付资本的联合进攻，争取华北以至全国纱厂总同盟罢工的实现；第五，天津党、团、工会必须把深入恒源群众斗争、争取恒源斗争领导，成为领导与开展天津所有的纱厂斗争的总关键。党、团、工会应当马上进行实际的讨论与具体的布置，在目前各厂尚未有建立党、团支部组织而各厂都已建立革命反对派的时候，党、团特别要加紧对工会的领导，立即建立各厂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召集各厂革命反对派代表会议，成立天津纱厂革命反对派的总委员会，加紧向纺织业黄色工会下层代表与群众工作，建立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对派的工作与组织，要把瓦解天津纺织黄色工会与在一切无组织群众中建立群众工会，及创造党、团在纱厂中的堡垒联系起来。在这次斗争的领导中，集中号召的力量去实现“不准一个纱厂没有我们的组织”的任务。把这个工作的成绩作为这一斗争过程中的最主要任务与最主要收获之一。

五、不是等待关厂、停工、减工、减薪时再斗争，而是马上便要提出斗争纲领，组织群众反抗运动来回答资本进攻。因此，这里第一，要马上在各厂以至于各间提出最迫切的部分特

殊要求来发动和充实这一减工关厂斗争，从每个小的行动与斗争中扩大群众基础，成立反对减工关厂斗争委员会。第二，斗争一开始便要发动群众组织各种自卫队、纠察队队伍，不怕大小，二三人起都可以成立，立即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武装起来。学习裕元工人的英勇经验，要发动数百数千男女工人、青工、童工参加纠察自卫组织。首先在天津要马上与裕元五百纠察队建立关系与领导，在六大纱厂普遍建立最少数百单位的工人自卫队。第三，动员一切工人家属参加自卫队与斗争的行动。

六、首先与纱厂失业工人建立统一斗争与行动的联合战线，和特别加强在青女工中的工作，是保证斗争开展与胜利的主要条件。第一，在斗争中应同时提出失业工人的迫切要求（要工作和救济等），来团结在业和失业工人，天津纱委马上要规定失业工作计划与在业工人斗争的基础上成立真正群众的失业委员会。第二，十二万分的加紧青女工工作，动员妇女突击队到女工群众中去，召集青女工代表大会，讨论一般条件与青女工特殊的要求，选举青女工的代表参加斗争委员会，动员一切青女工参加斗争和行动。天津恒源应当马上召集青女工全体会或代表会，以恒源为中心号召组织各厂青女工代表大会（最迟在红五月底完成）。党、团、工会要用一切力量来扩大和充实这两个代表大会的准备，把这两个代表会的召集作为纱厂总反攻斗争的主要动力，与号召和建立群众的革命反对派联系起来。青岛、河南、山西及各地一切纱厂应万分注意青女工工作。

七、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平津，已经迫在眼前，在纱厂工人斗争的准备与进行中，必须一刻不忘记的号召群众的反日斗争与行动，建立各种形式的反日自卫组织。在天津、青岛的日本纱厂中特别要注意在工人一般的迫切要求下，提出特殊的要求（如撤退武装军警，反对工厂驻军等），广泛的号召同

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平津与华北，组织检查日货、打工贼汉奸、厂内会议、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群众行动，用最大的力量动员他们参加救亡会议，参加“五卅”大示威。

八、纱厂资本家的进攻，只是整个资本家新的进攻工人阶级的开始，其他各厂与国营企业（如火柴、烟厂、印刷……）也正在进行。我们必须将纱厂减工、关厂的事实及意义普遍的告诉其他企业的工人，指出资本的进攻将同样的向着他们。集中很大的力量去团结，组织各工业部门的工人大小斗争，发动纱厂的工人和代表去推动与影响其他各企业工人的斗争，以纱厂工人反抗关厂减工的斗争为中心，去汇合其他各业的工人斗争的伟大潮流，争取几个中心产业区域特别是天津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的实现。

九、立即采用各种方法去发动群众对于纱厂工人的援助运动，如发表通电、宣言、派代表、写信去慰问，发起大规模的募捐，举行同情的怠工行动，从精神上物质上去提高与坚强纱厂工人斗争的精神与决心，使他们不致于在敌人各方面的进攻与破坏下陷于孤立无援。党必须动员赤色工会、反帝同盟、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立即开始这一工作，并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去筹备罢工的基金。

我要求河北以及北方各级的党的领导机关立即根据中央的紧急通知与这封信，以及《火线》上发表的关于纱厂斗争与斗争委员会的组织问题等文章，作一次详细的检阅与讨论，并具体的布置工作，动员最好的干部去加强天津、唐山、石庄、青岛、郑州、太原的党的领导，严格的检查工作，保障中央与自己的决定百分之百的执行，并将布置与进行的情形速作报告来。

中央驻北方代表

五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朱德、周恩来关于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是战胜阶级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战时负有各种任务的大军，分布于广大的战场，各处境遇不同，而要一切指挥员、战士们都向着一定的方针，一致地动作起来，必须有统一动作的号令，且必须服从此种号令，才能成功。

过去，我们红军有些部队尚存有游击习气，对于上级首长所发布的一切命令、训令大半没有负责传达，使之深入到每个红军军人中去，更很少检查其执行程度，因之各部队常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地去执行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甚至有把命令和训令视为废纸藏到公文箱内，而不去传达与执行。如最近我们检查，总直属队竟有多数单位完全没有传达上级首长的命令、训令，以致一般战斗员及工作人员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绝对不能再容许一秒钟的存在，必须立刻纠正过来。

为要使上级首长的一切命令和训令明确下达、彻底执行起见，各级指挥人员和政治人员于受领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时，须迅速向所属人员宣读解释，使深入到最下层的群众中去，并须随时检查其执行进度加以指导，以使这一个命令和训

令完满执行，毫无遗漏。如查有继续过去恶习、藐视号令、不予传达和督促实行者，应立即执行纪律，予以处罚，以资警惕。

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周恩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怎样学习行军*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

朱　德

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十三章第八百四十三条至第八百六十四条，所规定营以下的行军原则和具体的执行方法，营、连、排、班长的职责，都很清楚（出发前要准备好，出发时要用口令去指挥，检查服装、草鞋、绑腿，每次都是必要的，并要亲自去干），用不着逐条介绍。我们初、中级指挥员，应当在每次行军的前后，都应去看一遍，检查我们的行军是否合乎原则。如能本此实地练习，红军的行军力，会大大加强。

即使高级指挥员亦应熟习营以下的行军动作。这样才能做到全军团的行军指挥的完满，才能纠正营以下的行军中的缺点。

苏军野外条令第十七章的行军篇第三百五十八至三百八十九条内分为总则、行军计划、行军指挥、行军实施、夜行军五个项目，是团以上大部队的行军原则。我们高级指挥员应当经常地讨论学习，在每一次行军中均照此执行，行军后对照检查有无不合原则之处。我们相信，如在短期内都学会了行军原则，必定会减少行军的困难，加强红军的行军力。

红军行军力一般说来，都是较白军要强些，因为红军大多

---

* 本文原载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色战场行军特刊》第十期。

数战士是游击队来的。他们的行军动作是在被敌包围之环境中养成的，迅速、秘密两个主要条件，一般地都能做到，但行军秩序，不是很整齐的。

在白军眼中，估量我们的行军力，每日能行百里，这不是无原因的。我们游击队，日行百里是一件平常的事。红军大部队要行百里，没有很好的行军计划，是很难达到目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红军行军估量不足。大部队行军，事前计划不好，行动时指挥不好，还带着许多游击习气，必然有许多行不通的障碍。但因此就说红军行军力减弱，是不对的。我们应以野外条令有关行军的原则，去改正我们的游击习气，学习大部队的行军，保持红军固有特长的行军力，是目前急需的事。

我们用野外条令来检查我们过去行军的缺点，有以下几点，希望同志们加以注意。

一、分不开旅次行军与战备行军的原则。因此，无论何时对于保持体力的手段很少。即接近敌人，战备亦不周到。四军的作风迅速，随时都见到他们在跑。此种迅速，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你不去恢复体力，到了敌人面前，还能冲锋吗？

二、行军计划中，对通过出发点的计算很不精确，常有大部队拥挤在出发点，有被飞机袭击之危险。

道路、桥梁修补未列入行军计划中，临时常有小障碍，以致发生行军途中站几个钟头的事。

决定行进路线，很少派参谋侦察，相信向导带路多于实地调查，以致有错误之例。不计划交叉时间和地点，常有两军相交叉，久停不隐蔽，有被飞机袭击之例（七师），不计划大休息地点。

不计划进入宿营地，到达时，常有久立等候的现象。

不计划指定运输行进路线，常有一二副担架阻塞了几千

人，不能速进。

三、在行军指挥中，纵队指挥员没有提早到通过出发点去指挥，沿途很少报告，后方部队又不明了前方情形。

不指挥修理桥梁、道路及堵水等。

四、行军实施中，没有做到走路靠右侧的规定。来往的队伍和传令员，都不能通过。速度保持不一，时快时慢。对空防御不好，伪装没有。休息时间没有特别注意。

五、夜行军没有精密的计划，未认真研究地形、道路及天候、向导各种因素，常使行军不能达到目的，往往一夜仅行十余里。

以上各点，望各级指挥员要去研究野外条令，来纠正我们过去行军中的缺点。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为拥护苏联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挑衅告全党同志和一切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

全党同志们和一切劳苦群众们！

国际帝国主义的东方宪兵——日本强盗，自从掠夺了满洲、热河以后，积极进攻平津，逼近察绥，同时在满洲加紧对苏联的进攻，积极进行掠夺中东路，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反苏联的种种阴谋与行动，都证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紧急，同时也就是干涉苏联，进攻外蒙古共和国的最露骨的步骤。一切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法帝国主义者，都积极参加和赞助日本进攻中国与反对苏联的行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无时不想挑起反苏联的战争，以进攻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一反苏联战争，所以暂时没有爆发的原故，是由于苏联一贯的和平政策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拥护。最近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武装干涉，最显明的事实，就是英国的技师案、英国断绝和苏联通商、德国法西斯蒂反苏联的阴谋、华盛顿会议，以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利用中东路问题攻击苏联等等，无非为挑起反苏联的大战。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一、四十二期。

国民党自从投降帝国主义，背叛了中国革命以后，反对苏联就成了它们的一贯政策。最近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虽然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这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苏联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国民党在复交以后，正在利用一切方法进行对苏联的新的挑衅，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向苏联疯狂的进攻。国民党在复交后第一天，就经过各种反动刊物向苏联要求下令停止中国苏维埃运动，这是最无耻的反苏联阴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千千万万劳苦群众自求解放的运动，是中国民众新生命的基础，只有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才能向苏联提出这个最卑鄙的要求。国民党无耻的要求苏联交还蒙古，试问国民党有什么“理由”向苏联要求把独立的蒙古共和国交还中国呢？这只是表示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这对于中国劳动群众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是极端反对的。国民党借新疆事变，去反对苏联，把新疆回民的解放斗争，认为是苏联所主使，而把国民党自己压迫新疆回民的罪恶，以及英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俄对回民的压迫，完全抹杀了。中国劳苦群众完全拥护新疆民众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斗争，承认他们有自决权，直至脱离中国而独立，如果他们要这样。国民党借口反对“倾销”，特别限制苏联对中国的贸易，而对于民众的抵制日货，则加以全力的镇压，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真正的倾销政策，却表示极端欢迎。最后，国民党特别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对中东路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严重状态，对苏联疯狂的攻击与污蔑。

万恶的国民党为贯彻其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借中东路问题，进行广大的反苏联阴谋，动员其专做卖国交易的外交部，愚弄与屠杀民众的党官刽子手，以及一切反动报纸，制造反苏联的反动“舆论”与空气，进行各种最无耻的

武断宣传，以准备反苏联的战争。

中东路事件是什么一回事呢？谁也知道，中东路原来是苏联单独所有的，因为该路是在中国，所以苏联曾允许与中国共同管理。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南京政府在十八个月当中不曾负起共同管理该路所应负的责任，而且没有企图负起这个责任，没有采取丝毫办法去恢复该路所在地的满洲。日本强盗企图夺取中东路作为进攻苏联的武器，这正合于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的胃口。日本强占满洲，把中东路弄得破坏不堪，这是人人知道的事实。但是，在长久的时期，国民党没有也不敢向日本提出半个字的抗议，反而在日本强盗及其傀儡准备完全夺取中东路的严重关头，在传出苏联提议出卖中东路的消息以后，却拼命攻击苏联，提出最无耻的抗议。国民党的行动完全是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的。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反对苏联提议出卖中东路的“理由”，就是苏联无权出卖中东路，出卖中东路是破坏中俄协定与奉俄协定。谁都知道，中东路是由苏联民众血汗所造成的，而在中俄与奉俄两协定中明白规定，允诺中国赎回该路，这显然证明中东路主权是属于苏联。如果苏联要出卖中东路，他有充分的权利，国民党没有反对的权利。同时，国民党借口中俄与奉俄两协定中规定苏联允诺中国赎回该路，以及中东路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来反对苏联提议出卖中东路。然而国民党不但不想赎回该路，而且自一九二九年掠夺不遂以后，遂把中东路与满洲完全送给日本强盗及其“满洲国”了。国民党不但不愿与苏联去决定中东路的前途，不与苏联一块去保护中东路，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反而在苏联提议出卖该路的时候，为帝国主义效劳，企图把中东路和满洲及中国其他各地一样，无条件无代价的落到日本强盗及其走狗手里。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利用中东路问题企图与苏联公开决裂，以重新绝交为威吓，这又一次证明国民党不但不愿意与苏联恢复邦交，而且利用一切机会，甚至利用与苏联毫无关系的问题，去破坏中俄两国劳动群众的兄弟联盟。另一方面，国民党却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看作是中国“友邦”，极力维持与日本强盗友谊，事事都顺从日本强盗的意旨。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在中东路问题上无耻的诬蔑苏联“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事实上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暴力的，只有国民党。苏联不但没有投降，而且始终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彻底揭破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就在中东路问题，只有苏联才坚持该路的一切权益，而国民党对于日本及其傀儡的掠夺，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而且不敢说，反而为帝国主义卖气力，恨不得把中东路早日完全落到日本手里。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借中东路问题，无耻的诬蔑苏联违背扶助弱小民族的政策，污蔑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出卖革命”。事实上只有苏联才始终扶助弱小民族，保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试问谁真正放弃沙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只有苏联。这在国民党现在大吹特吹的中俄奉俄协定中写得明明白白，且为有目共见的事实。谁真正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帮助中国革命？谁在日本强盗占领满洲之日立即公开宣称完全站在中国民众方面，不承认一切武装侵略呢？也只有苏联。国民党却不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不抵抗，而且极力压迫民众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首先是用全力去进攻反帝的唯一力量——中国红军与苏区，甚至企图要求苏联“取消中国苏维埃运动”。所有这些都表示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与清道夫，是反苏联的积极参加者，是中国民众的罪人。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把苏联的和平政策看作是“屈服”与“软弱”，企图把苏联牵入远东帝国主义的纠纷的漩涡中，使帝国主义可以“借口”开始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这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反苏联阴谋。苏联所一贯实行的和平政策，在于“不愿拿他人一寸土地，也不肯把自己一寸土地让人”，在于为民族间的和平而斗争，为总的和平而斗争。这个政策给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予以直接的有力的障碍与打击。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才能把苏联的和平政策，看作是“屈服”与“软弱”，只有反苏联的凶恶敌人，才能企图使苏联放弃和平政策。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借中东路问题，去污蔑苏联承认“满洲国”，污蔑给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以莫大的困难妨害中国收复失地。事实上苏联没有承认“满洲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强盗机关——国联才在报告中承认“满洲国”的现状，即承认了“满洲国”和日本的一切强盗行为，只有下贱的国民党才接受了国联的报告书，始终信赖国联，默认“满洲国”。同时国民党不但不想收回失地，而且现在又准备出卖平津与整个华北，成立第二个“满洲国”于热河、华北，把华北、内蒙作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民众的根据地。

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借中东路问题，企图装着“担心”苏联的利害的样子，来进行反苏联的挑衅，什么提议出卖中东路于苏联不利，什么从此日本将进一步夺取海参崴和苏联沿海州等等。可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完全不能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一致拥护之下的苏联，有充分力量保护社会主义的胜利，保护苏联一切利益，也就是保护世界革命的利益。无耻的国民党不但出卖了满洲、热河、华北，断送了中国民族利益，而且假冒“同情”的

诡计，企图把苏联牵入于帝国主义挑衅的漩涡中，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阴谋。

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近来在中东路问题上所进行的反苏联的阴谋。国民党所以这样积极的利用中东路问题向苏联攻击与狂吠，无非为着要贯彻其投降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企图在反苏联的挑衅中得到帝国主义的继续帮助，以维持其苟延残喘的反动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国民党积极动员一切反动势力，进行种种反苏联的武断宣传，准备与苏联绝交，破坏中俄两国民众的亲密的联盟，同时拿中东路问题来掩盖其出卖平津、华北的卖国勾当，转移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斗争，去反对中国民众唯一的同盟者——苏联，去反对中国唯一的彻底反帝的工农红军与苏维埃。

全党的同志们！一切劳苦群众们！日本帝国主义用全副力量去进攻华北，平津已经在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下，国民党已经在日本直接指使之下成立了第二“满洲国”于华北——以日本走狗黄郛为首的北方政治委员会。日本强盗“满洲国”与国民党一致努力去夺取中东路。白俄在满洲不断的向苏联进攻，一切帝国主义都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危险，已经到万分危急的关头！已经到了新的严重的阶段。一切劳动群众们，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冒充民众的名义向苏联抗议，揭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阴谋，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破坏中俄民众的联合。中国民众要真正享受中东路的利益，只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华北，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拥护中国革命唯一的同盟者——苏联，不许侵犯苏联！巩固中俄的劳动群众的兄弟联盟。拥护中国革命

的工农红军与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铲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才宣布了对日宣战，只有苏维埃中国才能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才能争取中国劳苦群众的彻底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与苏区的进攻，对苏区劳苦群众的“围剿”，为苏维埃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根据工农红军政治部提议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团中央局有于下的决定。

（一）由于工农红军的胜利，更激动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和青年加入红军的热潮，红军的胜利就是党的进攻路线的胜利，就是党的进攻路线获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正当着红军胜利时也是国民党出卖热河与整个华北的时侯，因此红军的胜利也正是全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

红军的胜利在基本上和主要战线上击破了四次“围剿”，但是四次“围剿”还没有完结。正是这样与帝国主义的直接作战更加迫近，为完全彻底的粉碎四次“围剿”，须要更快的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给党的号召以列宁青年的回答，在实际工作中来证明团是忠实的坚决的拥护党的进攻路线，团是党的第一个助手。因此创造“少共国际师”是最迫切的任务。

（二）少共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青年解放的唯一旗帜。“少共国际师”的使命将是何等的伟大！各级团部必须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青年实话》第二卷第十六期。

将前方的号召与中央局的决定在团内和群众中广大的解释，利用过去扩大红军的光荣的经验，为整团整连的加入红军，整个青年团支部加入红军的光荣例子，成批的动员团员、少先队与劳苦青年到红军中去创立“少共国际师”。

（三）中央局决定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

中央局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议：责成江西军区将青年团所动员之团员与青年群众编立“少共国际师”两团，在福建军区一团，在闽赣军区一团。

少共国际师，将在今年的国际青年节，高举着工农红军的旗帜，举行检阅，宣布正式成立，武装上前线！

（四）中央局责成江西、福建、闽赣省委立即定出具体的计划，与各该军区商量动员的方法、集中的地点、训练的准备等工作，各省县所动员加入红军的团员、少先队和青年，直接送至各省军区，并报告少共中央局。

（五）在征调到“少共国际师”去的青年，团员必须占着半数以上，中央局提议应当从江西、福建、闽赣征调五千个青年团员到“少共国际师”去。为着达到这一任务，必须将中央局的这一决定提到每个支部和每个团员面前，提到每个群众的会议去讨论，发动与组织广大劳苦青年的积极性，造成加入红军的洪流，来完成“少共国际师”。

少共中央局

五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3—1934）》刊印。

中共中央紧急通知*

——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的问题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各级党部：

目前中国民族的危机是到了更严重的阶段。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一贯投降、破坏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及抗日的义勇军部队的战斗，遂使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得以长驱深入，直捣平津，计划在华北撑持起第二个傀儡政府来确保“满洲国”之安全，所谓“长城之线”而控制整个的华北，以压迫华北的革命运动和威胁着全国的工农斗争——首先就是更积极的履行帮助国民党来进攻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工农红军与苏维埃的“义务”。另方面，在华北局面急剧的进展和国民党各派之反苏联的挑衅的宣传与行动中，皆可见到在远东方面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想从东方开始反苏联的冒险以图削弱革命的祖国，而便于压迫东方弱小民族之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斗争。

正在这一反革命的共同点上，在英法帝国主义者斡旋之下，开始了而正进行着南京政府与日本强盗的秘密谈判和实行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三期。

出卖华北。

在目前这样严重的时机，全党须战斗地动员起来，在组织民众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来组织广大群众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用一切力量执行以下的几个具体任务：

（一）根据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宣言和《斗争》（四十一、二期）上关于“华北形势与创立北方苏区”的社论，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和加强政治的鼓动工作，揭破这一秘密谈判的黑幕和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报纸的欺骗，在中央这一宣传的周围团结广大的群众。

（二）在各处特别是在许多中心城市，首先是北平、上海、天津召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及组织群众的游行示威反对卖国的谈判。在各工厂、学校、兵营和农村里，组织“反对卖国谈判与保卫华北委员会”。在北平、天津首先应即刻在“武装保卫平津”的口号之下，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特别是要建立工人的武装组织。

（三）在义勇军部队中，须努力发动和组织义勇军士兵群众反对国民党解除其武装的斗争。在撤退的正式军的部队中要发动和领导士兵不服从长官命令，不退出平津和河北的斗争，组织革命的兵变来配合工农群众的斗争以促进北方游击战争的开展。

在这些部队中都应即刻成立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和领导这些斗争。

（四）特别在战区以及非战区的难民灾民中要加紧我们的工作，组织“难民救济会”等；在工人中组织“工人反日会”，特别要抓着北宁路、津平路的工人，开滦失业的全数矿工和纱厂等工人的日常斗争，密切地配合着反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的斗争。

要在青年工人和学生中广泛的组织他们的斗争并成立义勇军。

（五）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派兵南下打红军及轰炸苏区，更广泛的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在这一运动中来扩大“红军之友”或“新中国”的组织。

（六）在各工厂、各学校、兵营里，召集群众大会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告以中国劳苦群众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及拥护苏联的热忱（应根据中央五月十五日关于这一问题的宣言，《斗争》四十一、二期）。这一工作应由各级党部督促各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并在这一运动中来发展“苏联之友”等等群众组织。

（七）各级党部应在这些工作与斗争中，加紧救国会议的工作，应于最近期内在各地分别召集群众救国代表会，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来组织广大群众于救国会来。

中央认为，执行这些具体任务是各级党部最低限度的责任。目前时局的严重须要我们党切实的经过这些艰苦的工作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从目前的危机与陷阱中找出革命的出路！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张　闻　天

在工农民主专政下，不但阶级斗争没有消灭或是削弱，而且阶级斗争发展到了最高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这是工农民主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最高目的。同时为得要顺利的进行革命战争，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阶级斗争的形式并不限制于武力的流血的战争，并不限制于对于反革命的强迫、逮捕、拘禁、枪决与没收他们的财产。阶级斗争在这里还采取各种各样其他和平的与不流血的形式。在这里阶级斗争的表现，更加复杂起来了。

经过苏维埃政权，直接用武装力量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直接作战，来镇压苏区内部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这种阶级斗争的内容与形式是为每个普通的工人与农民所了解，所拥护的。他们看到反革命的进攻与反革命的活动，是知道以极大的勇敢、果断与牺牲去斗争的。但是在另外一种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十五日出版的《斗争》第十四、十五期。

情形之下，就是最先进的工人分子也时常会失去方向以至违犯了革命阶级的利益而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

首先拿苏区内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来说罢。劳资的斗争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是依然存在的，因为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工人阶级同农民在一起是统治的阶级。但是一般的在生产中他还是被剥削的阶级，资本主义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不但依旧存在，而且还有发展的形势，因此工人阶级为了日常生活的改善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不但不能消灭，而且得到了更自由的开展。也只有这种阶级斗争的开展，工人阶级才更能团结他们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准备将来更进一步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也“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的时候，群众才卷入运动中去，积极参加它，重视它，并发挥其英勇、无畏、顽强性与忠诚到最高限度”。（列宁）

无疑的，反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反对劳资间阶级斗争的开展，实际上是代表了资本家富农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间的领导作用，甚至把这一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险。

但是在这一阶级斗争的开展中，我们同志常常忘记了：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阶级斗争的形式与内容同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之下，我们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在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来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我们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在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来巩固工农自己的统治。在那里，工人是被统治者与被剥削者。在这里，工人在政治上是统治者，是国家的主人翁，虽是在经济上一般的还是被剥削的阶级。正因为这种不了解，所

以在苏区内，阶级斗争一开始发展，常常就走到另外一个“左”的极端。这表现在我们的同志，在经济斗争中，向资本家从心所欲地提出他们的经济要求，并且依靠于武力的与行政的手段强迫资本家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实现的结果，是部分工厂企业的倒闭，与对于苏维埃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群众的部分失业。

这种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的。

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由于他们的统治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总崩溃，水旱灾荒，以及工农群众的饥饿与失业的痛苦，是这一统治负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在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不满与愤恨来推翻这一统治。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我们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翁，我们对于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与衰落是要负责的。我们可以使民众了解，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产生的一切经济上的困难，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发生的恶果，我们是无法解释的。尤其对于农民群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拿事实证明给苏区内以至全中国最大多数农民群众看，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他们的生活是要更为良好，更为容易的。但是那种过“左”的倾向，必然会使日常用品减少，商品价格昂贵，给农民的生活以不好的影响，以至引起他们的不满。

巩固工农的联合，与我们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是苏区内阶级斗争的最高原则。那种过“左”的办法，看上去好似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实际上却正是在破坏这一工农的联合，放弃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为了一部分工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即是拿狭隘的行会的工团主义的利益代替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只有经过苏维埃政权，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使这一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使工人阶级得到最后

的解放。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同志说：

> “如果产业工人将专注意于狭隘的行会利益、狭隘的职业利益，以及从心所欲地只限于用心改善自己的地位，有时是安闲的小人的地位，那么这些工人便不能执行自己全世界历史的使命，即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中和战争中解放出来的使命。”

可见这种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同反对经济斗争的右的倾向内容上是没有区别的。这两种倾向的发展，均会削弱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中的领导作用。“左”的倾向的存在，实际上对于右倾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因为正是“左”的走不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造成了许多口舌使阶级斗争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开展起来。

至于用武力与行政的手段，来对付资本家的反革命，我们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但是单想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来达到经济上的一切要求，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是极端有害的。

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必须依靠于他们自己最积极的行动。每个群众日常的要求，每个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上的每一条文，必须经过群众的郑重讨论，由群众自动选举的斗争委员会来领导斗争，来向资本家提出工人的要求。每一个同资本家的谈判结果，必须报告群众，并且在群众前面暴露资本家压迫与剥削工人的实质，指出工人与资本家间不能调和的阶级矛盾，揭破资本家对于工人群众的任何欺骗，使工人群众更能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做坚决的斗争。每一次斗争之后，必须指出斗争胜利或失败的原因，教育工人群众。也只有这样的斗争方法，才能吸收最大多数的工人到斗争中来，在斗争中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团结力与觉悟程度。

所以职工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的决议

上说：

> “工会要利用发展着的工人为自己直接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建设，要造成直接执行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广大的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职工运动指南十八页）

职工国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在积极发展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吸收他们参加并领导一切目前苏维埃的中心工作。必须了解在苏区内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是极不相同的。中间有最积极的先锋队，也有最落后的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思想与习惯的工人分子。党在苏区内发展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在使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参加斗争，锻炼他们，清洗他们的污垢，教育他们，使他们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因此职工国际在同一的决议案中说：

> “团结并组织千百万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教育群众去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使革命往前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任务。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必须成为‘团结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同情的学校，保护自己利益的学校，学做主人的学校，共产主义的学校’。”

改良工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发展劳资斗争的中心任务之一，但如若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能同上述的基本任务联系起来，那工人生活的改善往往会使工人小资产阶级化与腐化，“在许多先进国家里的‘工人贵族’就是这样”（列宁）。

用武力与行政的手段，进行经济斗争，像我们现在常常所使用的，并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这种斗争的方法，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团结力与觉悟程度。相反的，这种方法会造成工人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消极的依赖，不能使他们清楚了

解资产阶级的本质与劳资间的分明的敌对地位，使他们从他们切身的经验中感觉到推翻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必要。

当然，要发展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并不是像现在有些同志所想的，不顾一切的总同盟罢工的手段去对付资本家。姑无论这种总同盟罢工，大都是工会命令的结果，而不完全是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发扬。但是就是那样，我们也必须不要一刻忘记，斗争是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总同盟罢工，对于苏维埃政权整个的利益是有害的。

总同盟罢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是团结工人阶级力量来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武装暴动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步骤。这种罢工一方面会停止社会的经济命脉，捣乱社会的秩序，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利条件，同时是教育广大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最好的学校。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我们发展工人斗争的目的，正是在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来巩固苏维埃政权。那么这种斗争手段的采取显然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害的，就是罢工（不是总同盟罢工）策略，我们也不能随便使用。在罢工之前，必须采取交涉，谈判，社会舆论，同情援助等方法，来达到工人必需的要求，来团结他们与教育他们。

罢工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是锻炼，团结与教育工人阶级的最好的斗争形式。如果工人阶级不利用这个武器，那工人阶级、它的同盟者以及跟随着它走的劳苦群众在走向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上，不能前进一步。罗佐夫斯基同志在职工国际第八次全会上说：“罢工可以用示威等等方法，来加强……但是不能用谈判代替斗争，不能用任何对于资本家的压力来代替最尖锐的斗争方法——罢工”，因为只有罢工，才

能使工人们走向革命阶级斗争中最主要的武器——伟大的政治的群众罢工，只有罢工才能引导工人到“毁坏国家机关，推翻目前阶级的国家政权。”（列宁）

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罢工虽是还是工人阶级斗争方式之一，但是它已经失去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那种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罢工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达到工人生活的改善，而不是为了推翻革命的政权。除了罢工斗争以外，我们还有了比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之下更多的方法来锻炼、团结与教育工人阶级。我们可以用各种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罢工。因为这里工人阶级是统治者，而资产阶级是被统治者。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当工人阶级起来罢工，国民党起来进行它的调解与仲裁时，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对于工人阶级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它只能站在资本家方面反对工人。但是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我们是赞成苏维埃政府的调解与仲裁的。

我们反对有些同志想以调解与仲裁的方法代替苏维埃政权下工人与资本家中间的一切冲突，甚至反对在苏维埃政权下发展阶级斗争。但是另一种极端即一切劳资间的冲突完全由工人自己用各种斗争方法来解决，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任何调解与仲裁。这些同志显然忘记了：这一苏维埃政权是工农自己的政权，而不是国民党的政权。

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的延长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妨害到苏区生产力的发展时，苏维埃政府应该很迅速地起来进行调解与仲裁，最无病的解决这一冲突。在调解与仲裁时，苏维埃政权决不是简单的用武力强迫资本家执行工人的要求。在工人所要求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冲突时，苏维埃政府应该说服工人改变他们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应该对资本家实行

让步。

同资本家交涉、谈判甚至让步等的办法，是为我们苏区内一些“左”的口头革命家所鄙弃的。交涉、谈判，甚至让步，这岂不是等于“劳资妥协”？而他们是劳资妥协的坚决反对者！资本家如若不答应工人的要求时，他们可以用武力与强迫执行的办法，还要什么交涉、谈判以至让步等的方法呢？

这些口头上的革命家不知道“劳资的妥协”也是有条件的。有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劳资妥协”，也有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劳资妥协”，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反对工人的经济斗争，这无疑的，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劳资妥协。有时我们为了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为了苏区商品的流通以至为了免除一部分工人的失业同资本家进行交涉、谈判以至“妥协”，在这一交涉、谈判以至“妥协”的过程中，不要一刻忘记告诉工人阶级我们眼前的“妥协”是不得已的，是为了我们在“妥协”后，更能巩固苏维埃政权，更有力量的来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我们的“妥协”不是为了投降退却，而正是为了斗争，为了进攻。

比如为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我们给某些商人以特别权利与利益，使他们大批输出苏区的生产品，输入白区的日用品。这样，资本家当然会从我们这里赚到几千几万大洋，但是我们却因此使我们苏区内部几万以至几十万的生产品能够出口，使苏区民众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日常用品，使他们的生活更能改善起来。这对于苏维埃政权与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有利的，这使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能够更有阵地的，更有力量的向资本家斗争。

“自然，也有异常困难的情形，使人们要费最大的力量，才能决定这个或那个‘妥协’的真实内容——好像在无数杀人

案件中，决定这是正当的，甚或必要的（如必要的防御），抑是不可饶赦的粗心或细心摆布的阴谋”，能够正确地分别这个或那个“妥协”，我们不但“应在早期的坚苦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工作中，培养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与经验之外——政治警觉。”（列宁）

我们一刻也不迟疑的最坚决的反对一切投降资产阶级，出卖工人阶级的“劳资妥协”。这些叛徒想以劳资的合作，代替劳资间不能调和的阶级斗争。但是想用强迫，命令禁闭，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内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上，我们不能不有资本家，我们只能经过苏维埃政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劳动法的执行与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不能武力消灭资本主义与它的剥削。这种企图，是托洛斯基主义的具体表现，对于中国革命是极端有害的。

大概还是不久以前的事罢。我们对于经过赣江商人的船只，除了用枪去射击，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外，从没有想到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对付这些只知图利的商人。这种政策的结果，在这一方面完全把我们自己封锁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来来往往的商人，为苏维埃政权谋利益。我们从这些商人身上，一方面可以征收通过税，同时，尤其重要的，我们经过他们还可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

我们苏区有很丰富的原料，尤其像钨砂那种稀有的矿产。苏维埃政府也曾经颁布了工商业投资的暂行条例。然而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还没有一个资本家在苏区开始了投资。这固然由于资本家反对苏维埃政权，不愿投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在经济斗争中过“左”的错误，由于我们不知道利用

资本家为苏维埃政权工作，不了解“我们应该强迫他们在新的国家组织内工作”，“应该叫他们作新的国家的工作”（列宁），由于我们自己过早的消灭资本家的错误尝试。

工人阶级决不至于那样蠢，知道利用一种方法去对付资本家，它应该利用一切方法来对付资本家。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工人阶级这种活动的范围是更广了，伸缩的余地也更大了。它可以利用资本家内部的每一矛盾，去分裂他们中间的联合战线，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苏维埃政权同某些资本家可以订立协定，甚至给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利的。

我们决不放弃利用武力与一切强制的手段，去对付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但对于遵守苏维埃秩序的资本家，我们还须采取各种“和平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只要对于苏维埃政权，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妥协”的方法。只有“在年幼而无经验的革命者看来，甚至很有经验，很有岁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容许妥协’好像是异常危险，难懂，而且错误的勾当。”（列宁《左派幼稚病》，六十四页）但是对于我们这是最容易了解的。列宁说：

> “每个无产阶级者都亲身经过罢工，同它恨入骨髓的压迫者剥削者‘妥协’过。工人到了势穷时，有时虽然他们要求的条件全未达到，或仅达到一部分也只得上工。”（同上）
>
> “幼稚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的承认可有妥协，便使机会主义（对于机会主义我们进行并且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与革命马克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间，丝毫没有界限，这些人，假使是不晓得自然界以及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并且在相当限度内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予以不断

的教育，训练，启发，以及政治的和生活的经验以外，再无他法可以纠正。”（同书六十六页）

我们苏区内的同志，应该学习各种斗争的方法，来开展劳资间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比较我们还有更大力量的阶级敌人。

列宁关于这一点说得好：

“一个军队，倘不准备好应用敌人所有的或可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一切斗争方法，那么谁也要承认这个军队的态度不仅是愚蠢，而且简直是罪恶，这在政治上比在军事上更甚。在政治上，在将来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何种斗争手段可用，何种斗争有效，更少能够预料得出，倘我们不能应用一切斗争的工具，那么在别个阶级斗争的阵地上一旦发生超出我们意外的变更，而提出我们所特别见绌的活动形式时，我们就会受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失败），我们倘能应用一切斗争手段，而又能代表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那么纵然环境不容我们采取最厉害的，可以最快地致敌人死命的那种武器时，我们也必然能够胜利”。（列宁《左派幼稚病》中译本一百页）

在乡村中，阶级斗争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形式，在这里有农业工人、手艺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以及地主残余。

地主阶级在苏维埃区域内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富农虽被削弱但依然存在。而且在土地革命胜利之后，小商品生产在苏维埃经济内所占的优势，从广大农民群众中，会产生新的富农，这是毫不足怪的。

“中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上，当然，还并不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对于农业，在消灭地主私有财产之后，消灭军阀制度高利贷剥削之后，资本主义一定要表现向前发展的趋势”。（《国际路线》，二十页）

可见阶级斗争在苏维埃乡村中间同样是存在着而且发展着。

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只有这一斗争的开展，我们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起来，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与消灭地主残余的明确的阶级路线。关于这一路线，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是不很了解的。

我们过去在乡村中所开展的阶级斗争（大部是在新发展苏区内）是大多数“劳苦农民”消灭地主与反对富农的斗争。这在土地革命一开始时常常是必经的阶段，因为反对地主阶级与小地主的富农的斗争，是全体“劳苦农民”的要求。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一般的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富农的好田，把坏田给了他们，实现了土地革命。

但是土地革命的斗争，不但惊醒了千千万万在黑暗中地底下生活着的劳动农民，使他们参加了政治斗争。同时这一斗争也推动了不少地主富农分子积极起来“参加革命”，把他们地主富农的真相隐秘起来，装成革命家式“贫苦工农”的样子，来“领导革命”，这样来钻进苏维埃政府内，甚至钻进党内。所以土地是分配了，但是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同时也分得了土地，而且分得了好田，不少地主与富农的分子，还保持着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威与地位。

列宁说：

> “在革命已经爆发广大的时候，谁都加入革命，有的是狂热，有的是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利益。这时候做个革命者并不为难。无产阶级要在夺取政权后，提心吊胆聚精会神地从这般所谓革命家中‘解放’出来。”（《左派幼稚病》一百页）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须深入，但是在这里阶级斗争已经采取了比较复杂的形式。这里像过去那样的地主富农是没有了。大多数的地主真的没有了，大多数的富农真的分得了坏田，但是还有不少这些分子变了他们的样子，钻在革命的队伍中间。反对这种分子，是比较更为困难的，像过去那样一般的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式是不够的了。正因为这些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现在是钻在革命的队伍内，装作了“贫苦工农”的样子，在不少农民中保持着他们的影响，表面上看去也像普通农民似的，所以采取过去那种直接进攻的办法，现在会往往弄错对象，以至影响到中农贫农的身上。同时不能忘记，还有不少这些分子是把持着一些政府的与党的机关，利用这些机关来执行他们本阶级的路线。

在这里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需要采取更耐心的审慎的办法。首先必须消灭一般的“贫苦工农”的民粹派的观点，明确的分别清楚在农村中间的各个阶层，知道谁是我们在农村中的弟兄，谁是我们的依靠，谁是我们的同盟者与谁是我们的敌人。

雇农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在乡村中的代表，而且他在全国工人中占绝大多数。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须首先组织这些工人群众，发动他们的斗争，使他们能够在反帝的土地革命中起他们的领导作用。这些工人的群众组织，就是他们的工会。这种工会，应该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

我们在乡村中的依靠就是贫农。我们要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必须把贫农团组织起来，雇农工会的小组应该全体加入贫农团，起他们的领导作用，我们的党就应该依靠贫农团，来执行我们的一切决定。

雇农工会、贫农团，我们过去是组织了一些，但大都还是

形式的，没有起他们应有的作用。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查田运动中，才在有些县区，有些乡内，真正经过了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积极分子，查出了很多分得了土地的地主与分得了好田的富农。从这一斗争的开展中，我们改造了许多苏维埃政府，甚至改造了我们一些地方的党部，把一些隐藏在苏维埃政府内与党内的地主富农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了出去，提拔了许多新干部到政府内与党内。

只有加强农村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依靠在广大贫农的身上，我们才能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一般的空喊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不从发动雇农与贫农的积极性着手，那我们就没有法子前进一步。

要发动雇农与贫农的积极性，只有正确的执行土地法，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落在他们的手里。正确的分配土地，在苏维埃区域内，依然是发动农民中剧烈的阶级斗争的要求。在许多地方，似乎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了，但是仔细考察起来，则甚至地主也分得了土地，富农依然保存着他们的好田，正是这些分子或这些分子应声虫，常常发出这种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了的自满自足的言论，把乡村中一些消沉的和平的空气，当做了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完全满足。而实际上，这种和平，正是这一乡或那一乡中，阶级斗争没有发展的记号。我们决不能相信，群众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群众会不那样积极的起来为苏维埃的每一号召而斗争的，消沉的和平空气常常不是农民群众要求满足的表示，而正是他们的要求不满足的表示。

在土地问题已经正确分配好的地方，要使分得的土地能进一步的改善雇农贫农的生活，必须更进一步的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如像种子、肥料、水利、耕牛、农产品的输出与日常用品的输入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和平的办法所能

够达到的。只有在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中间，克服一切反对、抵抗、障碍与困难，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隐藏在苏维埃机关内，甚至党内一切阶级异己分子或他们的代表者（这种人可以是个别的贫农或雇农），在我们所提出的每一个策略或每一个决定之前，他们都会用种种方法来积极的反对或消极的抵抗，在群众中间造成对于新策略与新决定的怀疑与不信任的空气，使新的策略与决定无法执行。

阶级斗争不但在苏维埃之外，而且也在苏维埃之内。所以发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同清洗苏维埃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同改造苏维埃，同苏维埃的检举运动不能丝毫分离的。反对苏维埃机关中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也不是一个和平的运动，而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在每一斗争中，我们不要一刻忘记我们的代表是雇农，我们的依靠是贫农，不要一刻忘记在每一个斗争中提高他们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使他们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使他们为革命的转变而斗争。没有这一有觉悟的有团结力的雇农以及贫农的帮助，苏维埃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一刻忘记联合中农，这需要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最审慎的细心的来感觉他们每一个的情绪与他们的要求。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把农民的一些要求，笑为“农民的落后意识”，以讥笑的态度来代替了对于农民意识的倾听。甚至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这样来掩盖他们反农民的倾向。

中农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占最大数量。在许多区域内虽是贫农出身的农民占多数，但是在从土地革命之后，这些贫农将逐渐的变为中农。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有极重大的意义，如若

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苏维埃革命是没法胜利的。说中农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这完全是一些机会主义者的胡说。正是因为这些农民，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所以他们参加苏维埃，他们购买公债票，他们当红军，他们情愿以他们的生命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

巩固中农的联合首先必须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党的中央，曾经有过专门的决议，指出：

> “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向广大的雇农贫农群众解释，他们要保持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要扩大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坚决战胜反革命与富农，他们必须同中农结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须不但不损害到中农的利益，而且要给中农以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就是中农所有的土地比雇农贫农所分得的多些时，我们也不能以平均分配一切的口号去分配他们的土地，妨碍中农的利益，强迫平均分配他们的土地，必然会使他们动摇到敌人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利益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

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翁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一切他的设施中不要一刻忘记了同中农的联合与对于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才能使阶级斗争深入，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起来。而地主富农的分子却正在利用一切方法来破坏这一联合，争取他们自己对于中农的影响。

地主与富农的分子往往利用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弱点与错误来动摇中农，甚至常常把自己在苏维埃政府中所造成的罪恶作为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在这里他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

利用大多数农民私有财产的观念。“蠢货！你为什么要努力耕田？你富了，还不是苏维埃政府把你当土豪打。”这差不多是这些分子常讲的话。在这里苏维埃政府不能简单的把这些分子捉起来枪毙就算完事，或者简单的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欺骗宣传”。这里，苏维埃政府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证明给中农看，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农，甚至富裕的中农，并不拿来当土豪打的。苏维埃政府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生产上的困难问题，保证他们的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使他们觉得这些土地不是苏维埃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使他们更加爱护他们的土地，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应该在一切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内，以及经济组织内吸收中农的参加。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说服与诱导的方法。一切我们党的，以及工会的，贫农团的重要决定，必须在全村全屋的群众大会上讨论、解释，必须经过苏维埃的代表会议通过，使中农群众参加并护拥我们的每一决定，使他们在每一实际例子中了解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正确，在革命转变时同无产阶级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

> “对于中农，我们的政策是永远同他们联合。他们不是苏维埃的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他们还要摇摆，并且只有当他们在实际例子上看到这一转变的不可免，他们才会答应走向社会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演说）

强迫命令的方法对于巩固中农的联合是最大的敌人。在这里必须最坚决的广泛的采取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吸收他们参加一切苏维埃的建设与斗争。

当然我们不能一刻忘记中农的两重性。一方面中农自己是劳动者，受地主豪绅以及军阀官僚的剥削，因此他同工人阶级

合作反抗地主与军阀官僚。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是商品的小生产者，所以他常常做些投机事业，企图自己变为剥削者，变为富农，因此他同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发生分歧。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里不是用武力的压迫来对付中农的这种企图，或是强迫他们立刻接受我们的共产主义，而是要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加入消费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吸收他们同资本主义的投机做斗争，把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联结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从苏维埃农村中间新的富农的产生将来是不可免的，同这些新的富农的斗争，我们一般的不能再以没收他们的好田，给他们以坏田为同他们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政策对于新富农的继续应用，必然会动摇中农，使中农失去对于土地生产力提高的兴趣，影响苏维埃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的任务，一方面经过我们的累进税限制他们的发展，另方面组织雇农群众，发动他们反富农的阶级斗争，提高他们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最广大的贫农与中农在他们的周围，为将来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才能消灭富农的产生与发展。

就是在目前我们对于富农的策略，同对于地主残余的策略也是不相同的。对于地主残余，我们的策略是在消灭他们。对于富农，我们的策略，只是在削弱他们的力量。所以对于地主的土地财产，我们是彻底的没收，对于富农，则只没收他们的好田，分给他们坏田。这种明确的分别敌人的对象，对于我们是极端必要的，这告诉我们在中国革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彻底肃清封建残余，而不是在消灭资本主义的成分。

总之，明确的执行我们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即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残余，反对富农，是顺利的开展苏

维埃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这一斗争，近来正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查田运动中剧烈的开展起来。

在前方，在后方，在城市中，在农村中，阶级斗争是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开展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能够利用这一切斗争的形式，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以旧的补充新的，以新的代替旧的，而在一切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起来，以准备将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刊印。

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朱　德

一、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 本文是朱德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写的，共有八节，这里是其中的六节。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钳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

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残敌乘夜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即破，遂获得东陂战役之继续胜利。

二、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

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三、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的成绩。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

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

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

四、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萧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

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

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

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

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

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朱德选集》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在日益开展着的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前面，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中央苏区的党在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的当中，在阶级成分的问题上，最近表现出了“左”右倾的错误。

在征收党员的方面：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他的先锋队，把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苏区，党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把最革命的半无产阶级（贫农）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里就必须纠正红五月征收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欢迎穷苦工农入党”、“欢迎工人贫农中农入党”这两个口号，明显的都忘记了“先锋队”的原则。前一口号更是重复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错误，后一个口号是犯了把中农与工人和贫农并列的错误。另一个“左”倾的口号，“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这个口号，无异把苏区党的门完全关起来。

这里必须指出苏区党内，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就是对各种与工人阶级有关系的劳动者的先进代表关起

门来，例如拒绝同情于工人阶级的职员及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这无疑是错误的。把那些完全准备着在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来，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尤其现在苏区的党，领导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党，由于许多条件还不能及时的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入党，更是必须的。当然这里不是指的那些半路人。

在巩固党的队伍方面：

在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每一阶段中，特别是初期的时候，地主阶级遭受了残酷的剥夺与压迫，富农资产阶级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便采取新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在阶级斗争不十分深入的地方，便利用机会冒名中农贫农假意参加革命，分得土地，并且混入苏维埃、群众团体以及共产党内来起政治上组织上的破坏作用。这在我们党内便是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的暗探，他们在阶级斗争更深入和革命战争更紧张的时候，必然站在地主富农一方面来或明或暗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半年以来在革命战争的动员中，在部分地方真正的查田运动中，曾经揭破了不少这种分子的面罩，把他们从共产党和苏维埃洗刷出去了。阶级的异己分子和暗探隐藏在党内，这特别对于领导专政和革命战争的政党，是绝对严重的危险。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依然是不够的。中央局唤起各级党部的严重注意，必须有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来对付这种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这首先须要从继续深入的阶级斗争中去检举他们，在真正深入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掩蔽在自己的面具之下的。例如瑞金、武阳、云集、黄柏几个区的查田运动中，我们获得了部分的成绩。最近发现有个别的乡以至个别的区的政权中以至于党的机关的主要负责者，落在这种分子的手里。他们利用领导的地位来压迫群

众，使群众不敢反对他们。因此在反对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的斗争中，要特别深入到支部中、农村工会中、贫农团员中，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只有依靠着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才能最后肃清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

中央局必须严重的指出，在这一方面的斗争，有不少的党部把党内从非无产阶级、非半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无差别的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如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不少的在革命斗争中坚决，在工作上积极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干部和党员，因为社会成分是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其中少数是知识分子。这种错误办法，不仅使一部分坚决的积极的但是社会成分不好的党员，感觉没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给了掩藏在党内的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断宣传的武器。这一错误，第一，由于把阶级异己分子与从敌人阶级队伍里面出身的社会成分看作完全一致的东西，以为从敌人阶级里面出身的成分就没有完全抛弃自己阶级利益而坚决为着共产主义的目的而斗争的。第二，是由于错误为党内的检举，应该把阶级成分当作最主要的标准，不了解真正的阶级斗争是最主要的标准。例如在查田运动中，谁坚决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拥护党的政策，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对于这种党员，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社会出身不好把他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看待。相反的，如果站在地主富农利益方面，即是工人出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洗刷出党。如果只检查成分，不从政治上考查，那些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冒贫农中农的成分而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更可以隐藏下去。因为我们没有用深入阶级斗争去逼迫他们，所以这种办法，更是有利于他们的。中央局指出：一月十日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中，在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上，没有

将问题提清楚，对于部分党部工作的错误也给了以影响。

把上面的总结起来：

（一）在努力发展党员的任务上，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和最革命的贫农吸收入党，因为这是党的基础。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同时应该吸收真正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纠正对于他们的关门主义。

（二）从深入群众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检举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坚决的洗刷他们出党。反对一切对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同时必须纠正不从政治上检查，而简单检查成分，乱洗刷党员，乱处罚党员，“吃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

中 央 局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火力与突击*

（一九三三年五月）

周　恩　来

火器长足进步到了现在，谁也不能否认火力的威权。可是另有一种论调，是过分看重了火力，以为有了优越的火力，无须白刃扑搏，就可以结战斗之局。譬如说：法国、英国曾发生“火力万岁”的论调，及遇到了顽强的德国步兵，虽曾发挥了惊人的火力，变动了地形，然而德国步兵竟有散伏于弹痕孔作不挠的抵抗。此时日本“肉弹”（指白刃扑搏）之说，又重新传诵起来。因之此后各国步兵的组织，就是排的组织，也是由机关枪班的火力系及步枪班的突击系混合而构成。我们从此也了解火力与突击在现代战斗中，成为不可偏废的事。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在颁布步兵战斗条令的命令中说：“当防御时，步兵应积极动作，企图以火力损害敌人，而以反冲锋反突击消灭之于防御地域以内或防御地域以前”。

步兵战斗条令第四十四条说：“当进攻动作时，步兵须先用自己火力损害敌人，并沮丧其士气，然后用猛烈的忽然的突击摧破敌人。”

就以上二段看来，我们可以见到火力与突破交互为用的效

---

* 本文原载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应了。

我们为了要在战斗中移动火器接近敌人，使其更有效地摧破敌人。又为了要引导步枪战士接近敌人，用白刃消灭敌人，这都需要运动的。所以，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元素，然而火力又是压伏敌人火力的抵抗，并束缚其意志，以掩护步兵运动，使其少遭损害，接近敌人，突破敌人的有效措施。于是火力又成为与运动不可分离的东西。故日本步兵操典对于运动与射击之联系，苏联步兵战斗条令对于火力与运动配合，都反复申述，其意在使军人了解其中的重要。

当进攻战斗时，敌人受到射击之际，有的死伤，有的潜伏地下，这自然是我们接近敌人的好时机；同样我们既接近敌人，又是射击敌人的好时机。不过我们接近了敌人，敌人亦好射击我们。这时，更要求我们奋勉前进，以求与敌肉搏，万不可久停于敌火之下甘为刀俎下的鱼肉。苏联红军中通常说："我们的机关枪和炮兵开火的声音，要当作上级指挥员叫我们前进的命令。"这是非常确切的话。

就火力配系说来，当进攻时，诸机关枪援助步兵前进的射击法是：

一、往运动在前之部队的间隙内射击敌人；

二、从侧面射击敌人；

三、从高地面超越本军之头部的射击。

如下能用上试三法射击敌人时，则出动机关枪于前方部队内射击。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各机关枪之前进均应交替转移阵地，以便不断射杀敌人，但无目标放枪或目标已消灭多放一枪，都是不许可的事。

在敌火下用枪火力援助步兵前进，有的是用各班交互行之，有的是用一班本身交互或错综行之。其步兵通常是用快

跑，自此一地区向彼一地区逐步跃进，其距离大约以五十米内为宜，然因地形及敌火亦略有不同的，但勿过于缩短致减弱前进的气势。

总之，无论使用何种火器，交叉射、侧射、斜射，都较直射为有利，但运用时须适合情况，且不可障碍自己步兵的前进。

在冲锋前用火力准备冲锋，对冲锋点应发射短促而剧烈的火力（此时特等射手也应显重大的作用），及我冲锋步兵将接近冲锋点时，则其火力应移向敌人纵深发射，以摧毁其第二梯队之反冲锋或移向敌人两侧，以消灭其侧防火力。此时手榴弹应于冲锋的以前对敌抛掷，并乘其爆炸之瞬间刺杀该敌，切勿过早抛掷，失其应有之效力。

第二梯队及其机关枪，在第一梯队冲锋之前，即调近冲锋点以扩张冲锋效果。特别要以机关枪援助其先头部队跟踪追击，并防止两侧之敌火及其纵深之反冲锋，如第二梯队在此时前出追击，则第三梯队应速整顿集结，准备跟进或巩固已占领的阵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断送了满洲、热河、上海之后，现在又与日本强盗订立“华北停战协定”，把平津、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

所谓“华北停战协定”的内容是：（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即所谓中立区域）；（二）华方承认“满洲国”；（三）制止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一切活动及反满洲国力量的发展，解除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证停止一切反日运动。“华北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卖国贼的庐山会议最后决定，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与中国卖国的能手军阀刽子手们共同签字，在他们的欢宴中庆祝他们的胜利。在北京城外，在满洲、热河，在察哈尔、在平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继续着用它们的大炮飞机轰炸与屠杀抗日的义勇军、革命的士兵与千千万万和平的居民，来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奴隶们的“和平与秩序”!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红色中华》。

全中国的民众们！平津华北已为反动的国民党最后的出卖了！这就是国民党的“长期抵抗”的内容，这就是国民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实质，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的“已定方针”。万恶的国民党，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这样无耻的这样大胆的把数千万方里及数千万人口的整个满洲、热河与平津奉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正在想把桂、黔、川、藏、新疆等广大的区域，卖给英国帝国主义。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们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以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首先是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向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武装部队提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是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一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新的投降与出卖，强迫东北抗日的士兵向后撤退，解除东北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全中国民众一切反日反帝的运动，组织新的力量向我们的苏维埃区域进攻，并且增派大批的飞机，来轰炸苏维埃区域内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却无耻的造谣，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障碍抗日战

争”，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现在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学生以及每一个革命者，都会亲眼看到，谁是障碍抗日战争，谁是卖国者，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打倒国民党，中国只有灭亡，中国民众将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的士兵、全中国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家，以及一切革命者，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不顾帝国主义的巡捕与国民党的军警的一切压迫与屠杀，违反国民党的停战退却的命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在完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四次围攻的血战中，建立广大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创造一百万铁的工农红军，准备会师长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它的工农红军，在长期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战争中，已经证明给全中国的民众看，只有它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它能够领导全中国民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出卖中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国民党的卖国军阀。全中国的民众们！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民族革命战争，为收复东北失地，为保卫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区域，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如瑞金（除武阳区）、会昌、寻邬、安远、信丰、雩都（除新陂区）、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五个全县，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太、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残余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文化、经济建设，都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太、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安福区，瑞金的武阳区，永定的南溪区等等）之后。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群众中，发展最高度的阶级斗争，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进攻，而把他们完全消灭，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关于查田运动的具体进行事项，人

民委员会特决定如下：

（一）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二）责成各级土地部、工农检查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用他们的全力去指导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地方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应用全力指导各下级机关，切实完成这些任务。

（三）责成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财政部，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半封建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责成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军事部，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责成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国民经济部，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剂。责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教育部，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予一切查田干部与群众；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

（四）省、县两级政府，应该从查田区域及一切先进的、较先进的区域征调干部，开办短期的查田运动训练班。县苏应每月召集区苏负责人开会，区苏应每十天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查田的经过。

（五）应首先召集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主要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发动八县的查田运动。

（六）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

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

（七）查田运动中，要充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起来，向着封建残余作斗争。首先要经过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分，通过这些成分，没收这些成分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没收来的财物，除现款外，应全部发给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注意发给贫苦的红军家属，并要多发给于财物所提出的村庄的群众。

（八）贫农团是查田运动中极重要的群众团体。区、乡苏维埃要极力指导贫农团，洗刷其中的坏分子，吸引多数积极分子加入。贫农团中的工人小组，应是贫农团的积极领导者。

（九）查田运动中，要集中火力注意于一切落后的，尤其是最落后的区乡及村子。

要注意在落后的区乡，尤其在大村子中，开展查田运动。必须发动本村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争，要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氏族地方斗争的一切错误行动。

（一〇）要在查田运动中，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谣与破坏。

（一一）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

（一二）各级苏维埃中，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受到严厉的或最严厉的惩罚。只有坚决执行上述的决定，才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激发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完成查田

运动的任务。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

听了毛泽东与胡海同志的报告之后，中央局认为虽然在瑞金及其他县份中个别区域里，查田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但是整个的说来，查田运动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为着总结现有的经验及在整个苏区中开展彻底的查田运动，必须指出：

（一）伟大的土地革命的浪潮，在他强有力地扫荡了农村中间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推翻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们千百年来借以奴役劳动农民的土地占有，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了雇农、贫农、中农。但是由于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在中国农村中的根深蒂固，在革命最初阶段上，雇农贫农的组织性与觉悟程度之不足，以及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查田运动指南》。

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这种现象除了个别的先进县区之外，在大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二）在这种情形之下，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的有力的方法。查田运动无疑的是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粉碎扑灭地主豪绅的抵抗的顽强的斗争。在查田运动中，一方面大大的提高了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积极性与组织力量，另外一方面，地主豪绅的残余与富农亦进行种种的反革命的企图，来破坏抵抗查田运动的彻底的进行。这里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他们混入党和苏维埃机关和贫农团的暗探，滥用党和苏维埃的威权，压制群众斗争的发展，欺骗收买威胁一部分群众，散布各种谣言，动摇中农群众，组织秘密会议，诬告陷害积极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直至暗杀积极的雇农贫农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因此党的各组织的任务，是要依靠在雇农贫农，巩固地与中农群众联合着，开展最热烈的斗争，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依据在雇农贫农及中农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的基础上，适时的、无情的揭露粉碎与镇压一切地主残余与富农的抵抗，以深入阶级斗争及彻底的进行土地革命到底。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实际上便是对于地主残余与富农抵抗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投降与屈服。

（三）正因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明确的阶级路线，是保证这个运动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说

我们应得最清晰的分别农村各个社会阶层与采取对于他们的正确与适当的策略。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中农群众是目前农村中最大的基本的队伍，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富农是与封建剥削密切的联系着，并且大半是半封建的阶层，是敌视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力量。地主是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凶恶的敌人。这里党的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依靠在雇农及贫农（农村中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削弱富农经济上的势力与打击他们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根据现在所有的经验，在执行这个总的策略路线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加强与发扬雇农及农村中的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经过工会来发展与组织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第二，必须特别的注意到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和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使在以村或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了解与拥护；一切中农群众的呼声，须最注意的倾听，并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的企图。第三，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能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当然我们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四）在查田运动中，必须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来

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必须经过党、团、工会的支部会、贫农团的会议、乡苏代表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等等，来进行这个动员。在这些会议中，须详细的解释查田运动的意义，解释分别阶级成分的标准与方法，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在得到大多数的群众的拥护之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及房屋农具等等，及收回富农的好田。没收与收回的田地，除留一部分为公益田及红军公田外，应分给以前没有分得田的乡村工人及贫农。没收的东西，主要的应散发给当地的群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应该采取全盘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须使已分好的土地，在农民群众手中稳固起来。

（五）查田运动的真实的开展，将毫无问题的联系着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改造和加强。必须在查田运动中依据在农民群众斗争的开展上，来清洗一切混入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暗探，提拔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力量，新的干部，以健全与加强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在必要时进行苏维埃的全部选举。但是这里必须得注意到群众的意志，和各个机关的具体的成分与工作状况。一切简单的命令主义，解散乡或区苏维埃和贫农团等等，将是不可允许的错误。在某些条件之下，这种举动恰恰是适合着富农地主的阴谋。在这个运动中，同样必须加强健全与扩大一切群众的组织（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等）。

（六）查田运动最密切联系到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全部改造，首先是肃反与检举运动。因此必须严格的纠正以为查田运动是土地部的事，党和苏维埃的其他各部处于不理或旁观的地位。中央局责成各党部与苏维埃中的党团，采取具体的办法，来执

行这个决议与中央政府的查田运动训令。

中　央　局

六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
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

（一）中央局听了项英同志对于扩大红军工作的报告，认为中央区扩大红军工作在党的积极进攻路线之下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一年来动员了几万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扩大与巩固了主力红军，创造了几个新的独立军、师、团，这在战争中有力的给了敌人四次“围剿”的主要战线上以基本的击破。

自今年二月中央局正确的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和“动员所有模范营模范赤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去”的任务（见中央局二月八日紧急决议）后，虽是在最初一个时期中某些党的组织犯了许多错误与缺点，没有完成正月至四月中所预定的计划，但在最近红五月中自兴国的党开始在坚决执行这一任务下，动员了赤卫模范师整师加入红军后，瑞金、胜利、博生、赣县、公略、石城等县继续动员了全县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成立几个新的师、团，使这一扩大红军新的转变与开展，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成绩。

（二）党在这一时期扩大红军的工作中，获得了最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必须运用到全党，成为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任务的有力利器。现将这些经验大概的总结如下：

1. 要达到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最热烈的自愿加入红军，只有坚决的深入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事实的证明，凡是斗争深入，土地解决较彻底的地方，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好。相反的，扩大红军成绩最坏的区域，也就是斗争不深入、土地解决最坏的地区。因此扩大红军与深入阶级斗争要紧密的联系起来。

2. 彻底实行优待红军条例，是动员和鼓动群众热烈加入红军的主要条件之一。许多地方明显表现由于这一工作没有切实的执行或执行得不充分，这一地方扩大红军差而开小差的也特别多。

3. 党必须有计划的领导政府、青年团、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首先是党内的充分动员，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领导和动员这些组织的力量，协同一致的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加入红军，方能使动员工作更普遍更深入。

4. 赤少队是扩大红军的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基础。党要以最大的力量，加强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健全赤少模范队的组织，建立赤少队的经常教育与训练，使他们能够在党的临时动员下，整个组织加入红军。红五月中在这一方面已获得扩大红军最大的成功。

5. 政治动员首先要“创造社会一切劳动阶级情绪的高涨，实是动员成功的基本的先决条件”（见红军中政治工作）。只有将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当地工农群众的利益和其具体的要求联系起来，才能造成社会情绪底高涨，达到动员的成功。一切脱离群众利益的政治鼓动都要减少动员的力量。

6. 扩大红军是党的经常主要工作之一，不仅在群众中特别是在赤少队中要建立这一经常教育工作，而且应当使每一次动员前后，都要取得密切的联系。在第一次动员时就要在政治

宣传上注意第二次动员的准备，不致造成寒热症的现象。

7. 采用突击方式以扩大红军，最有成绩的区域去帮助最落后的区域，以报名的先进分子去鼓励落后的群众，这是最有效的突击方式。革命竞赛要成为提高工作积极性，消灭落后的现象，严格纠正将竞赛变成简单的锦标主义。

8. 积极领导妇女代表会，动员一切妇女参加红军工作，鼓励男子当红军，这是扩大红军有力的突击队。

9. 开展归队运动，是发动新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的主要前提。因为开小差的分子，为了掩饰自己对于怠工，传播一些不利于红军的影响，阻碍了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积极性。

10. 归队运动的成功，是依靠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发动。只有动员了当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才能有力的督促开小差的归队。同时首先以积极方法来争取开小差归队。只有在一切积极方法失却效用的时候给予处罚，而且是要经过群众的决议和拥护。

11. 对于已动员之新战士，党与军事机关必须在集中和正式补充到前方时，领导当地的沿途的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欢送。要注意沿途的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和他们的生活，不要引起新战士的不安动摇他的决心。使他在沿途感受到热烈的欢迎与兴奋，这是巩固新战士的决心，消灭开小差的主要工作。

（三）中央局根据目前革命猛烈的迅速的开展形势和准备将要到来的与帝国主义最大规模的残酷的国内战争，为迅速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任务，对于今后扩大红军工作有以下之决定：

1. 为了保障扩大红军的工作能适应目前国内战争日益展开的需要，使工农红军在连续不断的胜利的战斗中猛烈的壮大起来，目前党对于扩大红军的中心工作，是有计划的来领导和

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的加入红军。当然对个别的扩大的方法在目前仍应努力。特别是新发展和斗争不深入的区域，以及赤少队的工作尚未健全的地方，仍应努力运用这一方式去扩大红军。

2. 为使保障红军有广大补充的来源，为使保障将来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千百万的武装新战士来加入战线，目前就必须加紧广大义务军役的宣传与实际工作的准备。使每个劳动群众了解，全体劳动群众武装起来为苏维埃政权斗争，是最光荣的事业，是自己的任务，这样来保障顺利的由志愿军制转到义务军制去。

3. 目前各级党部应用极大的力量去加强对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加强对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与政治的训练。特别是健全在模范营中党的工作，首先使模范营真正成为红军的预备队。动员全苏区的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全部劳动群众，都能积极的勇敢的加入到赤少队去，这样来建立将来实现义务军役和民军制度的基础。

4. 各级党部应加强对各级军事部的领导，使各级军事部的组织和工作都能紧张的建立起来，能直接指导各地方武装的组织和执行对地方武装的训练。

5. 为加强对赤卫军少先队的训练，以后凡当农村操作较缓的时候，进行对赤卫军少先队的定期训练，责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迅速规定一定的训练组织、训练期间和训练计划等。

6. 设立新战士训练处，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的实际步骤。以后凡属扩大红军到的新战士（整批的或个人的）均必须经过各处新战士训练处的短期训练再送往前线参加作战。

7. 以后前线作战军队与后方地域的群众，特别是与地方部队，应建立密切联系制度，把前方胜利消息、红色战士的生

活状态随时传达到地方群众中特别是赤少队中，同时把后方地域的情形反映到前线部队去。这样来更加提高前线红色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和更加有力的兴奋扩大劳动群众对红军的拥戴，和投身到红军的热情。

8. 最后，为了顺利的执行这一任务，必须最坚决的同对于党的这一任务任何机会主义动摇做斗争，打击一切边区不能扩大红军或新区域不能扩大红军，以至群众怕当红军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在这一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党依靠在全苏区千百群众的积极性与革命的热忱之上，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

——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们：

（一）目前的形势与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的重要

“华北停战协定”的签字在任何程度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向前侵略以及因此而丝毫有所缓和目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且恰恰相反。停战协定更给了日本强盗继续和加强侵略华北与整个中国的许多方便，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更大的刺激来瓜分中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停战协定签字后之数日，便轰传藏兵分三路进攻青海，回族军阀马仲英在英国指使之下称兵新疆，实行割裂的企图。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美国所借的五千万美金“棉麦”大借款，也于此时公布，都不是偶然！至于在“停战”后的华北，正进行和开展着非常严重的局面，那尤是有目共睹。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四期。

一、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按照卖国的协定，忙将中国军队撤退至“预定之线”，对不服撤退的部队便施以武装的压迫，把平津及河北数十县变成“非武装区”，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自由宰割；另一方面，则从撤退的部队中抽调入赣“剿共”以与帝国主义者分工合作，压迫中国革命。

二、在日本强盗的枪尖上在河北树起了第二个傀儡政府，以确立囊括整个华北与中国的更逼近的根据。协定签字以后，日本军队至今并未后撤，且撤亦不过至“长城之线”，南下西进，随时皆可自由行动。平津近郊的日兵多移增至平津（北平已由二百名日兵增至二千五百名），扼守着华北的咽喉。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卵翼之下的“伪军”如李际春等部则盘据河北，殆无撤退的任何准备，日本初则否认与这些部队的关系，继则提议“改编”为警察，以“警备”所谓“非武装区”，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现在日军似无大活动，但“伪军”之积极却较前增加，刘桂堂部已深入察省。日且宣称非夺取张家口无以保热河之安全，且连络内蒙王公，企图实现其满蒙政策，虎视着革命的外蒙共和国和进一步的进攻苏联。

四、日本之占据华北，必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冲突加深，而对于日美在太平洋之争霸将益加强。“日本为保障华北海道交通计，将在黄河设立管理权，日曾在釜山附近建筑津轻海军根据地，现又将旅顺军港恢复，将来日如占青岛作第二根据地，则黄海海面将永无他国舰影，日本种种计划与东亚大陆战争及对美战争之准备，均有关系”（《真理报》五月二十七日社论）。

五、日军之进展当与中国亲日军阀之活跃相并行。日本将

利用华北各派军阀之冲突——特别是在“停战”后防地之分配上，煽起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冯玉祥、方振武已开端于先。他如四川军阀战争正酣，西南的反蒋[1]的酝酿，都昭示着各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积极准备便于他们瓜分中国的军阀战争。

在这一个严重与险恶的形势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组织千百万的群众，号召他们及各种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国民党意志的战争，不许国民党这样干下去，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这些强盗们侵犯中国。而建立在反帝运动中真正的统一的战线，就是组织这一广大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因此，在目前建立和加强这一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1）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一背叛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但参加这一斗争和运动的群众，有的曾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训练，有的是刚从政治上觉醒过来，有的是久经革命风暴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区域，有的是不久才卷入革命斗争的漩涡，有的是彻底的革命工农分子，有的是动摇的不坚决的社会阶层。总之，社会的地位、政治的经验与由革命发展中之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都不能不影响着这一反帝和反国民党运动的形式和程度。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组织千百万的广大群众来进行这一反帝的革命斗争，才能团结一切反帝的力量。

党一方面要坚决的依靠民众自发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同时又要能够对于各种运动保持着统一领导的作用。正因为这种运动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很快的形成一支群众的政治军队，准备

大规模的革命暴动与战争。

（2）我们党不应该抹杀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还没有为大多数群众所了解与积极拥护。有的还在国民党各种民族武断宣传的影响之下依然幻想着它的“新的生命”，有的还是为黄色工会工贼们所欺骗着，有的是在国家主义派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别蒙蔽和麻醉之下。这只有在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才能把这些群众从这些反动的领导和它们的政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

我们的策略是：火力集中在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的党派。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站在群众和各种群众运动以外。党所提出的“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国民党是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等主张，以及苏维埃政府前后三次关于“反日战争同盟”的宣言，便是揭破，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大多数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完成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

（3）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用一切力量来削弱中国民族的抵抗力量与分裂反帝的统一战线，制造军阀战争，压迫一切群众的反帝斗争，用各种民族的武断宣传来控制一部分的群众以及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疯狂的进攻苏区，就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这一政策之具体表现。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并以这一群众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和它的清道夫——国民党阻挠中国民族解放与压迫整个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击破敌人的阴谋毒计，形成一个壮大的革命阵容。

（二）为什么没能建立起这一统一战线？

对反帝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之确切的认识是非常必要而迫切，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弱点。考究了目前我们党为什么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因，中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者：

一、没有充分坚苦的在企业中的工作以发动和领导工人的群众斗争及发展革命的工人的组织，不切实了解工厂作坊乃是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阵地。

现在，在工厂倒闭、各业减工、资本总进攻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上海、无锡、南通、济南、武汉、天津……几乎无日没有工人的斗争，这是一个很顺利的客观形势，但我们党和赤色工会都没有抓紧这一斗争的形势。赤色工会组织上的发展依然极不令人满意，在天津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反日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工人义勇军，在上海的情形也并不好些。无产阶级——这一全体劳苦群众的先锋队之政治上的动员和组织性的程度是值得特别警惕全党的。

中央认为：不保证反帝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等），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因此，尽量扩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首先和特别是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二、没有深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和组织及参加各种群众的运动，而在许多情形之下是站在外面干叫。国民党所扮演的“航空救国”的把戏，且多少能把它变成群众的运动，欺骗着一部分的群众，我们则始终没有加入进去夺取其领导。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首先就是赤色工会、救国御侮会，不是不坚决的实行群众的路线，度着狭隘的生活，便是不进行坚苦的群众工作，把每一件工作进行一个彻底，有始有终。

正因为如此，就更便宜了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在许多地方还能施行其欺骗和控制群众的伎俩。因此尽量应用群众的路线，进行坚苦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的政治影响的斗争，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

三、但能否夺取广大的劳苦群众，那就要看我们党怎样能把自己的口号变成广大群众的口号以至使革命前进，怎样使党的政策不仅为先锋队及多数工人阶级所采纳，且亦为大多数民众所采纳。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弱点正多：有些同志不是关着门空喊口号，便是把党的中心的政治口号到处背诵，一般的只管一再重复的嚷出来，不善于将它具体化、部分化和充实起来，使群众易于了解和接受。我们的工作方法、口号都是千篇一律，不顾工作对象与环境之不同。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口号只为少数先锋队所了解与拥护，许多党的组织和同志只会对先锋队说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对千百万的广大群众说话，用之以领导党者来同样的领导广大的群众。

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多数党政策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它很了解到第一种

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根本区别，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党的领导之科学，同时也是群众的领导之科学”（斯达林《列宁主义问题》）。

现在仍在各处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方面有些党的组织根本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以党内的工作方法来对付群众，这固然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另方面则是那些群众组织内面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完全抄袭党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以致有许多群众组织实际上变成了第二党的形式，这自然也不能组织成千成万的群众，遂形成目前群众组织较党尤为弱小的现象。

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不应混淆党的和群众的领导，同时“能够使群众以自己的经验，相信党的口号的正确，并领导这些群众走上革命的地位，这是党夺取广大劳苦群众的最主要的条件”（斯达林，见同书）。

四、没有坚决的利用半公开和公开活动的可能性。要组织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按照秘密路线来进行的。只要把成千成万的群众都拖入秘密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一个初步的真理的了解，对于处在地下党是非常重要。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固然不能争取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可能，但没有后者是没有法子能够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它是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统一战线之必要的条件。

在这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也可看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不是模糊我们在群众组织和各种群众运动中之独立的政治面目，降低或放弃我们原则上的立场以无论如何求得所谓公开活动的可能，便是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争取公开的活动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或者是保持“革命的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这都是不正确的。

中央认为在目前争取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是非常迫切，

这要求我们全党首先要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改变和丰富我们的工作方式，及如列宁所教训我们的“要学会取用一切的武器”和抓着日常事变中一切问题来发动群众，不要和站在圆圈里的母鸡一样，自己束缚自己。

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因。

（三）反帝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

目前中国的客观形势是很顺利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的统治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经济的破产、工农地位的恶化无以复加，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的困苦及士兵群众的牛马待遇，这样就引起了普遍于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继续不断的农民暴动、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士兵群众的革命化和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我们党应坚决的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改正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与弱点。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群众的斗争和运动统一起来而汇合为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巨流，来配合目前胜利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以促进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这一形势之下，我们党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工会、民众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的行动纲领：

第一，抨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指出希望国联与美国的援助是一个危险与失望的幻想。着重说明，只有团结并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才是民族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第二，着重的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号召民众参加反日的战争与游击战争。应当积极的

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第四，用军器库及入口的武器来武装民众。在同一基础上，没收大量物品以为抗日之用。

第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为获得我们的自由，必须取消一切对日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

第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第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和华北及中国的停战协定。

自然，这一行动的纲领只是一般的概括的，在实际工作中须要我们对准着各个不同的对象与具体条件来灵活的去运用。特别是不要忘掉工农士兵群众的切身要求，相反的是要在组织这些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的斗争基础之上来发动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拥护这些纲领的革命斗争。

（四）目前应该怎样行动?

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这一行动纲领，我们党、工会、团除全部实现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紧急通知中的指示外，应该立刻进行下列的工作：

一、在各处召集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将协定的全文发表，并在各工厂、学校、兵营等处组织“反对华北停战协定委员会”、“华北后援会”等。

二、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游行示威中，鼓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宣布对日绝交，调全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不准派一

个兵南下，特别在北方各部队中组织“反对南下进攻红军”的运动，在平汉路、津浦路组织铁路工人的怠工与罢工斗争反对运兵南下。

三、在各工厂、各学校、兵营组织和扩大抵货团，组织“反对还债给日本”的宣传队，并提出将这些赔款和利息全部来救济失业工友、灾民和城市贫民及抗日之用。

四、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武器，及组织群众夺取军器库的武器，特别是组织上海、天津等处的码头工人没收外来的武器的斗争。

五、英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且实际上占领了西藏，近且指使藏兵进攻青海及侵略新疆。我们应该将这些事实公布在广大群众的前面，发动反英的运动，组织“抵制英货”的斗争。

六、在农村里，加紧发动农民群众不缴一个铜板的税给卖国的南京政府的运动。特别是在河北的战区里，要加强农民中的作用，不纳租，不缴税，组织农民游击战争。

七、华北的抗日义勇军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前有日军的轰炸，后有国民党军阀及当地地主的反动武装的压迫，粮尽弹绝，过着极悲惨的生活。应该将这一事实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要求南京政府予以充分的接济并组织群众的募捐，组织群众的捐款保管委员会，由群众派代表送至义勇军部队。此外，应发动群众将“航空救国”的捐款买飞机送给义勇军及用作各种物质上的接济。

八、各地之救国会应立即召集代表会议，创立有力的反帝组织来进行这一切工作。

九、工会方面应以全国总工会及职业团体的名义提出保卫中国的领土是劳苦群众生死存亡的问题，且以共同斗争的唯一提议，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

及无组织的工人。反对减工，反对减低工资及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政府与资本家救济一切工人，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抵抗日本的侵略。用上述这些口号来提议具体的共同行动。

十、青年团应当不惜一切力量，把党这一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在青年的一切会议上，工会、学校、抵货团体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的提议，扯碎一切怠工的反动的领袖的假面具。

准备学生暑期休假时去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

发展军事训练，向市政府要求集会权利与军事训练的设备，要求选择军事教官的权利，发武器给战斗员，要求有宣传的自由权。唤起并团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士兵群众中有力的宣传党的这个纲领，加强北方的工作。

十一、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动员一切力量努力宣传苏维埃政府前后几次的宣言，在工人、士兵、学生群众中组织实际的回响，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这一宣言的周围。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揭破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武断宣传。

十二、各级党部应将中央这封信拿到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中讨论，加强说明统一战线之重要，并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用实际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来回答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与指示。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附：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

兹将国际来指示转你们。我们已根据此电发一苏维埃政府与全总宣言及关于反帝统一战线致各级党部信，国际原文如下：

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为高度开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加强这一斗争中我们的领导起见，我们提议：

第一，重申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民众的宣言，在先前所提的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作武力的共同战争；着重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急迫的进攻与国民党无条件投降事实：失掉热河、蒙古与华北的一部，愿意放弃平津；号召民众与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国民党意志的战争，不许国民党这样干下去。我们相信你们的提议会产生极力抵抗日本军队的结果。你们应以全国总工会与职业团体的名义，提出保护中国的领土，是劳苦群众生死存亡的问题，且以共同斗争的唯一提议，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及无组织的工人，反对减低工资，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日，要求政府与资本家救济一切工人，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极力真正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用上述口号来提议具体的共同行动，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工会、全国民众御侮自救会，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第一，抨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指出希望国联与美国的援助是一个危险与失望的幻想，着重的说明只有团结并统一工

人、农民及劳动群众，只有民众抵抗的力量是胜利的保证。

第二，着重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着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号召民众参加战争与游击战争，应当积极的援助群众行动的抵制日货的宣传，募集援助义勇军的物品等。

第四，用武器库与入口武器来武装农民群众，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尽量动员。

第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并争取得我们的自由必须取消一切对日债款与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

第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救国会必须极端的利用如宋庆龄等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性，在工厂、学校、兵营及其他组织中，创造有力的组织。

关于中东路问题，党必须用以下内容宣言启发群众的运动：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中国民众的忠诚的朋友。在他成立的最初，他就停止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东路变为商业性的企业，且与中国共同管理，而且曾屡次提议请中国政府收买铁路。这样，苏联不仅遵守了先前与中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中平等权利，而且就在一九二九年在帝国主义嗾使及其利益下实行夺取中东路企图之时，也严守平等的条约。现在南京政府和整个资本家地主不去抵抗日本的侵占强夺，拒绝执行关于中东路的协定。他们始终不去防卫中国继续做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却企图利用中东路问题来挑拨日本对苏联的战争。扯碎国民党罪恶政策的假面具，号召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当中国工人在闸北抵抗日本并英勇的作战之

时，全世界工人是站在中国民众一方的，苏联坚决的拥护和平而斗争。因为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苏联提议出卖中东路，这已扰乱了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国工人很知道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和苏联力量的增加，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中国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为中国独立而抵抗帝国主义，这也是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能够恢复热河与满洲，收回中东路，这可以破坏帝国主义以满洲与华北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的企图。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苏全国劳动群众的兄弟联盟。

以下是少共国际致团中央电：

青年团应当不惜一切力量把党这一建立统一的反日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在青年的一切会议、工会、学校抵货团体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行为的提议，扯碎一切反动的领袖的假面具，注意学生暑期休假时去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发展军事训练，向自己政府要求集会权利，发给武器给战斗员，要求有宣传自由权，唤起并团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士兵群众中有力的去宣传党的这一纲领，加强北方的工作。

中　央　局

六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六月）

现在是确定我们最近时期基本任务的时候，我们在下面提纲挈领的说明今后的计划，望你们在适当的考虑以后，接受这一计划，作保障今后进行这一计划的必然过程中一切实行步骤与行动所根据的总路线。我们完全知道，新的形势将给此种计划以许多纠正，阻止我们直接执行这一路线。这种牵制，当然是可能的，但我们不应拒绝执行这一计划。

（一）对于目前敌我力量的估计：

第一、目前的形势，对于南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一月一月的增加困难。投降日本的政策，更加削弱了他的地位。同时广东业已准备着在援救中国的假面具下，取南京而代之。经过对于广东的许多谈判和让步的条件，对于不可避免的冲突虽可延缓，但并不能完全阻止。

第二、蒋介石的军队，如五十三师、四师、五师、六师、二十一师、七十九师，在抚河新的集中，基本的目的是在反对我们，同时在以后的阶段，也在威吓广东。其他在福建的军队，如四十九师、六十一师、新二师、六十师、七十八师、五十六师，对目前形势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广东以西，正在演广西与贵州的军队进入湖南的行动，其目的是在长沙、汉口，广东尚无必要开始更大的行动反对我们，但蒋介石被硬逼如此，双方联合反对我们，在目前多半不会发生。他们每个都渴

望对方与我们进行残酷的作战。

第三、对于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的我们的弱点，过去是，现在仍然部分的是：

甲、我们的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

乙、在二月间我主力的束缚，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

丙、因缺乏现成的后备军，以便有利于我们的调动，敌我力量的悬殊，如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

我们在湖南、湖北之外部力量的行动，虽然是胜利的，而且是增长着的，但都没有达到直接影响我江西作战，他们最近没有吸引敌人的力量离开这一舞台。

如果是我们能加紧做去，甲、乙、丙三个弱点，是可在两月以内补救起来的。为着创造这一些准备的条件，至少是需要一个这样时间。同时我们外部的力量的行动，亦可更加逼近，给我们以更好的帮助。

这两个月是一个紧急的关头。在这个时期，敌人可以逼迫我们孤军作战，但我们没有理由无忍耐的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由于敌在抚河相当的没有扰乱的完成了新的集中，我们甚至要遇到敌人深入我苏区，切断我们的形势，同时将逼使我们改变我赣东北的根据地，暂时成为游击区域。

（二）我们叙述这个计划，为着以较大的眼光，应付这一局势，抱着在八月底获得最后胜利的前途，请你们注意以下的行动计划，此计划如在适当的考察以后而被采用，就应彻底的最坚决的执行。

这一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是：

甲、我政治与军事的领导，同心一致的接受这一整个的计

划，并即举行分工。

乙、愿意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为着在六月、七月进行分离的作战。

丙、用尽所有的力量，来建立和完成新的部队的任务。

丁、积极性与有计划的配合，加上巧妙的策略领导的质量与我部队的战斗力，将补充我与敌人数量武装相比之下所有的数量上与技术上的弱点，这样来平均我们胜利的机会。

戊、严格注意敌人的移动，一点不要忽视。

在六月、七月的紧急关头，敌人是可能暂时的取得些区域。这一时期我们在抚河的目的，是牵制敌人的前进，来扰乱他的计划，并非在不利条件下冒险一战，不能防止敌人时，便不应防止。

这一计划之第一阶段：

第一、从早派遣第五军团（独立团不在内），于夜间经过苏区，向石城方面前进，其目的是在向宁化、清流。总的方面于六月半左右，以从速将进攻消灭卢兴邦的部队。这一行动的目的物就是七十八师、四十九师，以及其他可能在此的部队之前进的各旅的实力。

第二、同时截断我第一模范团与连城以南敌人的毗连，在六月半左右，与在连城区域之第一模范团及汀州之第二模范团，开始向北进攻，以清流为总方向。其目的是在消灭途中敌人力量，如六十一师、新二师、六十师、七十八师的各旅之一部，以便在清流区域，完成与第五军团的合并。在这企图中我十九军应努力援助模范师，假如模范师在冲过敌人行向清流的时候，遇着较大的障碍与困难，那么今后应计算到从五军团得到援助。第五军团与模范师的配合行动，应由东方面军团的指挥部来完成，此指挥部应为此目的建立起来。东方军团首先应包括清流以北福建所有的力量，以后便应包括赣东北的力量，

司令部首先应在石城，然后逐渐移至建宁、资溪，这才适合我们希望。第一阶段在七月初，在五军团及模范师，方能完成在清流、宁化、归化区域的集中。

第三、在第一阶段中，在六月二十五号左右，我十一军开始在泰宁将乐方向进攻敌人，同时资溪我军之一部应向光泽、邵武以北威胁。在兴国其他所有的部队，应发展积极性，但不应冒险进行较大的战争。

第四、在六月底除模范师外，我十九军应恢复他的西南的阵地以为防御并在汀州储藏粮食及二十二军应恢复南方阵地。新创立的部队应在会昌开始训练，把将来的少共国际师的全体开到石城与模范师的第三团在一起，形成将来的少共国际第二模范师。训练工作应在七月半集结，这一师的武器主要的应从第一阶段时五军团与模范师所得的胜利中得来。

第五、在第一阶段中，方面军应避免较大的行动。

甲、仅对崇仁东的敌人力量，他的任务是：破坏永丰、乐安、崇仁之间的敌人连系。

乙、在崇仁与新淦之间的北方威胁，注意一切的机会，消灭敌人至少的力量，如戴[1]旅及陈[2]军单独的团。

丙、肃清新淦与吉水之间的赣江东岸。

在第一阶段上，方面军的任务主要的是巧妙用计划进行次要的战斗目的，以便其真实目的不致过早泄露。关于这个目的，我们作以下的说明：方面军不要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前，即七月以前，受不必要的削弱，对于意中的危害，应该特别注意。

第二阶段：

第一、东方面军应从清流、宁化区域继续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消灭敌人力量五十六师与第二旅，以及其他可在归化、清流、将乐、泰宁、南槎等区域发现的部队。这第二个

任务应在七月完成，以便在八月初与右翼邵武周围的防守拿口、麻沙之十一军合起来，同时取得从光泽区域来的兴国部队的帮助，以便共同进攻邵武。假若在第一、第二阶段的中间，我们的目的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实力，迅速向北前进，不大注意取得城市的，在第二阶段的末尾，如若可能东方军均应取得邵武，只要上述部队能配置好了作战，取得此地是有可能的。

第二、东方军团与其在第一第二阶段中，所吸收的集合力量出现于邵武区域了，乃是与方面军及新编部队共同开始最热烈的行动之信号。其任务在以完成第一阶段中，便是消灭抚河两岸的敌人，如七十九、四、五、六、二十一、五十三六个师，阻扰崇仁、宜黄、乐安等区域敌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九师的可能的移动，与恢复赣东北我们损失的区域。

第三、同时在七月下半月，少共国际第二模范师，应移至建宁、泰宁，其他新创立的部队甚至没有完成也应移至广昌以北，此地所有力量即为将来第七军团之基础。

第四、你们过去在宜黄、永丰、乐安三个部分所分散的几营游击队，在七月末尾，应集合于宜黄、乐安区域，以便继续向北行动，同时应与以前五军团属的独立队伍发生联系。

第五、除上述部队外，其他苏区内部可调的力量应向抚河，以便打击威胁，并向东北两方向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威胁。

第三阶段：

第一、发展在第二阶段中第二条所指出的任务，如若我们过去的行动能够适当的配合并能够进行与敌较大的袭击，则我们就是为了行动的第三阶段：

甲、前途在八月上半月，可以是由我方面军向东北前进，超过崇仁或在崇仁之北或在崇仁之南以攻抚州。

乙、在第二阶段中第四条所指出的独立队伍，从宜黄区域

北向抚州，以助此战。

丙、我东方兵团业已吸收了兴国[3]的力量，第一模范师第三团继续向资溪、金溪及抚州以北进攻。

丁、我新创立的第七军团，从建宁、泰宁与广昌区域向新丰街、南城方面至抚河威胁，以诱敌人。

戊、所有其他的游击队，都在抚河西岸南丰与宜乐之间扰乱敌人。

第二、在八月间，这些登峰造极的行动，其目的是在：

甲、切断抚州南北敌人力量之紧密联系。

乙、以方面军与东方军团的集中力量，在抚河西岸，开始从抚州区域向南昌的进攻，以便由抚河方向与南丰（南昌）一师一师的消灭敌人。

第三、这一计划是夏季行动总路线的大纲，供给你们考虑的。如若你们在这一计划中，发现了许多小的不合处，例如时间的限制、地理与地形的条件，以及其他这一类的困难，不要将这些当作反对这一计划的出发点。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以实际的步骤，来补救这些缺点与困难是有很大机会与可能的。

中　央

附一：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

朱周[4]：

我们转中央指示今后作战的长电，现有以下的意见：

子、为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拟改令彭滕[5]率三军团全

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七师、十九师、二十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

丑、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隐蔽我军企图时应派独立第一团领导永兴桥地带部队，前出新丰街配合黎川南广部队，牵制敌第六师，使该敌于我十九师东出泰将后，不敢侵入黎川。

寅、我们拟速调公略师到乐安南适当地点，少共国际师、兴国师到石广区域，策应作战。

卯、第十军尽量钳制其当前之敌，使其不易南下应援，并发展游击巩固苏区。

辰、第六军团，主要是打击湘敌，其在赣江活动的部队，应配合你们行动。特别是留在鄂南的独三师，在今后战略上日趋重要，应由孔黄[6]转知其在原地活动，不能调开，并向南浔铁路方面发展游击动作。

你们意见如何望即电复。

中　央　局

十三日

附二：朱德、周恩来关于作战具体部署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中央局：

依上海指示，根据我们昨电所述原则与对敌情估量，具体部署意见如下：

A. 沪电关于东方军的组成在第一阶段末系两个师（五军

团与模范师），在第二阶段末转入第三阶段系三个师（加上兴国师），七军团在外，少共国际师似准备加入七军团。如此，方面军保留四个师在抚河西活动。依此原则提议：

（1）东方军应以五军团（一个师）第三师、十四师三个师组成。

（2）七军团仍以现有之十九师、二十师（两团）、二十一师（两团）组成和扩大。

（3）少共国际师在广昌或石城集中编为十五师，视情况或开建泰或开邵光。

（4）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为执行昨电寅项所述原则，且应将兴国第六师开来前方随着三军团行动，征集资材以便不失时机的牵制敌人主力，打击敌人一个师左右的兵力好增强自己（枪弹与给养补充非常急要）。

B. 如顾虑董朱[7]指挥力弱，或仍以萧劲光任政委（在作战上朱不如萧），或由彭滕指挥一、三军团。方面军指挥各部门东移，暂由我们直接去指挥东方军及七军团各师的行动。

C. 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我力弱将不能与十九路军一个师的增援队决战，力强敌侦知可缓来。如调三军团去为着决战（沪电要求以十九路军甚至四十九师都为目的物），则与其行动十九路军在清流进行残酷战斗莫如决心在北面与赣敌一部分进行战斗。且由现驻地到清流须十五天行程，由清流到邵武十三天行程，由邵武到金溪又八天行程，酷暑远征，且多大山，须记着去年漳州回师近二千人的减员。

D. 因此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且目前邵光敌人正向光建前进，敌第五第六两师又志在黎川、资溪，方面军以一部配合十九师先消灭敌第六师，五军团从广昌

建宁之南与我第三师会合截击刘和鼎部，然后乘胜进攻邵武。我方面军在消灭敌六师后，仍转入宣乐之北积极活动，征集资材，并以独二团挺进樟树、丰城附近。我七军团大部则转至金资地区或经光泽转至铅山南部，首先消灭敌二十一师散在铅山附近各部，然后再转入金资。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

E. 河西军必须同时加强与扩大，孔荷宠不能指挥与掌握这样大的部队，提议杨宁[8]去任政委，以统一指挥。

F. 新的部队第三、第六、十四、十五（少共国际师）四个师，前后方应用大力去加强，并应举行分工，否则像十四师集中起来已跑走一半，这样与上海及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师相差太远，到七月底是否能作战将成问题，更不要说到模范。

G. 后备军应以两个工人师及公略、赣县等模范师为基础，公赣两模范师即可开来前方补充一、三军团以强大主力。

H. 瑞金模范师如来不及随同三师出发，可否以独七师编为三师之第九团，留瑞金师卫戍瑞汀宁化。此着最大的缺点在新的部队不仅质量差，数量亦将差得太远。

I. 七军团之扩大将来可以第二工人师与二十一师一团合并为新二十一师，另一团则编入二十师成三团。

J. 第一工人师应成为军委直属师卫戍后方，并供给干部。

朱 周

十八号十三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戴岳。

〔2〕指陈诚。

〔3〕指兴国模范师。

〔4〕指朱德、周恩来。

〔5〕指彭德怀、滕代远。

〔6〕指孔荷宠、黄志竞。

〔7〕指董振堂、朱瑞。

〔8〕即毕士梯。

中共中央给河北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

中央接到华北党的关于士兵工作的两个报告之后，觉得必须再给予你们以如下的指示，以补充我们以前的意见。你们接到这封指示信之后，应当马上讨论和在你们的工作中即刻执行。

Ⅰ．目前局势的新现象

甲、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停战协定，已在群众面前将国民党的卖国真相揭露得明明白白。这个协定就是承认日本用暴力抢劫中国领土。现在南京政府企图消灭日益生长的群众运动、反日运动和义勇军运动。在目前形势之下，这些运动对于国民党政府可以成为真正的危险东西。同时日本军队继续深入察哈尔和张家口一带，而一点没有抵抗，冯玉祥对夺取张家口和察哈尔的政权的企图似乎已经失败了。在冯投降于蒋介石的几个师之后，反对派的军队（无论是否在我们影响之下）与政府军队的冲突，就要很迅速地发展起来。

乙、中国中部红军新的胜利（红四方面军深入四川内地，鄂豫皖红二十五和二十八军胜利的前进和中央苏区势力的加强），使得南京的和各省政府的大半白军集中起来进攻红军，

南京与广州间的作战协定或者会成立（在湖南的西南几省所派的北上抗日的部队已在转换方向，以进攻苏维埃的江西），鄂豫间的一个新的大的剿赤运动马上就要进行。

Ⅱ. 北方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任务

甲、一般地说起来，以前所指出的任务依然不变，但是那些任务应该按着目前形势而运用，现在你们整个工作的目的是：

一、准备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兵变和游击运动。

二、瓦解反动的国民党军队和缴他们的械。

三、在华北创造新苏区，并且给予已有的苏区以有力的援助。

乙、针对着这个目的，现在我们在北方的任务是：

一、领导前线的，张家口之东和长城之南的一切正式部队和义勇军向南移动。在现在地段的这些军队，他们的生存是危险的，他们不能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日本与国民党都要压迫和消灭这些部队，我们没有理由将他们牺牲。相反的我们应该将这些失望的部队移到后方来，反对为反动的和卖国的国民党的骨干之国民党军队。

现在依然能够在察哈尔和张家口地域与日军作战的至少很广的正式部队或义勇军还要继续在那里游击。但你们要注意甚至于这些部队不可避免地与警卫张家口的蒋介石的几师人冲突起来，所以你们要预备这个接触。

二、领导兵变，领导整个部队反对停战协定，反对放弃防地，反对欠饷，反对缴他们的械，并且须与民众斗争，尤其与农民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在北方军阀的动摇

的部队中自发的兵变（我们的影响和组织太弱，不能有系统地领导他们）也是有作用的。因为由于兵变，他们亦加入反国民党的公共战线。可是在那些我们有坚强力量的部队之中，最好要避免过早的兵变，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规模来开展兵变。

三、在驻扎在军事上重要的地点（如北平、天津、保定和□里的铁路）的国民党各师中间和开往压迫北方部队及义勇军的那些军队的士兵中，努力开始工作。

丙、以如下的主要口号来开展民众的士兵群众运动：打倒北平和南京的卖国贼！反抗将抗日军和义勇军缴械和解散的一切企图！武装民众！驱逐国民党军阀官僚！准备出发攻打南京政府！

从这些口号里边很显明地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政治路线的主要点是将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和反国民党斗争联系起来。民族的革命战争是在进行着，但因为国民党的卖国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群众必须要动员起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国民党和南京政府。

出发攻打南京政府的口号今天还是一个宣传口号，但要靠我们将来的胜利也许要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行动口号。假使我们不能现实地攻打南京政府，这个口号也会促成瓦解国民党的军队而将士兵团结到我们影响之下。

Ⅲ. 士兵中和部队中的工作

大体上中央同意你们的工作和你们在报告中所给的批评，你们应该考虑以下的几点：

甲、集中我们政治工作和我们同志于几个比较小的部队（如教导团、骑兵第二师和第二义勇军团的第十二支队）或集

中于某一地点（张家口）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有更广泛的基础，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与北方士兵广大群众隔离的共产军，而是要在我们影响之下的一个伟大数量的军队（正式军队或义勇军）和争取这个影响的秘密的党的组织。因此，拿教导团和党员在怀来创造一个所谓基本军队是一个错误。但如果这个基本军队已经成立了，那么你们要把他们作为一个军事核心，在他周围将多数义勇军团结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

乙、士兵和义勇军运动必须真正与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联系起来，不然，军事冒险的危险就会发展。至于给予□□部和□□□□的义勇军以钱的问题是错误的。这种问题将来更会常常发生，金钱上的帮助党是不能给的。但这些部队须与农民群众联合一起，没收豪绅地主和县长的财产，发展社会的斗争和□□□□□他们在政治上的一致，以外还能够要求地方政府和官僚帮助给养，但决不可以政治的让步来交换给养。

丙、你们对于冯的估计是正确的。关于他的部下如吉鸿昌等，在他们部队中的党的组织更加需要戒备，必须绝对秘密。你们应当比以前更加实际地与每一个队伍建立直接关系，以致与冯及其他高级军官脱离关系。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

丁、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创造严格的秘密的党的支部，没有横的关系，没有集会的民主的系统，没有选举，需要最坚强的纪律。另一方面，要有士兵群众能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机关，例如反帝国主义会社、士兵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为秘密的支部所领导而且是党所凭借着它而活动的媒介。如果这样联系起来，那么政治工作可以发展，同时不会危害支部。

戊、省委要马上组织和训练若干小的宣传队，每队有三至

五个党的工作人员，训练之后尽可能地分配到各级部队中去，散发关于在政治上教育士兵（训练班）的特殊的指示和大纲以免地方的工作人员发生错误。

Ⅳ. 组 织 问 题

甲、将前线委员会改组为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在省委直接领导之下和由省委来负责的，它应该至少有三个真能工作的同志而在一切队伍中都有它的代表和我们发生联系。

乙、张□□所领导的小组必须与我们的士兵工作分开。你们不能容忍在这样重要的地位上像在军队中的组织里面有一个与党的路线不同的反对派别。首先你们要设法调开这些同志并且说服他们使他们了解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坚持他们错误的观念而破坏纪律，那么应该给以组织上的制裁。

丙、不论什么部队，不能将党的经费来补助他。

丁、仍然要动员和分配党的工作人员到队伍中去，但决不可滥用干部。因此一团之中只好派三至五人，一师之中派二十至二十五人，这是最大的限度。

戊、在平汉路的铁路工人中开始工作，他们的位置将来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Ⅴ. 补 充

甲、冯的失败和他的出卖以及蒋介石的三个师进攻张家口的出发的事实产生了你们在那儿的策略问题。

一、你们应该用一切方法企图瓦解这些国民党队伍，甚至

于根据他们战斗力的大小将他们较小的隔离的部分缴械。我们绝不能依靠冯玉祥，你们应当采取独立的路线（不要依靠别人）来阻止将我们影响之下的队伍缴械，阻止将我们的干部消灭。

二、保卫张家口或者还到北方去都是跑到死路上去。你们应该将在张家口一带和察哈尔的在我们影响之下的一切队伍（教导团、骑兵师、新基本队伍、义勇军和其他）集中起来，将工人、农民游击队等等团结起来围绕着这些队伍，建立你们的司令部，将他们向南移动（或者沿着河北、山西边界）．避免与数目超过我们而有较好的训练的国民党的几师的王要部队有坚决的接触。

三、在这个事变中间，这些部队进一步的目的是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红军，在河北和山西省东北部首先实行土地革命。

乙、我们觉得你们在河北农民和难民中的工作与客观的可能比较起来是不够的。为了避免我们士兵工作的孤立计，省委对于河北的一般的工作必须加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在一般工作中的任务你们是晓得的，我们不再细说，就此完结我们的指示。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健全侦察工作的训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

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但各级司令部对这一工作，仍然存留着很浓厚的忽视现象。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因为过去三次战争的时候，有广大工农自动替红军送消息，并从这些消息中达到了组织战斗的重大任务，以致感觉情报来源的容易，似乎认为不需司令部本身特别来组织这一工作。第二是不了解这一工作的艰苦困难，缺乏组织教育的耐烦性。第三是依赖白区及边区的党的秘密工作，以为在白军残酷屠杀和封锁之下，只有白区的党才能组织这一工作，才能打入敌军的内部。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减弱了红军本身侦察工作的健全。

自黎川召集参谋会议，以及每次的干部会议上，特别指出侦察工作的重要以后，虽然有了很大转变与成绩，建立了各种手段的侦察部门，一般都能得到相当的正确情报，尤其是打入白军的间谍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东陂、黄陂之役），但这一工作很不普遍，仅仅限于最高级司令部及红军保卫局，各级仍未

能同样地注意到这一工作的重要，甚至反而出现了单纯依赖上级的现象。所以，仍然不能完满地普遍地来健全这一工作。

这些忽视侦察工作的现象，就侦察队方面即可看出，如数量上很多没有按照组织上的规定，质量上更少注意满足侦察条件的要求。比较活动的战斗员不愿调到侦察队工作，并且个别司令部有时把调查土豪看成侦察队的主要任务，把侦察队的教育管理交给管理科，或者把它当作司令部的专门尖兵，其他侦察部门更是很少注意。这些现象确是忽视侦察工作的例证。

当着敌人四次“围剿”尚未完全粉碎，残酷的决战更日加紧张的面前，为要迅速完成红军历史使命，对于加强侦察工作，确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求各级首长应纠正过去忽视和依赖的观念，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督促司令部以应有的力量独立地进行各种侦察工作，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我们所必需的要求。兹再提出以下几点办法，望切实执行：

一、各级侦察队应在最短时间内加以整理，按照规定补足应有的数量，加强军事、政治和侦察技术的训练，提高其质量，使每个侦察员均能深入白区，成为情报的搜集和研究者。

二、在每次俘虏中，要协同政治部争取一些最好的分子，取得保卫局的帮助，开办间谍班，经常派到白军中担任局内间谍。

三、在三天以上的驻止时间中，各级司令部均要能够在驻地的适当地点布置坐探，并扼要的给以训练，使其真能替红军打听消息。

四、对白区的间谍，尤其是江西中心城市的间谍（如抚州、吉安、赣州、南昌、九江等），不要单纯地依赖上级和白区的党去建立，各级均要尽自己的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征调各种人才，帮助上级并独立地去布置。

五、各级司令部关于侦察工作中的上下级和友军的关系，要密切起来。上对下要有经常的指示，下对上要有经常的工作报告，对工作心得与经验，要经常检阅，以求得技术上的进步。

六、对讯问俘虏、审问敌探、打扫战场，尤其是到达敌人驻过的城镇、乡村，要细心搜集情报材料，不要放弃一个可以得到敌情的机会。在占领城市时，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去搜集敌军文件，不要为一般战斗员所烧毁，尤其对于敌军的机要文件，更要特别注意。

七、反侦察的工作，是蒙蔽敌方耳目最有效的办法。侦察队除本身要选定一部分有经验的同志经常进行破获工作外，还要从支部的系统中（红军中的）委托某些精细的同志，经常帮助调查。

八、要使侦察工作能够突飞猛进，同级的司令部要订出月的或季的工作竞赛条例。这种条例由上一级司令部召集参加比赛的部门来规定执行。

右令

兼司令员　朱　德
政治委员　周恩来
参 谋 长　叶剑英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周恩来关于对战略方针的意见给秦邦宪、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秦、项：

十七两电悉。

（1）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它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它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它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不对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必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

（2）目前的战斗不会动摇推延一决战的战略方针，故我一得沪电即在同意这一方针的原则下，考虑具体的部署。但目前战斗的开展必会要影响具体部署的某些步骤，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3）所谓往转重复，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斗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小战十数次，证明不是无仗可打，或完全不便打，而常常是打得不好，故我们如呆等有利的决战是错误的，但准备削弱消灭敌人的爪牙，以加强自己，还是有机可乘。今日十九师已消灭了敌六师一团大半，正是明证。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秦邦宪等关于执行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豪：

看了你对沪指示提出的提议，我们仍持原电的意见。有如下必须说明：

（甲）沪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人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即使目前略受损害，也要看到前途，总结经验，尤其是今后确实掌握敌情的变化，和我军的数量逐步的增加，须得有两作战线，且敌人实际上亦已构成两作战线来进攻我们。你对于目前的利益和虑及如沪所预见的地形，甚至行军的困难，只令东方军团在泰邵作战，而束缚其主力向东面进展，结果将不能达到沪所说的前途。

（乙）这一战略指示是有整个性的，如果你束缚东方军团向清归进展，则敌十九路军在侧背仍得卢[1]师的掩护，致该敌有可能的响应粤军的北侵，威胁汀瑞，影响北面作战。且我们处被包围的地位作战，尤其内部有国特分子，可能乘机活动，使我们难于转移突击方面，各个击破敌人。你对于整个的如南方的作战并未估计在内。

（丙）照战略原则，自然打敌人的主力，如此刻的蒋[2]军

队。但此须先有打主力的好部署，才能消灭其主力。同时，要在部署未完之际，避免与其主力作战。因此，我们同意了上述部署，并拟定三军团作东方军团，使顺利的完成此部署。北方战地既不能与敌人主力决战，调出三军团，尤其彭滕[3]去任指挥是适宜的。

（丁）东北两面敌人，都筑构了强固的堡垒。上海曾指出东方军团在头一阶段，主要是消灭敌人实力，不大注意取得城市，这就是估计了堡垒问题。同样，我们要了解敌人堡垒在与红军数量特别悬殊的条件下，表现了它的作用。假如敌我兵力对比相差不多，则红军正可以利用再分散兵力，以一部对之封锁或掩护，而以主力从其间隙入到后方逼之决战。此有苏联内战中外线作战运动战斗的先例，譬如说要消灭清流之敌，可以先入归化地带，捣其后方要害逼其决战。此本战术问题，当由你们实际中去运用，此不过举例罢了。

（戊）东方军团的行动，仍归朱[4]周统一指挥。

（已）沪电所述第三阶段中第七军团，即指第二阶段中移建泰广之少先国际师、第二模范师，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第七军团，请注意。

（庚）各作战军，特别是东方军团，在一切行动中都应特别注意新部队的组织培养和调用，以适应开展的战争新局面。

（辛）计划要速实施，望即电复。

宪 项 王 刘[5]

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卢兴邦。

〔2〕指蒋介石。

〔3〕指彭德怀、滕代远。

〔4〕指朱德。

〔5〕指项英、王稼祥、刘伯承。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的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豪：

甲、新计划长电已接到，这计划我们认为不适合的，因：

A. 将来一、三、五军团完全分散，一、三军团轮流伸缩，轮流分散为军事上之大害。

B. 此计划仅侧重闽赣、闽浙赣方向，而对东南、西南战线将来无重大影响。

C. 将来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而以主力军为后援军，将使游击队伍失其应有作用。

乙、粤敌目前尚不是我们改变上海总计划的理由，而且更急迫要我们执行上海计划之第一步，以威胁十九路军右侧翼，引动他们破坏粤闽敌配合进行的计划。如闽敌急进，则我东方军可以顺而南向，打击闽敌侧背，但我三A[1]在目前情形下，或须暂缓北向行动。

丙、上海电最主要的为建立两作战线，以准备八九月之总进攻，因之在目前阶段上，将抚赣间区域作为我们钳制方向，而以清归间为这时间之反突击方向。在战略总之防卫方面下，一、五军团及两个独立团，足够担负钳制任务，而反突击之力量，亦必须以三军团与彭[2]为指挥适合。

丁、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并立即行动。

中 央 局

二十二日

附：周恩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央局：

二十二日两电悉。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原意也。

周

二十三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指红三军团。

〔2〕指彭德怀。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我们纪念工农红军成立的"八一"日子，正是全世界工农劳苦群众每年举行反帝战争的日子，特别是我们现在决定开始来纪念之时，正是帝国主义新的世界大战与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极端紧张，特别是国民党与日本订了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移兵进攻苏维埃和红军之时。凡我红军军人，更要学习与提高军事学术和政治知识，以造成百万铁的红军，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武装拥护苏联，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红色中华》。

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日子。此令

代主席　项　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刘　少　奇

现在正是各地工会改订集体合同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改订合同。我们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我们要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更广大的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来参加苏维埃国家与红军的建设，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

两次代表大会[1]的经济斗争决议和纲领是正确的，修改的劳动法一般的说也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指出，这些纲领和新的劳动法，同样是不能机械的执行。规定许多“例外”以及许多带有伸缩性的条件，是这次修改劳动法和制定农业工人要求纲领的主要精神之一。当着我们在合同上实现劳动法与要求纲领的某些条文时，如果我们不能坚决站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分别许多企业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那我们仍旧是要犯或“左”或右的错误。因为我们只有根据企业中工人的具体环境，我们才能确定这种伸缩性的程度。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苏区工人》第二期。

我们听见同志说：雩都的职工会预备在三天内根据新劳动法，将所有的合同订好。同志们！订立合同，我们要迅速的进行，这是对的。但是这次订立合同，是要执行一个“转变”，有新旧劳动法的根据不同，有过去的许多错误需要纠正。在这里要进行许多说服的工作，要细心考察每个工人的要求与企业担负要求的能力，同时还不可免的要经过许多交涉、谈判以至罢工等等方式的斗争。当然这些工作，不是在三天内一律都能作好的。机械的规定在三天内将所有合同订好，这除开照抄新的劳动法与武力对付不答应条件的资本家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准备、考虑与说服，以及发动群众的斗争等等，在这里都没有了。

过去照抄旧的劳动法，现在是照抄新的劳动法。虽然劳动法有新旧的不同，但一样可以是错的。应该知道，新的劳动法也是为了在工业中实行的，在农业及小手工业中，许多还是属于“例外”的。机械的执行，可以同样是错误的。其次新劳动法的许多条件，是比旧劳动法要低的，如开除工人、参加红军的津贴等等。这些条件，在改订的合同上是要减低的。但是，当着工人还不明白减低这些条件的意义时，我们是不能用命令去机械的减低的。我们要说服工人，使工人了解为什么要减低这些条件，不是为着可怜资本家，而是为着巩固工农联合与苏维埃政权，为着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利益，使工人自愿的减低这些条件，而更加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更坚决的来参加战争，参加苏维埃的建设。

在某些个别的情形下，对于工人某些过高的要求，如果经过了我们许多说服的工作，还是不能取得群众的赞成，群众还是坚持了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就应该考虑暂时执行这些

要求的影响。如果不是直接妨害红军的行动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对群众某些过高要求的暂时容许与让步，以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力量去说服工人，这还是必要的。去年二月间，汀州的理发工人要“集中营业”，当时全总执行局是坚决反对这种办法，指出这种办法将来于工人是不利的。汀州理发工人反对全总执行局的指示，甚至对执行局的代表表示不满，认为执行局不是拥护他们的利益。但是执行局一方面继续向工人解释不同意他们的“集中”，另一方面在事实上还是容许了他们的“集中营业”，没有强迫他们立即分开。现在事实上证明执行局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汀州的理发工人在“集中营业”失败之后，他们感觉到执行局先前的说话句句是对的，他们悔不该没有听执行局的指示，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对执行局的信仰都提高了。因为他们在实际经验中了解了自己的错误。这个事实的经验，是值得工会许多领导者来学习的。

提出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蛮不讲理的要雇主雇用工会强迫介绍去的工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的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这些“左”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要直接影响到工农联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工人的部分失业。但是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我们绝不能跑到右的“劳资妥协”的泥坑中去。虽然我们在某些个别的特殊的条件之下，也容许对资本家的“妥协”。但是，我们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由于工人的自愿来停止强迫介绍，减低某些企业无能力担负的要求，绝不是我们要和资本家妥协，牺牲工人的利益。相反的，我们是要从各方面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各方面来与资本家作斗争，对付资本家的阴谋。而

这些“左”的错误，恰恰给了许多资本家阴谋怠工停业的口实。

苏区的许多资本家用各种方法，如用分红、合股，以及其他很小的利益来引诱工人，欺骗工人去和资本家“妥协”。条件是要工人不加入工会，不参加斗争，和资本家共同瞒税等。少数落后的工人、店员，现在还是在资本家这种欺骗影响之下。现在因为劳动法的修改与“左”倾错误的纠正，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企图利用这点来活动，企图向工人反攻，企图使工人离开苏维埃与工会。他们说：工会与苏维埃不拥护工人的利益了，现在是要实行劳资妥协了，工人不好的，可以无条件开除了，工作可以从早作到晚，没有什么八小时了等等（瑞金、会昌都发生这样的事实）。这种事实是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对于进行这些活动的资本家与反革命分子，应该给以严重的打击。工会在改订合同中应该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来实现工人的利益，实际的救济失业工人，立即建立劳动介绍所与社会保险局，号召群众起来对付那些顽固的阴谋破坏的资本家，在不断的斗争中进行充分的教育工作，证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之不可调和，争取那些在资本家影响下面的还不觉悟的工人。这才能使我们在改订合同、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来参加工人师等等。如果我们工会在这里略为放松保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工作，劝工人向资本家妥协，可怜一下资本家，或者机械的用强迫的方法去降低工人的要求，这无疑的要降低工人的革命情绪，助长资本家的影响和气焰。这在武汉时代的痛苦的经验，是应该记住的。

实现工人的要求，在苏区采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是错误的。在苏区内工人有更多的方法来对付资本家，达到自己的要

求，但是罢工的武器，在苏区内还是不能放弃的。“对于苏区内的富农田庄，应该广泛的适用罢工”（国际雇农委员会决议）。就是对于那些顽固的进行阴谋活动的资本家，罢工也应该广泛的适用。但是（一）罢工必须是群众的行动，工会机关命令与强迫群众罢工是不对的；（二）对于中农及雇用辅助劳动的小雇主，只有在最后才采用罢工的方法。

会昌的工会在订立合同中，也是执行了某些强迫办法的，以至有几个工人直接向执行局来控告。兴国县工会在决议案上说：“一切要求，都要根据雇主的营业情形来提出”。自然，在这里以为工人的真实需要与社会生活程度的提高，都不能作为工人提出要求的根据了，但这些恰恰是提出要求的第一个“根据”。还有许多负责同志以为工会现在是要反对“左”倾的错误，对于保护工人经济利益的工作，就似乎不得不放松些，这种观点是最坏最错误的观点。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会昌的代表说得好：不明白的讲蛮道理的工人总是少数，服从真理的工人总是多数。工会有了正确的领导，蛮干的人就没办法。工会不管事，忽视工人利益，有些人就不讲道理，蛮干起来。会昌的代表在这里说出了，过“左”的错误是由于工会忽视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而发生。所以纠正这些“左”的错误，不独不能减轻对这些工作的注意，而且工会必须加倍的来注意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必须研究集体合同上的每一个条文，研究劳动法，研究每个订立合同运动中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在报上发表。工会委员会必须来讨论这个或那个合同、这个或那个斗争所应采取的方法。工会还必须向苏维埃提议许多办法，来救济失业工人，建立劳动介绍所，设立社会保险局，以及如何使工人购买到便宜的粮食及其他必需品。虽然工人师的动员工作十分紧张，但是这些工作是不能忽视的。只有使这些工作与工人

师的动员工作联系起来，配合起来，才能在政治上收到更大的成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至七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

毛　泽　东

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一、讲阶级（做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的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斗争》第二十二期。

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八）以上均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宣传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去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地出席群众会议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去讲话。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查阶级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五）查阶级要查得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了，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写两三行，易得遗失，是不好的。

三、通过阶级

（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交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七）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

对的。

四、没收分配

（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方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摊（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拿东西。

（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五、工会、贫农团

（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加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引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九三三年六月）

朱　德

“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这是苏联军事学校的一个标语，其意在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确实有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可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在帝国主义指使、帮助国民党军阀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的大举进攻中，和帝国主义将直接与中国工农武装冲突的前夜，担任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伟大任务的红军，更须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我现在想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比如说，遭遇战斗，就应迅速动作夺取先机之利；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有分出

---

* 本文原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接敌、进攻和冲锋等段落的部署。“喝汤”和“啃骨”当然不是一样的动作。

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如有人想处处顾全，平分兵力，结果到处没有力量，将演出东不成西不就甚或失败的结果。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如有人运用战术专寻找敌人硬处打，则敌人软处也必成为硬处了。倘因此而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则战略的目的也就不容易达到。要知道，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如有人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则大的胜利又将由何处积累起来？

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兵团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其决心。如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但不能了解为机断专行就是与首长决心背道而驰。

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但侦察情况只能得到相当的了解，特别在遭遇战斗中更欠明了的了解。指挥员不能因侦察而迟疑徘徊，放弃良机。故指挥员常到先头警戒部队中赶早侦察，以便迅速定下决心，下达命令而不误时。

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

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如处在敌人几个纵队的夹击或包围地位，要突击其中某一纵队时，则应求得内弧幅员较宽，周旋容易，并利用险要地形钳制另一方面的纵队；否则应突击某一纵队之暴露翼侧和后方为有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盗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与华北的时候，同时是全国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极大的高涨，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得到空前伟大胜利的时候，因此今年的“八一”有着非常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为决议如下：

（一）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二）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三）在区苏土地部与乡苏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红色中华》。

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乡苏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福建后的行动部署给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项主席：

1. 在博生已说好，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打击敌人增援队，不采取积极进攻清城办法。已电告彭、滕[1]即本此急以攻泉上部队分一部乘胜袭击归化（只敌一营，无坚固工事），断敌右后方，配合主力断嵩口联络，易威胁清敌，调敌增援队，或改攻清流。

2. 在敌未动之先，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是不妥的。目前多雨，山水时涨，十九师过将乐河亦与本原意不合，且难于开展邵大[2]局面。

3. 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朱　周

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滕代远。

〔2〕可能是邵光，即福建省邵武、光泽。

周恩来关于实行新作战计划必须有步骤给秦邦宪、项英、刘伯承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秦、项、刘三同志：

一、实行上海计划[1]第一阶段，目的在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2]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

二、我们指示东方军的战略方针已累电报军委主席，是估量到各方可能变化的敌情，给彭、滕[3]以全般意图的指示，并指出现在向沙县行动是不适当的，十日十一时半的电告尤为明显。

三、我意如果敌情不出意外变化，行动步骤不宜扰乱，机动亦须与正在执行的战场方针相合。目前，三军团不断获得胜利，即由于我们依一贯方针，步步实施，而敌人处于被动步骤。在这里，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4]，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是战斗中大忌。续一[5]。

恩　来

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

〔2〕指卢兴邦。

〔3〕指彭德怀、滕代远。

〔4〕指周子昆、曾日三。

〔5〕这里指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人福建后的行动部署给项英的电报。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改变原作战计划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如我们所了解的，方面军的意思是仅仅接受第三阶段，完全取消了第一阶段，并很多的修改了第二阶段，这是大大的改变了原来计划的意思。在原来计划中第一与第二阶段是进入决定胜负第三阶段之初步条件，考虑到所指出困难，如赣东北的危急形势、敌对黎川和建宁的压迫以及我们所派去的军团在未抵清流区域以前所越过的山岭、路程等等，我们仍请你们估计到这些困难，是与下面所得到便利对立着的，即由我强有力的军队突然出现于直接受危险的区域的外面，以完全新的形势，威迫敌人，使他很难继续压迫黎川与建宁。关于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中，夺取堡垒的问题，我不仅没有提议，而且着重的反对，这样就在第一阶段中，唯一的企图是：在消灭从清流、归化、将乐向西进，到我苏区的敌人实力之先锋，或被派来的截断我东方军团与北方调来的别的军队。关于南京、广东、福建、广西共同联合反对我们的可能，甚至在五千万大借款等事实以后，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恰恰相反，依照我们的判断，事变发展的途径，是西南的军队现已注意攻打我们，以便在将来与南京的战争中获得较好的地步。无论如何广东较大的积极行动，已经从现在起确实发生了。因此在清

流、宁化、归化区域，初步削弱福建的军队，以为我们开始向东北进攻之先的阻止步骤，正是第一阶段的意义。如若我们跳过这一阶段，我们就不能阻止从南方来的危险。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第一阶段不能在福建以外去进行，就是因为我们新的力量的增长与获得战斗力事的迟缓，逼我们要走容易的道路与顾及到第三阶段。这一事实便是要使最后阶段依靠第一、第二阶段之成功，与当时我们新的力量所达到的程度。第一与第二阶段的意义，还在于假若在七八月苏区中部与南部的形势，被敌人弄的确实很危急的时候，我们有暂时转入西方，甚至回到南方面代替继续向北进攻。在第一阶段，这种被逼离开原来的计划，无论对于方面军红校或对于东方军团，都没有任何的可能。不过在那再若有紧急事变发生，我们的新的力量，就要而且必须准备好了来对付。以上便是我拥护原来计划的理由。

（二）但是如我们过去已经指出的这一计划，只能当作一个总的纲领。你们对这一计划的一切实际的与具体的步骤，根据你们对于条件更好了解，自然比我们从此地所能介绍的要更加适用。如果你们觉得原来计划中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去实现，那末可修改如下：

（三）留着二十师、四十九师、六十一师、六十二师，不为东方军团所扰动。

（四）留着模范师与新十九军到南方以便牵制广东军队的前进，是初步的回答你们二十三号关于广东军队前进的电报。

（五）集中第三军团于石城、宁化、安远地区。我们想这一区要可以经过较少的困难，达到并留此军团于相当的指挥者之手。至于在宁化、安远，东方首先应该打击谁，我们意见介绍卢兴邦军队之一部为第一个监视。我们意见是越过宁化、泉上向将乐的总方向继续前进，不需要进攻将乐的

堡垒。从此向梅江即泰宁之东北区，将比直接从建宁、泰宁区域发动有更多的便利。因为从建宁、泰宁直接发动，只能击退敌人，但不能消灭他，而且这将阻碍我们在第二阶段之下预期得到胜利。

（六）这一从南方而不是从西方来的军团，既已到达将乐、万安区域并与我十一军或其他可以任命执行此任务之军队的合作，从西北进入建宁、泰宁区域既已完成，那末在邵武、黎川之间未采取任何步骤以先，即应消灭敌新二旅五十六师、二十师、三十师与其他军队之一部分。

（七）为着制止广东军队的迫切危险与十九路军在我们作战之初，或其后一时期，当我们在此行动的时候之可能的新危险，我们向你们提议：加强我十九军及二十三军，加上新的游击队，并在数量上加强他们到我们三月初所给你们的电报中所说的程度。

（八）在七八月开始新编部队的大部分，应准备着应付会昌、汀州、瑞金区域的军事急变，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供给你们的食品。

（九）方面军应在七月半以前，回到永丰、乐安区域去，以便我方面军正在进行计划中所述任务时，稳定敌人的注意力于西方。如果机会凑巧，能够消灭一两团以上的敌人，我们自然并不反对这样。

（十）在计划的其他部分，你们似乎没有什么意见。因此，我们想最好从现在起就停止在这一问题上交换意见，并让你们立即开始工作，同时在你们与前方负责指挥的同志中间应用一切可能达到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是所至盼。

（十一）南方形势的发展异常紧急的，需要在东方军团作战以外，进行独立的反对广东军阀。同时请立刻告诉我们南方

敌人军队驻扎地区，并详细的告诉我军的主力部队分布、供给与一切条件，以及我新编部队准备的程度，那时再议告我们的提议。

中　央　局

七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为全国大水灾告中国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

全国的劳苦群众们：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弄得灾难遍地，苦海一般：民族受着空前的凌辱，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者各种侵略之下，过着极悲惨的殖民地奴隶生活；国民经济破产，工业倒闭，农村衰落，失业、贫困、饥饿、死亡网罗着每一个劳动者；二十余年来仍旧是军阀专擅，割据自雄，平时横征暴敛，战时为祸尤烈，兵灾所至，弄得赤地千里；复“天灾”流行，无岁幸免，水旱蝗雹，交相煎逼着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群众。民国二十年大水灾所受的创痛未复，老百姓的喘息未定，而今年自入夏以来，偏又是不断的阴雨，内地河流水势暴涨，终酿成巨灾。前年洪水泛滥的惨象又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复见于今日！

我们看看今年的灾象，就知道中国广大劳苦群众落到了怎样一个深深的陷阱：在河北，北运河暴涨，浸淹了沿河各地的禾稼，南运河同时告警，亦已决口成灾，永定河决口五处，淹没了良田三千余亩，宝坻溃决，把五百多个乡村都葬到洪水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八期。

里，大清河民堤决口，淹没了新城八县；陕西是连年旱魃为虐，已是哀鸿遍野，近渭河复泛滥成灾，更是火上加油；湖北被灾区域尤广，武汉三镇曾经成个泽国；湖南被灾之区达三十余县之多；其他如赣、皖、浙、川、黔亦纷纷报灾。淹没了的良田，浪涛带去了的财产，冲毁了的堤坝，丧命于洪水的民众，这一个伤心惨目的灾象，实较前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一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一九三一年受灾最惨的沿长江各省特别是两湖，今又陷于洪水；（二）近来水势的增涨不仅限于长江；滚滚的黄河，亦正在澎湃汹涌着，冲毁堤坝，淹没农田，这就造成了全国大水灾的险象；（三）河北这次大遭战祸，春耕夏耘在一大部分土地上已被破坏，现又加上大水，灾民难民将成千累万而不堪其苦；（四）这一普遍全国的水灾，将是中国国民经济更形破产的有力因素，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将随巨波大浪以俱起，向着推翻中国民众的罪人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大道前进。

劳苦群众们！

水灾并不是不能避免的天灾。这是由于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乱行搜括民财，只用来养兵“剿匪”，从事内争，不进行任何社会公益建设的结果。就是在名义上划作兴修水利的一点款子，不是被军阀官僚私吞，便移作“剿赤”的用度。长江一带的堤防工程，因受不住大水的冲击，即行溃决，不去设法巩固它；河身日高，一点也不进行疏通的工作，致水流甚缓，横溢成灾，黄河的淤沙，至今为祸，从不加以清导，而民众则一贫如洗，哪里还有力量筑得起千里长堤。国民党政府只知取之于民，并没有将一点半点用来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束手以待灾祸之来，结果，民众捐出了自己的血汗，还要一次再次地

受灾受难。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国民众实无以自救，无以出于灾难的惨境！

目前水灾的形势非常险恶，灾区遍全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忙于“剿赤”，忙于卖国，不见拨下分文赈款来进行任何救济的工作，坐视成千成万的灾民死亡道途，流离失所。若云国库枯竭，偏有千百万的巨款拿来“剿赤”，无数的国帑耗费到购买杀人的武器。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美国借了两万万之外，又进行向英国的五百万金镑大借款，皆美其名来“复兴农村”、“发展实业”，实则都是借来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宋子文已经在美国及意大利订购了许多架飞机、大炮、毒气、炸弹来准备轰炸脱离了灾难统治的苏区民众及“暴动”的灾民。前年大水时，国民党军阀以铁血手腕用机枪来扫射饥饿交迫的灾民，不许他们登陆，活活地淹死在滔天的洪水里。这是国民党禽兽们血洗农村，屠杀人民。不有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取苏维埃的胜利，那就是永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宰割，死路一条！

劳苦群众们！

我们号召你们立即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组织群众自己防汛救灾的委员会，要政府立发预防金与救济金，要求将“剿赤”的军费与付给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债款全部移作防汛与救灾之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学着四川劳苦群众的榜样，组织民众抗捐军，不纳租，不完粮；要求各地政府机关立即成立灾民救济所，将此次棉麦大借款之全部拿来赈灾；组织抢粮吃大户的运动并开展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军警屠杀灾民，在各地组织水灾后援会来援助灾区的民众。

劳苦群众们！

遍踏国民党的中国，是无地不灾，只有苏维埃革命已经胜利了的苏区，虽在国民党屡次“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困难情形

之下，苏维埃政府仍用一切力量来防止和救济各种灾荒，来谋广大劳苦群众生活的改善。这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中国劳苦群众解脱一切灾难的救星，是广大群众争取解放的灯塔！

劳苦群众们！

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更猛烈的扩大革命的战线，进行革命的斗争，因为只有从斗争中才能寻得出解脱一切灾难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分局和全体同志们：

因为交通断绝，在很久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同志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材料，使我们详细而具体的了解你们的情形。××同志只给了我们一个极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

我们这封信是根据本年七月七日和××同志的谈话，以及去年十二月光华[1]同志的书面报告写成的。因为材料不充分，有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军事计划，我们还不能作具体的建议，在这一封信里我们打算把国际和国内情形，给一个简单的介绍，把你们在四次“围剿”中的错误与弱点加以自我批评。最后，依照你们现在的情形，指出几个迫切的任务来。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召集扩大会议来详细讨论，按照具体环境规定你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同时把你们最近的情形尤其是敌我力量的对比、你们的军事计划、对敌人的策略以及肃反经过等等，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报告，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具体的帮助

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和无线电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解决我们所应当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仍旧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加深与尖锐化，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使社会主义地位已经在苏联完全确立了，而建立了为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惊人的胜利，不仅使工农劳苦群众的幸福与文化水平日益增进，而且使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之经济独立性愈确立了。现在苏联已经开始执行第二个更伟大的五年计划，即为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铲除产生人剥削人的根源的五年计划。苏联在国际上的力量，他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他是世界革命基础的意义，也大大的增加了。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我们看见相反的情形，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继续加深与更加尖锐化，工业的缩小已使工人阶级一半以上失业或半失业，农业危机使农民群众达到空前的破产与赤贫化。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阶级斗争日益剧烈，而革命的生长，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都同样高涨着。例如：西班牙在革命漩涡中，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德国革命危机的前提是加速的增长着，波兰革命危机日益接近，日本将进到革命危机的形势中等等。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使帝国主义列强间为找寻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范围而起的矛盾与冲突更加紧张，首先就是英美的对立，同时日美、德意、德法、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对立，都正在引到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

开始。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牺牲苏联，来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与拥护之下，资产阶级疯狂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最近日本积极准备掠夺中东路，武装白俄盗匪，以及在堪察加渔业区的种种挑衅，欧洲“四强公约”的签字（英法德意），英国技师在莫斯科进行反苏联的阴谋，及由此而起的英国对苏联断绝通商，德国代表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公开提出苏联的某些地方应做德国殖民地，法国远征军之组织，波兰、罗马尼亚、立陶苑、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之狂热的准备，特别选择的法西斯蒂之巩固与活动以及继续不断的挑衅，中国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疯狂的反对与攻击苏联等等，表示出直接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正在笼罩着苏联的境土上。资产阶级专政各种形式的尖锐化，反动势力之加强，法西斯主义的生长，白色恐怖之加紧，凡此一切都是为准备巩固后方，以便进行帝国主义大战与武装干涉苏联。

去年九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估计了目前的国际形势，指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已经终结，目前正处于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大的暴力冲突的过渡期，即走向战争与革命的过渡期。因此，十二次全会决定了共产国际及其各支的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反对资本进攻；（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统治；（三）反对逼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对苏联的干涉。

在中国，战争与革命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英法帝国主义直接拥护与战争之下，在国民党一贯不抵抗、投降、出卖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准备进攻苏联，而在中国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已经快到两年了。虽然现在国民党已经最无耻签订了“华北停战协定”与日满代表开了大连会议，承认了满洲国并承认满洲、热河及河北大部分土

地为满洲国领土，用一切手段镇压反日反帝斗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会停止对中国的进攻，而且由于国民党进一步的投降出卖，使日本强盗得了许多进攻中国的方便，而加紧对中国民众的掠夺与屠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调动大批军队与飞机、毒瓦斯去镇压日益兴起的满洲、热河等地的抗日义勇军，进攻察哈尔，以实现其所谓“满蒙政策”并准备并吞黄河流域的地方。其他帝国主义也积极准备与实行瓜分中国，如英国在西北的侵略，利用藏兵大举进攻西康；法国在西南积极活动，企图并吞云贵；美国在太平洋积极备战，与日本实行三年造舰计划的大竞赛，把五千万（合国币二万万元）棉麦借款给南京政府，用种种方法企图占中国。最近南京政府积极进行所谓“国联的技术合作”，“开发中国”，建设江浙“模范省”，这实际上是列强共管中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正在疯狂的进行着。

随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激进而俱来的，便是中国各派军阀间的冲突与混战日益酝酿和爆发。如四川军阀战争日益扩大，将蔓延全川；南京与冯玉祥将在察哈尔之宣化实行开火；西南反蒋运动日益剧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军阀的冲突与战争，反映着各帝国主义利害冲突与瓜分中国的激烈，同时又是帮助与便利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

无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各派军阀间有怎样的矛盾，但是他们对于镇压中国民众的抗日反帝运动，反对中国革命，是一致的。正因为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正因为两个政权对立的尖锐，所以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压迫中国革命运动，首先用全副力量去进攻红军与苏区，企图以此来挽救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自从国民党出卖了华北以后，得了

帝国主义的大批借款（美麦二万万元，英镑一万万元，现在南京与各派军阀又续进行法郎、马克等等的大借款）与各种杀人利器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来反对红军与苏区，屠杀广大的劳苦群众。现在蒋介石已经把大批的军队集中江西了，飞机、毒瓦斯已经大用特用了，三路“剿匪”总司令（南路陈济棠、左路蔡廷锴、右路何键）已经就职，积极准备与实行向中央苏区“总攻”了。其他如鄂军准备大规模的进攻鄂豫皖与徐源泉在施南就鄂西“剿匪”司令职，刘湘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所有这些，都表示出国民党如何疯狂的进行反对红军与苏维埃的反革命战争了。

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压迫中国革命，无论反动势力如何猖狂，白色恐怖如何残酷，然而这不但不能消灭中国革命运动，甚至不能暂时阻止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国民党六年来血腥统治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浩劫，使得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日陷于饥饿、失业、疾疫、死亡的惨境。国民党以其一贯的投降出卖的政策在群众完全暴露了它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冲突与内讧，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加之革命运动的蓬勃生长，苏维埃在广大的地域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广大的范围上崩溃着。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红军伟大的胜利，苏维埃运动的扩大，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高涨，反帝斗争的生长，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在我们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在全国劳苦群众积极的拥护与同情之下，苏维埃运动已成为不可克服的力量。在四次“围剿”虽然湘鄂西受了失败，退出洪湖，鄂豫皖主力离开原有苏区，但是鄂豫皖的苏区仍旧保存了一大部土地。红二十五军与

二十八军的形成与扩大，游击战争的开展，使得敌人惶恐不安，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将能恢复与扩大鄂豫皖苏区。最近红四军在四川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报载已经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苍溪、阆中、仪陇等县，现在正开展积极进攻为苏维埃四川而斗争。中央苏区自从今年第一季消灭与击溃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主力，缴获三万多枪支等等的伟大胜利以后，继续不断的得了许多胜利，近日又复占了安远、泰宁，占领了丰城、清流、归化，在执行“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大大的加强与扩大了红军。现在正动员一切武装力量与劳苦群众为冲破国民党的新的“围剿”，争取苏维埃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满洲海龙一带游击战争的发展，红三十二军的成立，同时二十六、二十九军仍旧活动着。这证明苏维埃运动，普及于全国，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形势。

在白区，革命运动迅速的高涨与发展着。工人的罢工浪潮普遍于各地和一切企业中。去年一年，据官场的统计，罢工工人共一百一十万以上，此外还有十八次的失业工人斗争，参加人数约十三万人以上。本年罢工斗争继续发展着。尤其是在四月间各业开始“减工”（例如纱厂改为四日工或三日工，约减百分之二十三，现在还继续减少）以后，工人斗争愈加剧烈。如上海、天津、汉口、无锡等地的纱厂工人罢厂、上海英美烟三厂的同盟罢工、闸北丝厂的同盟罢工、太古轮船的同盟罢工，平安路一千二百余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举行反帝代表大会等等，都证明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的高涨与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帝斗争不管国民党怎样残酷的镇压，仍旧是在生长。满洲的义勇军现在又积极活动着，与日本强盗及其傀儡血战肉搏。华北的劳苦群众、抗日义勇军，在我们党的影响与直接领导之下正在准备与进行反日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对国民党的出卖。这个斗争的发展，将日益走上创造北方苏区的道路上。此外，农民、灾民、饥民等的抢粮、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租、抗债，以至于游击战争，为土地的斗争，遍于全国。少数民族的斗争也正在发展，如新疆回民接二连三的反对国民党及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广西苗民反对国民党的大暴动等等，就是最显明的事实。

这样一来，中国显然是处于战争和革命的环境中。由这个环境便产生我们党的如下的基本任务："（一）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之独立与统一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二）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三）为推翻国民党制度而斗争；（四）坚决的采取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组织，并夺取在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的路线；（五）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要提出并进行成立农民委员会，抗捐抗税并拒绝政府的一切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民众政府的口号；（六）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苏维埃区域的成功，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国际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情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的决议）。将近一年的事变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给我们党的任务的正确。只有执行这些任务，才能使我们党领导革命到胜利上去。某个组织是否真正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栈，也就要看它是否执行上述的任务。

如果从上述的任务出发来检查湘鄂西党在最近一年来的工作，那末，我们不能不指出，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战线是被敌人冲破了；湘鄂西苏区旧有的根据地——洪湖苏区，已经敌人占据了；我们的红军被压而退出了原有的根据地，在这里，我们的力量都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总而言之，在四次"围剿"

中我们在湘鄂西的确是失败了。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使这少数反革命分子能在急危的时候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恐惧等分子，取得他们的声援，而支配广大的部分。当然改组派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起了莫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占据重要职位，正因为我们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破他们的阴谋与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末改组派显然不能给我们这样大的害处，如湘鄂西已经遭受了的一样。

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于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后面还要提到），而且使人不能正确的了解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我们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掩盖起来。我们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敌人力量占绝大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关于敌人力量在进攻湘鄂西时所占的优势，你们知道很清楚，无须证明。现在我们把湘鄂西党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几个重大的错误指出来，这些错误就是：

（一）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四次“围剿”中的任务，首先没有动员一切力量去冲破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进攻。无论群众如何热烈的拥护红军（如送饭、送肉、送鱼、送草鞋等），但是我们没有尽量吸引群众去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有许多不

是自愿的（如经过大会选举）以致有许多逃跑的现象，甚至党员群众也不愿参加红军，使红军没有扩大与加强。没有好好的发动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去帮助红军作战，游击队在许多情形之下，由于平日没有政治工作与脱离群众，在敌人进攻中（如在洪湖）完全失了作用。没有发动与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去配合红军的行动，有些地方（如天潜苏区）当群众勇敢与敌人作战，赶走毛匪时，而党内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便逃之夭夭，他们说："群众如此积极，若他们反水起来，我们还能跑得出来吗?"至于白军中的工作，在白区中心城市的工作，几乎是忽视的，像武汉、沙市、新堤、岳州这些中心城市中没有进行工作，不去领导自发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战胜数量上远胜我们的敌人，自然是不可能的。

（二）我们没有集中红军的主力去打击敌人，往往把我们的力量分散，使敌人更容易压迫我们。虽然在作战时对于牵制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或打击敌人的援兵，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任务，可由游击队、地方武装去执行，而不应由红军主力分散去做。然而，正因为我们的游击队的薄弱和不起作用，使得红军孤军作战，有时甚至被人的游击战术所牵制与骚扰。

（三）只知依靠红四军，没有独立的行动。不在准备与发动自己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围剿"的基础上去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一致行动，而是事事依红四军为转移，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出洪湖，跟着红四军乱跑，转战千里。退出洪湖之后，企图渡过襄北，没有成功，又向东北，然后往西北，又不成功，则到河南，复至陕西，再到湖北，由湖北又到四川，最后又回襄河，只在本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了现在的根据地。在这个长途行

军中弄得战士精疲力竭，丧失斗志与战斗力，有的遇敌人不抵抗乱跑，沿途抛弃枪械子弹，有的因为渡河无船，淹死水中，有的因为路途不熟被敌人截击（如在河南失了八百余枪支），诸如此类等等。自此以后，我们的红军主力受了莫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其说是被人解决，不如说我们“自取其咎”。

（四）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这样脱离群众，放弃反对“围剿”的任务而孤独进行的肃反，自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湘鄂西苏区在四次“围剿”中遭了失败。对于这个教训是湘鄂西每个同志所应当深切了解的。但是，据我们所有的材料，你们还是继续着上述的错误，因此造成你们现在许多极严重的现象。自从退出洪湖以后，在几乎一年的过程中，除了长途行军以及今年春天与敌人在鹤峰一带作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积极行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去准备我们的力量，去打击敌人，扩大我们的地域与力量。红军没有扩大，地方武装异常薄弱，虽然当地群众大半是贫农热烈拥护红军。苏维埃的负责人不是选举而是指定的。对于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对于发展生产，强固苏维埃的财政与经济基础等等工作，我们无从看见。对于地主豪绅的武装，采取自由主义，不去解除他们，让他们畏缩的逃到山中。对于群众的组织，异常忽视，首先是没有工会和雇农工会，甚至由于不相信群众，把许多群众组织都解散了。尤其是无理由的怀疑一切党员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定出了关门主义的党章（过去一人介绍的不要，要重新登记，须有二三个好的干部的介绍，才能成为党员），

这是莫大的错误，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现在陷于无党的状态。由于过分估计反革命派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认为“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是何等错误的。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和训练非常缺乏，借口党校过去办得不好就不办了，党报和群众报也没有出版，不敢大胆的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规定不正确的提拔干部的手续（过去保卫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种现象，那末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吓。

我们指出这些现象，不是把湘鄂西情形看作没有希望，使我们消极、悲观，绝对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甚至在任何困难之下都相信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会终竟得到胜利，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稳定性、胜利的信心动员群众，来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打击一切失败情绪，悲观失望的情绪。何况现在湘鄂西又有顺利的条件，有许多可能去争取我们的胜利。虽然你们的根据地现在处于偏僻之地，我们的力量此以前大大的削弱了，但是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各地苏区与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首先是邻近你们的红四军的伟大胜利，钟荆游击队的活动，洪湖还有我们不少的力量，在你们内部的敌人力量之薄弱，你们占有数县的区域，保持了二军团一大部分的主力，得有十万群众直接的拥护与依靠，土地革命的胜利，肃反告一段落等等，给你们有种种为往前发展与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顺利条件，你们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条

件，坚决的采取与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现在正是你们扩大领土与增强力量的最好时机。

从对你们的现状之正确的估计中，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执行如下的迫切任务：

（一）动员一切力量为巩固现在的根据地而斗争，立即纠正过去一切错误，抛弃旧的路线而采取努力准备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和扩大我们的领土的政策。我们不能把红军主力放在苏区不动或只是起了游击队的作用。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集中主力，去向敌人进攻。应当加强地方武装与游击队来巩固现在的苏区。我们提醒你们，目前回洪湖的企图，是过早的。长江附近的敌人在目前比你们强大多了，而且洪湖今年完全可能遭受极大的水灾。你们决定要向湖南发展，也是不适宜的，这里比现在的根据地更贫瘠，而且更难与其他苏区取得联络。我们应当向有利的方向扩大我们的领土。现在我们认为你们向川南发展比较有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在四川除了北部有苏区外，南方还有游击运动与巨大的农民运动。我们不想对你们用全副力量向这方面进军，但是，我们认为可向这方面扩大我们的领土。同时你们应当派人到旧苏区去恢复工作，去领导现在的力量及其斗争。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红二军团不但没有像其他红军那样扩大，而且数量上减少三四倍，这是事实。我们以为这不仅由于军事的因素，而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政治的弱点。主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去参加红军，没有把武装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没有广泛的武装农民，使成为游击队、地方武装，以已有的比较原始的武器武装起来，而是依靠枪支。如果红二军团要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真正的因

素，那末，必须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坚决的解除豪绅地主武装，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中去获得武装，以广泛的宣传，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的方法，号召与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加强红军中与一切武装组织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保存红军英勇的革命传统，粉碎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与扩大苏维埃领土，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

（三）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的选举，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吸引群众来做苏维埃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帮助与参加之下来改造苏维埃政府。我们绝对不允许那种减弱苏维埃政权的威信的“宣布苏维埃的罪恶”。苏维埃的威信必须提高，必须在吸引群众做苏维埃工作和引导他们来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去提高起来。苏维埃应当坚决的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令，首先是土地法、劳动法。采取一切办法去提高与扩大苏区内的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不能因为反革命派拿食大米做欺骗，就忽视这一问题。这里必须注意到能使农民群众减低生产兴趣的办法，如多次分配土地。据你们的报告，你们的土地分配了四五次，这种办法应当尽量避免的。保证与白区的贸易，供给苏区民众日用必需品，现在敌人还没有封锁，但是你们必须注意这种可能的危险，设法打破对外贸易上的困难。实行累进税与土地税，加强苏维埃的财政工作。用一切方法准备红军给养，“到一处吃一处”的办法，是不经常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巩固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四）加紧群众工作，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建立一切群众的组织。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你们没有给我们报告，我们

所能知道的就是你们只有贫农团，但是它的活动情形，我们不晓得。至于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工会、雇农工会都是没有。其他的群众组织，如反帝团体、互济会、合作社、文化团体，是否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转变，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政治与经济斗争，立即把上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和积极活动起来，以此来巩固苏区和扩大我们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我们的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我们的阶级敌人，才能解决摆在你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五）经常注意肃反工作，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你们虽然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必然会加强。他们将仍旧企图用种种方法钻入我们的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和阴谋。因此肃反工作仍然不能忽视的。在这个工作，首先要消灭过去对反革命派过分估计的错误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应当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采取分化策略。第二，把肃清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与肃清地主豪绅的斗争联系起来，不要孤立的去做这一工作。第三，组织政治保卫队，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建立司法系统。第四，进行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在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六）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你们不但不注意如何去扩大我们党的组织，反而把整个党都解散了，甚至否认一切过去的党员，不分皂白，须重新入党，且须经过干部的介绍，这是莫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干部的提拔也须经过保卫局的审查，这又是不正确的。你们以

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改造党和肃清一切异己分子，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关门主义和过分估计敌人力量的错误表现。我们认为改造党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像你们所采取的那种方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党的方法，就在于开展反对一切倾向和机会主义，首先是反对悲观、失望，与害怕群众等等的错误作斗争，为执行正确的党的路线而斗争，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大胆的对先进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开门，勇敢的提拔在革命战斗中考察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坚决改善党的成分，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对于党员群众的教育，加强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在宣传鼓动中必须细心的注意到民众的社会成分。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应该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工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这一路线又必须在党报的名称与内容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的党报的名称，与其用“无产者”（在工业区这是非常之好），不如用“斧头镰刀”或“工农报”，这样的名称能发动工人与农民。我们的报纸同时要处理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利益。你们必须把党报立即出版。各种的党的教育网，如党校、训练班、列宁小组等等，要用一切方法建立起来。

（七）立即开始关于苏维埃第二次之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节，在中央苏区举行第二次苏大会。你们应当现在就开始这个选举运动，选出你们的出席代表，保证代表在十月间到上海转送中区。你们必须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广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动群众参加选举，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讨论与检查苏维埃的过去的工作，使这个运动成为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我们应当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群众解释二年来中国苏

维埃运动的成功与经验，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的内容与进行状况，唤起他们来执行我们的任务，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杨光华。

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与严重，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继续发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惊人的生长与扩大，使中国的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紧张与尖锐化起来。最近一时期的许多事实，确切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的估计之完全正确。我们正处在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中间，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了一个急剧的转变的关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三个主要的因素与柱石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支流是猛烈的增长着。这是：

（甲）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终结的基础上产生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是以全力在进行着。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的援助之下，开始了并继续的以全力来扩大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满洲、热河以及河北北部的并吞（这是帝国主义东方宪兵造成在东方的反苏联根据地之重要的步骤），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心，他的强盗的血手向着内蒙古与外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四期。

蒙人民共和国伸张着；英法同样是实际的占领了西藏、西康与云南、贵州；美帝国主义者正在锐利的注意着他自己剥夺中国民众的“权利”。同时为着缓和自己内部冲突和竞争，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造成统一战线来瓜分与共管中国（李顿报告书、国际联盟下技术协助中国调剂委员会之设立等）。五分之一的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之下，整个中国在殖民地奴隶命运的威胁前面。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与出卖，非但不能缓和民族危机与帝国主义侵掠的野心，相反的只有更加刺激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强盗掠夺的贪欲。但是日本的军事侵掠、民族压迫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风暴般的反帝斗争的高涨（满洲、热河、河北的游击战争，反日罢工、示威、抵货与航空救国等等），虽然他在各个地域中间发展的程度还带着明显的不平衡的性质与由于我们工作的错误与弱点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但是，无疑的运动是在更扩大与深入，更多的带着群众性质，而成为丰富的革命源泉，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有力的支流。

（乙）经济崩溃的大踏步的前进，工业首先是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轻工业的倒闭与减工（丝厂的全部停业，纱厂减百分之五十，面粉、树胶等工厂生产量半数以上的锐减等），对外贸易的惨落（入口减百分之三十，出口减百分之四十八，而入超反增百分之六点二），农业中整个部门的毁灭（如育蚕、茶叶等）与全般的衰退，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创痛未复，新的普遍全国的水灾又发生了，这结果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产业工人是被抛弃在工厂门外，工人生活状况之恶化、农民的破产赤贫化与成千成万民众的饥饿，达到空前的程度。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官僚机关之

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是继续的增长着（顽强的罢工斗争、失业的斗争、示威、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

（丙）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军事技术的提高、政治觉悟的坚定、苏区及国民党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的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与完全的粉碎了！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不但巩固着自己原有的阵地，而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将苏维埃运动的种子与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满洲及西北的陕、甘、晋）。红军主力非但没有遭受到损失，相反地在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中增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敌人的十几师的军队是覆没了，敌人的全部计划粉碎了，这是中国革命史新的光荣的一页。这种伟大的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形势急速的开展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的开始，是在上海工人与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保卫上海斗争被国民党出卖与镇压之后，他的进行继续了差不多一年，他的最后的结束是在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之后。紧接着东黄陂惨败之后，蒋介石曾经几次企图依据他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是这一切企图都是失败了，使着蒋介石不能不暂时的改变积极的进攻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础上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期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总结四次“围剿”这一时期的经验，无疑的我们是得到极大的胜利与成功，苏区是巩固与扩大了，全国红军有一倍左右的数量上的增加，红军的战斗力是大大的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是更进一步的巩固

了，他对于全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我们党的工作亦有了进步，党的政治影响是极大开展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及本身的组织力量是增强了。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民众看，苏维埃革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民众革命，有着强固与不可克服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惨败。更使他们了解，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因此，推动着广大的群众更进的革命化，并使中国存在着的革命形势有进一步的开展。当然，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间，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这是主要的表现在我们没有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起来，提他到更高的阶段，把他们与工农红军胜利的战斗配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一方面我们还不善于依据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广大的群众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个别的地方，常常以上层勾结代替了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因此妨害着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在工厂与企业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薄弱与缺乏经常的持续性，与广大的无组织的以及在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几乎完全隔离的状态还没有能够克服，领导反抗资本进攻的罢工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还非常的不够，战略与战术许多屡次重复着的错误（日常斗争的轻视、下层统一战线之不了解、隔离反革命派不足及盲动主义倾向等）还存在着，这就使我们不能够把比较初步的广大群众的运动发展成为较高阶段的斗争——政治总罢工以及其他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形态。党还没有能够最迅速的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揭露改良主义派别的面目，把他们和群众隔绝起来。士兵中的工作不管士兵不满的增涨，我们的工作还是极端薄弱。在军事方面，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

中，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的集中的军事领导，因而不能够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配合的遂行战斗任务。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战略与战术方面的机动与活泼性还很差。红军后备军的组成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在苏维埃方面，中央政府还缺乏对各省苏的集中的领导，对于苏区经济上必须的建设以保证我们军事的胜利，仅在开始。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党的发展及领导方式之布尔什维克化，还只有初步的改善。所有这些弱点就妨害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三）革命形势更进的尖锐化，使得解决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的或者帝国主义的出路问题极端的尖锐起来。在中国前面放着绝对的问题，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他完全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计划，而国民党忠实的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他们清除道路。在这整个的计划之中，新的大规模的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在四次“围剿”粉碎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了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最卑鄙无耻的公开出卖华北，签订了极端污辱中国民族的华北停战协定，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赞助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宋子文的周游欧美，以出卖中国的各种权利为条件取得了美国的二万万元的棉麦借款、英国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以及许多其他的密不宣布的秘密借款。同时国民党召集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与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总结了他们在四次“围剿”中失败

的经验，并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组织军官团，重新训练自己的军官，调遣新的大批的部队入赣，招收与训练新的十五师军队，用一切收买与利诱的方法，团结反革命的各派军阀，一致的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以严酷的白色恐怖、非人的拷打、监狱、屠杀与暗杀镇压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革命运动，同时更以武断的欺骗宣传，愚弄与麻醉群众。阶级敌人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围剿”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在这次“围剿”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更加增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最凶恶的步骤，它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四）冷静的估计目前形势的时候，应该指出：四次“围剿”的粉碎，革命形势之新的紧张化，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一天的削弱。财政上的困难随着广大地区之丧失及国民经济之崩溃而日益增长，大批外债的借入将给国民经济的破产及今后财政上的困难以新的激励。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更加促进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忿恨，揭露了国民党的无耻民族武断宣传。由于屡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不仅广大士兵群众不满意及不愿和红军作战的情绪增涨了，而且中下级军官的惧怕红军的心理是普遍在国民党的部队中生长起来。反帝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不管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如何严厉，是在蓬

勃的增长着。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军阀混战的爆发虽是暂时阻滞着，然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国民党统治的急剧崩溃，这种削弱是将要随着我们的新的胜利与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这个胜利将更大的扩大联络各个苏区与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将根本击破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而使我们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冲突成为必不可免的前途。正因为这样，所以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要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苏维埃的出路，那我们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

（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认为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甲）苏区的党的组织

一、必须立即战斗的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广大的解释阶级敌人新的进攻的形势，及我们有充分的条件粉碎这个进攻，号召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二、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完成中革军委会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继续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自觉的阶级的纪律与政治觉悟，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的现成的后备军，在

军事机关第一声号召之下，立即加入红军，这是从实际上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步骤。

三、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与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四、红军各部之间必须在整个的战略意志之下，遂行战斗的任务。中革军委应集中与加强对于各个苏区工农红军的领导，以保证更好的互相呼应与行动的配合。

五、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央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来加强自己对于各个苏区的领导作用，并采用各种具体的方法来组织与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群众的革命斗争，最大限度的开展与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经过查田运动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地主的残余，削弱富农的力量，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和活动。同时在查田运动中必须以最大注意去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加紧开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严厉的与一切忽视工人日常利益的倾向斗争，这样去加强工人在苏维埃及红军中的领导，在这个基础上采用广大的民主主义及自我批评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六、为着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及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合作社运动之开展，是这个战线上的主要的一环。秋收与食粮收集储藏运动同样是目前战斗的任务，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党必须与借口战争不管一切经济上的建设，或者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任务，忽视战争动员的倾向斗争。

七、党必须加强在附近苏区白区中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军阀的压迫、苛捐什税、地主的榨取，提出具体的口号以开展群众斗争，吸引到更高的阶段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注意力应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乙）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一、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苏区的广大的煽动，指出这个进攻与国民党的出卖中国的政策和资本进攻是不可分离的。号召与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游行、集会与群众会议，在码头与运输工人中组织警备委员会，阻止一切进攻苏区的军火的运输，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在“集中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收复失地”的口号之下，反对调兵入赣。提高每个群众的斗争，使它和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进攻联结起来。

二、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及致满洲省委的信，大胆的广泛的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可能的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可能。应利用反帝非战同盟代表会的举行来开展反帝的斗争，必须利用每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的事实，进行广泛群众鼓动，揭破国民党一切的武断宣传。党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去争取我们对于满洲及河北的游击运动的领导，必须尽量的在群众中，在反帝的宣传鼓动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的兄弟联盟”的口号。

三、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坚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

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

四、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了日常利益而斗争，从领导他们的斗争中，使他们参加到斗争中来，引导他们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走向为了苏维埃的中国的出路而斗争的道路。

对于灾民、难民的工作，因今年的新的水灾的形成，也特别占到了重要的位置。对于各地发展着的游击战争，党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去领导与组织，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在士兵群众中，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个别士兵的拖枪逃走，而是在士兵中进行领导他们日常的斗争，组织士兵到士兵委员会或反日会中，组织大批的士兵的暴动与哗变，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在国民经济总崩溃、水旱灾荒日益发展的情形之下，党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同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任务是丝毫不能分开的。

（丙）但是要完成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扩大与巩固我们的党——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开展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与罗明路线的思想斗争，把一切对于党的战斗任务消极、怠工或感觉到疲倦的分子驱逐出去，吸收大批的新的工人干部到党内来，教育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党必须用耐心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使全体党员同志了解目前五次“围剿”的形势与我们党所负担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提高他们最大限度的积极性，转变一切党内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依靠在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力量上来坚决执行共产国际与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克服一切我们在发展中的与胜利中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够击破帝国主

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而且能够取得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秦　邦　宪

同志们！当着我们来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剧烈发展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尖锐化、激烈化的时期。我们处在最负责的历史转变的紧急关头上，我们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

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经济总溃崩，加上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的发展起来。这个革命形势更进的发展，已经进到了中国向哪里去的斗争的最尖锐的关头。现在在中国面前放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企图经过国民党而实现的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跳出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苏维埃的道路。或者是贫困的被压迫的奴隶的殖民地中国，或者是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中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把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确立独立自由

* 这是秦邦宪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红色中华》。

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是放在我们党面前的最负责的光荣的任务，而历史给我们解决这个任务是很短促的了。

一、中国革命形势的尖锐化与四次“围剿”的击破

中国革命形势的增长是依据着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在继续的尖锐化。中国革命有三个主要的支流，汇合起来而造成了今天日益增长着的革命形势，引导到中国劳苦群众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总目标。这便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痼与团集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的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涨。在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终结的基础上，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他的强盗武力侵略。从“九一八”以来，经过锦州的攻取、哈尔滨的占领、上海的战争、山海关的攫取、热河进兵与华北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扩大其侵略中国的强盗战争。直到现在为止，被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的中国领土有四百万方里，统有六千余万的居民，包括四个半省份，就面积来说，超过我们中央苏区十余倍；就人口数目来说，超过我们中央苏区二十倍。在这样一个短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成功”，却不能不感谢国民党一贯的投降卖国政策。大家知道，国民党将军的不抵抗主义，在一个晚上断送了整个东三省。以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国民党的军阀政客们曾经屡次的改变了他们的口调，从“不抵抗”与“逆来顺受”而“长期抵抗”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最后则公开下令“如敢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签订最污辱的奴役中国的华北停战协定及密约。这个密约据广东军阀所揭露的有以下的内容：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于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于中国察绥两省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友好的提携及内战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须于中国方面认为可能时始得协定，中满国界之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始会同明确划定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协定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协定成立之翌日实行之。

这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所大声疾呼“不涉政治”、“不屈服”、“无条件”的协定的幕后的真相，现在每一个人都会了解这是最耻辱的卖国条约。断送中国莫大的领土、主权、独立与整个民族利益的投降协定——这是国民党加于中国民众身上的新的锁链，不粉碎这个锁链，中国民众将永远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只有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协定订立的次日便代表全国民众否认这个协定，并号召全国民众为粉碎这个新的锁链而斗争。

但是国民党的这种无耻的投降，却不能使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因此稍为减弱他的野心，相反地只有更激励他们的贪欲。日本正在企图将他的肮脏的手伸到内蒙古，正在冯玉祥的勾引之下，向察哈尔内蒙进攻。长城以北六千万的居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炮火之下，殖民地的命运在全中国民众的面前威胁着。

不仅是日本，国际帝国主义都积极的企图瓜分中国。英法

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的赞助者。而且英国实际已占领西藏，经过喇嘛来进兵西康。法国实际上统治了云南、贵州。美帝国主义者同样地是锐利地在注意着他们剥削中国民众的“权益”，及造成他的势力范围。同时为着缓和他们自己在瓜分中国问题周围的矛盾与冲突，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实行与扩大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国际共管。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所说的“依据孙中山博士之提议，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便是这种企图。最近国际联盟——这个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机关，新设立了一个“对华技术合作调协委员会”，就是实现与扩大对华国际共管的具体步骤，就是策划如何瓜分中国共管中国，在加紧剥削和奴役中国劳苦群众中，使他们中间的利益能够调协的机关。

国民党政府对于这种帝国主义对华国际共管的政策，大家知道他是采用欢迎与拥护的态度。国民党事先参加了李顿报告的制定，事后恭维李顿报告之公正，并认为可以作谈判的基础。尤其显著的是宋子文在最近世界经济会议上的演说，这演说是“野鸡拉客”式的欢迎国际共管。他说：

“中国地位已如此，今后将何如乎？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提高，如吾人所欲为者，则其购买力不独可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想世界的政治才能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的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也……但吾人不愿采取亚细亚门罗主义，吾人且将反对国家与地方之孤立……吾人欢迎西方之技术与资本，并愿维持不阻止外货入境之理财政策……”。

这里，公开拍卖中国，卑辞屈膝的欢迎国际共管，是最清

楚没有的了。事实放在面前，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清道夫、尖兵。

在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下面，在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卖国政策下面，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直接受着殖民地化的奴隶化的威胁。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虽然得到国民党的拥护，但是千百万的劳苦群众和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反抗国民党的投降路线。在一天天增加的民族危机之前，中国工农群众反帝斗争一天天的开展，成为中国今天的直接革命形势主要标志和因素。在满洲、在河北反日的义勇军游击运动是广泛的开展着，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在赤色的苏维埃旗帜之下。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占领满洲，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非十年时间十万大兵不能压服满洲民众的反抗。除义勇军、大刀队……的流血的武装斗争之外，可以看到其他的各种反帝的斗争方式，如像日本企业中的工人罢工、反日的示威游行以及广大的发展在各城市各区域的抵货运动，都在白区开展着。在这一反帝斗争中间，包括有各个阶层的分子，他们的要求也各有差别，在各个区域与省份之间还带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质，但是都更明显的走向日益革命化的道路，这给我们以极大的可能组织群众的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他到更高的阶段上去。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据苏维埃和红军的发展，加上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广泛的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树立和巩固在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将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源泉，成为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支流。

第二，全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继续发展与深入，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中国国民经济进到总崩溃的破产道路，全

国的工农劳苦群众陷于失业、失地、饥饿、冻死、饿死。这个总崩溃的情况，即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臣仆亦不能掩饰的了。譬如中国银行，以如下的悲惨暗淡的词句开始了他的一九三二年的报告：

“民国二十一年，遭民国以来未曾见之国难，无异积弱之身忽染时疫，百病齐发。政治则举国皇皇几无一日之安定，社会则农村衰落几至全国人民沦于失业，经济则旧式商业组织奄奄待毙，几次第崩溃，金融则资金集中都市，内地血脉完全停滞。”

更仔细来观察这个经济总崩溃的形势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的图画：

甲、民族工业的关厂、倒闭、减工与生产量之锐减　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工业、重工业是非常的薄弱而且几乎全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是轻工业：首先是纺织与缫丝。在纱厂方面在去年似乎是锭子数量在表面上有些增加，而纱的销路却大大的减少，上海七十一家纱号去年倒闭者共十七家。今年则纱厂一般的减少了生产量。今年四月间，中国纱厂决定取消星期六的夜工及星期日的工作，名义上是一个月的暂时的办法，而直到现在上海二十八家纱厂之中还有十七家继续减工，棉织业则在一九三二年减少了生产量的五分之一。丝厂则在完全破产的状况中，上海九十七家丝厂去年开工的仅十一家，今年仅十家；无锡四十七家开工者仅九家；丝织厂上海共五百六十七家，去年开工者仅半数，生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机器制造业去年减少生产百分之三十。近年来比较发达的化装品工业，去年营业亦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是一幅民族工业衰退破产的悲惨图画的轮廓。

乙、对外贸易的急剧的减少　去年进口货总值十万四千九

百二十四万两多，比前年之十四万三千三百四十八万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出口去年为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四万两，较前年之九万零九百四十七万减少百分之四十五点八；进出口总计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而入超反增加百分之六点二。

丙、农村经济中几个特殊部门的毁灭与一般的崩溃　丝茶是中国特殊产品的重要部门。拿去年来说，主要产丝茧的江浙两省的生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在价格总值方面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江浙的桑田现在是毁灭了，改种了别的产品。茶叶历年来亦早在衰败之中，去年茶叶出口又比前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米麦等主要产品虽去年未受灾荒，但因为洋麦洋米的倾销，使得价格大跌，更陷农民于破产的境地。今年则新的大水灾普遍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了，前年水灾的创痕未复，今年新的水灾又将使崩溃中的农村经济更加速其过程。

这种经济破产的结果，使工人和农民生活日趋恶化。广大的群众失业，现在有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产业工人是失业者。正因为广大的农村经济的破产，大量的农民跑到城市找工做，在城市流浪着。资本更利用这些产业后备军，残酷的向工人的生活水平进攻，一二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要减少三分之一。这还是名义上的工资，而实际工资则减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作时间却延长了，特别是工作的强度是增加了。譬如一个城市女工，她从前管理四个布机，现在就要管二十四个布机，甚至还要更多些。座中有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布厂中做过工的同志，将会发问：一个人如何能够管理这么许多？但是事实如此——一个女工需要管三十个布机，工作强度是大大的增加。工厂的卫生设备非常的简陋，如上海正泰橡皮厂，是经过国民党调查，而认为所谓“设备最安全与满意”的工厂，但是在国民党检查不及一星期之后，汽锅炸裂，使二百余男女工人

葬身火窟。农民生活的恶化，更不必说的了。军阀混战、地主的抽剥、苛捐杂税、谷价惨落、水旱灾荒、强迫修马路、禁止食盐自由使用等，给农民无限痛苦。至于东三省热河和河北北部的整个农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和大炮之下毁灭，千百万的农民在生死不得的地狱中挣扎着。在这种帝国主义、国民党贪狠的掠夺与剥削之下，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担负着经济浩劫所生的全部重担，使他们不能不在饿死与反抗中选择出路。更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的增长，吸引着最广大的千百万工农群众卷入汹涌的反攻资本进攻与地主国民党官僚机关的残酷的掠夺。最近时期中，白区农民抗捐暴动、游击战争的继续爆发，其范围与区域的广大、群众性质的显明、农民斗争之坚决与勇敢，逐渐的更走向争取土地，实行摧毁封建势力统治的土地革命，这些，同志们可以从“红中”九十三期的特约工农通讯中看到，不再多说。至于工人阶级的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是日益发展着，去年全国比较大的斗争如太古轮船公司罢工、津浦路济国罢工人数达一百十万以上，最近时期中南六厂的罢工[1]，京沪、沪杭两路员工加薪的斗争，北平电车工人的罢工，天津、武汉纱厂工人的斗争，风涌于上海橡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等等。虽然斗争还大部分是经济的性质，但政治要求更加明显，斗争的特殊的顽强性，常常一厂罢工转为整个企业的同盟罢工，党在罢工运动的领导作用的加强，都是明显的事实。我们领导还薄弱，因而不能将他发展成为更高阶段的斗争——政治总罢工。工农斗争是汹涌的开展，这是革命形势中的强有力的支流。

第三，红军惊人的生长与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完全粉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非但不以一卒一兵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不管苏维

埃政府与红军屡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军队订立战斗协定，而国民党集中其全国的兵力向苏区作第四次绝望的进攻。

从去年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开始进行对苏维埃和红军的四次“围剿”，而东黄陂的战役的伟大胜利把他完全与彻底粉碎了。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间，我们获得了极端伟大的胜利：消灭了敌人的十几师基本主力部队，创造了四川、湘鄂川边的新苏区。在最初，敌人以十倍于我们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进攻，加上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上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不能不离开鄂豫皖苏区，作有名的几千里的行军。从皖西北通过京汉路、豫边、陕鄂边到四川，几千里的行军，这种行军只有工农的阶级的武装才能做得到。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的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几十以至几百万劳苦群众的爱戴，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白军士兵哗变加入红军，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就在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和配合中形成。他把苏维埃运动散布到北方和西北——这些大革命时代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当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的时候，川西工农组织了十九县的抗捐大同盟，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响应红军。到现在离成都四十里的地方都有红军活动，四川军阀极端恐慌。蒋介石委刘湘为“剿共”总司令，团结起四川军阀来对付四方面军。为什么？因为红军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五六县的根据地，由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使四川军阀发抖起来。至于红二军团现在不仅恢复了洪湖的根据地，并将主力移向川鄂湘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四方面军的活动互相呼应。国民党老早就造谣贺龙同志领导下的红军没有了，最近却惊呼贺龙部队的化零为整集中有三四万人了。鄂豫皖苏区自从四方面军离开以后，国民党就在纸上口头上宣传鄂豫皖苏区没有了，但是根据最近

消息，不但鄂豫皖苏区保持了旧有的区域，而且取得了发展。红二十四军、二十八军在商城光山一带与白军宋天方、戴民权部激战，戴部损失过半。同时皖西六安一带的红军，已开到商城与红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会合，预计最近期间内可攻下新集金家寨，与鄂东之二十五军打成一片，向七里坪河口进攻，包围黄安，恢复鄂豫皖苏区旧的据点（上海工农电讯）。四方面军离开后，创造了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三个军，整理和恢复自己力量向敌人反攻。中央苏区的红军，在这时期中，消灭了敌人五六个师以上的实力，仅仅在东黄陂战役，消灭了敌人四师兵力，覆灭了中路军的最强的纵队，使敌人的四次“围剿”完全遭到惨败。国民党对自己的惨败也不能在群众面前隐瞒起来，不得不公开的承认是受了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作出“隐痛实深”的哀鸣。虽然在东黄陂战役之后，蒋介石曾经企图在四次“围剿”的旧有基础上作新的反攻，然而这个企图，没有能够实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开展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

这是造成今天中国革命形势的三个主要的柱石。依据这些事实，所以我们确切的断言，全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在继续的增长，我们正逼临着新的大革命风暴。

二、四次“围剿”的总结

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着敌人今天疯狂般的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问我们依据着什么基础击破了四次“围剿”？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英勇的工农红军依靠着冲破三次“围剿”的经验，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一般的提高了军事技术与政治自觉。假如在一年、一年半以前我们的红军还仅仅从游击队变成正规红军的开始，那么在四次“围剿”之中，我们已经锻炼红军走上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游击队的习气是逐渐克服了。靠个人天才的作战指挥，已经变成了采用全世界新的战略与战术的指挥。强健的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坚固的共产党的骨干都在军队中建立了起来，新的部队有大量的增加——尤其是在今年五月及以后一个短时期中，这是我们所以能够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在阶级敌人疯狂般进攻面前，苏区劳苦群众为着保卫苏维埃政权，为保卫土地革命，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热烈的自愿的加入红军，赤少队的模范队整营整团整师的加入了红军，愿意以自己生命为苏维埃政权流最后一滴血。在经济战线上，党依靠着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了今年春季的粮食困难，二十万担的借谷运动得到了伟大的成功。《红色中华》退还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号召，在短短四个月的时期内达到了五十余万元的成绩。这个群众的热忱在春耕夏耕秋收查田中都充分的表现了出来。这种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

第三，然而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不仅得到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正因为工农红军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民众武装，代表着全国劳苦群众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利益而斗争的武力，所以他们在与阶级

敌人的决战中，到处受到劳苦群众的热诚的拥护与爱戴。不必说，四方面军在远征中，在四川，是如何的到处得到了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最著名的如巴中的占领，由于四郊的农民暴动而夺城。不必说，上海工人是怎样的关心红军的每一个战役，以红军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尽量的用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如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征收“剿赤”捐而爆发了顽强的斗争。一个铜片捐助红军的运动，和购买飞机赠给红军的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获得很大的成绩。虽然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募捐买飞机的款子还没有完成购一架飞机的数目，但并不因而减少募捐的意义。其他购买西药军用品捐赠红军，赠送胜利的红旗制草鞋等等，上海的拥护红军运动成为一九三二年上海党最有成绩的群众运动之一。不必说我们方面军在南丰、南城、宜乐、新淦等区域中怎样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即使在离开我们较远的地方如满洲、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方，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亦是日益增长，譬如沈阳与长春的工人热烈的要求加入红军；譬如直南有一个数千人的农民大会通过了拥护苏维埃政府并要求援助的电报；譬如在北平黄色工会所召集的七百多人的各业工人的代表会与到会代表一致拒绝国民党工会官僚提出的组织“铲共义勇军”的提议，公开声言“共产党与苏维埃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应该去打他，枪口要朝外放”。这些都证明着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拥护苏维埃情绪的热烈，苏维埃与红军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之灯塔。

最后，我们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假如我们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的领导，假如我们执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我们便不能够获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正因为我们坚决的进行和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

争，才能够获得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是在残酷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中获得的。在这一个时期中，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不论在白区、在苏区都加强起来，党的政治影响大大的扩大了。在上海“九一八”和“一二八”及北平的征收运动中，党在组织上巩固亦得到了相当的成绩。在罢工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日益加强，党不顾一切困难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苏区的党在反对罗明路线中表现他的政治的坚决性，使那些罗明路线的英雄们成了没有军队的将军。党的工作方式亦开始向着活的具体的领导方面前进了。假如我们没有党的工作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那就不能获得这样的胜利——不论在战争方面，在经济战线上面。

自然，这决不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间已经没有错误弱点。错误与弱点显然的存在的，而且还不少。假如我们能够不做一些错误早就克服这些弱点，我们将有更大的成绩，更大的胜利。我们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以前指出的在粉碎四次“围剿”中争取几个大城市开始一省数省胜利。在军事战略上我们的错误与弱点是全国红军还不能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实行互相配合的牵制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极大的弱点。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当敌人向鄂豫皖苏区进攻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红军东攻漳州，南下南雄，没有能够最大的牵制进攻鄂豫皖的敌人的行动。而在东黄陂战役的时候，也没有取得各苏区互相配合，这是一。第二，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2]的游击队时，那我们的胜利一定更要比现在大得

多。不管白区农民斗争的高涨，我们还没有组织许多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再则我们技术上还是薄弱，在夺取敌人据点，冲陷敌人营寨中以及别的方面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技术没有进步，可是这种进步与今天的要求相比的时候，是万分的不够的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时刻准备与现代帝国主义武力直接作战。同时我们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一二三个月中，是在停滞的状况，假使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前完成了最近这个扩大红军的数目，那将可以得到更大的胜利。这是我们在军事上的经验和教训。

至于在政治方面，在其他工作方面，我们错误与弱点更大更多。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曾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与工农群众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日常斗争，提高他到更高的阶段，使他们能够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胜利汇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我们的重大的弱点是不善于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及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不是在反帝运动中拒绝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将一切还没有了解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出路与拥护苏维埃的分子都当做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走狗，那就在统一战线中放弃了对于同盟者严格的批评其动摇与不坚决，或者则以上层的勾结代替了下层的群众的统一战线，这都妨害了反帝运动的更进的开展与深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领导权的巩固。在组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中，我们还缺乏经常的坚持的有系统的工厂企业中的活动，给每一个资本进攻的企图以群众的反抗，轻视经济斗争的观念还在许多地方党部及工会的干部中存在着。在罢工斗争中一样的不善于与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无组织工人订立统一的战线，具体的每一步的揭露黄色领袖的罪恶，争取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之下，而发展斗争到更高的阶段。其次，如对改良主义的政

治派别的面貌揭发不足，因此没有使每个不满国民党的分子，迅速的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使他们和广大的群众完全隔离起来。最后，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没有很迅速的来克服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在江西是在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以后，才开始揭发和克服江西的罗明路线。

这便是在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

三、五次“围剿”——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定胜负的战争

上面已经讲过中国革命危机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因素，造成了今天的革命形势。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的统治者，他采用什么方法来应付今天的革命形势，争取革命形势中反革命的出路呢？很明显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尽量扩大其反对中国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扩大他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在贪狠的掠夺中国民众中来挽救其本国的经济危机。另外，为和缓他们本身的矛盾，企图采取共管的方式来统治中国，把中国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这两个政策是在同时并进，他们目的是一个，就是想从加重奴役压迫的枷锁在中国民众身上来挽救他们不可救药的危机。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之前投降、屈膝，帮助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殖民地化，替帝国主义的政策开辟道路。所以，我们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制造者，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国民党以无耻的出卖和血的屠杀替帝国主义争取殖民地化中国开辟道路，然而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使中国殖民地化

的政策时候，必须用极大的力量经过残酷的斗争，击败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与积极反抗之后，才有可能。因此他们将用最残酷的手段，企图把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是中国苏维埃红军放在血海里面。所以帝国主义正在指挥着国民党向我们作新的第五次的疯狂与绝望的进攻。五次“围剿”是国民党造成国际共管中国，帮助殖民地化中国的有力步骤，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是决定中国走向奴役的压迫的贫困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走向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道路的历史关头。

从东黄陂惨败之后，蒋介石了解了须要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力量来进行新的“围剿”的准备。这里，第一，必须以更大规模的更无耻的出卖中国来取得帝国主义更大的帮助。因为他深切地了解，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是不能进行五次“围剿”的。所以蒋介石在东黄陂战败后曾亲往北平，与日帝国主义谈判，经过黄郛的手签订了“五卅密约”，以出卖辽吉黑热四省，承认“满洲国”，划河北北部为中立区，担任镇压一切排日排满活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他“戡平内乱”。就是说，蒋介石把东三省华北拱手跪送给日本，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同时蒋介石派遣宋子文周游欧美，同样以卖国条约取得帝国主义军械、军火与金钱上的帮助。宋子文在美国和罗斯福谈判之后，借了五千万元美金，合中国大洋二万万元的棉麦借款。美国所付的借款并不是现金而是麦和棉花，在美国市场上停滞的过剩货品，经过国民党在中国的倾销，换得现金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宋子文又向英国借了五百万金镑购买军械，到意国和法西斯蒂首领莫索里尼这个混蛋签订条约，无疑的，这又是一个卖国的密约，虽然现在这些条约的内容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看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

议上的言论，也就容易的索隐的了。

其次，蒋介石正在整饬旧的部队，调动新的部队入赣，征募与训练新兵，重新训练军官，以准备对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进攻。五月初在庐山开会的五省“剿匪”将领会议，正是总结四次“围剿”的失败的一个会议。同时他进行了改编军制和重新训练以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为骨干的军官团，调动新的五六个师入赣，另外还准备训练十五个新的师，已经招募三万五千人在汉口、九江、归德大造兵营从事训练，用收买利诱种种的方法来团结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委任了北路、南路、西路的总指挥，使湘敌、粤敌开始更积极的进攻，何键到萍乡，粤敌的积极化都是这个总攻计划的步骤。

第三，为着将经济浩劫的全部重担转移到劳苦群众身上，为着进行五次“围剿”，国民党更加重对于工农群众的压迫剥削、白色恐怖与屠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苛捐杂税的名目繁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大晚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中的捐税名目共用一千七百五十六种，收税卡局共有八百九十四处。这已经是足以吓人的数目字了，可是实际上这还是不确的，减少了的数目字。譬如一个在张家口工作的同志在他的信上这样的告诉我们：“从张家口西头到桥东不过几里路，可是捐税局竟有八处之多。每一车子粮食从乡村运到城市来卖，这八个税局一共要收五元二角五分的捐税，而每车粮食不过值价四元。因此农民从乡村中将粮食运到城市中来卖，他必然的不仅得不到一个钱，而且要将车子、牛都卖了，来完清捐税才能回去。”仅仅几里路就有八处捐税局，那全国岂止八百多处？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阀还实行预征捐税，譬如川西的钱粮已经征收到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了（大公报）。在进行新的“围剿”中，国民党还要预征与增加各种税

项，还要帮助资本家向工人的生活水平继续进攻，这是国民党罪恶政策之组成部分。另外一方面，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凶焰简直把全国变成了监狱屠场。罢工工人、反帝战士、革命士兵、义勇军及暴动农民成千成万的被屠杀，首先是共产党员。统计今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屠杀的逮捕的我党的干部（仅仅是干部呵!）已经不止一二千的数目了，广大群众的被屠杀简直是无法统计的了。而且对于一切不满国民党的分子亦是采取这种残酷的手段，譬如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不久以前被蒋介石的暗杀队暗杀了。杨杏佛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离开共产主义与工农革命是很远的。他只因为不满国民党白色恐怖，主张最低限度的民权保障就被杀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亦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着暗杀的威胁。国民党企图将一切革命运动沉在血海中，以便进行五次“围剿”与忠实地做帝国主义之下的“甲必丹”!

阶级敌人是在拼命的有计划的准备新的大规模的大举进攻，这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共管中国计划是不可分离的。这是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决死关头，能够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才能够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四、我们有取得粉碎五次“围剿”胜利的一切条件

在敌人的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能不能够打胜仗？这是现在要说的。

机会主义者可以想：五次“围剿”是更加残酷的了，环绕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现在在五次“围剿”还未开始时，已经有五十个师八个旅一个团。即湖南西路总指挥何键有十师一

旅，北路总指挥刘峙有二十六师三旅，南路总指挥陈济棠包括十九路军在内，有十四师三旅一团。机会主义者想来，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有很大的军事力量，有很充足的战争经费，更多的军械，有飞机、毒气等新式现代武器，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只有失败，只有上山。机会主义者看来，我们不能打胜仗，也不敢打胜仗。

我们自然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但是国内战争的规律并不是在于军队数量多才能打胜仗，以少胜多却正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这正是机会主义者和蒋介石以至国民党的军事顾问所不懂得的。即就军事方面来说，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是充满着不满与革命情绪，士兵不愿意打苏维埃红军，要去东北抗日。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十九路军中有四个北上抗日团，从福建经过广州入湖南北上，在到湖南以后，华北协定已经签订了，蒋蔡[3]要他们回来福建进攻红军，在中途士兵大半逃跑，只存下一团多的实额，这是士兵用脚表决了要抗日反对进攻红军。又如从东黄陂战役到现在，在每次战役中白军的高级中级军官，多数都在阵线上被我们击毙了。当然我们军事技术的进步，射击力加强是原因之一，但是应该知道这亦由于白军士兵的动摇，使官长不得不在前线压迫士兵作战，白军官长不得不在火线上督师，给我们以击毙的更多可能。时常在战争中白军官长击毙后，士兵马上就派代表和我们接头加入红军，因此蒋介石特别要办一个一千人的军官团，武装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来分布在各军部队里，像苏联国内战争快要结束时期白党所采用的办法一样。这两个显著的事实证明了白军士兵充满着不满情绪与革命化，可惜我们在士兵群众的工作还是极端的薄弱，我们常常还只能够用“拖枪到红军中来”的一类呆板的口号，而

不善于去抓住群众的情绪，组织他们的斗争与哗变，组织他们要求北上抗日，不然，新的宁都兵暴与更大的士兵暴动的潮流是一定的早就发生了。

其次讲到军官，那这般东西真是蒋介石所说的“贪生怕死”之辈，他们一方面受着士兵革命化的压迫，另方面恐慌做张辉瓒、李明之继，大部分都害怕和红军作战，要求离开江西，使得蒋介石不能不发出“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何用自馁其气”及“如有再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的命令。这样陈诚只得喊：“目前一切都是黑暗，我们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这就是准备着不顾一切的去赴死”，就是说眼前只有死路一条。这也许可以算陈诚有自知之明罢！然而其悲观失望、茫无前途的情绪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再看抱着“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的蒋介石对于自己和苏维埃运动力量的估计是怎样，他在给陈诚的手书中说：

“寇深匪毒，将馁兵弱，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思之心痛，不寒而慄。”

把这死人的说法变成活人用的白话就是：

“苏维埃运动的深入，红军之英勇，国民党将军的懦弱害怕，士兵的动摇，使得国民党统治到了生死的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想起来就心痛，即使天不冷，也要发抖起来了！”

没落的阶级、没落的军阀，在澎湃汹涌的革命力量之前心痛发抖也不足为怪的。可是为什么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竟会在发抖的蒋介石面前发抖，这未免太难于索解了罢！

战地居民的态度对于战争有重大的关系，假如不能取得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民众对白军的仇恨，只从下面两个童谣便可以看出，福建的童谣是：“宁愿红军杀，不愿白军扎”。江西的童谣是：“红军打土豪，白军挖灶

脑”。这样痛恨白军的情绪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而红军则随时随地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至于在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方面，那么从报告的第一段中，已经可以知道，最近时期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动，这变动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苏维埃和红军的。革命形势的尖锐化，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天天削弱与崩溃，不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民党清道夫的面貌一天天在群众面前暴露，使群众对于卖国的国民党的愤恨愈是增长，而帝国主义的野心却由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而更增涨。财政的困难与国民经济的破产，虽有大批的借款无异于“饮鸩止渴”，棉麦倾销将使农村经济的崩溃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各派军阀间除了出卖中国，加紧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这二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之外，在别的问题上因为帝国主义主人的各异，因为各地政治经济上的发展的不平衡及军阀封建割据的状态，使各派军阀间的矛盾，没有法子调和，新的军阀混战是不可免的。

最后，国民党罪恶统治的结果、棉麦借款残酷的剥削、长江水灾的浩劫、工业破产、资本的进攻使工人农民失业失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这使工农斗争将燎原一般的燃烧起来，今年饥饿寒冷的冬天将是热烈的革命斗争的冬天。

而我们的力量和四次“围剿”时比较起来，不论哪一方面都有长大的进步，红军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战斗力极大的提高，群众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发扬。我们的力量大大的增加，敌人的力量却大大的削弱了，加上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继续冲破敌人新的五次“围剿”。我们有着一切力量战胜敌人，我们有粉碎五次“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切条件。

五、目前苏区党面前的紧急任务

同志们！新的五次“围剿”是在面前，比以前更剧烈残酷的战争逼临着，我们有着一切的条件取得这次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与确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但是这不是说，胜利是会自然的到来的，我们可以袖着双手坐观其成。不，在这个剧烈的战斗中间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发展的困难，假若我们不能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紧急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来为着争取苏维埃的出路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为克服我们发展中的困难而斗争，那我们便不能胜利。因之，在我们全党及每一个党员面前有着光荣与负责的任务，这任务总的说来，就是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提出来的六大任务，而最主要的便是：

（一）在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

（二）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进行坚苦的厂内活动，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反对资本的进攻。在这个基础上改善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的工会，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三）开展农村中的反对饥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地主的掠夺，争取土地的斗争，尽量给农民斗争以无产阶级的领导与组织性，开展游击战争。

（四）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反对反动政治，反对白色恐怖，保障苏区，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争取革命形势中苏维埃的出路。

在这个总任务之下苏区的党，每一个党员，要努力为着战争的胜利，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口号下，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参加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突击。

首先我们要更加紧张的扩大红军，组织新的师新的军团，在最短时期内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有人以为红军扩大了这么多了，用不着再扩大了，而且红军多了要增加我们的困难，要使我们忙得不得开交，希望红军不再扩大，以便休息一下。毫无疑问这种心理是完全不正确的。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任何疲倦的现象，都要不得的。我们必须依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近扩大红军的计划，完成在最短期间扩大八万至十万红军来庆祝第二次全苏大会。其次我们要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不但要在苏区周围组织挺进队深入白区游击，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使敌人腹背受敌，要记得游击队伍的积极活动，是主力红军在决战中获得胜利的要素之一。为着具体与切实的准备从志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那么扩大赤少队的组织，用一切力量，采取具体的方法去加强他们政治和军事的训练，如实行短时期的野营生活是十分迫切的了。如果我们过去从单个的扩大志愿兵后来动员整连整营到前方参战，经过长期的政治工作，争取队员全部加入红军，最近我们已经能够动员整师整团的赤少队模范师加入红军，那么以后我们的工作的方针要为着动员整队的赤少队加入红军。要使得每个劳苦群众加入赤少队，每个赤少队员能够在军事机关的一声要求之下加入红军，而且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军事知识与技术，一上战线便能够作战以及政治上能够成为一个忠实于苏维埃，能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赤色战士，这样来增加无限数量的红军后备

军，以便迅速的转入义务军役制。复次，便是猛烈的开展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的热潮，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到最好的使用我们一切的武器与工具，如射击、劈刺、掷手榴弹、建设工事等。在指挥员方面必须学习与善于运用最新的战略与战术，更加以政治工作的各方面的加强以更加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保证红军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最后，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使得全国红军能够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更好的互相配合行动。

在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方面，我们必须继续采取一切方法来改善他的工作，要使苏维埃成为千百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成为千百万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为着这个目的，要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以及个别的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奸细，要缩小行政区域使他更密切的接近群众，要最广大的发展苏维埃的民主主义的精神，要发展对于工作的弱点与错误的严酷的自我批评，要更加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要加强对于临近白区的边区的及新苏区中的苏维埃工作的领导——而在目前应该说正是这些极端重要的区域中，苏维埃的成分与工作最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目前苏维埃工作改善中的几个主要的链环是查田运动，劳动法正确实行的监督，边区新区的苏维埃工作的改造与创立及苏维埃的改选运动。查田运动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执行中央局决议中所规定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的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的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要经过查田运动去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巩固中农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任。在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中，必须保证他成为全国性的第二次苏大会，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全部经验与教训。中央政府不仅要领导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要组织与领导白区的千百

万工农劳苦群众，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帮助白区的群众的斗争，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群众所围绕着的太阳。

在经济战线上，我们今天有了新的阵容，这便是切实与具体的开始经济建设的工作。为着保证战争的胜利，初步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同志以为在内战的环境中谁要提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来，那便是"和平建设"，那便是机会主义。又有些同志以为经济建设是今天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他是高于一切的。我想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解决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是：

"内战猖狂的时候，专政的强制作用，是特别的显著。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一点就以为在内战期间不能做建设工作。内战的自身，假如没有建设的工作也就不能担保会得到胜利。"（斯大林）

"假使一定要战争，那么一切应该服从战争的利益，一切国内的生活应该服从战争，在这一点上任何的犹豫是不允许的。"（列宁）

为着苏区经济的发展与流通，为着保障红军给养与供给，为着给苏区经济今后发展准备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前提与基础，目前经济建设中的中心的一环是广泛发展合作社组织，因为合作社能使"私人的利益，私人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有适当的配合，并且使私人利益服从于整个的利益，恰到一种适当的程度"（列宁），因为合作社能团集与组织千百万的农民，铲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以前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顽固守旧的关系，而将集体经济的利益灌施到农民的心中。所以党与苏维埃政权正以极大的力量来推广合作社运动，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以大部分帮助合作社的发展，要做到五十万人加入合作社，这是一个极大的任务，只有以极大的努力才能胜利的

完成他。在广泛的发展合作社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着重的指出，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必须依据在自愿的原则上，必须以实际的利益证明给农民看合作社的好处，说服农民群众自愿的加入合作社，急躁的追逐数目字而采用强迫的方法去发展合作社，那只会破坏合作社运动而使他流产。在经济战线上的其他的任务，如广泛的设立粮食调济局，恢复手工业生产，设立对外贸易处等等，我不想多说了。

最后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我想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力量，改善我们的工作与领导，提高党员政治与理论的水平，使我们的党能够坚强与胜利的领导国内战争。这里首先我想是扩大党的组织，征收积极的雇农、贫农、中农入党，现在我们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虽然我们在中央苏区已经有十几万党员，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有一倍以上的增加。我们必须研究红五月征收运动流产的原因，我们必须使得每一个同志了解发展党的组织在今天的重要性，我们要以经常不断的努力来发展与扩大党的组织。第二是改善支部的工作与区委的领导，要使支部能够成为群众的核心，群众积极性的组织者，要使区委接近支部接近群众，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根据具体的环境采取切要和具体的方法。最后是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争取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及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纯粹性。在这个紧急的历史转变关头，党内的一部最不坚定的分子中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动摇的表现，如对于长期国内战争的倦怠的情绪，对于敌人新的进攻的惊惶失措，对于土地革命伟大力量的忽视，对于苏维埃机关的污蔑的估计，另外就是那种“没有事情听捷报好了”的盲目的乐观情绪，这实际上是倦怠心理的另一种表现。此外如在文化战

线——特别在戏剧运动中，偷运敌对阶级思想，对于这种偷运私货的缺乏警觉性，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火力粉碎这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继续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前提。

末了，请让我引用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领袖——列宁的训示，来结束我这个冗长的报告罢。

“假如一定要战争，那么，一切应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一切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在这一点上任何的犹豫是绝对不容许的！一切牺牲，一切帮助给与战争，抛开一切的动摇，集中一切的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当然，这一次我们是要胜利的。”

是的，这一次我们当然是要胜利的。这一次的胜利，将确立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热烈的鼓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这段文字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单行本上为：“去年全国罢工人数达一百十万以上，最近时期中比较大的斗争如太古轮船公司罢工，津浦路济南六厂的罢工”。

〔2〕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3〕指蒋光鼐、蔡廷锴。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作战部署和任务的指示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豪：

沪来电转如下：

一、我们认为广东的进攻，并不是与南京联合反对我们的行动。恰恰相反，这主要的表示在广东要在实际上“剿赤”，献媚英美帝国主义，以便在将来反对南京，夺得更好的帮助。因此，纵或我们通过政治的分析，对于目前的军事形势不甚恰当，但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广东的进攻，虽然在目前千真万确的，不过是一暂时的危险，而对于我们的主要危险，仍旧是北方的蒋介石，虽然他暂时比较的不甚积极，因此方面军至少是第一军团与第五军团的两个独立团，必须在七、八两个月继续执行计划，夺取第一、第二阶段所给的任务。我们的相当目的在：甲、扰乱或袭击那里的敌人，切断那里敌人联系；乙、取得并保持吉水，在这里建立侧面的根据地，他们当蒋介石开始进攻，或当我们进到计划中第三阶段时，应付一切的事变，消灭敌人的二十七师。在这方面应该督促红十六军向吉水、新淦之间的赣江行动。

二、比方我们来看广东对于我们的危险，假若照我们前次电报所提议，不迟的进行反攻，以模范师及游击队向寻乌外地

威胁，以便从后方决战，继续进攻安远，同时以便回师进攻武平，抵抗十九路军、掩护模范师的行动，则广东敌人初步胜利，是不会成功的。瑞金、会昌、雩都三角区域，仅仅进行防卫的步骤，是不能够应付目前的形势，而同时却用较强的力量，由上述的区域向边境进攻，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行动，不仅不能使广东的进攻平静下去，恰恰相反，这将使他更加积极。除上述的步骤以外，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只能同意暂时扩大三军团在第一阶段的任务，三军团应该从清流东南向连城扩大进攻，以便掩护我南方力量，反对十九路军的作战。并以威迫闽南的敌人，放弃他们的继续进攻瑞金的企图。三军团在他援助了向武平行动的三十四师以后，应在八月五日以前，再回转北方，以便完成第一、二阶段中原来规定的任务。三军团在自己的主力向连城扩大进攻之时，更应以小的队伍，消灭那些向永安，沙县退却的敌人。

三、当三军团还没有在八月初重新转向北方进攻的时候，七军团不应与敌人有大规模的冲突。这时他的任务是：甲、如太宁尚未取得，则应取得之；乙、向太宁之北威胁，以便消灭一部分与我兴国力量作战的敌人。在八月初，应以小的部队，企图取得将乐与顺昌之间的金溪北岸，以便在三军团来到的时候容易渡河。

四、兴国的力量应以赤卫军支持一月至多两月，如万不得以须在此时以前躲避敌人的退却，则资、溪、邵是他唯一的方向，以便在此等候三军团的到来。

五、假如五军团目前在北方不甚忙碌，我们建议：除两个独立团外，将他移至兴国、雩都，以备广东敌人从信丰、赣州开始进攻的时候。应付紧张事变，同时亦如北方第一军团之后备军，这样利用可给少共国际师一些干部，以便加紧这一师的

训练，并使他及早完成少共国际师，在八月初可以执行警卫清流、归化的任务，并向着这里继续完成他的训练。在三军团将要离开清流、归化区域，转向北方的时候，少共国际师应防卫以上的区域，反对新的敌人进攻，因此少共国际师，在达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即应建筑堡垒工事。

六、你们可以从这一力量的分配上了解我们的，定下了分配的原则，就算在八月下半月北方的敌人开始进攻，我们也有方法抵御他。总之，在我们一切的行动中，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我们再一次着重指出：今天广东进攻的危险，并不能成为移动方面军保卫首都的理由，因为方面军的进攻无论如何，为时尚早，企图这样想，只有造成着开始改变原来计划及早进攻我们的结果，因此不要以暂时危险而转移你们路线。虽然这一危险是很严重的，而应向前看到八月和九月，这确是我们前面的困难时期，请你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根据一个计划，来改善我们的环境。

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四日）

张　闻　天

一

自从党在苏区提出了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以来，差不多已有半年了，经过了党的领导机关与党的积极干部的努力，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得到很大的成绩，如像江西党在红五月中所得到的光荣的成绩，当然和江西省委以及个别县委领导方式的转变不能分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转变，主要的还只限于省委与个别的县委，一般的县委以及县委以下的组织，在转变领导方式方面的成绩，还是非常不够的。

许多同志对于新的领导方式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够。他们以为新的领导方式就是要求党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坐在机关里不出去，在县委（这里举县委为例吧）之下，多找几个巡视员，把各部工作人员加多起来，多开会，多讨论问题，这似乎就是新的领导方式！以至发生这样有趣的事情，就是县委书记以及各部干事坐在机关里不知道做什么，只好睡觉或算伙食账。县

* 这是张闻天《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的第三、四部分，分别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和九月二十四日，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和九月三十日出版的《斗争》第二十、二十八期。

委的议事日程上，天天开会讨论，“从苏维埃工作”一直讨论到“群众工作”，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所要讨论的“群众工作”究竟是什么？（如新泉县委六月内的议事日程）

这当然不是新的领导方式，而是对于新的领导方式的讽刺。像我在以前关于新的领导方式那两篇文章中所说的，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真正能够具体的实际的领导下级党部，领导机关内的分工与集体，建立各部工作与巡视制度等等，不过是新的领导方式的“必要的基础”与前提，而并不是目的。

新的领导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不是去看这个县委的书记是不是在家，各部工作人员是多是少，有无开会的议事日程等等，而是要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要看党是否能灵敏的反映下面的群众情形，很迅速的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响应党的每一号召。简单的说，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所以说到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含有党与群众的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这是新的领导方式的基本内容。

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的，命令群众的，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的，领导群众的，我这次所要说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脱离群众的，所以他动员的主要方法就是命令。这种命令主义，尤其在苏区党内特别发展。在这里，政权是在我们手里，这更便利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捆绑起来不可。退还公债，常常发生摊派与命令的现象。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

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求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甚至像工会这样的民主的群众的组织，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如像以国家保卫局来恐吓群众的话，在全总执行局的机关报上曾经不只一次的发现。

这种现象，是不能一刻容许的。斯大林同志说得好："党的权威，是依靠工人阶级的信仰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仰，是不能以武力获得的。因为用武力去取得信仰，反而失掉了信仰"。（列宁主义概论一六六页）

拿扩大红军做我们的例子吧。要动员大批群众加入红军，只有说服群众的方法。如若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我们不但不能扩大红军，而且会使群众登山，反对我们。最近各县扩大红军特别有成绩的地方，即是能经过群众来动员，用宣传鼓动的方法去说服群众加入红军的地方。那些想用强迫命令来扩大红军的地方，都宣告了破产。在其他任何工作上都是这样，如若我们党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使群众执行我们党的每一决定与每一口号，那我们党决不会在群众中得到任何信仰。

斯大林同志说："党必须天天得到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仰，党的策略，党的行动，必须得到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命令群众，而要说服群众，帮助群众用他们自己的经验，能够体验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必定要作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先锋与导师。"（同书一六八页）

但是我们的党所以能够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我们的路线，因为我们的党有着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策略。因为我们党的每一决定，每一口号，都是为了群众切身的利益。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虽是我们党所提出的口号或决定是正确的，所代表的是群众本身的利益，但是一部分群众还

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口号或决定。比如关于总同盟罢工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总同盟罢工在我们党看来，是有害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党反对在苏维埃政权下进行总同盟罢工。但是如若工人群众不管我们党的意见，而举行了总同盟罢工，那时我们党能否利用武力去对付工人，同样不能够。我们在这里，还是只能向工人们解释他们的举动的错误，并帮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去了解党的政策的正确。这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是这样。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 “我们现在假设因为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的盲昧，党的政策虽然大体正确，却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信仰与拥护。让我们再假设，因为时机没有成熟，党还不能够使工人阶级认识出党的政策的健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党是否能固执他的行动，勉强群众去行动呢？决定不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假若党要领导得很好，一定要知道怎样去等候，等候群众相信了党的政策的健全，并且一定要帮助群众用自己的体验去认识。”（同书一七七〇页）

但是如若我们党自己犯了错误，如若党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能够不顾一切而坚持自己的错误吗？当然不能够的。比如过去中央苏区的党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致使群众对于党发生了恐怖，使群众的利益与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那时我们如若不顾一切而继续蛮干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党还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吗？结果必然是群众离开党，或甚至起来反对党。如在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结果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如果还要做群众的领导者，那他必须重新考虑他的政策，修改他的政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像中

央苏区的党后来关于肃反问题所做的那样。

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中讨论到废止强迫征收而采用新经济政策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 “我们绝对的不能禁止群众发表一切的意见，我们必须诚恳地承认农民已经不满意我们建立的系统，而且已经不能再忍受了。这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意见，表示得十分明显了。我们已经违反着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我们一定要顾及群众的愿望，而且毫不固执地说：让我们从新考虑这个问题吧。”（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一册，一三八页）

总之，在任何情形之下，党决不能脱离群众，党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在群众的身上，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这里党对于群众的最主要的方法，便是说服！只有党说服了群众的最大多数，党的领导者的资格才能得到保障。

但是这个并不是禁止一切强迫的意思。比如我们在动员整团整师加入红军的工作中，当然免不了有少数不愿意加入红军的分子，或加入了而又开小差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我们是并不禁止采用强迫方法的。斯大林同志说：“当这种强迫是根据于大多数劳苦群众的信从的时候，当党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的时候，强迫的方法是可以用的。”（同书，一八〇页）但是在这里同样的，首先是在说服大多数，即整团整师的大多数，加入红军，然后对于小部分采取群众的压力，使之跟着加入红军。

我们党内两条战线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即是实现党对于群众的领导权。右倾机会主义者，往往落后于群众的革命情绪与革命行动，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与不信任，以致做了群众的尾巴，失去了领导者的资格，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往往以革命的“左”的词句，脱离了现在的实际情形，以致脱离了群众，同样的，使党失去了领导者的资格。而党在任何时候不能

同群众对立，而须时时刻刻是群众的领导者。

但是要使我们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我们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 “党一定要洗耳静听群众的呼声，留心群众革命的情绪，研究群众斗争的实质，细心考察他们的政策是否健全——因此不只要教训群众，还要跟群众学习。”（同书一六八页）

每一个官僚主义者照例是不耐烦去倾听群众的呼声的，他们不管群众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他们总是把党所提出的任务，机械的命令群众去执行。如果群众不执行时，他们就骂群众“悲观失望”，“太平享乐”，或者说“群众落后”等以掩盖自己对于领导群众的破产。比如我们自己党的支部会议开不成，官僚主义者只知道骂支部同志不好，而从没有去研究支部同志不到会的原因，同个别支部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一切困难与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从没有去研究党的某一正确任务不能执行的原因与如何使群众来执行的方法。

党常常规定了正确的策略与口号，但是在实际环境中如何使这一策略与口号实现出来，常常是党的领导机关所不能完全预料到的。群众在为了党的策略与口号而斗争中，常常能够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比如党提出了“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的口号，兴国的同志以及兴国的群众首先创造出了实现这一口号的新的形式与新的方法，动员了整个兴国师加入了红军。这种群众创造的新的方法与形式，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表现的非常丰富，我们党的领导者在这里的任务是在立刻抓住这种新的方法与形式，研究这种方法与形式，跟群众去学习，以便利用这种新的方法与形式，使我们能更好的去领导群众。

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做的非常不够。我们大家都说，江西兴国的工作，福建才溪区的工作是中央苏区最好的。但是他们好在那里，他们用了何种方式与何种方法领导了群众，我们就很少知道。一直到最近，江西省委才很迅速的抓住了兴国模范师加入红军的经验，把他运用到其他各县，使扩大红军的工作在江西得到空前伟大的成绩。在其他各种方面，我们也应从这样机警的迅速的去跟群众学习。

只有官僚主义者才会自高自大，以为他所决定的办法是天下最完满的办法，群众只要依照他的命令做去，那就是什么事都会好起来。标本的例子是过去全总执行局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这些同志根本不管什么企业，什么对象，什么地方，他只是把劳动法上的条文照抄一顿，再加上一些千篇一律的条文，就算完事，以致发生这样可笑的事，在学徒的合同上，也写上成工八小时，同工同酬等条文，在木船工人的合同上，写上房内需用石灰水天天洒等条文，结果，这些合同大都是没有人去实行的。这些合同的订立自然会使群众失去对于工会领导机关的信仰。

我们的党是领导群众的党，我们的党在苏区是统治的党，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党。因此，我们特别应该小心谨慎去领导群众的斗争，使党的策略带有更多的弹性，以便能够活泼的运用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容纳群众的最大的创造性，并发挥这种创造性到最高限度。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 “现在正是群众的政治行动高涨的时期，党特别要时时留心注意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而且对于党的政策要格外地小心，特别使他表现弹性，而且现在假若共产党都是独断独行者，便格外容易妨害党对于群众的领导。”（同书，一八八页）

那种以为党是超于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党员有享受各种自私自利的特权的观点，对于党的领导是极端有害的。这种观点，只能造成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不信任。

不要忘记列宁同志在联共十一次党大会上所说的有价值的话：

> “在群众之中，共产党不过如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所以除非我们正确地代表群众的意识，我们就不能管理。因为不然，共产党便不能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便不能领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便会破碎了。”

细心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识，负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的领导方式的主要内容。

二

在《斗争》二十期上我说到我们领导群众的主要方法是在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的正确，使群众执行我们党所提出的每一任务。

从许多党部的文件上以及许多同志的言论上，已经可以看出关于说服群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般同志的注意，反对强迫命令的声浪，是更加叫喊得响亮了。

虽是这样，但是强迫命令的方法，依然到处存在。“反对强迫命令”，许多还只是在党的文件上，同志的口头上。在实际工作中的显著的进步，还是没有看到。

请问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是在于我们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我们就没有法子去说服群众，没有法子说服群众，那结果还是只有强迫命令之一法。

在宣传鼓动方面，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带有极浓厚的刻板性与一般性。我们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总是那一套我们所说得烂熟的老话，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起到扩大红军，经济动员止。虽是在最近，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宣传鼓动的形式与内容方面有了微弱的转变，但是对于怎样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没有清楚的了解，因此我们不能依照一定的原则去转变我们的工作。

拿江西《省委通讯》第二十七期上所发表的“八一宣传工作的总结”来说吧，这里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木标语”、“竹标语”、“壁标语”、“纸标语”等等赤裸裸的数目字，但是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那我们还是没有法子知道的。譬如这里说到在“八一纪念宣传动员比较充分，如宣传队普遍有系统的建立和训练，宣传品数量上的增加与方式的改善，均有了进步。”然而到底对于这些宣传队的训练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出去宣传的，群众是否了解或满意他们的宣传，在宣传中有什么经验，以及宣传队应该如何改善工作，那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关于宣传品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同志重要的，只要有宣传品发出，至于这些宣传品有没有人看，要得要不得，那就可不管了。

下级党部宣传工作的报告上，也是拿这些数目字来表示他们工作的优劣，而上级党部也拿这些数目字来决定下级党部工作的优劣。大家这样习惯了，至于在这些数目字下到底有什么内容，如何改善它们的内容，那是大家所不管的。

这是宣传鼓动工作方面恶劣的传统。要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同这种传统做坚决的斗争。

要使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变成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问题，实际上即是怎样去接近群众，怎样开始向群众说话，怎样使群众相信我们所说的，而且能够执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具体了解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我们在开始宣传鼓动时，必须知道听我们讲话的是工人、农民、红色战士或是城市贫民，而且也应该知道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思想上准备的程度。同工人讲话我们是一个样子，同农民讲话，我们应该又是一个样子。而且在工人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在农民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因此对这种工人或农民讲话是这样，对别种工人或农民讲话又是另一个样子。千篇一律的宣传鼓动，是不会发生什么好的效果的。《真理报》的社论曾经这样说过：

> “人们按照一定的样本，标准，公式去做鼓动工作。人们不是随地都会应付个别工人，女工，农夫，农妇。在鼓动工作中，难道人们不是往往把某企业中一切工人都看作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即同样接受每句话，每个论据，每个观点的整体吗？然而有用政治鼓动之实质，却在于把这个鼓动传达到每群人中间去，使它能为每个工人所了解，从他的知识程度出发，从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某方面，对于某些问题的兴趣出发。”（斗争第四期）

我们现在的宣传鼓动工作，却是把所有的人都看做一个模型里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对于他们说同样的话，要求他们同样的接受我们的主张。要“把这个鼓动传达到每群人中间去，使它能为每个工人所了解”，像《真理报》所讲的，当然是没有可能的。

其次，我们对于宣传鼓动的对象的了解也不是一般的。比

如，我们知道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是工人，甚至某处的某一种工人，如韩江的木船工人，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绪、兴趣与要求。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应该从他们的切身问题开始。从这些他们有兴趣的，懂得的，要求得到解决的问题说起，把这些问题紧密的同我所要达到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那群众不但会了解我们所说的，而且会执行我们所提出的任务。

比如拿我们对于一部分失业的木船工人做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来说吧。如若我们一开始就说，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开始了对于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所以我们每一个工农分子应该加入红军，去回答敌人的五次“围剿”，你们木船工人就应该报名当红军，当红军是最光荣的。这种宣传鼓动，我想一定得不到很好的成绩。木船工人听了这种宣传鼓动，当然不会清楚了解，不会自动的积极的报名当红军。但是如若我们从他们的失业问题讲起，说明他们失业的原因，怎样才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把加入红军与打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同根本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密切的联系起来，那木船工人就会了解我们所说的，就会自动的积极的报名加入红军。

把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同党的基本口号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错误，就在于不知道应用这一原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一些基本政治口号不断的叫喊，而不知道如何使这些口号变成群众自身的，群众所深刻了解的活跃的有血肉的口号。

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与我们整个领导方式的转变不能分开的。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之下，我们决不会知道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这一地方的人或那一地方的人的生活、情绪、兴趣与要求。要了解这么多问题必须要

有最具体的领导，必须我们有非常灵敏的阶级的感觉，感觉到群众每一脉搏的跳动。

一千零一次的背诵党的基本口号，是完全不够的。这里还要把这些口号具体化，把这些口号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中执行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考察、研究、探索、猜摩和熟知各种人群的生活与要求的特点，把我们的总的政治口号与路线同群众这些日常的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我们以后就要拿这一标准去考察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优劣，并且以后我们的宣传工作的转变也应该向着这个主要方向去进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变为真正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能够说服群众的宣传鼓动。（关于宣传鼓动的其他问题，将专文讨论）

第二、要说服群众，除了群众的宣传鼓动之外，还应当在实际上来解决群众中所发生许多困难问题。

我们实行了土地法与劳动法，我们大大的改良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我们是已经满足了群众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与新的封锁，在群众中造成了新的痛苦与困难。如像食盐、布匹的缺乏，苏区生产品的不能出口，都会使群众的生活恶化。此外，在群众日常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像犁牛、工具、肥料、水利、种子等。我们都必须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群众相信我们是处处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斗争的。这种日常的坚苦工作，最容易取得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信仰，便利于我们去说服他们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

拿扩大红军来说吧。查田运动深入的区域，经济建设比较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也最有成绩，这已经是大家所知道的真理。再譬如经常红军家属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同样的，扩大

红军工作比较容易，进行归队运动也比较好。一切事实都证明，只有我们真正细心的了解群众的困难，耐心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时，说服群众，动员群众工作，才能胜利的进行。

但是这一简单的真理，却不是为每一个我们的同志所了解的。有些同志当他们不能动员群众时，常常骂群众不好以至把强迫命令捆绑当为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然而他始终没有去想一下，不能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因在哪里，为在大大改善群众的生活上做了什么艰苦的工作。有些地方发生这样的情形，为了要进行扩大红军的突击，我们组织了耕田队给红军家属耕田，但是红色战士出发前方后，我们就把这一工作冷淡下来。至于经常的解决红军家属所发生的一切困难问题，那更是说不上。这种情形，同样是不好的，改善群众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这是我们的经常的中心的工作，而不简单是一个临时的突击工作。

只要一看我们各级党部的议事日程，我们就可知道我们每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大都是扩大红军，推销公债等，对于当地群众的某一具体的切身问题的讨论是很少的。近来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是异常不够。无疑的，有系统的改善群众的生活与完成党的基本任务中间的一致性，我们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第三、在每一宣传鼓动之后，在说服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组织群众。首先在我们的动员工作中，我们往往把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分离开来。我们在宣传鼓动之后，不知道立刻组织群众，做组织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利用宣传鼓动工作，来组织群众。比如关于推销公债的问题，我们召集了群众会议做了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不知道当场就由群众自动认购公债的

数目，并且经过群众组织某乡的推销公债委员会，经过这个委员会去更广泛的推销公债。或者我们不做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而把群众关在会场上强迫他们购买，或者由一个同志拿了花名册挨户摊派。

其次，我们不知道经过不同的组织去组织群众，经过这些不同的组织去动员群众。比如我们的青年团，这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组织，我们应该经过青年团去组织最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然而，事实上青年团员的数量远落后于党，许多青年群众没有被吸收到青年团中去。如像在方面军中，青年占所有红军数量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青年团却只占全青年群众的百分之二十五强。

显然的，我们是把许多不同的群众团体，也看做了和党一样的东西。我们在那里的工作方式也看做是第二党的工作方式，在青年团中这种第二党的工作方式依然存在。这种方式甚至在儿童团中也是存在着。此外，如像我们的互济会，我们的“反帝拥苏”，也往往不能清楚了解到他们特殊的性质与任务，以不同的立场与方法去组织群众。在“反帝拥苏”中讨论的是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在互济会中讨论的也是这一套。党提出创造工人师、少共国际师、互济会也照样提出创造“反对白色恐怖连”、“反帝拥苏”则提出创造“反帝拥苏连”。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作方式，到处都可看得到。至于怎样经过互济的反帝的立场去团结广大群众在它们的组织中，怎样应该适当的在他们的组织中去传达党的影响，执行党的任务，那就很少注意。正因为这样，许多群众组织，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他们的会员许多是登门造册式拉来的，这些会员除了知道必须交纳“互济捐”、“反帝捐”外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加入这样的组织。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这种机会主义的

观点，说党应该取消这种群众组织，把我们的力量更能集中于党的工作，而不了解党正需要经过这些群众组织来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周围。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还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或者是由我们同志去包办，把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或者是根本不管。在许多县区的党，甚至放弃了对于苏维埃青年团与工会的领导。

我们现在大家认为动员整连整营整师的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是扩大红军的最好办法。然而我们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则是极端的忽视，所以在经过五、六、七三个月的动员之后，整批扩大红军的成绩，是非常的微弱。不整理与扩大赤少队，加强党对于少队的领导，不迅速的恢复模范队的组织，那动员整连整营的模范队去加入红军，岂不是纸上的空谈！

经过党团来领导各种群众组织，在我们同志中间还没有清楚的了解，甚至有些同志把苏维埃的党团，当做了党与团的代表，根本不知道党团是什么一回事。或者形式上组织了党团，根本就不起作用。正因为党还不能经过党团来加强党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各群众组织的工作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程度。

最后，寻找出新的组织形式来动员群众，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利用新战士去组织扩大红军的突击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兴国的同志曾经创造了许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新方法。过去少先队动员整连整营少先队到前方去配合红军作战，这样来争取他们加入红军。这里，我们要极大的发展同志与群众的创造性，灵敏的抓住每一新的方式，来动员群众。一切呆板、固执、迟钝、墨守成规，都是新的动员群众方式的最大敌人。我们不但要知道如何发展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知道

如何组织这些群众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就说到最后的第四点，即是为了要能够很好动员群众，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过去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把这些经验来普遍的应用。

我看到不少我们的党部对于各种工作的检阅的报告。但是这些检阅照例的只是指出“政治动员不够”，“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深入”，如若是关于红军的，那一定还要加上“对于扩大红军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的群众动员，强迫命令的方式非常严重”，“没有充分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等，这样的一个“检阅”，就算了事。过了三个月于是又来这一套，又来重复一次过去所说的，有些同志甚至把一套话说的烂熟，所以在检阅工作时，他可以不听，他可以睡觉，但是轮到他讲话时，他却可以滔滔不绝，讲□□□两三点钟！这种“检阅”，当然对于工作具体帮助是很少的。

我们要使同志们知道如何不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而能够动员群众，那简单的告诉他们不要强迫命令群众，而要去说服群众，是不够的。这一真理，就是我们重复它两三千遍，强迫命令的方法依然还是会存在下去。这里，对于我们下层同志的谩骂与责备，并不能改善事情的实质。这里需要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断的以新的具体动员群众的办法，去告诉同志，详细的研究每一新的群众所创造出来的经验，去告诉同志如何来应用这一经验。

比如我们批评八月份扩大红军中犯了寒热病的错误，所以我们以后应该同这种寒热病的现象的斗争。这种批评，对于以后的工作不会有丝毫的帮助。因为这种批评是笼统的抽象的表面的批评，对于八月份实际的扩大红军的情形，没有丝毫的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不能真正了解扩大红军落后的真正原

因，来帮助以后工作的转变。

就是拿兴国动员模范师整师加入红军的经验来说吧。这一经验，说来似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实际上，真正能够知道这一经验的，还是极少数中的少数。我们江西省委始终没有把这一经验，写成通俗的小册子，普遍的散布到全苏区去。至于研究这一经验，指出在这一经验中还有什么缺点，还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良的，使这一经验与教训集合起来，供给各地党部，那更是没有看到。

许许多多我们下层的同志与群众所创造的宝贵的动员群众的经验，我们是白白的放过去了。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只满足于背诵圣经式的千篇一律的自我批评，而对于活生生的新鲜的经验，则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种倾向，是使我们动员群众工作不能迅速前进的极大原因。

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应该成为我们党改善我们对于群众的领导方式的有力的武器。这种自我批评应该具体分析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经验，指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使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这种自我批评有它的时间性、特殊性与连续性。它一层深一层的向着取得领导群众的艺术的方向前进。自我批评的价值也就是在这里。

或者是忏悔式的背诵圣经式的自我批评，或者是没有自我批评。许多地方的负责同志，把动员红军、推销公债中所发生的严重现象都推在下层同志身上，似乎他自己是丝毫也不负责任的。他从没有想过，他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中除了一般的空洞的指示外，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工作，到底给下面同志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办法。这类缺乏自我批评的现象同样是妨害我们改善我们的动员群众工作的。

至于张如心同志在《红校斗争》第七、第八期上的“自我

批评”，那只能说是张如心同志的流水账，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把每一新的经验，每一具体的动员群众的办法告诉同志，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学习领导群众艺术的主要方法之一。

不疲倦的，顽强的，坚持的在上面我们所说的几方面努力，那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在领导群众的艺术上，必然会有迅速的进步。我们必定能够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战争，争取五次战争的完全胜利！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目前作战部署与战略问题的指示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

朱周王宪[1]：

（一）虽然由于你们过去给敌人的打击，及我十一、十二、二十二军向敌人作有效袭击之结果，使敌人行动迟疑退后，而造成了相当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但我们认为在目前跟踪敌人，在过崇仁、抚州是不适宜的。

第一，敌人在精神上虽已动摇，但我们绝对不能过低估计敌人力量人数，技术、距离之密切、守备队之坚强等。

第二，依照上述方面，我们将把自己对于决定胜负的战争中，而无可能取得策略上各个击破非常有利之机会。

（二）根据上面理由，方面军必须无迟疑的离开崇仁、乐安、宜黄的区域。现有两个可能的方面，值得我们选择：

（1）与敌人切断，向宜黄、乐安之间南退，以便转入永丰区域，在五月开始新的作战。

（2）进攻公陂集中的敌人力量，以便我主力能自由集中到永丰的东南，而进行同样的新作战。

（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各军及第四、第五独立团的活动，都应为我们的目的而活动，并继续

下去，要选择进攻公陂。

（四）完全依照你们目前估计，如何应付堡垒以外一三师敌人的突击，即我们所想到敌人第五师、九十师、第一四师，一点时间不能空费，向西前进，撇开乐安，用力的打破一切进攻中的障碍。

（五）从永丰区域开始新的作战，用意即在：

（1）牵制乐安以南的敌人任何的行动。

（2）乘时取得有备的地位，突破敌人赣江的防线，但此第二而且主要的目标，是完全依照于最近在赣江东岸所给与保证的打击。

（六）为将来密切的与红军主力合作，十六军应派独立的队伍向赣江进展，以便切断安福以北赣江沿岸的敌人连络，我八军必须在安福以南进行同样的任务，牵制从湖南增援安福的敌人。

（七）立刻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同时希望立刻详细告诉福建战线上敌我的力量，以及模范师的情形。

告诉你们，我们根据此电，任何误解都可清楚。国际电内容如下：

（一）我们对于军事策略的建议，绝不能当作对于在军事的行动，纯粹采取防卫路线的提议。

（二）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开展进攻的作战，应利用最有效的援其目的，不仅在维持我们主要的根据地，目前任务同时应在巩固和联结我们的苏维埃区域，但须避免大的损失与失败。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

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何克全

一　组织发展的状况

目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团的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因为解决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或者革命的出路，正依靠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巩固的程度”。在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苏维埃革命发展的前面，提出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让卖国的国民党继续统治下去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或者是苏维埃胜利使中国独立解放。解决中国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殖民地的或者苏维埃的出路上，依靠着我们的组织的巩固的程度。

从一九三二年来，在全中国都有极新的加入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队伍的潮流。从是年“九一八入团号召”到一九三三年“一二八入团号召”，上海的团员有十倍的增长，在“一二八号召”中河北的团有二倍的增长，满洲的团有一倍的增长，在厦门的团也有一倍以上的增长。这一事实指明，在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在全中国存在着革命危机更猛烈的向前发展与民众革命性的极度增涨。

虽然国民党用着禽兽的白色恐怖，企图来割断共产党与群

众的关系，但是并不能去阻止群众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潮流。被这一潮流所冲洗出的叛徒正在那里诅咒“共产党的崩溃”、“共产青年团的坍台”，然而冲洗的叛徒，却增加成千成万的我们的新的力量。

在苏区内这一年以来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又是怎样？

我这里手下没有全中国各苏区团的组织状况的材料和统计，这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我手下只有江西和福建两省的比较详细的组织材料，以及闽赣和浙赣两省不完全的十分不完全的材料，然而根据这些材料，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去研究苏区团的组织状况。

先来看我们组织发展的趋向。

在春季冲锋季的时候（一月到四月），在江西发展了五千人（包括建黎泰）、在福建发展了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在江西有五万人左右，在福建有五千人，在春季冲锋季时江西、福建两省总共有五万五千人到六万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决定了红五月的入团号召。

在红五月中，在江西（建黎泰除外）发展了一万四千五百零一个，在福建发展了三千九百五十七个。当然红五月发展的速度是比春天冲锋季快了一倍半以上。如果冲锋季是三个月，红五月是一个月，那么应当是快了四五倍。

现在我们拿江西各县来看。那我们在红五月的入团号召中，根据兴国、胜利、赣县、雩都、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十二个县总共征收了一万〇五千〇二个，内占青工、雇农一千〇六十三个，即是占百分之十点一的工人成分。

根据胜利、赣县、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乐安、信丰，九个县总共征收了八千八百四十九个，内占贫农六

千七百二十五个，即是占百分之七十六的贫农成分。

第二个事实告诉我们，根据兴国等十二个县团员总数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个，内占青工、雇农四千三百四十三个，即是占百分之十二弱的工人成分。

根据胜利、赣县、瑞金、寻乌、宜黄、信丰六县总共有团员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个，内占贫农一万四千零七十一个，即是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七的贫农成分。

可惜这一统计只告诉我们红五月征收的统计和各县总的统计，没有告诉我们在红五月以前原有的数目，因此我们从这个表中不能够去研究苏区团流动的现象，然而这一问题是对于我们是非常之重要的。为着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寻找另外的材料。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在江西各县的报告中实在是很难找到。在会昌的报告中是有这样的材料，但是会昌的工作一般的讲来是落后的区域，很难拿他作为评定江西整个工作的标准，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拿会昌的材料作为一个参考的材料。

在会昌进行春季冲锋季以前，共有团员一千九百三十六个，在一月份发展了一百二十八个，在二月份发展了一百六十五个，到三月份增加上一二月的共发展了五百人，在四月发展二百四十七个，在五月发展一千一百六十七名。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到红五月止会昌应有三千八百三十三个，但实际现在三千六百五十一个，流动的共有一百七十九个。

在一月份团员到红军中去的只有四个，二月份有三十七个，四月份三十二个，五月份十一个，总共八十四个到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去了，除八十四个到红军中了还有九十五个流动的，这里的事实说明江西的团流动还在存在着。

再拿公略的情形来看。

在一月份公略流动的情形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在一月份发展了一百一十三个，动员到红军中去有三十九个，原有团员是四千三百六十八个，在总数量上只增加三个，即四千三百七十一个。

即使就是把四月份的不计算在内，也应有五千五百零四个，除去到红军中的共有九十六个（也是没有四月份的统计）外，也应有五千三百零八个，但是红五月征收的总结，公略总共只有团员五千零七十七个，流动的还有二百二十一个。公略今年总共发展有一千一百三十六个，流动的现象在公略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们想，根据这些零碎的材料，已经足够说明江西团流动的存在，而且是很严重的。

同样在江西总的统计表中没有告诉我们落后于党的组织的状况，使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去提出赶上党超过党的任务。在会昌，在冲锋季时还比党少三分之一，在公略也是在这个时候比党少一千九百多个。

在春季冲锋季以前，福建团的成分根据汀州市五县的统计，青工占百分之十六弱，根据长汀等四县的统计，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一强，经过春季冲锋季后发展了一千一百五十二个。

经过冲锋季后在汀州市等五县青工的成分，由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十八。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动呢？我想在汀州市入团号召的成功应当是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

进行红五月的入团号召，在福建征收了三千五百九十七个。原有团员五千三百二十二，加上红五月发展的三千九百五十七，实有的团员应当为九千二百七十九个，但是现在只实有八千六百一十五个，就是六百六十四个团员流动了。

这里还须要说明的在冲锋季前原有团员四千二百个，加上

冲锋季发展的一千一百五十三个应当为五千三百五十三人，但是在红五月前原有的团员只有五千三百二十二个，这里没有把四月份的发展计算在内，还有三十一个流动。福建团内的流动现象也还是存在着。如果拿个别县来看，那么流动的现象更是惊人的。如长汀据春天冲锋季以前的统计有团员二千九百一十八人，加上冲锋季内发展的四百七十个应当为三千三百八十个，但是在红五月前的统计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个，这一时期内流动了一千五百零二个。应当说明的是在红五月前后新成立了汀东特委大部分是由长汀划过来的，除了汀东的四百二十七个也是流动了一千零七十五个。又如宁化在冲锋季前有五百三十四个，冲锋季中发展四百一十四个，红五月中发展八百个，应当为一千七百四十个，但现在发展有团员一千四百四十九个，流动了二百九十九个。

长汀冲锋季动员去当红军的团员四百零八个，在红五月中一百八十二个，总共动员了五百九十个去当红军，从一千零七十五个中除去五百九十个当红军的外还流动了四百八十五个。宁化在冲锋季中动员了七十六个团员到红军中去，在红五月动员了八十七个，从二百九十九个中除去一百六十三个，也是流动了一百三十六个。流动的现象还有非常之严重的存在着。

现在我来说福建红五月后总结的组织状况，我的结论是青工占百分之十二弱，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十六。

如果单拿红军中团的发展上来讲，在这一时期内也是非常之不能使人满意的。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抹杀红军团的质量的优良，政治水平比一般团员要高，它是成为苏区团的模范队，但是团的发展无论如何是迟缓的。在春季冲锋季中，在方面军只发展了一千二百多个，在一月份的统计是有团员四千九百七十个，团员的数量只占红军中青年的百分之一。在青年占绝对多

数的红军部队中，团员在数量上还是落后于党，只有在某部队的战斗员中团有时是超过党的。

江西、福建两省组织状况总的图画：总共有团员六万一千六百零一个；博生县的没有统计，我们估计博生县有六千人，那么就有六万七千六百零六个。但是闽赣省内的没有计算在内。然而建黎泰划归闽赣省委对于江西团员的数量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黎川在冲锋季前只有十五个团员，冲锋季中发展一百八十四个；泰宁原有一百零八个，冲锋季中发展二百零八个；建宁在冲锋季时共有二百三十九个，总共只有九百四十八个团员，在红五月中才发展了九百九十个。增加了一倍的团员，这是闽赣的成功。

由总的数量上发展的曲线看来，江西、福建两省团的组织的增长是极端的迟缓，如果与上海团组织发展的速度来比较，那可以说江西、福建在这半年来组织的发展是在停滞的状态中。我想这样的估计对于苏区团半年来的组织的发展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事实完全不能指明苏区青年工农积极性的低落，或者是像有些机会主义者的说明“苏区青年怕加入团”。这种事实只能指明：苏区团在这一时期内对于革命发展中组织的意义估计的不够；对于解决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殖民地的或者是苏维埃的出路，依靠于我们组织发展和巩固的程度估计不够；还存在着立三路线对发展组织的自发论的残余——立三主义者以为我今天暴动，明天就可有几万几十万的党员不成什么问题，即使在苏区之内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不去为着壮大我们的组织而斗争。希望我们的组织自发的会增长起来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永远不会有的。在中央局春季冲锋季的决议与报告大纲中都没有提到增长组织的问题，因此江西整个十八县的报告，没有一县讲发展组织的状况，虽然在苏区内我们

有着比上海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从江西福建的材料中，这应当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

苏区团的成分问题，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江西方面没有这样详细的材料，使我们可以去研究这时期团员成分变动的状况，据江西兴国、胜利、赣县、雩都、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十二个县共有青年工人和雇农团员四千三百四十三个，根据兴国、胜利、雩都、万太、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九个县的统计，加入工会的青工会员就有七千四百二十七个，如在兴国全县青工会员一千七百一十六个，又有未加入工会的一百二十八个，但是青工雇农团员有九百八十四个，只有一半的青工雇农加入团，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的来。但就在上面的事实已经足够的说明我们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

如果拿福建的情形来看，我们在冲锋季中我们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无产阶级成分，但是在红五月中减了百分之三十八的无产阶级成分。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在总的百分数上红五月中冲锋季减少百分之八，而且在绝对的数目上减少了三十九个，在绝对的百分数上减少了百分之七。当然在红五月中广大工人加入红军，在福建有四百个青工（但不完全都是团员）动员到红军中去了，这也是减少原因之一。然而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没有吸收新工人加入团来。福建方面，据我们手下的材料有青工会员二千八百六十一个（没有加入工会的我没有统计），吸收在团内的青工雇农只有八百五十三个，即就在工会的青工会员来讲也只有三分之一弱。如汀州有一百二十四个青工，五十七个木船青工，十四个苦力，刨烟十人，还有四百多失业学徒，汀州的团只有八十个

青工雇农。

机会主义者的胡说苏区没有青年工人，或者青年工人都加入了团，我想在上面这些事实面前完全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胡说。

我们的正确组织政策，并不像有些同志机械的提出为增加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的无产阶级成分斗争，这种机械的提法只能够一方面限制贫农与其他最受剥削的贫苦分子入团，另一方面，正是给机会主义说苏区没有工人的盾牌。

我们的门应向着什么人开，应怎样去开，我们上面这些事实已经尽够的告诉我们怎样去开门了。

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今天苏区团的阶级成分还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从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应当得到第二个结论。

一件惊人的事，就是在苏区团内流动现象还是普遍的而且很大的程度存在着，很少人注意去与这种现象作斗争。在苏联的团内如果是失去一个团员，都要发出警号，找出原因和什么人应该负责；我们这里可以失去几十、几百甚至千数，但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号，也没有任何人去寻找原因，也没有任何人负责。这种事件真奇怪！

在苏区团内还存在着的严重的流动现象，这是我们应当得到的第三个结论。

另一惊人的事，就是苏区的团在数量上很大的落后于党。少共国际支部拥有三百万团员的苏联列宁青年团，超过党的一倍，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团一样超过党。

关于红五月入团号召的教训，党和团中央局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给红五月的征收运动的估计，是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

流产了的。这并不是说红五月的征收运动没有它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从胜利中去学得教训，同时我们应当从失败中去学得教训，使我们不去重复这样的失败。

怎样去解释红五月征收运动的失败？它的原因在哪里？在红五月中有三万以上的加入红军的新战士，有几十万参加经济动员、春耕夏排、借谷运动、退还公债、退还谷票、开垦荒地、查田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团的发展只有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个，怎样去解释这一件事？是不是像有些同志的回答："青年怕加入团"、"青年不愿意加入团"、"我们的门开了青年不进来?"我想这些同志的回答，不但不能解释红五月征收的失败，而且是对于青年的侮辱。红五月征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存在着的团对于发展组织的意义的忽视没有完全的克服，在团内有些同志对于青年群众的不相信，对于青年的侮辱，以及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这是阻碍着红五月征收运动的进行。

现在我们来看红五月发展的情形。在江西红五月中发展一万四千五百零一个（十八个县的统计），内中有七千八百八十三个（十三个县的统计），是在"五一""五卅"以及其他纪念中征收的。如果拿这十三个县红五月的发展为一万零一百六十八个，即是说百分之七十七是纪念会中征收来的。

如果我们拿个别的县或区来看，我们更可以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

从赣县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从纪念日的发展占百分之八十二，从日常的发展中占百分之十八。我想这样的事情已经是惊人了，惊人的是日常没有发展。

从会昌发展的情形看，我们从纪念日中发展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二强，从日常发展的只有百分之八弱，在这种情形之下是

完全取消日常的发展工作。

这样的材料，我手下还有许多，我想已经够了。

从红五月的发展来看，在纪念日发展的占百分之七十，在日常中发展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九。

从这些事实中告诉我，在红五月中所采用征收团员方法，普遍的是会议进行，几个团员的负责同志或者是宣传队热烈的演说之后就是一番号召入团，会场上摆着一个摊，贴着报名处，接收报名和填表。这一个事实很明显的指明了没有执行中央局关于红五月征收团员的指示，没有把征收工作成为每个团员的日常工作，没有实现中央局所提出的应当在每个团员前面提出“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有许多地方的报告说：“关于每一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口号，我们是普遍的提出了，但是没有实现”。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没有实现的原因。我想没有实现的原因，就是用纪念会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

没有把红五月的征收，变为每个同志的日常工作，这是红五月征收运动流产的主要原因。红五月征收运动的主要教训是在这里。

是否我们须要在会议上的报名式征收呢？当然是可以采用的，但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方法，尤其是不能用会议上的征收去代替日常的征收。

会议上的征收的好处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吸收大批的入团，但是它的坏处能够使更多的偶然的分子入团，增加团的流动现象。建筑在每个同志日常工作上，个人的负责介绍，可以减少上面的现象。提出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就是说要把征收的工作变为每个同志的日常工作。要实现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也只有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每个

同志的日常工作中去。这是非常明显的真理。

红五月征收运动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于征收运动上的宣传鼓动之刻板性和平均主义。有些同志把青年看作一个整体的东西，想按照一定的样本、标准、公式去做鼓动，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应付个别的青年工人、学徒、牧童、雇农、女工、农妇以及文化程度政治教育之高低。在红五月中，征收工作中我们的鼓动往往是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这一公式。我们在许多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中听到同志说，我们宣传了团的主张，但是怎样去宣传了团的主张呢？有的是说：“加入团要当红军”、“加入团要做工作”、“加入团要做模范”、“加入团要开会”、“加入团要缴团费”，这样去宣传要别个加入团不但是错误，而且不会使别人了解的；结果我们的同志用这种公式去宣传，到处碰到了壁头。他们的回答：“我们不加入好了”。因为我们的同志不善于从他们切身的问题，他们所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去向他们解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不善于利用每一个好的时机来鼓动青年与劳苦青年来赞助与加入共产青年团。我们的同志不善于去对付青年各阶层中的个别的活的人，我们的同志想用一个固定公式去对付一切的青年。

红五月征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具体的领导，没有经常的检查工作，没有监督与帮助。在红五月中没有检查过一次，只是到了红五月总结时才作了一个结论。为什么在会议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不能早的纠正，因为我们没有具体的领导，因为没有去检查工作。这是红五月失败的重要教训。

现在我们还是要来解答在红五月征收运动中的组织政策，因为这是我们在组织上的基本问题，因为没有组织问题上的正确政策，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是不能去执行我们的组织任

务的。

在上面的表中，从江西、福建的两省中的征收中，可以看到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在两省红五月征收的无产阶级的成分都占百分之十，在福建无产阶级的成分相对的与绝对的都是减少了。

在红五月运动中，有些地方提出“一切青年加入团”的口号，这是一方面模糊组织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减低团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提出“贫苦工农加入团”的口号，这是模糊了我们的正确的组织政策，不了解我们首先而且最多要吸收的什么人，似乎我们吸收青工与吸收贫农没有不同的意义，似乎我们吸收贫农与中农也没有不同的意义。

这是对于红五月征收工作的几个重要教训。

二　在目前苏区内怎样去调剂成分

要使团能够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求最迅速的变为几倍大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组织，包括广大的最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青年、贫农青年和觉悟的中农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求最迅速的变为拥有几十万团员的组织。

最先而且最多要吸收的什么人？团应该最先而且最多吸收无产阶级的青年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团应该首先集中一切力量，用一切的可能，吸收苏维埃企业内的青工、小企业和商店的青工、手工业的青工学徒、农业青工牧童与运输木船苦力青工到自己的队伍内来，依据他的职业所在地建立起模范的支部，经过团的组织，能够使这些支部对于比较落后的和缺乏无产阶级成分的支部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在哪里？我们听到不少的这些理论：

"苏区没有青年"、"青工都加入了团"。我们先拿事实来看：虽然因为青工部的工作与团在工会中的活动非常之坏，没有整个苏区青工的统计，我们根据一些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公略、瑞金、博生、兴国、赣县、胜利、会昌、雩都、永丰、石城、乐安、万太十二县在六七两月内共有青工会员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个，在福建据不完全的统计有青工会员有三千四百四十二个，即就在这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将近二万的青工会员了。在福建只有八百五十三个工人团员，即是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青工会员加入了团，还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没有加入团。这些事实完全很明显的指明无产阶级青年在哪里，说"苏区没有青工"、"青工都加入了团"完全不是事实。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青工群众的统计，使我们不知道到底苏区内有多少青工。

我们的门应当开向工会的青工会员，开向一切的男女青工。

在调剂成分的问题上须要坚决的反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团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与战略上占着重要的地点，去建立团的强固的组织，这些地方我们应当使更广大的青工与最受剥削的分子，半无产阶级贫农和好的劳动的青年加入团。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观点到今还是存在。我们的同志以为在汀州市吸收一个团员与在长汀任何一个乡吸收一个团员没有差别，以为在东黄陂吸收一个团员与在博生其他地区没有区别，如汀州市红五月的征收只有河田区的三分之一。一般的来说，还没有一个城市的工作到了模范的地位：兴国城市的工作还落在上社区高兴区的后面，瑞金城市区的工作还落在武阳区九堡区的后面，即使汀州的工作在长汀县的模范内来讲也还落在红坊区的后面。过去我们回答为什么城市区的工作落后呢？很多人的意见都是说忽视城市工作，省县委所在

的地方工作愈是落后。这只能有一部分的真理，这一部分的真理是过去的领导方式，“机关锁了，天天在外面”。但是主要的还是因为城市工作的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坚苦的工作。我们的同志逃避了这个困难，而向着比较容易的方向去发展。

然而不能抹煞城市工作的改善，这主要的是从汀州市的入团号召后，汀州的团由八十几个人变为了三百五十四个人以上，最近汀州市整连工人模范队加入红军，在博生城市工人的加入红军。

对于缺乏无产阶级青年成分的区域，我们调剂成分的方针又是怎样？在这些区域内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尽可能的达到将那里所有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分子都吸收到团内来。少共国际的指示是“在可能公开的地方，他的门应该开向一切男女青工”（少共国际纲领），“向着一切男女青工开门”是我们苏区团调剂成分的主要口号。

正确的调剂成分，加强团内无产阶级的基础，这并不是说可以允许一刻的对于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与中农青年的关门政策，这种政策是一刻不能容忍的，必须大量的来吸收最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与觉悟的中农青年入团。少共国际对于这方面的指示：团一方面维持着青年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还是努力的吸收劳苦青年群众和其他的贫农青年，并且青年团也允许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和中农青年来加入队伍，只要他在工作中表现积极革命的就好了（少共国际纲领）。

少共国际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团吸收中农青年有下面特别的指示：“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当对于中农的策略是不但使之中立，而是与之联盟的时候，则团更可较广泛的吸收中农”（同上）。这样的指示，对于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我们对于中农的策略是采取坚决联盟。因此少共国际的这一指示，对

于我们苏区的团是适用的，而且很重要的。

过去我们在调剂成分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政策。一方面是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如我们提出“一切青年加入团”、“贫苦工农青年加入团”；另方面却限制其他劳苦青年的入团，如机械的提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的无产阶级成分。如在兴国，全县只有一八四四个青工（据他们的统计，全县已有六九四一个团员）。如果机械的去调剂成分，就会限制其他劳苦青年的入团，对于他们关门。

三　与流动现象作斗争

流动现象在苏区团内还是很大，在有些情形之下，使我们的团没有任何增长。使苏区团发生流动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这些原因除了一般的原因（如支部工作的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新团员没有分配适当的工作与进行必要的教育）不说外，发生流动性的重要原因是征收团员的方法，大部分的情形是在会议上进行的，没有日常的征收工作，关于这一点，在上面总结红五月征收运动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讲到。用在会议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这不仅是在红五月中发生过，而且春天冲锋季中也发生过。不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日常的工作上去，要克服流动现象是没有可能的。

随着广大的加入团的潮流，必须开展广大的对新团员的教育工作与团的教育网。在红五月的征收工作并没有去加强对新同志的教育。可惜我们没有对红五月新团员教育的整个统计，只有个别区的材料，如在兴国方大区征收四十个团员，只有十一人受了支部的训练，在瑞金征收了一一八一人，只有五百人受过支部的训练。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对新团员的教育并没

有广大的开展起来。

因为缺乏对新团员教育与没有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我们常是听到同志们告诉我们说："有群众说加入了也是一样工作，不加入也是一样工作"（万太、文圹的报告）。因为我们缺乏对他们的教育与没有分配适当的工作，使新团员感觉到他们加入以后与没有加入是没有什么区别，使他们很容易的流出去。

为着坚决的克服流动的现象，必须：（一）转变我们征收工作的方式，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日常的工作上面去；（二）改善支部的工作，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发展团内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健全支部的生活；（三）发展对新团员的教育与团内的教育网。

四　为团的正确组织政策斗争

为群众的团的斗争，在全国的苏区内，在最近的期间，为着拥有百万团员的共产青年团而斗争，在中央苏区应当最迅速的把几万团员的团变为拥有几十万团员的团，应当立即来实施少共国际纲领上所指示的"一定要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应当立即来实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议"团员赶上党，超过党"的任务。

为布尔塞维克的团斗争，使团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团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特别是干部的工人化。团必须在正确的调剂成分的政策之下，"团的门开向一切男女青工"，使拥有百万团员的团有着强固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能够使团真正的成为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团。

群众的团！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团！这就是我们组织政策

的旗帜的标帜。

我们在国际青年节的入团号召中，经过今年的国际青年节，使我们的团能够走上“群众的团，布尔塞维克的团”的道路上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我们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自占领了东三省热河，为长城以南平津以北建立了完全在它统治之下的“缓冲区域”之后，正在动员它的武装力量向着察哈尔、绥远前进，预备在“满洲国”之外创造它的“蒙古国”，并且计划如何建筑横贯西北大铁路，如何联合华北的各军阀建立第二个傀儡政府，来并吞华北的全部。

英法帝国主义的赞助日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配合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并吞了西藏、西康，并且正在利用四川军阀的内战，新疆回民的暴动，准备直接向四川、新疆进行武装的侵掠。法国帝国主义在云南、广西、贵州的殖民地政策也正在加紧的进行着。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组织国际联盟之下，已组织了瓜分中国的专门机关。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同样是为了要把中国完全放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六十期。

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是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而且全中国有六分之一的民众已经直接在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过着悲惨的奴隶生活。

在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全线进攻的前面，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但是一贯的不抵抗与投降、出卖，而且积极的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充当清道夫。它在东北强迫抗日的兵士停止反日战争，有计划的出卖东北义勇军，使义勇军走向失败。它在全国以白色恐怖的屠杀镇压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它签定了出卖东北四省的华北停战协定，在大连会议上正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与“满洲国”的外交官“握手言欢”，庆祝卖国的胜利。它协同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一致的向着察哈尔、绥远进攻，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早早完成“蒙古国”的创造。

同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更派出专使宋子文周游各帝国主义的首都，进行大规模拍卖中国计划。以出卖整个中国为条件，宋子文从美国取得二万万元的棉麦借款，从英国取得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从法国取得一千万元，德国取得二千万元的借款，并从取得借款的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购买了大批的枪炮飞机以及一切杀人的新式利器。即以飞机而论，就有二百架以上的轰炸机与战斗机！

国民党以大规模的出卖中国，求得帝国主义财政上军械上与人力上的帮助创造了三十个新的主力师，不但不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是为了要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民众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最大阻碍——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五次“围剿”，使帝国主义更能顺利的把中国完

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正因为这样，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以至四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企图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肃清道路。然而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惨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他是不能战胜的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兴奋了全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更清楚的告诉了全中国的民众，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

以蒋介石为匪魁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必要的与主要的步骤。每一个工农民众，每一个革命分子，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一“围剿”是在国民党签订华北停战协定之后，是在国民党在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财力武器以及人力上的帮助之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是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当清道夫的最好的事实上的证明。为了帝国主义能够顺利的瓜分中国，国民党不惜使用一切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它利用飞机来轰炸，大批的毒瓦斯弹以及一切新式的杀人利器来屠杀苏区不愿再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生活的劳苦民众。它以经济的封锁，禁止苏区生产品的输出与非苏区油盐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的输入。它组织大批的武装队伍拔苏区的青苗，割苏区的谷子，毁坏苏区民众所有的一切房屋财产，企图这样来饿死冻死苏区数千万劳苦民众！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紧急

关头！在我们的前面有着绝对相反的两条道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中国的道路！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剥削与负担加在全中国民众的身上，吸尽你们所有的骨髓，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群众的反抗，调动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向着苏维埃区域进行五次“围剿”，一切这些是为了要把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也正在动员全中国与全苏区的工农与一切革命的民众，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一“围剿”，是为了要彻底击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为要把全中国的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为了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全中国的民众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开展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争，进行群众集会、罢工、示威、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拍卖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五次“围剿”，反对中国地主资本家对于工农民众最残酷的剥削与白色恐怖的屠杀，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进攻，使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协同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直接作战，开展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全中国的民众们！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呵！我们过去已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扩大与巩固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我们现在一定能够继续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取得中国革命更伟大的胜利！

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一）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各省县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暂行条例另行规定。

（二）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三）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对于下级的组织及党员个人，认为有违反党章和决议及破坏党纪情弊发生时，得遵照党章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议决施以处分等。

（四）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

（五）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在其职权内进行

工作时，得指挥下级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或党员执行一定的职务。

（六）中央党务委员会以党龄在五年以上的党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七）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为议决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的最高机关，凡不服省县监察委员会或党务委员会的处分决议者得向中央党务委员会上诉。

（八）区一级暂不设立监察委员会，区委对其所属支部或党员个人，支部对属于该支部的党员，认为有处分之必要时须决定其处分。不服支部处分者得向区委上诉，不服区委处分者得向县监察委员会上诉。区委或支部收到申明不服处分的意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即须转送县监察委员会。

（九）支部决议开除党员的党籍时，须遵守党章第六条的规定报告区委批准，区委仍须附具批准理由，报告县监察委员会备案。

（十）任职中央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主席的党员为党务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中 共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九一八”二周年纪念迅速的到来了，必须以战斗的动员来进行以下的工作：

一、抓紧日本帝国主义两年来继续不断的对于满洲、热河和华北的工农劳苦群众与义勇军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继续对于察哈尔积极的进攻，同时借口要求偿还西原借款，准备新的对中国的掠夺等等事实，广大的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的反日运动，进行一切反日的组织与斗争。

二、必须加紧开展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战争，广大的进行武装群众与组织群众参加到义勇军中去的运动，加强各地义勇军中的领导。河北党必须以战斗的动员革命的工人农民与反日的战士去加强扩大前线的抗日运动，满洲党应十百倍的努力去加强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中的领导与组织。同时河北与满洲党必须开展农民的一切抗捐抗税的运动，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抗政府的一切命令，发动游击战争，以扩大与加强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北方的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在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以及“满洲国”的士兵中，号召与组织革命的士兵来参加民族革命的战争。在日本军队中亦应艰苦的进行哗变的工作。

三、“九一八”二周年纪念运动中，必须最高度的进行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的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拥护世界反帝同盟，成立反帝同盟分会等工作，选出代表来参加欢迎代表与参加同盟的代表会议。河北与满洲党更应发动群众选出代表欢迎同盟代表到北方实地考察的运动。要使这一运动尖锐的与国民党欢迎李顿调查团与信赖国际联盟的无耻行动对立起来。这一运动，必须视为今年“九一八”中的一个中心运动。

四、国民党南京政府协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以流血的战争来进攻察哈尔的武装的抗日力量与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成立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将察哈尔奉送于日本。我们党，首先是河北的党，必须紧张的动员工农士兵群众来反对国民党继续的出卖，反对冯玉祥和其反动长官的投降，组织士兵的武装反抗和群众的游击战争，以为创造华北苏区开辟道路，奠下基础。

五、有力的进行反日的斗争与罢工，特别抓紧日本企业中的一切反对减工关厂、取消月赏、延长工时、武力压迫等斗争，来组织反日的罢工运动。满洲、河北、江苏的党必须加重对于中东路、抚顺、北宁路、唐山、平绥路、天津、上海等处反日斗争的领导。对于因受日本两年来进攻所遭受失业的工人与难民中的工作，也必须有计划的去进行。加紧组织工人反日义勇军的工作。

六、在国民党出卖和协助之下，满洲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我们党，首先是满洲党，应动员群众来首先破坏日本在满洲各种军事意义的建设，含有战略作用之铁路的建筑等，反对日本以武力攫取中东路的任何企图，揭破日本御用以反对苏联的“华东共和国”，在满洲军队中更须加强拥护苏联的宣传与组织，驱逐白俄与反对武装白俄等。

七、必须指出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瓜分的急进，国民党的请求国联技术合作与大借款项，更加彻底完全尽其出卖整个中国的无耻与进攻对于中国革命与红军苏区的凶恶。另方指出红军苏区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伟大的胜利，更加有力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应该在群众中广大的宣传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加紧进行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运动。

八、利用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各派最近完全暴露出来的吞没义勇军捐款的事实，动员群众组织清算捐款委员会，号召群众起来没收这些国民党和反革命派别的财产，援助义勇军与救济失业群众与难民，同时逮捕这些吞没捐款的汉奸，成立群众法庭来审判，广泛的解释、揭发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年来替日本瓦解和消灭义勇军的罪恶，来开展反国民党与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党应在这些斗争中同时进行开展募捐与抵货的运动。尤须反对国民党利用“航空救国”的捐款买飞机轰炸苏区的劳苦民众。

九、征收党员的运动，特别要在铁路、码头、兵工厂和士兵群众中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应为这一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战斗任务。

十、应该动员党、团、工会的一切力量来进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的示威运动、飞行集会与车间会议。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开会的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个苏维埃革命运动创造了新的中国——真正工农民众自己的中国。而国民党——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维持着中国封建残余的统治，维持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调动着一切反动势力来进攻苏维埃区域。这是两个政权的斗争：国民党的政权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权，他宁可奉送东北四省以及整个中国北部给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而且供献进攻苏联最便利的军事根据地给日本，他宁可公开的和秘密的大借外债——美国的棉麦借款，英国的钢铁借款，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和兵工厂借款，出卖中国民族的许多权利……目的只在于动员军事上财政上的一切力量来进攻苏维埃区域；它是在临死的挣扎之中保护着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保护着买办和资本家的剥削利益，因此，实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屠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九期。

杀政策。苏维埃政权却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它是唯一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在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完全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苏维埃政府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国民党军阀因此更加努力的包围苏区，使中国红军不能够打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政府之下，新旧军阀完全消灭，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已经完全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以及一切非剥削者的劳动人民却享有一切政治上的真正自由和权利；一切民族之间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完全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为着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是要把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是要消灭一切种种封建残余的势力，首先就是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是要开辟真正经济上文化上的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才能够挽救中国的灭亡和瓜分，才能够避免中国几千百万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和屠杀之下的死亡，才能够挽回中国经济上的总崩溃。

二、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的两年，更加表现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运动的强固的力量。国民党军阀用十倍的兵力，几十倍精巧的现代武器，想来消灭苏区，而结果是相反——他们四次的“围剿”都被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民众和红军打破了。苏维埃区域虽然也受了一些损失（鄂豫皖区和洪湖区），但是，苏维埃运动在全国的范围里反而更加扩大了，苏维埃的中央更加巩固和坚强了。这种胜利的发展就在于全国民众的拥护，广大的几千万的苏区工农自动的“退还公债票”——他们买了公债之后不要苏维埃政府偿还，他们自动的借粮食给红军，妇女和儿童都非常热烈的慰劳红军大批的积极的加入红军……而白色区域里的工人和民众拒绝运输白军，反对进攻苏区，国民党军队里的兵士群众一批一批的转变到红军

里去。这些，都表示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国民党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更无耻更公开的出卖中国，以至于恭请国际帝国主义来共管的政策，空前的白色恐怖和压榨，人造的巨大灾荒和失业破产等等，已经很难支持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另方面，这表示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能够正确的指导广大的中国劳动民众，指导工农的阶级斗争和红军的战斗，所以使得几千百万的穷困破产饥饿的群众得到自己的斗争和解放的正确道路——苏维埃的革命。中国的民众只有向着这个目标发展自己的革命斗争，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解放。今年十二月十一日要召集中国苏维埃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检阅全国真正革命势力与总结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大会，他将动员全国更广大的群众积极的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来奋斗。必须使全国各种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革命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等，深刻的了解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和现在苏维埃区域的状况。

三、国民党统治之下，工人群众受着极端严重的压迫和剥削，大批工人失业，只能够挨饿、挨冻、讨饭……而在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实行了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成年工人每天八小时工作，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工人六小时，十四到十六岁童工四小时，工人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求知识、休息、娱乐；女工有特别的保护，例如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而工资照给等等。每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都由劳动人民委员会规定，而且每半年检定一次，使得工人所得的工资至少可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失业工人以及受伤、生病、衰老的工人可以得到相当的津贴，——这种社会保险费用不着工人在自己的工资之中储蓄（而且禁止资本家借口储蓄制度而克扣工资），这种费用都由资本家负担，或者由国立企业特别支出；此外，工厂作坊的设备

必须合于卫生，免除危险，这种设备都要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劳动人民委员会检查批准，否则不准资本家开厂等等（参看“劳动法”）。赤色的职工会享有绝对的自由和代表工人的合法权利，工人群众的言论、出版、罢工、集会、结社都有绝对的自由。工会和工人能够充分自由的监督资本家执行这个劳动法，和资本家订立雇用各种条件——集体的劳动合同。对于工人的这些权利，苏维埃政府是绝对保障的。苦力、雇农和手工工人也受到同样的保障。

四、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农民群众受尽地主、军阀、官僚、高利贷、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者的政府不顾农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水灾、旱灾、蝗虫、瘟疫特别来得多，现在使得至少一万万以上的人都变成了灾民，活活的要饿死。而在苏维埃区域里，农民群众赶走了地主分配了田地，贫农和雇农尽先分得土地，中农自己愿意也可以和贫农群众共同分配田地。凡是以前出租的田地完全没收，所以不但一切地主的田地都没收了，就是富农的田地也要没收。而富农自己耕种的，仍旧可以分得较坏的田地。这样，一切耕种田地的农民群众都可以分到田地（据有些区域的统计，大抵每人八担田到十五担田）。以前要交纳的田租，现在不要交了，而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和田赋正项等等，也完全取消了。苏维埃区域的农民只要交纳一种极少的农业税，按照每人的收入，用累进的原则征收。以前的高利贷的本利也完全取消，以后的借贷规定月利一分为最高利率。农民群众的经济就改良得多了，地主消灭了，富农的剥削受了限制了。同时，苏维埃政府帮助农民集中耕具、耕牛，改良种子、肥料，储蓄粮食，修理道路，兴办水利……尽可能的防止天灾。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着巩固的保障。

五、国民党统治之下，兵士的生活是极端的困苦，而且要在军阀混战之中做炮灰，要被强迫的去打红军，而同时被禁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苏维埃区域之中，红军的兵士——就是工人农民的武装——他们享有着苏维埃政府和民众的优待。红军兵士的生活完全有保障，待遇上和指挥者——红军的团长、师长等等完全平等。而且，红军兵士在前敌作战，他们在乡下仍旧可以分到田地——由本村本乡的农民帮助他们的家属耕种。家属不在苏区的红兵——例如从白军转变过去的兵士——一样可以享受分田的利益。苏维埃区域的乡下，每一乡区都特别留下“红军公田”，由当地的农民群众代替耕种，而收入拨归这些红军兵士。如果这些“外籍”红兵退伍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公田”之中分到自己的一份田地。最重要的是，红军兵士的作战是为着工农民众自己，为着自己的解放，为着改造整个社会。因此，红军和白军完全不同：在红军的队伍里，不但没有种种愚民政策，而且竭力发展文化工作，使每个红兵都可以得到新的知识，成为自觉的革命的战士。

六、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苏维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做了政府的主人，然后这些保护工农的法律才有具体的实现的力量，然后军队才成为真正保护工农兵士自己的军队，苏维埃就是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代表会议，这种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自然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决定并且实行保护工农兵士的法令，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女性等等。同时，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却不能够派出代表参加这种会议，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民主制，真正代表极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因为只有剥夺一切剥削者的参政权，才能够

保障政府机关不受他们的支配，而成为消灭地主阶级，限制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政府，这是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凡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别都受苏维埃政府的严厉的制裁。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建立了有系统的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和各级裁判部、劳动法庭等等。地主敢于私自收租，或者资本家敢于破坏劳动法等等，那末，苏维埃的法院立刻就会制裁他们，尤其是对于反革命的阴谋——就是反对多数工农利益的阴谋，有极严格的刑罚。

一般劳动人民以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贩、小商人等等——只要不是靠着剥削别人劳动生活的，只要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那末，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们的一般利益，都受苏维埃法律的保障。苏维埃区域的司法采取陪审制度，就是由当地的工农选举代表参加审判，一切罪状的成立都要经过严密的审查证据和多数陪审员的判断。此外，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建立了民警制度，由当地的工农民众自己编练民警队，维持日常秩序和公众的安宁，制止反动派收买利用的流氓的捣乱等等。

苏维埃区域的主人是工农民众自己，苏维埃的政府职员都是工农民众选出来的，或是各级执行委员会雇用的。苏维埃的代表如果不能够代表群众的意思，那末，选举人立刻可以撤换他们。而且有经常的控告局，任何一个人民都可以控告苏维埃政府的职员，而得到迅速的解决。

七、苏维埃区域已经在战争的艰苦的条件之中，开始了文化的建设。极大多数工农民众的儿童，以前是没有可能识字、读书、求得学问的。现在的苏区里却到处开办很多的小学校，贫苦人民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成年人的识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维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

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见。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不是像军阀国民党似的造成一些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驯服的奴隶，以及个人的升官或者发财的资格，而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凡是愿意为着民众服务，愿意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各种专家、技师等等，都受着苏维埃政府的优待。

八、自然，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在国民党军阀的轰炸和屠杀之下，还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建设的工作，然而尽可能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在发展民众的经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同样是为着工农阶级的利益而限制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区域里，邮政、公路、桥梁等等的建设已经有相当的进行。苏维埃政府领导着民众实行储蓄粮食，而创办粮食合作社；没收地主的耕具和牲口，没收富农多余的耕牛犁耙，组织“犁牛站”使贫苦的群众可以大家来借用；还竭力奖励耕种工具和其他工具的制造。苏维埃政府领导民众组织各种消费的和生产的合作社；实行大规模的春耕夏耕运动和秋收运动，奖励粮食生产的提高。就是私人资本家的生产事业，例如造纸厂、瓷器厂等等，只要资本家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也给他们一切必要的帮助。如果资本家抵制苏维埃政府，或是逃走，或是故意怠工破坏，那末，苏维埃政府就没收他们的企业，由苏维埃国家来经营。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自己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借贷款项给贫苦的农民，而且统一了货币。

苏维埃政府之下，除出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外，就只有一种累进的工商营业税。贫苦的农民、工人以及小商人，在一定数量的收入之下，一概免税，而一般的纳税人也完全不要交付

像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税捐。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确定的预算决算制度，每一个地方每一年度的支出和预算，都要经过当地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过。

九、总之，苏维埃革命是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的建立，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里的情形就证明了这些任务已经在彻底的实行着。工农兵士贫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良，他们已经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是在开始创造新的中国。这还并不是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品生产还并没有消灭，然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必然要开辟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广大的工农劳动民众只有在这个前途之中，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完全的解放。

十、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已经有广大的领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湖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许多县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尽力的进行着。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这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斗，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为着真正的解放的战斗，是不能够没有牺牲的。苏维埃区域的多数群众都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因为幻想着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立刻就是天堂，就可以坐着享福，那只会使反动派乘机反攻，而丧失工农已经得到的胜利。所以苏维埃区域里的劳苦群众都积极的拥护苏维埃政权，自愿的加入红军——使得工农红军迅速的扩大，自愿的借出粮食，推销苏维埃公债，集中一切力量、知识、技能、经费……来为着扩大苏维埃区域而斗争，要在最近期间，把分散在各省的苏维埃区域联成一片，夺取更大的城市，完成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种胜利的前途就是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末日

的接近。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帮口和派别，现在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对苏维埃与红军实行第五次的“围剿”，轰炸、屠杀、封锁……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他们自己这样制造着“匪区”里的灾祸，他们却又造谣，说“共匪杀人放火”，说“共匪毁灭生产”，造作千奇百怪的谣言来诬蔑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诬蔑几千百万反抗起来的工农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督促着，指挥着国民党军阀，借外债给他们，用大批的武装、飞机、大炮等等供给他们，使他们来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这也就是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十一、全国的工农兵士和一切劳动民众都应当派代表去参加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当赞助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拥护苏维埃和红军——揭穿国民党等的造谣诬蔑，拒绝运输白军，反对五次“围剿”，反对一切“剿匪捐”，反对借外债来屠杀中国民众，帮助红军的作战，转变到红军队伍里去。而且一切工农民众为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为着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军队，为着解放自己，为着改良自己的生活，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都应当争取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会议的政权。而全国的地主豪绅买办资本家都在帮助国民党的军阀官僚进攻红军苏维埃，也就天天的压迫和剥削民众。因此，只有发展工农的阶级斗争，发展兵士群众直接反抗军阀的斗争，发展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发展民众自动武装实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才是拥护苏维埃政权——庆祝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大会的行动。拥护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发展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全国斗争，创造新的苏区，必须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瓜分、共管的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

进攻苏联的运动联系起来，尤其必须和各种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

（关于苏维埃区域的材料，在宣传的时候，必要应用《苏维埃中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优待红军条件》、《对日宣战通电》——都见去年出版的《新中国》）。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对目前形势和军事部署的指示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周：

沪来电转如下：

（一）由于你们最近战胜了十九路军与广东军队的一些部队，我们今后继续执行计划的一般条件是更加顺利了。不过对于这些胜利结果，付了太高的代价，因此应该得到以下的教训：不要过于费力企图夺取城市和堡垒，应将这种企图当着次要的目的；主要的应该威胁城市，诱引敌增援，以便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

（二）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以下的步骤：

甲、八月间我们在福建的中部，至少应该消灭敌人的两师，以便在五次“围剿”开始时，即破坏协同的计划。

乙、我们必须在协同围攻开始，布置强大的胜利的部队达到邵武区域，以便后来逼敌人于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央军消灭西方某些部队之机会，同时东方军应与（七）[1]一军团完成合作以后，更应与兴国红军合作，共同消灭东方的敌人部队。在第二阶段中的作战，主要的注意力是在东北方。因此在九月前，为着对付五次“围剿”我们对于整个兵力的分配，有

以下的理由提议：从我们全部的兵力中，东方军应占百分之四十，中央军应占百分之三十，东南与南方战线合起来，应占百分之十至十五，中东路的区域的后备队应各占十五至二十。

（三）为着便利于东方军，在八月间在福建中部的行动，我提议调五军团的一师到建宁、太宁的方面去，以便与三军团合作进攻将乐和顺昌，使敌人在八月二十左右，□觉察到这些作战的影响，而便利于三军团行动。

（四）东方军团的战斗员在八月应达到二万人，不要继续大规模的行动，反对广东军和十九路军应在八月间即集合那里的力量，并使之集中于积极的游击队的□，以便当敌人企图继续进犯苏区时，给一勇猛的反对。

（五）必须准备着防御敌人的飞机轰炸中区，我们预料南京在开始进攻以前，将开始轰炸，应严重的注意各方敌人的行动，及受训练的敌人军官团之行动。因为这些军官回去，就是表示敌人将在一周或两周后开始“围剿”的象征。

（六）因为我们没有详细的地图，请你们在电报中务必告过分小的地方距某个大的地方有多少米远，并在什么方向。

（七）我们采取在十九路军的士兵中作广大的政治运动，号召他们不要再打工农红军。若他们指出初次我们愿意不再打，他们与我们一起不打，匪的□□国与日本的南京政府蒋介石[2]，保卫福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告诉他们，日本已在厦门组织匪徒，准备在□侵略福建，特别应在东方军的活动区域广泛的散发传单标语。

中　央　局

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作战步骤的指示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朱、周：

沪来电转下：

一、因为不久以前，你们报告我们占领丰城，所以我们提议夺取吉水，现在条件概已改变，新的敌人力量已向赣江移驻，我们并不坚持这一意见，不过着重指出：应在赣江附近、乌江以南创造根据地，并在新淦、峡江与永丰之间，布置强有力的游击前哨。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乱敌人的羽翼，不让他安然改编，而使我军在敌人没有开始进攻以前，可以相安无事。

二、三军团由于炎热的天候与缺乏粮食，而致削弱，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下的步骤：

甲、仅以二十三师与模范团执行你们反对广东军队的计划，然而这些力量，直至八月半，还不得手。我们提议停止反对广东的较大行动，而以游击军队集中在会昌东南和西南，在于都并应有我五军团之一部，以便准备着：广东军队如向北进攻时，给他一个反攻，在这时应即放弃收复安远及其他失地的计划。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不能举行两个进攻的，反对北方敌人，又反对广东。

乙、在八月上半月，如广东不积极进攻，我们可以从南方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来帮助东方军团。

丙、如若闽南的条件允许时，我们应企图逐渐将东南反对十九路军的战线安静下来，以便集合我们的力量，小心的准备，如我们对付广东的敌人一样。如是尽可能的使我们的力量，挤开南方的敌人，着三十四师，仍应继续钳制连城的敌人。

丁、三军团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开始向北，到达将乐行动，应采夜间的轻便行军，与敌较大的冲突应该避免危险于我们的行动，使给养及粮食没有较大的关系，不要占领任何城市。我们在移动时分成两纵队，以从将乐的东方和西方，同时渡河，当我们纵队还没有取得河之北岸区域。与第三军团没有从西方来援的时候，我们同时进攻将乐的警卫队，同时渡河，必须对延平的方向掩护。

戊、从现在起，最大的注意应该集中在转入计划中第二阶段的实力。为达到此目的，三军团必须加强起来，七军团应开到将乐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十九师及其他新编部队，如新模范团，应立刻编入三军团，在八月半以后，训练的力量亦应编入三军团。

己、五军团的主力应留在雩都、兴国的区域。作为南和北方战线之准备军，现在还没有必要详细告诉你们。第二阶段开始时作战的布置，根据三军团向北移动的结果，与整个东方军团从各方面加强的情形，你们可以比现在更大的作出战争的规模。现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该能及时的电告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使东方军移向将乐、顺昌、邵武之间，集中河岸以北，并在八月中得到配合。沙县、清流、旧化，应在三军团以外，调动其他的部队驻守，例如少共国际师。如果由于时间

短促不可能，可暂时的由三十四师的一部驻守。

三、告诉我们三军团实际损失的情形，友军反对十九路军与广东敌人的我军情况。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对行动部署及任务的指示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周：

沪电转如下：

（一）我们同意你们在赣东北方面的部署，这些部署其目的就在：

甲、以独立二十师与二十一师，掩护东方军的外翼，同时钳制资溪以东的敌人。七十九师、五十五师、四师及二十一师，给我十军以直接的援助。在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到达崇安、蒲城区域以后，并可以小的队伍，如闽北独立团，向崇南袭击，钳制建瓯的敌人，并与政和的土匪取得联络。

乙、在我们所希望的顺昌、将乐取得以后，东方军在上述独立团与二十一师掩护之下，即应率领三四个师，转向邵武、光泽、资溪，而只以小部队，如六师、十五师、二十师，即应从黎川以西的区域，向金溪进发。他们应在东方纵队开拔的数日后开始行动，无论如何不要因取得了邵武延迟了这两个队伍消灭敌人五六两师的共同任务。我们西方的黎川方面的部队，必须制止敌人渡过抚西逃跑的企图，同时截击南丰、南城方面来的敌人。而东方的部队的任务则在南丰敌人阻止金溪谋北退去。要知道在黎川、资、金溪的区域，没有完全肃清敌人以

前，我们以后的行动将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这一任务，应在九月的三个礼拜以内完成。估计到敌人的进攻，加速我们的步骤是有很大意义的。

（二）在下面我们要说到第三阶段中我们多少可能的行动，作为初步的意见，请你估计到军委与相当的军事指挥者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告诉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我们想在我们消灭了五六两师及八师敌人派遣的新的力量，肃清了黎川、资溪、金溪区域，与掩护的部队一起扩大了我们的活动到东乡、进贤，并钳制了敌人七十九师、四师、五十五师、二十一师于邈远的东方及东北方，以引我们将进至我们的主要作战的下一步骤。现将我们对这一步骤的意见，写在下面：

甲、东方军团与中央军的联合行动，来进攻南城、宜黄之间的敌人，其目的即在：

乙、使东方军团易于渡过抚河以西。

丙、消灭南城、宜黄、抚州三角区域的敌人实力。

丁、击破南城与宜黄之间的堡垒区域的敌人左翼。

戊、仗我们的力量，稳固的驾驭抚河，以便根据形势，继续以后作战，去依照敌人进攻的阶段，来决定我们到西北去，还是到西南去。

（三）为达这一目的，必须：

甲、东方军不仅向抚州威胁，同时准备率领四五个师，在抚州、南城之间浒湾、东馆等处过河。其目的即在突然的向宜黄方面的敌人六十七师、十一师及凤岗九师进攻。东方军在抚河以西突然出现，将很大的帮助中央军的行动。

乙、中央军在永乐行动，威胁乐安、宜黄，移至东方以后，即应在宜黄区等待东方军所选择的过河时机。在这里一军团既能按时的离开了敌人，中央军即应留下十四师及一切独立

团，与宜黄的敌人作战。以第一军团然后由南方向南城进攻，东方军与中央军的作战尊重时间，以便在行动中从相对的方向会合，执行共同的任务。首先消灭南城、宜黄区域的敌人实力，其后占领南城、宜黄的堡垒。如若我们不能在突然的进攻中取得南城，则在消灭宜黄区域的敌人实力以后，必须取得他。因为占领南城，对于我们以后的行动是很重要的。

丙、我十四师与一切独立团的作战，亦应与上述的行动配合起来。他们应在乐安、宜黄之间行动，反对敌人的九十七师、九师与四十三师，主要的应从西南方面攻击宜黄。

丁、第三师在按日的移到北方以后，即应经过南丰之西开向南城，以便与第一军团在一起作战。

戊、十五师应停留在广昌的西北作为后备队。

（四）无论我们能够取得南城南丰与否，我们都必须消灭这一区域内上述的敌人十师，以便在抚河敌人的翼侧，保存我们的积极行动，威胁敌人的进攻。在那里如果敌人开始进攻，我们的任务亦可比从前更加容易，因为敌人实力的进攻，均在堡垒区域的外面，同时切断敌人的后方，与西南的堡量区域的联系，亦就大大影响敌人的进攻，使他一切侵入苏区的企图，成为不可能。恢复浒湾到南城以至更向南这一段抚河，必须留我们的力量，巩固的驾驭着。如若我们能够取得这一地位，则在任务需要的时候，都可向任何方向行动，当南城周围的半个圆圈，即从北方的浒湾，南方的南丰以至西方宜黄、乐、崇的水道，都在我们的手里的时候，我们以后便不怕河道在我们的后方了。不过有两个问题，必须预先回答的：

甲、在今年该时渡过抚河，在技术上是否可能？

乙、我们威胁和掩护的部队，能否驱逐从抚州来的炮舰？很明显的，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应早在游击等行动以前完

成，而行动本身，则须带突然的性质。

（五）为着阻止敌人的准备，你们应命令十六军从西北进行扰乱南昌区域的特殊任务。

中　央　局

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

---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

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

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

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

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

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通知*

——关于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各级党部：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在江西中央苏区举行。苏维埃政府已发出通知书，邀请全中国的群众选派代表出席大会。我们的任务是发动宣传鼓动工作，准备选举与派送代表至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立刻开始进行下列工作：

一、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和群众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之上选派出席大会的群众代表。

（一）首先要在各大产业中心选派产业工人代表。这里，江苏、河北、武汉和满洲的党、工会、团必须最广泛的发动群众工作以保证代表之圆满的产生。各厂代表选出后，须组织许多整齐的代表团，由代表团再选主席或首席代表一人，并以代表团的名义及经过代表推进各城市各厂的政治鼓动工作。

（二）在各主要农村里，召集农民大会，选举农民灾民代表，并应保证贫农中农及雇农的成分，及保证在农民代表团中之雇农和贫农的领导作用，努力达到经过这些农民代表在各乡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一期。

村成立农民委员会和各种拥护红军的群众的组织。

在白区的各游击区域里，尤应加紧这一政治鼓动工作，选送英勇的游击队员和抗捐军到苏区出席大会。

（三）在政府军队士兵、义勇军部队、各学校及文化界亦应选出代表，以推广苏维埃的影响。

选举代表的运动，应该广泛的进行，但各地党部应该按照规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另有通知），进行复选运动，不出席参加大会的代表，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其苏大会运动的工作。

（四）如有可能，在每一代表团内，必须成立党团以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尽量的利用选出来的代表，经过他们在各地各工厂学校及各部队中成立“红军之友”等群众组织。各代表必须经过群众大会选举，不准委派，代表的川资必须发动群众的同情募捐。邻近苏区的各白区的党尤应加强这一工作，以促进苏区之扩大。各地代表须于十月十日以前选就，俟接到专门通知时即行出发。

二、**在第二次大会的周围团结全中国的民众须要开展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必须根据中央政府的宣言和宣传大纲及其他材料对准各地的特殊任务，制定群众大会的报告大纲，翻印“第一次大会到第二次大会”的小册子，刊行各种通俗小品、画报、苏维埃区域地图及各种统计表，并限即日起各级党刊及其他刊物须全部转载中央《斗争》上的红军捷报与苏区通讯，召集各种群众会议。

（二）各级党部宣委须立即组织各种宣传队、标语队、散发队，以进行关于第二次大会之一切宣传事宜。

（三）在各地、各工厂、各学校须努力争取公开的活动以

动员群众来成立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分会（总筹备会在中央苏区业已成立）。

（四）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须达到通过拥护红军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与通电，由各筹备分会之通讯组及时发出，以资号召。在各级刊物上须另辟专栏登载各地筹备第二次大会的消息。

（五）向上海反帝组织提议，在各种名义之下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以扩大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其他各地，如有可能时，亦须组织。

（六）向上海及北平等处之文委党团提议，动员左翼作家创作关于中国苏维埃之文学的艺术作品并保证广泛的散布。

三、冲破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准备第二次苏全大会的中心任务。

四次“围剿”已经被英勇的工农红军和劳苦群众胜利的冲破。蒋介石国民党以帝国主义共管中国为代价，举行大借款，充实军备，以乘“秋高马肥”之际，举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我们党必须全体动员起来，组织白区的工农士兵群众来反抗第五次“围剿”。必须进行下列工作：

（一）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特别要用一切方法打入直接进行“围剿”的部队中去，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以至组织革命的兵变，这对于邻近苏区之白区的党尤负有特别的责任。

（二）在发动农民群众日常斗争基础之上，首先在赤白交界的区域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钳制敌人，协助红军而促进扩大苏区的任务之完成。

（三）加强兵工厂、铁路、水道运输工人中的工作，特别要建立上海码头的工作，以破坏和没收入口的军火来武装工

人。江苏党团海上区委和工联之码头工作委员会必须共同商量这一工作之进行的具体步骤，即日开始工作。

（四）五月份内，中央苏区红军新扩充了四个模范师，更于“八一”日正式成立了两个工人师及一“少共国际”师，应该在扩大红军的周围加紧武装白区工农群众的宣传与工作，动员产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和扩大募捐帮助红军的运动。

向少共中央局提议，检查河北团省委所发起的“河北青年”号飞机募捐运动。

（五）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行有组织的饥饿和经济封锁政策来进攻苏区，必须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饥饿政策，组织同情的援助。在邻近苏区的白区的党必须组织群众捣毁国民党创办的油盐公卖所等封锁机关，组织边区民众武装输送队等以破坏敌人的毒计。

四、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须与准备广暴六周年纪念的工作完全联串起来。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行动的几点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周：

沪电转如下：

（一）你们最近的电报，表示我们双方对于形势的了解，是没有分歧的。不过有几点必须提起你们注意，特别因为目前正在更顺利的条件，我们必须看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中的某些变迁，粉碎十九路军的左翼与停止广东军队右翼的进攻，给我们一种机会，能将我们的力量最大限度的转移到北方去。

（二）北方敌人在赣江的右翼已有八师左右的力量，同时敌人大概还要从吉安方面集中抚河以西的敌人的中路，亦已有了新的集中。由此就可以得到结论：我们在敌人还没有开始进攻以前，必须扑灭目前较弱的敌人左翼，这一任务到九月半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我们那时才能居于有利地位，停止敌人中路与右翼逐步企图。

（三）因此我们提议以下的初步步骤：

甲，在福建西南方，不要有较大的行动。在武平、上杭、龙岩的行动方针只发展游击的活动，正式的军队如三十四师，应集中在后方，准备即迅速的及时的回答敌人任何的行动。这

里主要的目的，并不是防卫已经得到区域，而是继续不断的扰乱敌人的实力。如若在这种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放弃连城时，也不要抽调任何新的军队来恢复它。

乙，对付广东敌人的策略，也是一样的，特别应在寻乌、安远一带发展游击使敌人疲于奔命。而使二十二师集中于右翼之后面，即□信丰之东北。

丙，驻于汀州、会昌的工人师，应暂时的作为三十四师与二十二师的后备军。

丁，其他一切的部队，特别是模范师，应该准备着加强我们在北方的力量。我们想在九月初能调动新的力量到清流区域，并要那里少共国际师会合起来，再向北移。那我们到九月半，即将有需两个新的强有力的师，作为东方军或中央军最亲近的后备队，至于归化清流的警卫任务。在九月初，我们即应委托某些独立团的队伍来担负。

戊，我们□□东方军，即三军团与十九师，业已首途北上，独立二十师、二十一师亦已在其右翼继续向沙县、延平掩护。我们任务就在八月以内，与兴国的力量合作，消灭将乐、顺昌警卫军队。引至郊外，那将更易于击败他们。独二十、二十一师应继续向延平，并其东方袭击，以掩护东方军的翼侧。如我们要得到充分的时间，在敌人大举进攻以前，扑灭他们的左翼。上述的一切行动，至迟在九月初必须完成。

（四）甲，九月初或者完结第二阶段的行动，应该是由东方军迅速消灭邵武的独立第四旅，并在九月半将一切增加的力量，集中在邵武、光泽、资溪区域。

乙，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在光泽、崇安、贵溪的三角区域以积极的游击战争，掩护东方军的右翼，完成了这种任务，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即告完结。

丙，同时当东方军取得邵武的时候，中央军应尽力使蒋[1]敌的中右翼疲于奔命，扰乱他进攻的准备，最后在第二阶段的末尾应留下小的力量，如五军团钳制永丰、吉水区域的敌人，以便所有中央军的其他力量，都能移至宜黄区域附近。抚河准备第三阶段与东方军联合行动。

（五）由于敌人右翼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必须改变中央军原来的企图，我们在第三阶段中，应有以下的改变：

甲，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应继续向东北活动，直至信江。

乙，东方军打击与消灭了敌第五与第六师以后，即应不迟延的越过金溪向东乡进贤区域，先头部队所至应尽速的达到进贤。

丙，根据威胁金溪事实及敌人中路的行动，即可决定第一军迅速移至抚河的以东的地点与时间，以便尽速的完成消灭敌人的左翼。

（六）此后我们在第三阶段中的目标根据以上的改变，仍旧是抚河。不过进攻抚州的先决条件，是要完全毁灭敌人左翼的实力。现在仔细的计划进攻抚河的道路与第三阶段的行程未免过早。不过在九月间，敌人的左翼既经扑灭，即或他的中路和右翼能开始进攻，亦将失去效力，同时使敌不得不重新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十月间消灭敌人四五师的目的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我们即可在别的方面，开始我们的进攻，使我们大部分力量，尤其在北方在西南给敌人新的在冬季进行新的作战。我们想目前应该指出：冬季作战前以便你们在将来行动的区域中，开始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秘密的宣传队与游击队伍等等。各季的作战，将来开始向信丰、赣江方面的粤敌左翼进攻，以便取得赣江的左岸，援

助我第八军的扩充，并开辟到赣南与赣西的道路。这一作战将需要三万至四万人，其余的应扼守保持苏区的任务。根据上述的冬季的作战，我们目前就应即开辟在雩都区域，创造□至一万人的新的部队，这些部队的训练应在新年开始时完成。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

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和你们断绝了交通关系将近一年，仅从报纸上和个别的捷报中，一般的知道了你们的斗争情形，曾由中央苏区转给你们一个短短的指示，许多问题，自无从谈起。这次，四川省委已与你们打通了关系，并由省委转来了昌浩[1]同志简要的给四川省委的信，仍旧无从了解你们的全盘工作。因此，我们只提出几个个别的问题，促起你们的注意，至于整个政治的和军事的指示，尚有待于你们迅速交来详细报告之后。

一、胜利的冲破四次“围剿”与第五次“围剿”中党的任务

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苏区及白区中广大劳苦群众对苏维埃与红军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的与完全粉碎了。我们巩固了原有的阵地，并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使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红军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增强了自己，覆没了敌人十几师，粉碎了敌人全部计划。这一伟大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在二三

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后结束了。东黄陂惨败后，蒋曾几次企图根据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这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防守政策，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的劳苦群众，苏维埃革命有强固与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免的受到惨败。同时在冲破四次“围剿”中，我们还有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主要的是未能将白区中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与红军胜利的配合起来，军事上未能建立全国集中的军事领导来配合各地进行战斗任务，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非常不够，战略与战术的活泼性很差，红军的组织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这许多工作中的弱点，妨害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在中国前面放着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或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或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完全瓜分中国以沦于完全殖民地化的计划。在这整个计划之中，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四次“围剿”粉碎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签订了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的“塘沽停战协定”，便抽调劲旅南下“剿共”；南京政府经过宋子文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大借款，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法西斯蒂的德国且专为国民党兴办了两个兵工厂，制造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武器；近且向日本直接乞援；大批法西斯蒂干部培养与调赣参加“围剿”；发行大批“航空公路”公债，剥削民众的血汗以充实“剿赤”的军费；拟定三年军事建设计划，开始召募与训练五十万完全法

西斯蒂化的军队，五千架战斗机与两千辆坦克车等，以大规模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召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和对苏区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帝国主义的作用更加强了，成立了共管中国的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步骤。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更进一步的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天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走近崩溃，更加使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

中央认为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战斗任务。

（一）苏区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领土及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号召与动员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2）继续猛烈的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团，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以实际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制的步骤。

（3）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4）红军各部间须在整个的战争意志下进行战斗的任务。

（5）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组织与援助白区

的群众斗争，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开展查田运动，巩固与中农联盟，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

（6）在胜利的冲破五次“围剿”的口号下，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7）为保障红军的给养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开展合作社运动、秋收与粮食收集储藏的运动。

（8）党必须加强附近苏区的白区中的工作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二）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反国民党的新的煽动，号召并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与群众会议，尤须加强在码头和运输工人中的工作。

（2）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信，注意争取我们对于满洲、河北及其他各地的游击运动的领导，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及在广大群众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之兄弟联盟的口号，加强拥护苏联的工作。

（3）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广大的群众工作，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攻。

（4）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的日常斗争，并引导到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

同志们！中国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火焰中。在完成这些任务中，你们光荣英勇的红四军实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二、目前四川的形势与红四军及四川党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

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顺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这一顺利的形势决定于：

（一）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据《申报》所载，谓红四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广、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区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红四军入川后，更加兴奋了四川劳苦群众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演成了武装战斗的形势，树立起声势壮大的抗捐军和川中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这是削弱敌人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三）四川各系军阀间的冲突，又一次酿成了全川的军阀战争。刘文辉固然败退岷江西岸，或更被迫退入康边，但刘湘所领导之下的联军亦已创伤不小。而四川的统一，除我们以革命战争来完成外，对任何一个军阀都将是梦想。联军内部的冲突依旧是存在，防区割据的制度并不会就能消灭，这将继续牵制各派军阀，彼此削弱自己的力量。

自然，对于这一个基本上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骄自满，过于看低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轻敌而使鄂豫

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中央同时要求你们严重的看到下面的几个事实：

（1）据天津日本军事情报处报告，英公使蓝博生到四川重庆去的主要目的，是同刘湘讨论划定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和这两处贸易的可能，并且谈判二千万的英国大借款用以购买飞机、军火和其他商品。同时法国总领事梅礼霭也曾到过重庆，进行怎样把法国势力更深入到四川而巩固起来。这些事实，使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都不得不认为："……四川军阀……接受新的借款，英国人就不但得以统治西藏而且可以统治四川了。此外，联合进剿四川东北边境红军的事实，也很有可能性"。

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四川革命运动的壮大，使得四川的统治阶级更直接的乞援于帝国主义，而且使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感觉到他们在西北统治的致命威胁。英国之实际占有西藏与向东进展，实在积极准备着就近的军事根据地，以企图直接武装干涉四川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法帝国主义者虽与英有利害的冲突，但在压迫苏维埃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你们应当看到这种逼近的危险，来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2）最近四川军阀战争以刘文辉之惨败渐趋结束，而刘湘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积极督促与帮助之下，对你们大举进攻的危险更加紧张，并将首先驱使四川较小的军阀为"剿赤"的前锋，以消磨我们的力量，而造成他的"优势"。南京政府蒋介石将更多依重刘湘，资助他来与我们为敌，你们决不应该轻视这一个反动武装所给与我们的困难与威胁。

（3）四川党的薄弱，没有很好的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还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这些游击队伍中，有的还在反动豪绅操纵之下，没有完全夺取到我们领导之下，把他们的行动汇合起

来，统一起来，很有被军阀武装暂时击败的可能。

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锐敏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的形势是给你们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极大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变成实际。自满于胜利的可能性，而不以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斯达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的指示，是值得你们深刻去了解的。

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你们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是：

（一）巩固现有的苏区与将这些苏区联合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的支柱，没有红军则苏维埃政权无从树立得起；苏区是红军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

（二）为巩固苏区与向前扩大，必须加强和扩大红军。中央认为你们有一切可能和必要在今年内创造真正富于战斗力的主力军五万人。这样，才使你们能打碎任何敌人的优越部队和夺取中心的城市。

（三）必须动员你们一切力量和整个的四川党来争取十数县以上的抗捐军的领导，及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

战争。报载川滇边（古宋一带）的游击队拥有四千余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务必派人去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整个计划中行动，以配合红四军主力的作战。

（四）你们现拥有三千里以上的苏区，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使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非常必要。

（五）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六）加紧反帝的工作，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开幕，你们和四川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以加强反帝工作来拥护这个大会，应加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及到处建立反帝的群众组织，筹备召集救国御侮的代表大会等，以动员群众。

（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今年“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你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二苏大会。在川陕各苏区举行各级苏维埃代表会，并选举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务须于十月底即派来上海。

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加强全线上的工作，工会工作尤居首要。你们应巩固与省委的联系，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

三、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的每一成绩，都将增加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国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亦遭受‘赤祸’之蹂躏

盘踞，将来发展，宁不可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中央向你们和红军四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昌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一）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破产了。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空前的浩劫（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陷于饥饿、失业、破产、贫困的深渊中）。帝国主义公开瓜分中国，造成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罢工运动空前的高涨，反帝斗争蓬勃的生长，农民运动普遍发展，特别是红军与苏维埃的伟大的胜利——这些都表示出中国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与剧烈化。中国革命剧烈的发展，形成了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殖民地化的国民党道路，一条是自由解放独立统一的苏维埃道路。

国民党的破产，使得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它曾经企图采用各种新的欺骗手段，以继续自己的血腥统治，如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以至于无所不有的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开放政权"等等。然而，这些企图都遭了可耻的破产。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之下，地主资产阶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三期。

级的反动统治，只有更加崩溃。为了更凶猛的摧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为了镇压反帝反国民党的一切革命运动，为了进攻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垂死的反动统治，于是法西斯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这不是表示反动统治力量之加强，而是表示它的力量之削弱。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与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虽有共同之点（疯狂的白色恐怖，摧残共产主义先锋队，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它有种种特点。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政党，那么封建残余占优势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不能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派别。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去实行“对外政策上极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国际纲领”），那么成了帝国主义工具的中国反动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却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之下实行出卖民族利益和替帝国主义侵略作清道夫。如果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是在统一的独立国内而能采取独立的政策，那么，殖民地化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只能采取以帝国主义意志为转移的政策，适应对中国瓜分共管的政策，绝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统一。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支柱，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最反动的一部分力量上，主要的是军队、警察、民团、侦探、官僚、政客、革命叛徒和上层知识分子等等。法西斯蒂抱定一个目的“不断的进行争取士兵、团丁、警士……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的独裁政治，并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义，乃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见《政治评

论》五十六期上《中国往何处去?》一文）。但是法西斯蒂无疑的企图去影响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如经过青红帮等的流氓组织去收买一些工头与落后的工人，并且“以富农为骨干”去压迫农民群众（见蒋介石编的《匪情之分析与对策》小册子）。

（三）中国目前的法西斯蒂运动，是以卖国罪魁蒋介石军阀为主动且为他所御用的工具。法西斯蒂的组织，称为“蓝衣社”，又名“中国青年同志会”，它的前身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主持的CC，奉蒋介石为领袖，后来吸引同情他们的分子，遂形成现在的法西斯蒂组织。这个组织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间在南京正式成立的。发起人是贺衷寒、康泽、酆悌、曾扩情等等黄埔学生，他们现在也成了该组织的主要角色。按其党员成分说：法西斯蒂组织实际上是黄埔同学会的扩大，其中占重要地位的也是黄埔系人物。

法西斯蒂的全部活动，完全决定于卖国贼和刽子手蒋介石的行动与意志。他们称蒋介石为“领袖”（行文中遇此术语时必须另起一行），为“本会会长”等等。他们介绍会员时，先要考核对象“对领袖的认识如何”，“对本会会长之态度，尤应特别注意分析”；在考察会员生活时，先“从其所发之言论，所读之书，考察对领袖的信仰”；在宣传时，先“使民众认识本会会长的救国苦心及勇健行动”；在决定“斗争方式”时，应“基于拥护并扩大本会会长的政治主张及威信”，“因为我们领袖是政治上实际的负责者，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不能采取破坏现有行政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方法，以增加领袖的责任和顾虑”。

法西斯蒂的纪律是“盲目的绝对的服从”，是“棍棒的、机关炮的、炸弹的”。对于会员的处分，用各种奴隶式的刑罚，如禁监、罚钱、苦工、通缉、私刑等等。法西斯蒂所用的指示，俨如官场的公文命令，如“切切此令”、“转饬所属一体遵

照等由……为要”。法西斯蒂对于群众采取侦探的手段，他们所规定的“工作路线和方式”之一，就是“随时侦察——督促小组或组员，对非同志或政敌之主要分子，随时设法侦得其一切秘密，报告上级”，以进行打击。

（四）法西斯蒂的纲领和基本政策，不外是投降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准备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蒂专政，镇压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一切革命运动，首先是苏维埃与红军，以加深经济的浩劫、民族的危机，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法西斯蒂的对外政策是：

（1）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法西斯蒂的匪首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公开反革命以后，一贯的采取出卖投降政策。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把东三省、热河、华北一手奉送给日本强盗，同时用一切方法镇压反帝斗争，首先去反对彻底反日的红军与苏维埃，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作清道夫。蒋介石已经宣言“攘外必先安内”，谁敢说抗日就要杀头。法西斯蒂机关报公开拥护卖国政策，他们说：“事实上失去了东北四省不足怕，再失去滦东，甚至再加上察绥，河北亦不足怕”；“中日协定姑无论其只限于军事而不涉及政治，即使怎样的丧权辱国，只须中国能于此得有收拾残局的机会，我们可以签订和应该签订的”；“我们的努力……要阐明中央最近的主张，和解剖现在的国情。俾使民众能了然于中日停战协定在精神上是胜利，至少是有利的”。这就是法西斯蒂的卖国辱国的真面目。

（2）不但投在帝国主义怀抱中来反对民众，而且极端仇视与反对中国民众的同盟者——苏联。中国资产阶级自从大革命中背叛了反帝斗争以来，便一贯的反对苏联，在一九二九年

对苏联所作强盗战争失败后，无时不企图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作反苏联的挑衅。去年虽然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与苏联恢复了邦交，但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之反苏联的阴谋并没有停止。反之，尤其是在日本及其傀儡“满洲国”企图直接掠夺中东路的时候，便用一切最无耻的诬蔑去攻击苏联，企图挑起反苏联的战争。在法西斯蒂的一切机关报，如《晨报》、《社会新闻》，向苏联发出最凶猛的狂吠，什么“赤色帝国主义”，什么苏联“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什么苏联与“日本及伪国勾结共同蹂躏中国”——总而言之，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以攻击苏联的污蔑，法西斯蒂都应用了。他们所以这样疯狂的反对苏联，无非为着在帮助帝国主义干涉苏联中得到帝国主义帮助，以反对中国民众，转移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去反对苏联，以表示其对日本强盗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忠诚。

（3）中国法西斯蒂，亦如其他各国的法西斯蒂，公开鼓吹与准备帝国主义世界大屠杀。蒋介石刽子手在江西军队中的训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战是要爆发的，到那时候就是抗日（?）的时候……现在我们在洛阳已设置六个存军械子弹的大仓库，以作抗日（?）之用。美棉借款交付以后，军械子弹还要天天增加，火药库亦要天天增多”。在《社会新闻》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很快的到来——在这四年之内”，同时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给中国的影响决不能说（?）是很坏的”，因此，他们断定“我们并不恐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他们的党报经常鼓吹：一切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清算！”这样一来，中国的法西斯蒂是强盗战争的辩护人与放火者。他们拥护这种强盗战争是为着帝国主义的重分世界与瓜分中国的利益，至于所谓“抗日”

只是一种骗局，因为上面已经证明法西斯蒂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

法西斯蒂的对内政策就是：

第一，采取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反对我们的党和一切革命群众以及反蒋分子。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载着中国法西斯蒂的恐怖情形："法西斯蒂暴力团的横行——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暗杀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这一切等等事件，给了中外人士一个大刺激。这种暴力团的尖刀不仅向着共产党员，而且向着反蒋派的政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派往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沪杭甬沿线去的侦探队、铁血团、团警班（法西斯蒂的政治警察）总计十组，团员达二百余人，尤其是蒋介石势力所及的江浙皖赣豫鄂等地，省政府的法西斯蒂化非常显明。现在上海市政府的市长吴铁城以下，公安局长文鸿恩、教育局长潘公展、社会局长吴醒亚、保安处长杨虎等都是有力的党员。市党部方面，执行委员吴开先这般陈果夫系的委员，也是法西斯蒂的铮铮人物……法西斯蒂暴力团的凶焰日益上升，演出许多流血的惨案，使得中国人方面，抱着极度的恐怖情绪。现在上了暴力团黑色名单的人，已有十多名，左联的重镇鲁迅身边危险，茅盾也被法西斯蒂下了逮捕令，这是确实的消息"。

第二，用全副力量进行对苏区与红军的"围剿"。为了这个目的，动员一切的反动舆论、军事、财政、法西斯蒂组织等。他们在其党报上说："中国民族主要的大患，不在封建残余与国民之贫乏，而在共产党的滋长"；又说："我们同志在此大举围剿共匪（?）之际，应深切了解中国革命（?）之能复兴与否，决于是役，而时时准备总动员到匪（?）区作生死存亡的决斗和牺牲，这是我们最大的任务"。现在法西斯蒂匪首蒋

介石已经把自己的兵力都集中到江西，利用美棉麦及其他的借款作为“剿赤”军费，并买了大批的飞机炸弹去轰炸苏区，以法西斯主义去训练了五六千人的军事干部，并招募十五万新兵，以进行五次“围剿”。最近法西斯蒂决定派有军事学识的同志五百人赴江西担任“剿共”工作。

第三，拼命扩充军事力量以进攻红军和苏区，并企图实行更残酷的军事专政。自从法西斯蒂的宋子文在欧美得了大借款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以后，蒋介石便秘密制定了军事建设的“三年计划”，其内容就是：（1）在三年内成立六十师新军队，即为法西斯蒂党军，完全以黄埔学生为干部。在江浙皖豫湘鄂等省已开始招兵。蒋介石预定今年必须成立十五个师约十五万人。同时又在蒋介石所直辖的六七省内大大的扩充民团。（2）在三年内完成五千架飞机，这个工作完全由美国顾问主持。（3）在三年内完成坦克车二千辆，这个工作由德国顾问主持。现在蒋介石已于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新兵训练处，拟训练新兵一百五十团至二百团，闻九月底可以训练成功。现在洛阳已有德国顾问七十三人。

第四，教育文化事业的法西斯主义化，压迫学生的革命运动，造成奴隶式的法西斯蒂文化。上述的《每日新闻》同一期上登载了法西斯蒂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活动情形：“在这次暴力团事件发生的前后，最显著的是向来以秘密工作为主，努力于养成基本党员的蓝衣社运动，已经半公开的在学界中进行。这一倾向已经由长江一带波及于平津地方，而上海真茹的暨南大学，老早就因法西斯蒂的活动而极端右倾化。该校的校长郑洪年以下，教授刘秉黎、白瑜、孙白骞氏等已经入党。本月中旬以学生骚动为起点，驱逐左倾教授与共产主义学生，法西斯蒂化达于极点。大夏、光华、交通等

大学，也受这种运动的波及，中国公学的教务长樊仲云、傅东华等，也以担任文化运动有力的党员而活动，发行着机关报《前途》……蒋介石的蓝衣社……聘请二三十个德国人，做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或组织员。在南京用德国留学生大事翻译关系文献以分配各党员。”

最近蒋介石以每月数万元之巨款在上海组织法西斯蒂的文化运动，先从新闻、教育、艺术及出版事业方面着手。闻已吸收了文化界分子数十人，成立一组织，名为“干社”，即取蒋介石所谓“硬干、实干、快干”的意义。该社由潘公展、吴醒亚等为领导，该社的纲领是“以法西斯蒂的精神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该纲领认为法西斯蒂精神，第一是“服从”：“法西斯蒂的服从是盲目的绝对的，而且必须出以恭顺的精神”；第二是“硬干”：“暴力主义和强烈手段简直成为法西斯蒂的经典”；“对付反抗的棍徒，我们要随时准备五十万枝的棍棒；而且必要时还要准备十分充足的机关炮和炸弹。如果不倾耳而听我们宣传的，我们就要以棍棒对付!”；“私刑比什么刑罚都好!”法西斯蒂的恐怖主义的“文化”就是这样。

第五，法西斯蒂高唱“发展农业，改良田税”，“促进工业，养成劳资间互相谅解之精神”，甚至无耻的喊着“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剥削劳苦大众的资本家”（见《干社纲领》）。我们已经指出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经济只有走向破产、浩劫与殖民地的道路。法西斯蒂以其保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侵略、瓜分，维持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掠夺、苛捐杂税、军阀战争，加紧资本对劳动的进攻，特别是镇压与进攻已经得到解放的苏区工农群众等等的反动政策，只有使农业工业更加破产与崩溃。法西斯蒂宋子文已经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对他们的帝国

主义主人，宣布了法西斯蒂的殖民化的政策：把中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商场，而成为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的范围”，“吾人欢迎西方技术与资本，并愿维持不阻止外货入境之理财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只有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之加强，只有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促进中国经济的崩溃与殖民地化，使中国劳苦群众担负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和“繁荣新时代的极大要素”。这就是法西斯蒂所谓“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此外，由于实行加重剥削劳动的所谓“劳资间互相谅解”，使工人阶级更加痛苦。法西斯蒂在土地问题上，是保护地主私有制，保护地主、富农、高利贷的剥削，反对任何甚至改良的要求，使农民群众只有陷于破产、贫困、灾难、流离、死亡而已。

（五）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看出，法西斯蒂的政策，与现在国民党的政策，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法西斯蒂在自己的机关报上也宣称：“我们的行动不能采取破坏现有行政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方式……中国现有政治现状能够维持，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滋长繁荣”。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是相互联系着的。国民党统治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而且国民党统治的方法本身已经带有许多法西斯主义恐怖的因素；同时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为着挽救国民党统治的最后的崩溃。《社会新闻》上所发表的一篇《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的文章，其中说道：“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无论从国民党的立场上或它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出一点与法西斯蒂冲突的地方，恰恰相反，无论是三民主义或国民党的历史，到处充满了法西斯蒂的精神”。“国民党的发展，必然要走到法西斯蒂的道路，也只有混

和法西斯蒂精神，才能使三民主义更发扬光大起来!”不管法西斯蒂用怎样的形式去获得统治，是要国民党还是不要国民党，都没有关系，总之法西斯蒂如国民党一样，不但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任何一个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尖锐化。法西斯蒂不但不能“救中国”(如它所梦想的)，反而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以至完全崩溃。因此，“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斯达林)。

(六) 法西斯蒂运动的加强，法西斯蒂恐怖的加紧，把反对法西斯蒂的任务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目前在反对法西斯蒂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执行的任务就是：(1) 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蒂的宣传鼓动工作，向广大的群众解释法西斯蒂整个政策的反动性，首先说明他们对于摧残共产党和一切革命运动的恐怖政策，及其投降出卖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作用，使群众明白法西斯蒂是革命最凶恶的仇敌。(2) 拿具体的事实给群众证明，中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而法西斯蒂是把中国引到瓜分共管的经济浩劫的道路，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是中国独立解放领土完整的道路，民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形式——法西斯主义也在内，拥护苏维埃，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3) 在群众切身的要求基础上，在与这些要求的密切联系中发动各种反法西斯蒂的群众斗争，反对白色恐怖，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4) 建立反法西斯蒂的群众组织，在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团结一切反法西斯蒂的分子，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5) 利用法西斯蒂每个恐怖的事实去号召与动员群众组织革命的武装自卫，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的工农劳动者及其领袖。(6) 在这次世界反帝大会中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揭破法西斯蒂对于这次大会的污蔑与破坏，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这次大会

成为反帝反法西斯蒂的大会。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今年的选举*

（一九三三年九月）

毛　泽　东

同志们，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已开过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同志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同志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我的报告就在说明这个意义。我分做几段来说明它：

（一）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又在继续争取粉碎五次“围剿”胜利的年头

去年以来到东黄陂战争胜利，把敌人的四次“围剿”完全粉碎了。我们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区，发展了苏区，领导了帮助了全国反帝反国民党反地主资本家的伟大革命斗争。革命的胜利，比过去那一个年头的胜利更大。反革命那方面呢？他

---

*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上的报告。

们是更加衰弱了，但是反革命还在拼命的挣扎，特别是帝国主义因为全世界革命与战争逼在面前，他们拼命的向中国侵略。日本已在他们的炮火下建立了一个满洲国，还想要建立一个蒙古国；英国要在中国的西边建立西藏国；法国侵略云南、贵州；美国想瓜分长江各省。这些帝国主义都在指挥他们的走狗国民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进行对我们的大规模五次“围剿”。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百倍的努力去打破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更大规模的革命与战争是摆在我们面前。受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他是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今年的苏维埃的选举，正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关头，我们要选举出强有力的苏维埃来，组织战争领导战争，这是今年选举的十分重大意义。今年又是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年头，今年的全苏大会将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这是全国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要使二次全苏大会能够担负他的伟大历史责任，今年的选举就不能当平常一样看待。

（二）要明白选举的重要，我们还要来说明苏维埃的作用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有两方面的作用，这两方面都是与旧的统治阶级政府完全相反的。第一方面，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他用战争消灭外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反对敌人“围剿”，开展胜利进攻，向着全国反革命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任务。同时他又用法庭镇压内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对付 AB 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及一切存在苏区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一有反革命行为，我们就立即镇压他。革命的阶级——工

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同志们，大家看得到，我们现在是统治者，因为我们战胜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我们镇压了历来的反革命活动。再说到第二个作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我们工农群众的生活，过去完全是受地主资产阶级管理的，因为他们有政权，他们就有自由，而不给我们以自由，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劳动保护，现在呢？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有了劳动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政权给了我们以自由，我们在自己政权下进行各种必要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己管理着，我们内部是真正自由平等的，不受哪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干涉。而我们对于地主资本家，却是独裁，却是专政，不让他们有一个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设置各种法律管理他们，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这就是苏维埃第二方面的作用。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政权与选举的严重意义，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最积极的来参加选举。苏维埃人员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很好的去领导选举。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要把苏维埃与选举的作用即刻宣传到群众中去，首先所有苏维埃人员自己要完全认识清楚，才能使今年的选举成为最完满的选

举，才能一致动员起来为着建立强有力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

（三）今年选举中的顺利条件

目前既当着革命与战争的最紧急关头，苏维埃及其选举的作用又这样重大，那末今年的选举能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的，因为今年选举中我们有着许多顺利的条件。第一，敌人的五次“围剿”虽然规模很大，但我们已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我们在最近两个月内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第一仗占领连城打败十九路军，第二仗占领乌江打败第八十师，第三仗围困延平打败了敌人的增援队，共缴枪六千多支，我们是在红军大胜利中进行选举。第二，今年的选举我们是在更大版图上进行着的，因为我们在打破四次“围剿”中极大的扩大了苏维埃领土。我们今年是在十个苏维埃省内——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闽赣省、闽浙赣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鄂豫皖省、湘鄂西省、四川省进行选举。我们选举的规模是更大了。第三，在这许多苏维埃省中，农村里、城市里的阶级斗争今年比去年更深入了。查田运动的发展、劳动法的实行、文化教育的进步、经济建设的开始都得到了许多成绩。特别是查田运动把许多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坏分子也大批被洗刷出去了，使今年的选举得到更加顺利的基础。第四，我们还有着过去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的经验，使今年选举得到许多宝贵教训。过去选举中好的成绩我们今年一定要继续采取，并且要更加发挥。过去选举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就要完全避免他，丢掉他，不让今年的选举再犯一点错误。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已经正确的做了

总结，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成绩，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去仔细看清楚，并且要每个苏维埃工作同志都去看清楚，还要对一切选民群众解释清楚。只有正确的认识了过去的教训，才能使今年选举运动更顺利的开展起来。

（四）怎样指导今年的选举

同志们，我们明白了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积极瓜分中国进行五次“围剿”的时候，极大的增加了今年选举的政治任务。我们又明白了苏维埃的伟大革命作用，而今年的选举又是在许多顺利条件下进行着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很好的来指导这次选举，百倍努力争取这次选举的完全胜利。关于选举的原则与方法，中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及选举训令上已经说的很明白，我不须一一重述。今天我只把几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唤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关于选举的宣传鼓动、基本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报告、选举单位、候选名单、选民大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等这几个问题。让我把这些问题向同志们作一个简略的解释，因为这些都是选举中极重要的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注意的：

第一，关于选举的宣传。今年的选举必须在选举前三个星期内作最广泛的宣传。必须把粉碎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今年选举的关系说得最清楚；必须把苏维埃的革命作用讲得最明白；还要说明今年的选举是在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着的；使群众把选举看得极重要，同时又有着充分的自信心来参加选举，来推选许多先进分子进苏维埃，而一切当选人都有百倍的勇气来担当国家大事，这种宣传鼓动是选举胜利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的宣传鼓动，即是说群众还不了解目前的政治

形势，不了解苏维埃的作用，不了解选举胜利的基础，那么群众就不会很热心的参加选举，也不会使当选的分子百倍增加他们的勇气。去年的第一次选举宣传较好，成绩也就较好。第二次选举宣传差，成绩也就要差。今年则必须比去年第一次选举的宣传还要做得更好些，才能鼓动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

第二，城乡代表会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城乡选举是苏维埃的基本选举。城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扩大红军查田运动、实行劳动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工作，均须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执行，所以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并且，要全苏大会开得好，就必须要省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省苏大会开得好，必须要县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县苏大会开得好，就要区苏、市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要区苏大会开得好呢？就要乡苏代表会选举出很好的代表。这样看来，市苏乡苏的选举，岂不是关系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选举吗？所以说市苏、乡苏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同志们，我们会场的侧边正在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个塔是打下了一丈五尺深的石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脚，这就是城乡代表苏维埃了。

第三，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城乡苏维埃，不但要用最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而且要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他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去，这个工作叫做选民登记。这种有选举权人民与无选举权人民的严格划分，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出发点，是苏维埃宪法与选举法最重要的一条。你们看，那个

塔脚不都是石头筑的吗？所以这个塔是坚固的，如果掺杂一些污泥粪土进去，这个塔就不会有这样坚固了。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就要从不使一个地主、富农、资本家偷取选举权做起。

第四，去年的选举单位太大，今年把他改小了。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工人单独开会选举，农民以小村子为单位选举，城市中贫民群众则划分街道选举。这一个改变与争取选举完满胜利有很大关系，因为选举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好更多，日后的撤回权也更容易行使。因此同志们要注意今年的选举单位不可再弄大了。

第五，关于市苏、乡苏向选民做工作报告，中央内务部已拟了一个大纲，区苏要指导乡苏照着大纲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去年的选举，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种报告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向群众作报告，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的选举热忱到更高程度。区以上各级政府凡遇下级政府开代表大会的这一天，都应去做工作报告。

第六，关于候选名单。好好的准备候选名单，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关节。中央训令中说了：应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对候选名单的意见，并且公布出去，使选民对于各个被选举人能加以充分的考虑。候选名单中首先要注意成分，不但要照着选举法使适当数目的工人、农民当选，而且要依照选举训令至少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要使他当选，当选的应该全数是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分子。其次，工作能力方面也要相当注意，能力过于薄弱的亦

不宜引进到政府来。其次，现任苏维埃工作人员，如代表、委员、主席等，凡属犯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包庇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重大错误没有改变的，一概不能使他当选，但过去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同志，则毫无问题可以当选。有人以为选举就是一律推选新人，旧人一概不要，这完全错误的。

第七，关于选举大会。选举只须要一天工夫，却要把几个星期去筹备他。因为前面所述许多重要工作，必须有几个星期的筹备才能弄好。绝不可不早些筹备，一天捱一天，捱到选举逼近两三天，才手忙脚乱潦潦草草的搅一顿。现在北部十八县定期九月一号至十月五号为城乡选举期间。各区应该把选举的日子定在最后十天内，而把九月二十五号以前这几个星期极紧张的去做选举宣传选民登记、工作报告、候选名单几项工作，才能在实行选举的那天得到完满的成功。南部十八县可以迟一个月选举，城乡选举日子可以定在十月底，而把九、十两月充分做准备工作。其次，选举的日子到了，必须尽量动员选民到会，今年必须办到最大多数选民都来参加选举会，并且须使选举在一次会上成功，不要弄到不足法定人数开会不成又要召集第二次会。其次，选举会上提出候选名单来讨论表决的时候，要发动群众发表意见，要与去年兴国一样选举会上有热烈的批评，群众不赞成的要另提候选人，绝对不能强迫群众去通过候选名单。如有坏分子捣乱，借着候选名单强迫群众通过，查出定要严办。其次，选举完后，还要讨论群众的提案，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到苏维埃来作为新政府的行政方针。

第八，一切以上的工作，须要组织一个专门机关来负责任，这就是市苏与区苏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政府及各个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而

成的，还要经过县苏的批准。选举委员会是负担着关于选举的全部工作。去年的选举委员会多半没有起作用，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因此许多地方没有很慎重的去领导选举，政府中坏分子操纵选举的毛病也是有的。为了要免掉这些毛病，今年一定要组织选举委员会，由政府与群众团体共同组织之。

同志们，我的话说得很多了，选举的意义和选举工作的要点，我也都说到了。没有说到的如县苏要有计划的去指导全县各个区苏代表大会，省苏要用有计划的去指导全省各个县苏代表大会，中央也是要有计划的去指导各个省苏代表大会，以及还有关于选举的别项事情，选举法与选举训令都有了详细的指明，这里我不多说。我说的那些要点，还望同志们回去告诉县苏、区苏的许多同志，要提到主席团会议上去作详细的讨论。同志们，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比平常的选举，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举，是一个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这次选举。除了前面所说选举本身许多工作以外，我们要抓紧这个选举时机，开展查田查阶级的斗争，开展苏维埃的检举运动。只有查阶级与检举运动，才能把偷取了选举权的分子查出来，把混进苏维埃中的坏分子清出去，使这一次选举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在南部十八县是更应该这样去做的，因为还有两个月时间给我们进行查田运动。还有，行政区域没有划好的，应该赶快划好起来。这样做去，我们坚决相信今年的选举是能够取得完满胜利的。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盼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睁起眼睛望着苏维埃的旗子，他们明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几天上海正在开全世界各国代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他们同样热烈盼望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应该回答这一切的

热望。我们拿什么去回答他们？拿我们全苏区的选举胜利去回答他们，拿我们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去回答他们。

我们的口号是：

争取选举的完全胜利！

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苏维埃中国万岁！

根据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红色中华》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

（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

六月二日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以后，三个月来，查田运动有了相当的开展，特别是瑞金、博生、胜利、兴国、永丰等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查田运动的全般的彻底的胜利，将使冲破五次“围剿”的决战有了更巩固的基础。

中央检查了各县查田运动中部分的材料，特别是瑞金比较充分的材料以后，认为胜利的开展着的查田运动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错误和缺点，应该迅速的纠正过来，以保障查田运动的彻底的完全的胜利。

（一）在许多边区和中心县份的落后区，查田运动还没有迅速的开展，这因为有些地方党部的领导机关，没有认清查田运动的意义和重要，因而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个别的县份则因为不久以前还没有撤换机会主义的领导，如南丰、乐安、信丰等，有的因为地方党部和苏维埃机关中隐藏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者妥协分子，他们用种种方法阻碍查田运动。为着迅速的完成查田运动，各级党部必须把彻底开展查田运动当作推动一切工作的基本工作，动员全党去进行，同时要无情的打击一切对地主富农的妥协动摇，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对于不愿立即改正的动摇分子，应当撤换其领导工作。在审查阶级成分的时候不

要放过一个地主和富农，对于个别的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的错误应该纠正。

（二）另一方面，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着，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城市区北郊一个乡就有七家，踏径、下肖两区一部分材料中有十四家，北郊有一家还是红军家属，中市曾有中农要求改成分，瑞金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这种现象决不只瑞金才有，其他各县如果认真检查的时候，必会同样发现。中央坚决指出，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致破坏与中农的联盟，也即是破坏工农联合，必须刻不容缓的纠正过来，任何坚持自己错误的工作人员，必须受到党的严厉的制裁，必须公开的向群众纠正这种错误，使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是拥护中农利益的，侵犯中农利益只是个别党员的错误，并且受到党的批评和指责。凡属群众怀疑的表格应当在群众中重新讨论，最容易做错误的是把富裕中农当富农看待，所以在审查阶级的时候，应该特别仔细的去判别。

同时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个别的发现，对于反动富农的判断也有不估计到他在反革命组织中地位的重要与否，不估计他在革命以后是否遵守苏维埃法律，而只要凡是在革命前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如收三成租之内）都当反动富农没收。这种对于富农的过火政策，同样要危害与中农的联盟，都应该纠正过来。

在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富农过火政策的时候，决不是对地主富农让步，恰恰相反的是巩固我们消灭地主阶级和限制富农剥削的阵地。一切借口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富农过火政策，来实行对地主富农妥协的企图，都应严厉的打击。

（三）在许多地方没收的土地、谷子、房屋、用物，没有迅速分给群众。有的地方不经过群众的愿意，把谷子保留起来，个别的地方还有没收的东西送给苏维埃政府，根本不分配给群众，有的地方分配东西的时候，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意见，而采用抽签的办法。为着使查田运动的果实落在群众的身上，责成各级党部把没收的土地、谷子、杂粮、房屋、一切用物等，迅速分给工人、贫农、中农，在分配的时候鼓动群众分一部分作红军公田，对于红军家属所需要的，要鼓动群众首先分给他们，对于以前逃出去现在回来的工人、贫农、中农，要一样的分给等等。立刻纠正在瑞金所发生的对他们收额外租税的错误办法。只有在群众自己愿意的时候，可以把谷子收藏起来，准备明年春荒之用或者用来买别的东西。

（四）要反对在查田运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如查田不经过宣传和讲阶级，不经过群众讨论阶级，不召集工会、贫农团会议，只由工作团或几个同志去秘密查田，甚至几个人黑夜去没收。如区苏批准阶级根本不审查表格，只照例盖章，甚至仅有姓名的表格，也被苏维埃盖章批准，认为地主富农把查阶级当儿戏。政府的工作团也常有不经过支部区委和苏维埃，而直接去进行查田的事实。所有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仅阻碍着广大群众参加查田运动的积极性，并且给地主富农以至反革命造谣捣乱的机会，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必须无情的打击这些各种各式的官僚主义。

（五）责成中央政府党团和各省委县委对中央负责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为着百分之百正确的执行中央六月二日决议和这次决议而斗争。中央政府党团要经过土地部立即切实检查瑞金全部查田运动，纠正所有错误，并搜集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正确的分别阶级等以指导其他各县。

（六）在查田以前从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而在战斗及一般工作表示坚决与英勇的个别分子，对于他们的家属的田地，苏维埃政府应以特别的条例规定之。

中　央

一九三三、九、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游击队任务与对敌策略的指示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

周：

沪来电转如下：

（一）我们大概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来结束福建与赣东北的作战。为着保持我们在福建已经夺得的区域，我们提议在福建、浙江的边界上以崇安、浦城、松溪为主要的根据地，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这一游击队的任务是：

甲、牵制福建军队向西北方的任何进展，从上述的根据地来威吓建瓯、屏南、古田，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好办法。

乙、阻扰敌人四师、五十五师、七十九师的行动来援助红十军，同时使这些敌人不能到西方去。我们必须很快的完成这一游击区域的创造，以便当我们的队伍在抚河作战的时候，而敌人的注意力仍集中于福建，甚至于浙江。我独立师在到达邵武之后，即应开到上述地点，开始执行这一任务。政和的土匪亦应补用来适合这一目的，适应创造地方武装等等。

丙、要保护连城、永安、延平以西的区域，仅派三十四师与地方武装恐怕是不够的。因此，应给工人师某些部队一种任务，要他们保卫大龙溪左岸的区域。

（二）直到现在敌人尚不知道我主力的真实目的，在此上述的步骤以后，我们应继续隐蔽我们的目的，同时我们要向西北进攻，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的目的是在南昌。我们是用一切方法令我们前卫的部队能尽速的达到东乡、进贤区域，这一步骤的本身，也许就能够推迟敌人的进攻或者在敌人已经开始进攻的时候，使他停止一些时，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便获得了一切便利，使我主力在南城、宜黄周围的困难任务，更加容易。

（三）对于蒋介石的进攻，所应采取的步骤和策略，我们现在有以下几点建议：在过去几个电报中，我们已经向你们建议，我们如能在技术上抵抗敌人空中的袭击，现在来说这一任务的政治和组织方面：

（甲）应向所有城市中的居民充分的警惕这一危险，同时要防止夸大。在夜间空中的袭击大概是不会有的，山坡中隐蔽起来是避开轰炸弹、燃烧弹与毒气弹的最好方法，各地应该作出警号、救火队，使人民不集中、分开居住和隐蔽等，粮应分散储藏，并应离开易燃的建筑物较远。

（乙）一切组织的领导机关应迁到城外附近的小村庄去，或者到郊外不明显的地方去。一切学校应该放假。

（丙）苏区内部的武装队伍，应驻扎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外面，特别着重于分散的野外的训练，这一点对于军事学校尤其重要。他们应在瑞金、会昌、雩都等地分成许多队伍，开始操演，同时即为南昌红军之总预备军。

（丁）地方的防空队，应经常在通达各城市的河流边岸、小山顶上，举旗为号，机关枪、步枪和旧式的土枪炮应在这些地方很好的利用。

（戊）对于作战的部队应广泛的向前线上每一个战斗员解

释：对周围举旗为号普通法则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等等；反对毒气轰炸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进攻敌军的后方，与敌人短兵相接，交换夜间的宿营等等；同时要有严格的纪律，以制止任何惊惶失措的发生。

（四）敌人正在广泛的利用蓝衣社的便衣队，企图向苏区内部进行特殊的任务。为打击这企图，城乡的劳苦群众与地方政权的合作是必须的。因此，必须：

甲、教育群众，使他们知道便衣队是什么东西，使每个人都知道不报告村中生客或庇护这类生客是要负责的。

乙、组织少年先锋队的巡逻队，帮助地方政权，逮捕嫌疑犯等等。

（五）在每个区域的乡村中，应该加强地方武装，为着对付敌人的游击队许多邻近的乡村，应该有共同司令部指挥各村的武装队伍。

（六）根据报告，敌人在其进攻中将利用以下的策略：

甲、前进部队之第一线，将包括许多单位，每个单位均在一营以上，许多蓝衣社的便衣队都将分散在第一线的部队中，准备在这些部队前进以后，进行自己的任务。第一线队伍的任务就在吸引我们队伍与我们的队伍作战。同时，敌人后方较大的队伍则如钳子的形式前进，从第一线的两翼进发，企图达到我军的两侧及后方而消灭我军。注意到以上的策略，我们必须采取相当的行动方法。对待敌人队伍中的便衣队，应该是我们特务队的工作目的。

乙、我们只以让敌人的第一线部队前进几步，然后很大的用计转入翼侧，以便与敌人第二线突然的作战。在我们消灭了敌人第二线以后，我们才以小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第一线部队。而我们的其他各团或者从翼侧的外面追踵敌人取得再后方，或

者由于新来的敌人数量过大，则更将我军的翼侧隐藏，如是来破坏敌人的主要方向的进攻线。

丙、敌人认为他的第一线与第二线，在开始一天的作战不过只是初步的行动，而第三线的较大行动将在夜间行动，以后多半在次日清晨开始。由此可见，敌人已经正确的估计到他的第一线与第二线有被我们消灭的可能，但同时他们认为我军在开始的一天作战中已经消耗了力量，同时我们将敌方俘虏与战利品之获得，而因为胜利失掉了警惕心。这时敌人第三次的最强的进攻将在第二天的战争中使我军的胜利归于无效。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假若新编的一两师在第一天已与敌人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战了一整天，那么夜里就应设法离开敌人转向新的方向，使敌人第一天的计划归于无效。敌人就不得不重新派遣侦察与吸引的队伍即第一与第二线。如敌人不照这样做，那他在第三线的行动将入于不可收拾的陷阱中。上述的几点策略意见，适用于我们所决定的主要防守的战线部分。在我们厚集大军，预备进行我们目前所决定的决定胜负的战争，此部署便不能完全适用，第二种情形应完全由前线的指挥者来领导。在福建的胜利以后，我们相信在第三阶段中发展，将是我们反对的打击了敌人的左翼及中路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如若这一任务要在让敌人右翼及中路的一部进入苏区的条件下始能完成，我们亦应准备这样做，以便打击敌人在赣江方面的进攻，我便能在抚河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将在下一时期引导到赣江方面的胜利。

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健全赤少队与今年举行野营演习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一）赤少队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特殊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它的伟大的作用与力量，同时又是红军有力的补充队。当目前粉碎敌人新的五次“围剿”中，对于巩固苏区，镇压内部反动之活动，防止敌人侦探与蒋介石蓝衣社、便衣队之骚扰，发展边区游击战争，钳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后方工作，更便利红军集中力量随时转移方向各个击破敌人，继续有组织的扩大与充实红军的力量。赤少队是担负这些任务的主要力量，成为争取五次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党必须以极大力量去加强对赤少队的领导，巩固和扩大赤少队的组织，加强政治军事训练，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同时以达到赤少队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队，实际的准备由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的军役制。

（二）赤少队在过去工作中还残留着许多弱点和缺点。组织的涣散；动员的迟缓；没有将全部壮年青年吸收到赤少队中；许多县特别是边县的赤少队，大多数只是形式的没有实际

的担任卫戍和赤色戒严的责任；不能适时的充分的来担任后方勤务；异己分子仍有不少的混入在赤少队的组织中；政治委员与党代表制度没有实际建立，不断发现非党员充当政治委员和指导员的现象；军事和政治教育没有经常的进行；在配合红军作战中，时常发生违反苏维埃的政策和阶级路线的严重错误。因为有了这些弱点和缺点，使赤少队的全部，特别是边区赤少队，还不能成为巩固和发展苏区有力的地方部队，以配合红军和独立师团作战，不能普遍的继续的开展有组织的伟大作用。

（三）各级党部过去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和注意是非常微弱的，没有将这一工作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甚至将这一工作认为专属于军事机关而放弃了自己的领导责任，更少选派最好的党员去担任赤少队各级的政治委员和党代表。很多地方的党员和团员加入赤少队，还只是少数。这些绝不容许存在的现象要立即改正过来。

（四）为了扩大与健全赤少队，加强党对赤少队的领导，各级党部必须执行以下之决定。

1. 依据中革军委之新的改编计划来领导各级军事部和赤卫军迅速完成新的编制，首先恢复与扩大赤卫模范营的组织。动员党团员积极加入赤卫军特别是模范营，应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在“粉碎五次围剿”、“扩大并保卫苏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等口号下，并联系当地实际斗争和群众本身利益的具体口号（如查田查阶级斗争，冲破敌人封锁线购买贱价盐，保障土地革命利益等等），运用群众各种组织与会议，以宣传鼓动方式并从解释加入红军是工农阶级的权利，进行扩大赤卫军的运动，这样来动员凡是十八岁至四十岁的公民自愿的积极加入赤卫军，来扩大赤卫军

的组织，但必须严格防止不去艰苦的进行群众的政治动员，而用抄名字以及各种强迫的办法。

2. 赤卫军是带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它还有其他斗争的任务和作用（如参加苏维埃各种斗争，青年的、文化的、教育的等运动），因此，少先队的扩大应以青年群众为对象。在口号上除了政治以外，还要着重在青年本身利益与青年积极性上来发动青年群众加入少先队，应该运用少先队本身实际生活，以及文化体育娱乐各方面，更有力的来吸引青年群众热烈的自愿的加入少先队。凡是已经加入少先队的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劳动青年男女，可以不必加入赤卫军，而加入赤卫军之青年也不应强迫退出加入少先队，但少先队员有经常的输送最积极的分子到赤卫军的责任。必须纠正过去将赤少队的区别仅仅是在年龄上的规定（认为少先队是青年的武装组织，赤卫军是老年的组织），甚至仅在年龄上互相争夺队员的现象。党要打击将少先队变为赤卫军第二和附属组织的企图，同样的要反对将少先队与赤卫军对立起来的倾向，这都是没有认识赤少队的各个性质与作用。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与争取还未加入赤少队的壮年、青年全部自愿的来分别的加入赤卫军和少先队。

3. 为了严密和健全赤少队的组织，各级党部应领导各级军事部、少先队部进行队员和干部的检举，驱逐异己分子，改换赤卫军中不积极和开小差的领导干部，提拔新的积极分子来充任各级的干部，特别是提拔工人、雇农以加强无产阶级在赤少队中的领导作用。

4. 为了加强党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应由地方支部选派党员中最好的分子去担任赤卫军营连两级的政治委员、指导员和少先队的党代表，县区两级应有一个常委专任同级赤卫军的政

治委员并兼同级少先队部党代表，实际建立政治委员党代表的制度，以及赤少队中的经常政治工作。

5. 为了加强党员和支部在赤卫模范营的领导作用，党的支部可将参加模范营之党员依地区和连编在一个或几个小组内，能经常讨论赤卫模范营之工作，遇该连出发时，则将每连之各地方支部小组来成立单独支部。

6. 党对于赤少队的领导一方面经过政治委员与党代表直接去实现和执行党的决议，同时运用党的支部和党员在赤卫军中起核心作用，经过各级团的组织去领导少先队。各级党部应经常讨论和检查赤少队的工作。赤少队之政委、党代表要经常向党作工作报告。连指导员可兼负党支部的军事干事，县区政委兼县区委的军事部工作。

7. 少先队有它独立的组织与工作，只有属于军事范围（作战、卫戍和后方勤务、军事教育等）在前线则属于红军相关的军事首长之指挥，在后方则属于同级的军事机关（军区、县区军事部和赤卫军指挥部）之指挥。党责成各级军事机关立即派出军事代表为少队参谋长，以保持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实现军事教育，并以队长（团代表）、党代表、参谋长三人组织各级少先队部领导机关，但在工作中如队长参谋长有不同意的，则最后取决于党代表。

8. 中央局责成军委、军区协同边区党部，特别加强边区赤少队的领导，健全其组织，使它成为有力的卫戍部队和边区游击队，来担任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目前党应以最大力量来领导今年赤少队的野营演习。各地党部可依军委拟定计划来依照各当地情形，有一次专门的讨论，定出具体实施计划，以及在野营中党的工作。为了使这一野营演习顺利的进行，首先要在群众中进行最充分的宣传鼓动，来正确的解释野营演习的

意义和义务军役的宣传，纠正过去在动员赤少队加入红军中，曲解为就是实现义务军役的错误，以免妨碍野营演习。只有从阶级的觉悟与政治任务上以发动群众积极学习军事的热情踊跃参加野营演习，在赤少队队员大会上、干部会议上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会议上普遍的去进行这一宣传鼓动工作，使每个参加野营演习的赤少队热烈的自愿的来参加，而且均能按照规定，自己携米盐柴油，发动各团体拥护野营演习并捐助柴菜等物。只有在广大群众热烈拥护与积极参加之下，才能更顺利的获得今年野营演习的完满成功。

9. 加入赤卫军模范营的党员，须积极参加野营演习，并起积极的领导作用。进行演习之各地支部，立即召集赤少队模范营的党员开会讨论和计划野营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县区委依据各地野营演习地区与时间之规定，首先选派县区委中的常委任政委和党代表，去建立县区赤卫军的各级政治处，来负野营政治领导责任。并将每期参加野营的赤少队与模范营的党部，以连为单位，成立临时总支委，直属该县区委管理。这一临时支部，应成为野营演习中党的领导核心，积极为完成野营计划而斗争。

10. 各级党部应在今年野营演习中充分搜集对赤少队模范营的工作材料，以帮助今后党对地方部队的领导。同时每期野营完毕即须做出总结，如关于教育训练、党的工作、领导方式等，以作改正和补充下一期演习的计划和工作方式。中央局责成军委及各省委收集今年各地野营演习的材料和工作经验，以便明年更大规模在各地普遍实施野营训练。

11. 今年野营演习不是普遍实施，先从工作较好的县区开始，并分期分批进行。没有实施的县区同样的要利用这一农闲的时期，来进行经常的军事政治训练，并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

赤少队选举代表到实施野营的县区参观，以提高和传播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学习军事的广大运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四九、五〇及五一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的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等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的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

诚恳的揭露这一次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流露”与“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三）中央认为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居然能在《斗争》上好几篇文章中发现，这证明编者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与缺乏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因此中央认为《斗争》的编者必须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与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的检查《斗争》上的一切文章与其他刊物上的质量。同时为着保证《斗争》的政治领导，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以后一切比较重要的文章必须经过集体的审查，方可发表。

（四）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周恩来关于派人与十九路军代表面谈给项英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项彭滕[1]：

蒋、蔡[2]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3]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二十二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4]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恩　来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滕代远。

〔2〕指蒋光鼐、蔡廷锴。

〔3〕指蒋介石。

〔4〕即袁国平。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关于近期作战方针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

沪电如下：

一、军委的布置对于目前的紧急事变是适宜的，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再不需要其他的建议或批评。因此，我们这一电中所提的意见的出发点，是根据十月二号左右的形势即当军委的命令业已实行，与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敌人的行动。

二、首先我们应清楚了解的就是为着打击蒋介石的第一步的迫切危险，使我们目前不得不放弃过去巨大计划，东方军主力自动的退出，就是放弃了我们在福建的主动作用，在这种突然的变化中就是包含着这种危险。我们在泰宁、建宁行动的根据地虽有他一切的优越战略的形势，但在翼侧和后方均有少许不便之点。在建瓯、顺昌、将乐有五十六师，而十九路军在其南、邵武亦将快要变为赣东北敌人增援的根据地。第二，在十月初我们就进入战略上防守的阶段，这一阶段到我们再起主动的作用，大概将要四五个月的时间。而进入这一新的延长的困守阶段之前，我们所有的一般责任，是没有能如我们按时的到达资溪、金溪区域时那一样的顺利。这里主观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在顺昌的区域延迟过久。

三、根据上述的情形，我们的任务如下：

（甲）为军委命令新布置，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在黎川以北取得决定的胜利，否则敌从邵武、建瓯、顺昌区域来援的危险将要增加。因此，必须严格的经济我们的行动的时间，在行动以后就应该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与敌人作战，否则这种行动就是不经济的。顺昌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目前应避免围攻城市内的敌人，这同时就是说我部的行动应该采取在敌人没有达到城市以前，截击敌人的实力。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黎川周围的战争，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个步骤就要更小心了；那末，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以便在延平的防御中能取得时间。

（乙）为着转移东方军的新根据地周围的不利条件，我六十一团与独立的队伍应用一切力量消灭仁寿的五十六师。如若顺昌将乐之围已解，我们必须切断这里面的城防军与邵武、延平的联络，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得不到军火和供给，给我们以后来消灭他们的机会。

（丙）我们二十师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应企图达到适合的北方，在开始时应避免与敌人作战，以便与贵溪营及其他赣东北的队伍亲密的合作。

（丁）我们愈扩大北方、东方的根据地，将愈容易防卫我们的主要根据地。因此，我们至少必须使游击队到崇安、松溪区域与红十军、十一军合作，牵制赣东北的两三师敌人不能在一两周内到达邵武，甚至我们冒险的提议派遣游击队绕过金溪到达东部去扰乱敌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袭击敌人，使之离开我们的主要根据地，以我们的主力在很小的根据地上袭击敌人，而没有这些游击的动作，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戊）东方军在迅速的完成集中以后，应沿着福建的边界

向前推进，以便在黎川以北与敌人作战，如能按时达到资溪区域，并从那里迳向西方和西北方向，给我们的战争以更大的便利。如若敌人的空军积极行动，那末，在夜里行军和作战是绝对必要的。

（己）由于黎川的迫切的战争，重新布置中央军是正确的，不然在乐安、崇、黄的敌人开始前进的时候，他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在黎川的危险未去以前，中央军必须坚决的向南城以南与南丰以北的一段抚河。

（庚）在吉水、宁都间的山脉的北面，应该防卫起来，在其两翼应有较大坚强的防御点。在军事指挥部下面动员工人营在现在有极大的意义。那些还不能作战的后备军，应继续在上述山脉的后面地方受训练，不要抛弃他们的原始武装，而其余一切将要完成训练及形成的后备队应该集中在广昌区域。所有我们能够从南方和东南抽调来的力量，三十一号应开到这一区域，以为新军之骨干。

四、反对十九路军的策略应该是：

（甲）留游击队于他的后方。

（乙）由谈判者多方扰乱他的计划，同时尽力瓦解他的内部。假如能取得他们安静的代价，可表示愿意不打他们的队伍与宽大的划定目前占领区域的界线。在目前无论怎样应不睬他的进攻，因为需保持很大的力量将来对他，而目前没有停止他前进的必要，因为这只浪费我们的时间，宁愿让他前进到某些圈定的地点，我们暂时的失掉一点，但不要过用不适当的方法，在很坏的方向，企图停止他们，我们现在要推迟与十九路军的作战。

五、反对广东的策略是利用最经济的力量进行，继续不断的防御，并派游击队到他们的后方。

六、请再一般详告我们，关于东方军、中央军将来在广昌集中的队伍与南方队伍的战斗力，以及这些队伍平均的每一支枪的军火如何？

附一：军委关于消灭进逼黎川之敌的作战部署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朱周：

（甲）现赣敌似先以五个师的兵力进逼黎川，图解闽中之围，并正在继续抽调宜、乐、崇间军队，有转到抚河流域作大举进攻的部署。

（乙）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

（丙）各兵团行动纲领如次：

（1）第十五师留广昌之一团，应先速出黎川适当地点，构筑工事，掩护东方军集中。开宁化的第三师欠一团，取道建宁、康都兼程出黎川协助这一掩护任务。

（2）二十师继续活动于大小竹、杨坪地带，迟滞硝石和金溪方向敌人之前进，俟我东方军转到熊村、湖坊之线时，即北出钳制金溪方面之敌。

（3）三十四师应背靠归化方向，领导新独立部队，活动于将、沙中间地带。六十一团领导新的独立部队，活动于延平、建瓯间，掩护东方军撤退和集中，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4）东方军应即向泰宁适当地点集中（先撤收突入西芹部队，并特别注意掩护伪装）。

（5）中央军方面如十四师现在宜南间时，则领导一、四两团出两南间，阻碍敌人进逼黎川和集中抚州，独二、三两团继续活动于永、乐、吉地带，吸引当前敌人。第一军团缺一师应速秘密转入宜南地带，参加会战。

（6）各兵团行动的时间，由方面军自定，最好十月二日东方军能集中泰宁，一、二两师到河口、黄陂以东地带。

（丁）建宁暂作东方军策源地，此电收时，望复。

军　委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附二：军委对作战部署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朱周同志：

我们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给你们的电令，现有以下的补充指示：

（甲）东方军指挥抚河以东军队，以其有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敌人之目的，应该区分为两个纵队。其一：以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三、第十五欠一团第十九共五师两个团为右纵队，就近由万安寨经朱口、金坑、杉关、周湖源前，出相埠、寒丰桥地带，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原大小竹活动的二十师，须适时转出水口、珀玕地带，钳制金溪方面之敌，掩护该纵队的侧背，该纵队在运动中特别要秘密。其二：以第三师之两团、第十五师之一团以及三军团教导营为左纵队，各由现地出龙安镇、弋阳隘地带，钳制和截击钟贤、黎川附近之敌。

（乙）中央军的一、二两师、十四师、独四团等，由宜南间向里塔圩前进，攻敌罗卓英纵队，但须以独一团迅速转到永乐地带，领导独二、三两团等，尽量吸引当前之敌。

（丙）东方军右纵队的进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中央军的行动，应与东方军同时进行。

（丁）你们特别注意派遣侦察部队，搜索敌情和领导地方部队游击掩护。

（戊）你们根据此电令参酌实际情形的部署，望速电告。

项　英

九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亲爱的同志们：

因为交通上联系上的不敏捷和其他的原因，下面的信，我们仅仅是根据万永顺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一些五六月份材料来写的。关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全国政治环境及党的紧急的战斗任务，中央已经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上，给了全党一个明确的分析与提出了严重与负责的政治任务，我们不预备在这封信上再重复他，而想根据那个决议来给闽浙赣的工作一个检查。在这个检查之中，我们将只说到一些重要的中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还缺乏各方面的详细的报告与材料），希望你们能够根据这封信，更仔细检查你们最近一时期的全部的工作。

无疑的，由于闽浙赣的党的组织一般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依据于闽浙赣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之革命积极性的增涨，所以，虽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在与敌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及组织对苏区内部的反革命阴谋的坚强不挠的斗争中，胜利地保护了苏区的根据地，及时地破坏与扑灭了隐藏在苏区里面的反革命组织，开展苏区内的经济建设，相当地发展苏区与白区间商品流通与贸易，巩固与发展了党的组织及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三十一期。

周围苏区的白区工作之建立。这些当然是不可否认的重大的成绩，并且其中有许多的经验是可以供其他苏区的参考与学习的。但是当着我们在检查整个闽浙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信不仅应该指出这些成绩，而且必须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的许多的严重弱点，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自我批评是克服我们的弱点，巩固党的组织，开展我们工作的各方面的必要的前提。

（一）中央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在详细的分析了五次“围剿”中的各个问题之后，曾经锐利的在苏区党的前面提出：“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时期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同时，应该指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江西的党的组织已经在这个口号之下，真实地进行了布尔塞维克的动员，而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在这方面应该指出，闽浙赣的党的组织，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完全、差不多完全没有大量的扩大红十军，而且在六七两月的突击计划上写到了一切，甚至缴枪亦做出了预算表，可是没有一个字、一句话说到扩大红军!! 这几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然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不是偶然的遗忘（即是遗忘这样重要的头一等的任务亦是不能允许的），而是表示着闽浙赣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了解与忽视。根据永顺同志的报告说：闽浙赣党内有些同志认为在苏区扩大红军将要妨害苏区的生产，使劳动力感觉缺乏，因而这些同志认为目前扩大红军的中心，应该放到白区或灰区去。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与有害的。这是阶级敌人武断宣传的

影响在我们队伍中直接的表现。如果在闽浙赣几十万劳苦壮丁中扩大二三万红军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减低，那么如何解释中央苏区个别的先进县份（如兴国等），他的人口要比闽浙赣苏区少几倍，已经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壮丁要比闽浙赣多几倍，然而兴国的生产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在今年反而增加了两成收成。所以问题并不在以机会主义的借口来妨碍红军的扩大，问题是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与劳动热忱。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最大限度的扩大红军的队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经过发动劳动妇女积极的参加生产工作之各方面，经过农村中劳动互助社的普遍的建立和党与苏维埃对于耕种运动各方面的经常的注意与努力，则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将农业生产提高到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所梦想不到的地步。为避免误解起见，我们应该指出：吸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革命的劳动分子，首先是产业工人加入红军是必要的。然而这不能够用以与在苏区内部扩大红军对立起来，成为放松后者的借口。另外一个同样是有害的见解，就是以为我们暂时还缺乏现代的武器（步枪、机关枪等等），所以红军扩大了亦没有用。因之，红五月中已自动报名几千人，我们并不把他们集中起来，同时雪片般的电报向中央请械。亲爱的同志们！这里你们忘了我们在今天环境下，当着我们暂时还没有大的中心城市与大的兵工厂制造厂的时候，我们的枪支子弹及一切武器是在残酷的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当着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新式武器时，那我们亦必须被迫的利用一切旧的武器，刀、梭标等等（在这方面闽浙赣的劳苦群众有着令人钦佩的伟大的创造力），把我们队伍——不但赤卫军与游击队，而且有时候正式红军部队亦是一样——武装起来，以便在战斗的胜利中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是国内

战争的规律。不说在鄂豫皖、湘鄂西、井冈山及赣东北苏区本身的发展的最初时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即使中央苏区在最近还是一样的。在五月中我们扩大了二万五千红军，创立了几个师。开始时，这些队伍差不多多数是没有良好的新式武器的。直到今年夏季及秋初东方军与中央军的胜利后，我们才能充实了他们的武装。这是在目前我们大量的扩大红军中所不可避免的阶段。革命的军队正是在这种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过程中，生长、强大与锻炼出来的。可以借口没有武装或者等待中央苏区的大批武器输送，而将那些已经表示热烈的愿以头颅热血来捍卫苏区，发展苏维埃运动的赤色战士闲散在乡村中，而不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不但是使红军不能实际的扩大，而且使我们保卫苏区的工作更加困难。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的存在，是妨碍我们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最大障碍。我们再一次警觉你们，就是红军是苏区的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坚强壮大的红军，是使我们难于胜利的保卫苏区，使他不受敌人蹂躏，与发展和扩大苏维埃区域。战斗的布尔塞维克的口号，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应该放到闽浙赣党的工作的首要的地位上去。应该在这个口号的周围，进行最广大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利用中央苏区的许多经验，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军为充足的新编制的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创立一个军团的目标前进。

其次，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包括着不仅红军之数量上尽可能的扩大，而且是应包括着红军部队之军事技术、政治工作及阶级自觉纪律之最大限度的提高，使红军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这里应该和部队中的各种游击主义之残余，轻视现代战略战术原则的应用之倾向作严格的斗争。在这方面红十军还是非常的落后，不论在军事技术与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

极大的落后于我们的主力红军。“提高与学习军事技术”，“以政治工作来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还没有能够普遍到各部队中去，战略战术的灵活的运用与深切的了解在干部中还极差，这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是军事指挥员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能够给与应有的注意。国内战争中的党，应该是军事化的组织。整个的党的组织应该最大限度的注意和学习军事问题，这里需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创立和锻炼壮大与强固的铁的红军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不是闭门造车的决定某个部队每月应行动几次，或会计式的制造缴枪预算表之类的荒唐事业，以及用一般的有时在原则上，甚至有错误的空洞话（如完成七八两月突击月计划的具体工作上说的：“在每一行动时，应很精细的估计敌人的行动、敌人的能力、敌人的接济、敌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选择最适宜的时候、最敏捷的路线、最优越的地形去进攻敌人，歼灭敌人。”之类），来代替有步骤的具体的对红军建设与战争的领导。

重复的说：要没有壮大的有战斗力的红军，要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任务，就是为着创立这样的队伍而用最大的努力——这是在今天环境中我们的第一等任务。

（二）国内战争的猛烈的环境中，而国内战争又是这样的坚苦的性质，使得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一切苏区内部的生活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不能不把“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当做我们一切工作的指标，尤其在今天的苏区的环境中，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上胜利的时候，这尤其是重要。一切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服从战争的利益，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在目前正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领土上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的任务就是巩

固苏区，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苏区，巩固苏区，而这里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决的发展与扩大苏区，苏区的扩大将使我们能够更好保卫他。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是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政治上消极的防御政策，不能使我们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更加不能完成我们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在闽浙赣的党的一部分同志中，浓厚地存在着保守主义的情绪。在军事上，我们始终不敢进行较大在白区中间的作战，战略战术上我们时常因为要防堵的原因将部队放在敌人分进合击点上，因此许多时候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胜利，游击战争之开展非常的不够等等。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在我们对于积极向外发展的极端的缺乏注意。我们依据着闽浙赣群众的积极性的发展上，在防卫苏区方面，我们尽了很大的力量，发扬了群众的创造性，发明与采用各种的防卫的武装方法，然而我们的弱点亦正就在这种单纯的防卫。所以，虽然我们所费的力量是不小，然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的苏区非但没有大大的发展，而且还遭受着敌人的几次的部分的蹂躏与烧杀，这就是因为单纯的防卫决不是真正的巩固苏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

其次，正因为这种浓厚的保守主义，“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并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自然，在经济建设或其他方面，闽浙赣的成绩不容忽视的。可是，有些时候，这种建设没有能够在上述的

列宁的口号之下进行。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工人的休养所的问题。据说这个休养所还办得不坏，工人群众很满意他，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多少是一种奢华的举动。当着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设备上能差强人意的红军伤病战士的医院或休养所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保证这个相当良好的休养所，给赤色战斗员与指挥员。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工人群众经济生活与文化水平之提高，相反的，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努力为着这个而斗争。但是我们应该告诉工人阶级，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增进基础，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统治，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彻底改善与解放的最重要的保障。

这些是说明着：在闽浙赣党的组织中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政治的倾向，这就是保守主义。我们的领导者并不了解目前全国情势之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以及积极的为着巩固发展联系苏区成为一片的任务，而以狭隘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区域，兢兢业业的保守他。正因为这样，我们忘却了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将我们全部工作服从于国内战争前线上胜利的口号。而实际上这种单纯的保守与防御的态度，都并不能真实地巩固我们的区域。

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来源，我们不能同意万永顺同志所解释的，似乎因为闽浙赣苏区是由农民暴动产生起来，所以保守主义是必然与不可避免的，这是无稽之谈，用以来减轻我们在领导中的错误的借口。这个倾向之政治上的来源，很明显的还是在我们，首先是领导的同志，对于日益尖锐化的全中国革命形势之估计不足，对于红军的军事力量之估计不足，对于苏区与环绕苏区周围之国民党区域中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之估计不足而来的。这个倾向是危险与有害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其

危险与有害的性质是更加增涨起来了。因为目前我们正处在全中国存在着而且日益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之中，我们正处在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剧烈斗争的关头。正如中央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所指出来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最具体与凶恶的步骤，他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与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目前的状况正是这样紧急的情况中间，要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只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克服这种倾向，使全党的同志了解这种倾向的错误及其害处，这是今后闽浙赣工作转变的必要的前提。反对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内广泛的开展，这便使得保守主义倾向有滋长的可能。我们认为必须在这封信的周围，开展最广泛的解释工作及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来保证我们工作上之必要的转变。

（三）最后，我们觉得必须说到的，是关于领导方式、思想斗争及自我批评的问题。

为着新的布尔塞维克的活动的具体领导而斗争，是改善我们工作的中心的主要一环。中央在一年来曾经用极大的力量，为着改变与消灭那种旧的、空洞的、一般的、恶劣的领导方式而斗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自然这些成绩，还是非常之不够的。说到闽浙赣这方面，那么应该说，必要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而且有些曲解与庸俗化了新的具体领导的问题。从六七两月的突击工作计划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把活的具体的领导一变而为呆滞机械的数目字的领导，整个的突击工作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会计式的表格，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计划。我们不去仔细的考查每一个工作的具体的情

况、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对于每个政治事变与问题之反映以及真实的群众工作，不去给每一个下层组织以必须的具体指示，而空洞的计划着一般的数目字，甚至制定缴枪预算表，决定每个部队必须行动几次等等。我们不是具体的去进行扩大与锻炼红军及游击队，教育与训练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而以决定必须要几次行动与缴几次枪为心满意足。而结果呢，自然可以预料到这个计划是不能完全的完成的，到那时候，我们再来检查指出一些成绩，指出一些缺点，从防卫保守一直到太平享乐等等，以后再来规定计划，制出会计式的数目字等等。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具体领导，而是具体领导的讽刺，布尔塞维克的具体领导需要的不是空洞的表格，而是经常的检查；真实的实际的领导，不以一种数目字而心满意足，而是要实际的工作计划与为完成计划而进行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说到自我批评，在闽浙赣的发展异常不充分的。有许多时候，甚至压制着自我批评的现象亦是有的（如对畴西[1]同志），即在永顺同志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到，严格的对于我们工作之自我批评是缺乏的，似乎除了军事工作太差，军事领导者应负责外，其余一切都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同志们！这是有害的，自我批评之需要正像空气一样，我们要尽量的发展自我批评，这是克服我们工作中弱点与错误的唯一的方法。

思想斗争的开展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闽浙赣党内是若无其事的过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说明我们虽然喊着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怎样具体揭发在我们队伍中的不良倾向，还没有真实的注意。要使我们的工作能有全部的迅速的转变，重复说：开展反保守主义的斗

争是其先决条件。

这就是我们觉得必须指出的几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你们能够在中央各种文件上得到一般的指示，这里不再重复。

中央向着艰苦斗争的闽浙赣的共产党员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刘畴西。

中革军委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紧急命令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五次“围剿”，在我东方军与中央军清连、洋口与乌江等不断的胜利中，更加急迫的进行。最近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向黎川进攻，这是敌人正式的大举进攻的绪战。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就在眼前！

这一次决战，是关系中国两条出路——苏维埃新中国与殖民地化的决定胜负的重要关头，诸红军兵团、诸地方部队以及赤少队紧急动员起来，集中一切的力量，为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而斗争，这是每个红色军人当前的唯一的战斗任务。

诸红军兵团、各军区、各作战分区、各级军事部、赤少队部，应立即执行下列各项：

一、诸红军兵团、诸地方部队，可依照各作战的环境立即分别召集军人大会，赤少队以营或大队召集队员大会，根据总政治部第一号训令，特别着重目前争取决战的全部胜利的意义，进行紧急的政治动员，来提高和紧张全体红色战士的战斗情绪与斗争决心，以保证各个任务之遂行。

二、诸红军兵团立即并经常完成各种战备，依照上级指示的作战方略，坚决的迅速的实施之。

三、各军区、各作战分区，立即完成军委密令所指示各作

战区之布置，并责成军区对于所属之各作战分区的布置与实施情形，加以检查和指导。

四、各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连、游击队），依照各个任务立即出动，来打击、钳制、迷惑、疲劳各当前之敌，挺进游击敌之后方，以配合各战线基干兵团作战。

五、各地赤卫军及赤少队，在最短期内完成新的编制，并进行检阅一次，考察编制是否符合规定，武器是否齐备，加以改正和充实，并发动赤少队员准备充分火药，每人除备一支枪或梭镖外，应备扁担一根，五人共一担架，准备随时出动，以配合红军作战与担任一切后方勤务。

六、各作战地区及其附近各县之战地工作委员会立即组织和健全起来，随各战线之红军部队出发，指挥当地和邻近之赤少队，帮助收集给养、运送伤病兵、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等等，以便利红军部队随时转移方向和继续消灭敌人。

七、动员全部赤少模范营及赤少队，根据军委第七号训令严密赤色警戒，特别是建立盘查哨、游动哨、巡查队，来打击和消灭敌人之便衣队和侦探，以保卫边区，并帮助保卫局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之阴谋企图，巩固后方。

八、各作战分区，须依照军委密令，在战略与战术的必要上立即选择险要地，并完成必要的土围和工事，准备相当粮食与弹药，具体指定相当地方部队据守，并由各分区立即派专人去检查和指导，按级报告军委。

九、立即按照军委第五号训令，由军区、军分区、各级军事部指挥各城市、各乡村成立防空、防毒委员会，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和教育防空、防毒的简单办法。诸红军兵团、地方部队更加紧防空、防毒的教育，并完备防毒口罩。赤少队应在各居住地方领导居民挖备防空掩蔽部（俗叫飞机洞）、电光式的散

兵沟，并举行防空、防毒的演习一次。

十、责令各县、区军事部立即设立警号，每五里路设土炮一座，轮派赤卫军掌管，一遇有警，即鸣炮传报。至警炮识别的声响数，由县、区军事部规定，通报邻近县、区。

十一、兵站、卫生、供给等后方勤务机关，立即完成各种作战准备，以便依据战况开展迅速执行自己的任务，使前后方密切的联系起来。一切运输勤务和兵站、医院之警戒，均由赤少队担任。兵站与医院之首长对运输、警戒，有协同当地军事部指挥赤少队之权。

以上各项，须以最快的速度，限于十月二十日内全部完成，以利争取决战的全部胜利。责令各级政治机关根据这一命令，以充分的政治工作来保障以上任务百分之百的实施，对于执行命令不积极和怠工者，须给予军纪之制裁。

此令

代主席　项　英

副主席　王稼蔷[1]

彭德怀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于本委员会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刊印。

注　释

〔1〕即王稼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命令(第四十九号)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一)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本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特公布之。

(二)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其因变更阶级成分而应变更土地财产之处置者:凡中农、贫农、贫民、工人等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等,过去已经分配者,均应设法照数归还其本人,但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以外之财产,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归还本人(如当地尚有地主财产可没收或有可能由分得者手中退回等)。凡富农应得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耕牛、农具等及资本家的财产,均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归还本人。

(三)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司法机关判决之案件有不合本决定者:其已执行者,应维持原判不变更;其未执行或在执行中者,应即依据本决定变更其判决。

(四)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及以后,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及因阶级成分而处置之土地财产适合本决定并无错误者,任何人不得要求变更其处置。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在分田与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的发展土地斗争，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决定：

（一）劳动与附带劳动

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二）规定全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全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有些人以为要有二人甚至全家参加劳动，才算这家有劳动，这是不对

的。（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与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五）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耘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六）劳动既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他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身从事主要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不得分配土地。（七）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暴动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

查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有劳动当作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判为地主，或以只有附带劳动当作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与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原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这种错误。

但上面的规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别情形下，须有不同的处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主而家中有人参加生产者。例如有人剥削地租债利的数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债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多，消费不大，则虽这家有人每年从事四个月以上的主要劳动，仍是地主，不是富农。但如人口甚多，消费甚大，则虽有百担租或千元债，只要有人从事主要劳

动，仍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第二方面，是拿剥削情形说是地主，但拿生活情形说则不能照地主待遇者。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暴动前数年，因死亡或疾病原因，突然丧失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地主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待遇是不妥当的，应照本人原来成分待遇。又如有人名义上还是地主，但土地权实际已属别人，剥削收入极少，甚至生活比农民不如，而本人已有附带劳动者，此种人应照富农分给坏田。其特甚者，在群众同意下，可照农民分田。再如有人过去是农民，暴动前二年遇特别机会突然致富，成了地主，土地固应没收，但因其二年前是农民，在群众同意下，亦可照富农分给坏田。

上述这些特别情形，查田运动中有些地方把他忽视了，这也是不对的。

（二）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

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其他中农则一般无剥削。（二）富裕中农与富

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分时所需要的。（三）所谓富裕中农的轻微剥削，是指雇牧童，或请零工，或请月工，或有少数钱放债，或放少数典租，或收少数学租，或有少数土地出租等。但所有这些剥削，在其全家生活来源上不占着重要的成分，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四）在接近暴动的时期内，虽曾经有过与富农在同等时间内的剥削分量相同的剥削，但不超过二年者，仍以富裕中农论。（五）在某些情形下虽超过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为富裕中农。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些情形下，剥削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认为富农，而应认为中农。若没有这些情形，则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为富农，不应认为富裕中农。这些情形的正确判断，依靠于当地群众的公意。

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占着相当的数量，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他们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各地发生的侵犯中农事件，多半是侵犯了这种富裕中农，应该即刻改正。

举例：（一）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屋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

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一百元（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利息只三十一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二）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屋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的中农，还不是富裕的中农。

（三）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

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一）以暴动时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而不应把其他任何时间作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有些人算陈账，拿了中间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剥

削，作为决定阶级成分的根据，这是不对的。（二）以连续三年的剥削作为构成富农成分的标准时间。如果剥削时间不超过二年，或虽有三年而是中间空隔了的（不相连续的），虽其剥削分量与富农在同等时间的剥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农论。（三）剥削的分量必须是超过了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才能构成富农成分。如果剥削分量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虽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连续性，也不能构成富农成分，而仍是富裕中农成分。（四）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部分的合计，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产部分四百元，剥削他人部分一百元，合计五百元，即是总收入。因其剥削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农。（五）某些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因此生活并不丰富，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种情形下，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这里群众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形的考量，也是要十分仔细的，不应把富裕中农弄做富农，引起中农群众不满意。但同时也不应把富农弄做富裕中农，引起贫农群众不满意。所以应有仔细的考量，要取得群众的同意。

查田运动中对于这个时间与分量的问题，闹出许多纠纷，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或把富农当做富裕中农处置，中间的争论时常发生。现在规定的两者分界，可以免除这种弊病。

举例：（一）全家十一人吃饭，二人劳动。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实谷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

块，每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杂粮生产及养猪等，每年约值百五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个，雇了七年，到革命时止，每年剥削剩余劳动约值六十元。放债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时止。有一儿子是秀才，会做呈子打官司，借势欺人。判断：此家自己有劳动二人，但雇长工，又放债不少，剥削收入超过了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虽多，但开销后余钱不少，故是富农，应分坏田。他家有个劣绅，本人应不分田。（二）全家三人吃饭，一人能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税谷二担。放债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应分坏田。

（四）反动富农

在暴动前，尤其在暴动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叫做反动富农。反动富农应该没收他本人及其家属中参加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的人的土地财产。

对于反动资本家，适用上述的原则。

（注）这里应该注意：（一）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才叫做反动富农。如当暴动时领导民团屠杀工农，对革命政府顽强抵抗，特别是暴动后还在领导别人组织反革命团体机关，或个别进行重大反革命活动，如暗杀，当敌人侦探，自动替白军带路，逃往白区帮助国民

党，积极的坚决的破坏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等。这种富农出身而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经证明确实者，应没收其土地财产。其他富农中虽有反革命行为，但不是有领导的或重要的行为者，均不得没收其土地财产。（二）反动富农家属之中，只没收参加了这种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的土地财产，其他分子的土地财产，则不没收。（三）以找生活为目的而暂时跑去白区的，不是反动富农，不应没收家产。但不愿在苏区居住而跑去白区居住，满一年不回来者，虽不是反动富农，仍应没收家产。（四）对于反动资本家之定义与处置，完全适用以上之规定。

过去许多地方，把没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没收了，并且一家中把没有参加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来源，是在江西没收分配土地条例的第三条："凡加入反革命组织（如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全家没收"，这里不分首领与附从，不分参加者与未参加者。关于家属问题，虽在这一条的后半指出了："其家属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为，并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当地群众不反对者，得发还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没收，后才发还一部，仍非正当办法。因此这一条应照现在规定改正。又过去有些地方扩大反动资本家的范围，没收了一些不应没收的商店，这也是不对的。

举例：一家九人吃饭，一人劳动，又一人附带劳动。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实谷五十六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租三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块，每年出息大洋七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人。欠债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债大洋三百八十元，利

加三，放了五年。有一人当靖卫团连长，当了两年，与赤卫军作战五回。又有一人加入AB团一年，不是重要分子，无积极活动。家里其他各人无明显反动行为。判断：此家成分是富农。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动富农，应没收家产。其他各人不应没收。另一人虽加入AB团，不是重要分子，又无积极活动，也不应没收。

（五）富农捐款

在削弱富农的政策下，在国内战争时期中，除了实行分给坏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这些基本办法外，再向富农要求临时捐款，是应该的。但必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捐款数目。并且要有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才能实行，一般的富农捐款数目的最高限度，应在命令上规定之。

（注）（一）近来进行富农捐款，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庇富农不去捐款，一种是把富农现款捐尽与地主罚款无别，两者都是不对的，而后者则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并有影响到中农的危险。（二）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农业税不同，故捐款数次应有限制，不能捐至多次无止境。（三）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款。（四）捐款的数目须按照富农家况及过去是否交过捐款，适当的规定，以不妨碍富农生产为原则。国家财政机关应依当地情形规定一般的最高数目（例如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因战争需要曾临时规定富农捐款的最高限度为不超过富农现有活动款项全数百分之四十）。

（六）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

凡确定为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富农自己有处置之权，他人不得妨碍。仅在便利生产又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工农贫民才可与富农互相斢换房屋。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发生工农贫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斢换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甚至有斢换衣服肥料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削弱富农”应有限制，分给较坏的劳动份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并要求捐出一部分现款，这样“削弱”的政策已经实现了。超过这种限制，就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在目前革命阶段上是不应该的。（二）所谓便利生产，是指有些地方富农住所附近无相当较坏的土地可分，因此富农分得的土地离开自己住所很远，而很远地点住居的工农贫民分得的土地又恰在富农住所附近，彼此耕种都不便利。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便利生产，可以互相斢换房屋，但仍须得到富农同意，不得同意不能斢换。（三）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以后，如富农分得之坏田已经改良变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斢换。（四）暴动后富农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虽有多余，不得再行没收或斢换。

（七）富农的义务劳动

富农应该比工农贫民担负国家及地方较多的义务劳动，但以不妨碍富农的生产为限度。

（注）责成富农担负义务劳动与责成地主担负义务劳动，应有分别。地主的壮丁，应该完全编入劳役队，加以训练，使之参加国家与当地的劳动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改造其阶级性，消灭地主阶级。富农应该比较工农贫民担负更多的义务劳动，但不应同地主一样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致妨碍生产。因此，把富农与地主编在一个劳役队，在农事紧张的时期内，在富农劳动力没有多余及没有补偿办法的情况下，使之担负长期脱离生产的义务劳动，是不应该的。但是不妨碍生产，或富农劳动力有多余，或有其他补偿办法，则不在此例。

（八）破产地主

在暴动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但仍不从事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破产地主。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分配土地。

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有分配土地之权。

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来源之一部，其分量达到其一年生活用费三分之一者，得照富农成分待遇。

（注）（一）有些人把部分破产的地主叫做破产地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地主还有一部分产业依以剥削，只不过剥削收入的分量有改变罢了。（二）有些人把破产后已经从事主要劳动满一年的，叫做破产地主，这更是不对的。因为地主破产后从事主要劳动已满一年（指暴动前），他已经由地主变为工人或贫民或农民了。（三）有些人把

地主破产后已经从事一部分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若其劳动已达到维持全家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这种人已应该给予以富农待遇了。

（九）贫　民

工人农民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者，或依靠少数资本自己经营以取得生活费者，均叫做贫民。乡村及小市镇贫民分子失业者，应分配土地。城市贫民分子无房屋者，应分配城市中地主的房屋。贫民均有选举权。

（注）（一）贫民在城市中占着相当的大数量，在乡村及小市镇上亦有一部分。贫民的职业是很复杂的，有些贫民的职业常依季候更换而不能固定。贫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其收入常不够支出。（二）工人农民外，如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小贩、不剥削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及其他一切劳动分子，均属于贫民范围之内。所谓独立生产者，是指各种自作自卖的小工业生产者，这种小工业生产者有时雇用辅助劳动力，但主要依靠于自己的劳动。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一切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业务，有时雇用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这种雇工行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

（十）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

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

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

三、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期间，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等等。把知识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分是不对的。把农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做一种坏的成分，更是不对的。（三）把当教员，当医生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

（十一）游民无产者

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

苏维埃对于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的分子。关于争取一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土

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

（注）（一）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职业。有些人对于在业或半失业而兼从事一部分不正当职业（非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子，概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甚至把工农贫民中过去染有不良习惯（如嫖赌、吸鸦片）的人，都叫做流氓，这更是不对的。（二）有些地方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不加惩办，反而分田给他，这是不对的。有些地方对于一般游民无产者分子，又拒绝其分田的要求，这也是不对的。

（十二）宗教职业者

凡在紧靠暴动前，以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等宗教迷信的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无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注）（一）凡有这些宗教迷信职业而不是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及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满三年者，均不得称为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分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一律不分土地。即是说凡以这些宗教迷信为副业的，或依为主要职业不满三年的，如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在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如是富农，应照富农成分待遇。本人如此，家属更不待说。（二）真正宗教职业者的土地，一概没收，分给工农群众。其土地以外的财产，没收与否，依照当地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的意见决定。如果不得大多数工农贫民群众同意即去

没收宗教职业者的财产，这是不对的。（三）菩萨神主等迷信偶像，也须得多数群众同意才能毁坏，仅依少数人的意见去打毁菩萨神主的办法，这是不对的。（四）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看地、算命等人不叫做宗教职业者而叫做流氓，这也是不对的。

（十三）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

（注）（一）优待红军条例：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这里本已包括一切红军战士在内。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二）所谓“红军战士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权利。（三）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如被开除军籍，得收回其土地。

（十四）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本身及其妻子，依工人成分不变更。其应分配土地与否，依其在乡村或在城市，分别处理。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或富农成分处理。

（注）（一）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暴动前，有人出

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分。本人及妻子照工人成分待遇，其应有的一部分财产不没收。工人本身及妻子如在乡村，应分配土地。本人及妻子如在城市，不分配土地。本人在城市，妻子在乡村，本人不分配土地，妻子分配土地。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分，依其成分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工业店依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分，又各依其成分而决定其在苏维埃法律下的待遇）。（二）农村工人、独立生产者、小学教员、医生等人中，有兼有小块土地，因乡村不够维持生活，出外谋生，而将其小块土地出租，并非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应照一般农民分配土地，不能当地主看待。

（十五）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

一、结婚的行为，不应改变阶级成分。

二、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依照结婚在暴动前后的分别，依照原来阶级成分的分别，并依照结婚后生活情形的分别，而决定其成分。

三、凡在暴动前结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

民或贫民成分。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一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则须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才能承认其为地主或富农或资本家成分。如生活不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同等而与工农贫民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四、凡在暴动后结婚的：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须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五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分，如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五、不论何时与何种成分结婚，所生子女的成分与父同。

六、土地与公民权的应否享有，依其成分。

七、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者，不得编入劳役队。随嫁的现款在五十元以下者，不得向他罚款或捐款。

八、暴动前，工农贫民以子女卖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及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卖子女及招来郎婿的成分与待遇，适用上述一至七条之规定。

九、暴动前，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子过继者，不问过继时之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分不变更。从满十岁起，工农贫民之子过继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过继于工农贫民，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三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注）这里所谓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

（十六）地主富农兼商人

一、地主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二、富农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照富农成分处理。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

三、对于地主富农兼商人的罚款或捐款，应限制在地主富农部分，不得侵及商业部分。

四、商人不编入劳役队。

（十七）管　公　堂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应分别地主富农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

（注）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但有些小的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作为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有些人以为只要管过公堂的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这是不对的。

（十八）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

在苏维埃机关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人员，未分配土地而

生活特别困难者，本人及家属可分给相当土地，或以其他方法解决其困难。

（注）已分配土地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决（即发动群众耕种其土地），这里只说未分土地的人员。所谓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十九）公共事业田

新区分配土地及老区检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时，应酌量留出为了桥梁、渡船、茶亭及农事试验场等公共事业而使用的土地。

（注）桥梁的修理，渡船的修理与船工的工资，茶亭的修理与茶水的设置，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均须按照需要程度，由当地区乡政府决定，酌量留出一部分土地，发动群众耕种。此外，县苏、区苏、乡苏还须在政府机关附近适当地方，留出一部分土地（县苏可留一百担至二百五十担，区苏可留十五担至二十五担，乡苏可留五担至十担），以为开办农事试验场之用。在农事试验场未开办前，可租给农民耕种，只收最低的地租。

（二十）债 务 问 题

一、在暴动前，凡地主富农资本家以金钱或物品贷付于工农贫民者，除店铺贷帐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农贫民以金钱或物品存放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本利应照数归还。

二、依靠高利贷剥削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高利贷

者。高利贷者照地主成分处理。

三、在暴动后的债务，凡不违背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借贷条例者，均应归还。

（注）（一）有高利贷剥削（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论城市乡村，债务中最大多数，都是高利贷剥削），但不是依靠高利贷为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贷者而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应各依其成分处理。以为凡有高利贷剥削的都是“高利贷者”，这是不对的。（二）一面放债一面欠债的，应将其“欠人”“人欠”互相抵销，看其剩余部分的性质与程度，再与本人其他剥削关系总合起来，决定其成分。（三）店铺货账必须归还的理由，是为了不使商业受到损害，并且货账一般不能算入高利债务范围之内。（四）工农贫民相互间的债务应如何处理，由借贷双方自行决定。双方不能决定者，由当地苏维埃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全体选民同志们！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到今天，已经两周年了。去年的今天，我们曾向同志们做过简单的工作报告，现值两周年纪念的时候，应该把最近一年来的工作进程向同志们作个扼要的报告，并愿接受全体选民同志对于过去工作的意见和以后行政方针的建议。

同志们，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依靠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无论哪方面都是胜利的向前开展着，比一年前的形势大不相同。现在分开来说吧：

第一是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红军的扩大与加强。

一年来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这一战争是在全国各苏区都完全胜利了。依据不完备的统计，一年来消灭白军缴获枪支在十万以上。单只今年一月到六月的统计，消灭白军共四十一团六营十连，击溃白军八师三十三团十九营九连，缴获步枪三万一千七百多支，机关枪自动步枪一千多支，活捉师旅团长二十多人，打死师长二人，旅长以下死

伤不计其数。正因为我们这种光荣伟大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大大动摇起来，他们不得不组织五次“围剿”来向我们作死命的进攻。但是我们依靠着党的进攻路线，依靠着红军英勇与苏区白区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一开始就给敌人的五次“围剿”一个迎头痛击。连城、洋口、乌江及最近的黎川战役，我们都得了胜利，缴枪八千支以上。一年来由于工农群众勇敢向前加入红军，使红军比较去年扩大了一倍，并且在英勇的血战中锻炼成为强大无敌的革命铁军，各地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也加强了。苏维埃政府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用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是一切革命任务的中心。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

第二是苏维埃区域猛烈的扩大与进一步的巩固。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赤化了建宁、泰宁、黎川、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最近东方军的胜利，又从福建的龙岩、新泉交界，经过连城、清流、归化，一直到闽北的延平附近，这一大块区域，都变为苏维埃版图了。江西在粉碎四次“围剿”中扩大了南丰、宜黄、崇仁、乐安、永丰、新淦等县的各一部分，面积占数百里之广。至于中央苏区以外的各苏区，如闽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虽然有小部分地方暂时被敌人占据了，但有的不久即恢复，有的更有了新发展。发展得特别迅速广大的，是四川北部新创造的那个苏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不上一年已赤化了十多县，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都倾向着苏维埃革命。其他在陕西、河南、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等处，都有我们的苏区或者游击区域存在着。甚至被国民党出卖给日本

帝国主义的东三省境内，也已经有了我们的红色游击区域。东三省广大的抗日义勇军部队，是在继续的顽强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着。

苏维埃区域不但扩大了，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比如过去执行阶级路线不明确的现象，现在一般已经纠正。劳动法的切实执行与新的劳动法的颁布，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更加改善了，工人参加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工会普遍的组织起来并发展起来了。查田运动的广泛开展，给了苏区残余的封建势力以最大的打击，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劳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泛的发展了贫农团。依靠于工农群众积极性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新的工农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隐藏在苏维埃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加改善，苏维埃更加与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了。苏维埃行政区域今年已经划小，这样在制度上使苏维埃更加接近于群众。根据于过去苏维埃选举运动及苏维埃工作的经验，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选举法与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使今年的选举运动更加正确的开展起来，使地方苏维埃组织更加完善起来。所有这些，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适应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而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由于红军的伟大胜利，苏区的发展与巩固，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强占东三省、热河与华北，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浩劫，影响了激起了国民党区域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士兵与革命学生一致的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地主资本家，革命的斗争在全中国广大区域发展起来。全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因为只有苏维埃与红军

才是真正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的政府与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第三是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的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苏维埃已在用极大的力量去进行。这里发展农业生产是第一个任务，由于今年春耕夏耕中苏维埃领导的正确与广大劳苦群众热忱的提高，使今年的秋收平均比去年增加了一成半，杂粮生产更大大增加，犁牛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社亦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只有依靠农业生产的发展，才保证了红军与群众的给养，保证了与外部工业品的交换。发展工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任务，这里农具与石灰的生产，是与发展农业生产密切相连的，许多日用手工业品的供给，是依靠苏区自己的生产。烟、纸、木头、夏布、硇砂、樟脑等项的生产，过去都是出口大宗，但是后来衰落了。今年以来，苏维埃对于这些工业已在计划恢复，有些已得到了初步的成绩。发展出口入口贸易，是经济建设的第三个任务。今年以来，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经开始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为了实现上述各项经济建设的任务，合作社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自从中央政府着力提倡合作社运动以来，各地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已在风起云涌的发展中；各种生产合作社亦在计划发展；信用合作社则在开始计划。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事业，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发行超过了三百万，大概五百万的数目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得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同志们，一齐努力呵！

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亦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农群众才有享受

教育的权利与可能。一年来苏维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已在着力的进行，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已在各地广泛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与红军大学的建立，工农剧社与蓝衫团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苏维埃文化建设事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阶段中。中央政府最近已宣布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央政府正在制定小学教育制度与颁布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要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部分。

全体选民同志们，上面我们已经简单的报告了一年以来革命发展的形势与苏维埃工作的进步与成绩。现在我们还要向同志们指出过去苏维埃工作的不足与今后工作的任务。全体选民同志必须在苏维埃正确领导之下，用全力来充实这些不足，实现这些任务，才能争取五次“围剿”的彻底粉碎与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些什么呢？我们的不足在何处呢？

第一是扩大红军。同志们，我们的红军虽比从前扩大了，但是还不够，要打胜五次“围剿”中很多的白军，还要大大的扩大红军，每个勇敢的工农都应该自动的上前线去。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同时为了保卫地方，必须大大的扩大赤卫军与少先队，扩大赤卫军、模范营与模范少先队，放哨查路条的工作要特别严密起来，不让一个敌人的侦探混进苏区来。运输队要时常准备着，以便上前线抬伤兵、运胜利品。

第二是新苏区工作要更快的开展。一年来发展的新苏区虽多，但是还觉得慢一点，这里一个原因就是中心区还没有选派更多的工农积极同志到新苏区去做工作。为了在粉碎“围剿”战争中更加猛烈扩大新苏区，中心区的同志要大家欢喜到新苏区做工作去，新苏区的同志更要百倍努力于自己的工作。

第三是一年来苏维埃建设工作有极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工作须待于今后的努力。首先是保护工人的日常利益，要把劳动法更加普遍正确的实行起来。其次是查田运动，要在那些还没有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地方，尽力的发动查田，查阶级运动，不得侵犯中农，不得把富农同地主一样看待。其次是经济建设。要努力今年的冬耕，准备明年春耕。要发展合作社达到一百万社员入社，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各级总社，实行做起生意来。要实行发展出入口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食盐的困难。要修理桥梁、道路，使经济发展得着便利。要切实推销三百万至五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为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资本。其次是文化建设。要建立完备的小学教育制度，要发展消灭文盲的运动。其次是加紧肃反，不使苏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乘着敌人的进攻在我们内部捣乱。其次是加紧筹款，使战争经费得着保障。

为了迅速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保证了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

全体选民同志们，所有这些工作，每件都是我们的战斗任务，都是粉碎五次“围剿”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当着我们向你们作报告的今日，正是敌人用其全力大举进攻，我们集中力量向这些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战争是极度的紧张着，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极度的紧张起来。中央政府已颁布了战争的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用突击的精神去开展自己的工作，要使整个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前线的要求。凡我选

民群众，都要在中央政府这一号召之下，立即动员起来。同志们，我们用这样的工作去换取最后的胜利吧！首先要换取一个伟大的胜利，使之在现于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前。同志们，我们拿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去献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吧！

猛烈扩大红军！

猛烈扩大苏区！

战斗的发展苏维埃建设工作！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第二次全苏大会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央政府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上）刊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1]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下列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各在该线不得控置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本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如民众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

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存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 潘健行[2]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 徐名鸿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红色中华》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潘汉年。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九三三年十月）

毛　泽　东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

*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　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　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

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　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中，党的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便是新区边区工作。在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以后，在这方面有了转变。但是一般的来说，转变还是很迟缓的，并且在整个中央苏区之内，在一省或一县之内，转变是很不平衡的。例如闽赣、粤赣在中央苏区内是更落后的，宜乐崇在江西是最落后的，泉上、彭湃在福建是落后的等等。我们的党、苏维埃、军事机关、少共、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努力，还是不够的。为着加强对于革命战争的领导，为着巩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阵地，克服新区边区的落后，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中央局重新郑重的把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的任务提到全党的前面，并给以下面的指示：

（一）

为着彻底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广大的贫农中农和农村工人群众，发动和提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为苏维埃政权

而斗争的积极性，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新区边区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环。这首先要排斥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新区土地一次分不好的，开始没收分配的时候，只能马马胡胡的解决。”现在许多新区边区的土地问题，表面上解决了，实际上大部分没有解决，这种观点实给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观点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把没收分配土地当作新的领土占领的第二天就应该着手作的事情，而慢慢的去进行（如东方军在闽西）。以后凡苏维埃旗帜插到一个地方就应该立刻着手没收分配土地。

在坚决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真正做到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到贫农、中农、雇农的身上，不让一个富农分得好田。但是新区边区地方党部红军中政治部，过去以及在最近在闽西作了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错误，如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江西闽赣），原耕不动（闽赣流行“原耕为原则”的口号，此外崇仁和闽西少数地方），分配的时候以收获量为标准（闽赣），闽西分谷子不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而采用四六分甚至补工钱和肥料费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崇仁、店上）山林竹木是主要出产并且操在地主富农手里，我们没有没收分配，此外还有以房为单位来分配的。上述实例，都是明显的富农路线或其残余，同时是新区边区解决土地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的错误。另外一方面，个别地方提出“贫农分上田，中农分中田”的侵犯中农利益的口号。地方党部和红军中政治部必须开展反对各种各式的富农路线的斗争，同时纠正一切“左”倾的错误。在少数新区没有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必须立刻没收分配，而一般的新区边区更须切实的开展查田运动。要严格的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那里有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明确的阶级路线。同时中

央政府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1]、《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最后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两次决议，都给了执行土地革命法和查田斗争以具体的指示。

豪绅地主和富农的政权虽已被推翻，但他们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必然要用尽一切诡诈伎俩来保持自己的剥削地位，如威吓贫农中农不许分田，保持“原耕不动”，如在闽西提议把地主富农的谷子交给政府不分，以阻挠群众的发动，在黎建资一带，他们混入苏维埃，把自己的田当作公田不分。特别当我们的政治宣传还未深入，群众还未广泛发动起来的时候，豪绅、地主、富农更要利用我们的弱点来遂行他们破坏阻挠的阴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时候，必须依靠自己在农业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中的深入的工作，很警觉的揭破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阴谋。领导土地斗争的组织（如没收分配委员会等)，必须保障是积极的雇农和贫农占主要的成分，绝对防止被富农地主或其代理人混进里面。

没收分配土地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采取自下的平民式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要发动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自动手来参加没收分配的斗争，只有依靠雇农和基本××××[2]的发动，才能得到彻底的土地斗争的胜利，可是许多新区边区的乡革委或“查田委员会”把派人调查户口、田地和阶级当做中心工作，而不宣传鼓动群众起来参加。在闽赣有些地方，由革委派出突击队去调查，把田地分派给群众，以至群众不敢接受。这种脱离群众由工作人员包办的方式，不仅不能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有时反而被他们利用着在群众中进行许多武断的宣传。在没收豪绅地主财物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发动群众参加没收并且当场分配给群众的地方，群众积极起来报告隐藏的豪绅地主；反之，有些地方打土豪不分给群众而搬到区苏、乡

苏甚至被工作人员私分的地方，则群众不愿报告隐藏的地主土豪。所以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

土地斗争既然是新区边区工作最基本的一环，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那就绝不应该像有些新区边区一样，只看作是土地部的工作或者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党必须领导着革命政权和革命的群众团体，特别是少共、工会一致的为着彻底的迅速的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在新区开始土地斗争的时候，应当组织没收分配委员会领导没收分配。分配完毕，应当紧接着立即组织土地检查委员会，进行查田查阶级，以便土地问题经过这样的紧接着的步骤得到彻底的解决。至于某些新区边区土地问题已经过初步解决的，应该集中力量进行彻底的查田运动。自中央和中央政府把查田运动提到整个的党和苏维埃前面以来，新区边区仍然没有能够及时的迅速的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局特再唤起各省委和边区新区党部为党的两次查田运动决议而斗争。

（二）

中央曾经郑重指出“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工会工作所以落后于工人积极性和党的其他工作的发展，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彻底实行劳动法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业上遭遇了某种程度的忽视。这种情形在新区边区表现得更为严重，许多新区边区的党里面，发现对于工人力量估计不足与对于工会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许多地方，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只有形式的机关（闽赣），工人经济斗争没有发动，劳动法没有切实实行。甚至最近福建省工会的代表在连城

主张减少工人工资，闽赣党的干部中有人认为“工人情绪很低，店员靠不住”，因此没有什么经济斗争和工会工作可做。因为这种原故，边区新区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战争动员和土地斗争中没有相当的表现出来。党里面工人成分特别的少，只有少数的城市见到相反的情形，如门岭、建宁的工人曾经多次武装起来保卫苏区，实行与敌决战。最近洋口有七百余工人加入红军，这正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积极的组织和领导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展了政治的工作，为着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发展工人群众积极性，提高他们在土地斗争、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各个战线上的领导作用。必须在新区边区的党内坚决开展反对对工人力量估计不足和对职工运动机会主义消极的斗争，把“不让一个工人站在工会之外”、“不让一个工人没有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当作日常战斗的口号，谁不为这口号斗争，便该把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谁。

（三）

在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没有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权的机关，革委大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坚决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武装群众，彻底摧毁反动统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使临时的革命委员会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闽赣省委八月份报告说：“政权机关改造仍没有多大成绩，肃反后仍有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内，改组的几个县委仍没有工作能力，区乡更糟”。连城八月报告谓“革委主要工作是没收土豪及与土豪代表接头”。最近与敌人残酷决战的当中，边区新区革委中时常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反水的事情。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很久很

久甚至十几个月，还没有成为苏维埃。为要巩固临时的革命政权并使这个临时的政权迅速的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列各项：

一、应当严格选择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在革命委员会之内，“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其在军队中或在地方民众中有影响的分子不得不让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加入后如果不能在革命委员会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从第一天起我们便须设法使他们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时候，把他们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国际路线第二本九九页）。估计到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并不能“绝对保证党的训令的执行”，有些革命委员会中潜入了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有革委而无党员的，特别是最近敌人阴谋破坏革委的手段更加巧妙，如他们在红军未到时即组织革委，当红军政治机关表示对革委成分不满，他们即自动改组等等，都证明上面这一指示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我们地方党部和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最严格的选择革委的成分，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或来历不明的分子混入革委，在革委里面，必须保障组织上政治上我们的党的绝对的领导。

二、革命委员会必须积极的领导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工人经济斗争，解决城市贫民的要求，组织城市和农村的工会，组织贫农团，使他们成为革命政权的柱石。同时把群众武装起来，利用一切新式的旧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

三、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进行肃反的斗争，依靠于政权武装和群众的力量，残酷的镇压反革命。

四、“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权。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

民）兵士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同上九九——一百页）

五、地方党部必须加强自己对革委的领导，因此要派得力干部到革委工作，并建立革委中强固的党团，经常检查革委中党员的工作，听取党团关于革委各部门的工作报告，给以具体的指导，必须保证党团绝对忠实的执行党的一切政策和训令。闽赣省委报告说“整个说来党对政府工作领导极为薄弱。在县及某些区，党的负责同志可以包办一切，而政府主席如菩萨，大多数区委及支部则对政府工作不理”。党对政府工作“包办”或“不理”的两个极端的现象，不只闽赣才有，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四）

“已下台的剥削者，本来不料他们会下台的，本来不相信这个，本来未曾想起这个，于是就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奋斗为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国’”（列宁）。当其我们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没收地主阶级打击了富农以后，无疑的要以“多倍的毅力狂疯的热情万分的仇恨”起来反对我们，企图推翻革命政权，恢复他们的统治。特别是我们正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尤其特别的是新区边区在这种形势下所处的严重的环境：那里革命的政权还刚才创立或极不巩固，而反动统治还未彻底摧毁，包围我们的敌人的武装时时向我们袭击，他们极力组织法西斯蒂和各种各式的暗探机关，反革命组织等来与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勾结，组织复辟。我们不仅要武装的反抗外面的进攻，我们同时

要极警觉的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如果放任内部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将不可能战胜外面的敌人。

七八月间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在黎川资溪光泽破获了大批AB团和改组派的组织，使闽赣苏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前面消灭了暴动阴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那里发生肃反中心论倾向，省委已在纠正）。可是我们冷静的检查大部分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便发现那些地方的党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是很不够的，因此，肃反的工作是松懈的，赤色戒严和步哨没有严密的组织起来。敌探以至武装团匪可以没有阻碍的深入苏区数十里，区苏或区委时常突然的被袭击包围，游击队、政权机关以至党的组织内时常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反水。但我们没有事先觉察，对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与造谣多不注意及时的揭破，有时造成群众中的恐慌，而我们反莫名其妙。这些严重的现象，客观上表现了对反革命“仁慈”的倾向，我们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残酷的斗争，战斗的加强新区边区的肃反工作，以群众的暴力“坚决的肃清反革命阴谋，彻底的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一、首先重要的是加强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肃委的领导必须是对革命最忠实的并且对肃反工作比较熟练的干部充当。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须创立这个组织。

二、在肃委中和其周围，必须吸收当地工人贫农中最坚决积极的分子参加工作，经过他们建立与广大劳苦群众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肃反工作将不能开展起来。

三、扩大保卫队的组织使之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组织严密的步哨和赤色戒严。

四、要广泛的采用群众的革命的手段来处置反革命。对付反革命必须采用暴力，这种暴力要依靠在革命的劳苦的群众身

上，而不是依靠在几个工作人员的搜索与专断。对于显然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反革命首领，必须经过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由群众处决而不要机械的经过合法手续。

五、对反革命的武断宣传和造谣，一方面要及时的揭破，另一方面就要追求其线索和来源，达到破获的目的。

（五）

部分苏区群众被反革命欺骗或威胁因而转到反革命影响之下的，有两种情形：跑到白区去；加入大刀会、难民团、守望队、童子团等。两种情形都在反革命领导之下，并且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加入，这些于我们是敌人。唤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影响威胁之下的群众。

跑到白区去的群众有两种情形：一是当敌人进攻时，群众未及走避被敌人押去白区；一是平常跑出去，由于阶级斗争不深入，有的由于工作方式（如强迫命令）或策略（如侵犯中农利益等）的错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欺骗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跑到白区。跑到大刀会等反革命组织中去的，也有这同样的情形。

此外，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在邻近白区“乱打土豪”侵犯白区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至在许多地方造成“赤白对立”的城垣，敌人便利用这种错误。闽西十九路军被红军击退时，拿“土共来了，扫帚也要××”的口号威吓成千成万的群众跑去敌人的后防，并且扩大童子军的组织。

反革命首领对于跑到白区或大刀会等反动组织中去的群众，除掉欺骗外，就是威吓强迫他们进攻苏区或修筑工事马路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跑往白区的群众是容易争取回来的，大刀

会等反动组织里面的群众也是可以分化出来的，闽赣省的光泽资溪曾争取了两万多跑去白区的群众回来，群众回来后积极带路捉反动领袖，就是极好的例证。

但是有许多地方，我们的地方党部和地方武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有的没收跑出去的劳苦群众的财产，新泉、芷溪竟发生没收被胁迫去白区的红军家属的财产。对大刀会只是单纯的采取围剿，石广游击队甚至认为凡是大刀会地方都是匪巢，凡是匪巢都无条件的烧杀没收，群众的纸槽、香菇棚一概毁灭。这种国民党式的政策，使大刀会首领更能欺骗一部分纸工、木排工和香菇工人，拿“打下山去，不打红军苏维埃，只打游击队”的口号煽动群众。湖坊、熊村赤卫军将捉了的大刀会群众“乱打乱杀”。闽赣有的地方，当群众争取回来的时候，要他们向苏维埃悔过，同样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政策，仍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把一切暂时被反革命欺骗或跑往白区的劳苦群众当作“反水群众”，不了解群众是不会反水的。反革命领袖是一方面，在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又是一方面。前者是苏维埃的敌人，后者完全可能成为苏维埃的拥护者。所以反动领袖不得不向群众说“大红军好”，“不打红军苏维埃”，正因为群众是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另外一种错误就是东方军政治部×××××首政策”，希望真正反革命分子××这种政策，实际是反映着对反革命首领妥协的倾向。

我们必须在严厉的反对一切对反革命妥协的倾向的时候，无情的打击不相信群众的“反水群众”的理论，纠正地方党部游击队等所犯的“左”的政策上的错误。

估计到成批的群众跑去白区都有反革命分子从中威胁煽惑，必须在×××时候，进行严密的肃反工作。估计到大刀会、童子军等是一种反革命的武装组织，必须加强地方武装

(赤少队、独立团等等),坚决对这些反革命武装实行群众的武装的进攻,严厉打击类似过去合泽的同志在建黎泰所执行的防守政策。

估计到一切反革命首领常常提出巧妙的欺骗口号来煽惑群众,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的从实际例子中去揭破那些欺骗宣传。估计到反革命首领的欺骗口号,一部分是利用着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严格纠正自己的错误,以至向群众公开承认这些错误,用实际的事例去说服群众,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影响而转到我们方面来。

对于跑去白区的或加入反革命武装组织的劳苦群众,不仅要采取各种各式的方法去宣传他们回来,不仅不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危害他们留在苏区的家属,并且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同样要分配给他们××他们回来分田。对于反革命的首领××××××劳苦群众,也要同样待遇。这样才能使这些群众完全了解苏维埃是保护他们利益的,是他们自己的政权。

游击队应当是苏维埃种子的散播者,新的苏维埃的组织者,必须严格的执行党和苏维埃的政策,坚决肃清游击队中"土匪主义"的倾向,如乱打白区劳苦群众,以及脱离群众的倾向如没收豪绅地主财产,不分给当地群众,不组织当地群众斗争等。必须这样,才能根本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

估计到争取回来的群众,他们曾经受过各种各式的反革命欺骗,我们不仅要发动群众以极热烈的诚恳的态度欢迎他们,慰劳他们。被我们缴械的大刀会等反革命武装组织,除开把首领交给群众审判处决外,对于群众不仅不要杀害他们,同样要安慰他们。我们更要向这些群众尽量揭破反革命首领的罪恶,解释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且组织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肃反工作和继续消灭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六）

三次战役中赤少队、游击队英勇的作用，而在四次战役中“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斗争》二十一期第三页）。这种现象自然最厉害的表现在新区边区。依据于环境的需要，新区边区的赤少队游击队应该表现出最高度的积极性。但事实恰恰相反，那里的党部很多表现倚靠大红军的心理，“大红军不在，一切没有办法”。现在的状况是四次战役来发展的新区，赤少队极少真正建立起来。比较老的边区和新区，赤少队大部分表现出没有自卫的能力，调动着去配合红军作战，则发生开小差和逃跑。

地方的游击队（除开红军直接组织领导的）的现状是很严重的。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一）游击队不仅很少扩大，反而日渐缩小；（二）时常发生开小差或拖枪反水，特别在敌人进攻紧急的时候；（三）不敢出击，伸出即回；或者游而不击，击而不游；（四）出击时“乱打土豪”，没收不分给群众；（五）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在队伍中，甚至担任领导工作；（六）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上述的现象在部分的独立团营也同样存在着。

在会寻安方面，虽在敌人积极进攻的环境中，无论赤少队和游击队都没有什么改善。其他地方赤少队一般是没有改善，在闽西和闽赣少数地方游击队有极微弱的转变。

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严重的向全党提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并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党“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

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与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为着使地方党部、政府和军事机关能战斗的解决这个任务，中央局曾经发出关于赤少队的指示（《斗争》二十八期）并准备发出关于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专门的指示。边区新区的党，必须在中央关于五次“围剿”决议的总的路线之下，遵照右述个别的指示，在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方面执行切实的转变。

（七）

为着解决上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区边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必须在新区边区党内开展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改善党的领导方式。

一、因为罗明路线的损害，曾使新区边区工作陷在严重的落后的地位。直到最近反罗明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一部分新区边区，如宜乐崇、安远、寻乌、南丰、新淦、信丰、闽北、武平等地方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展。那些地方不是没有“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退却逃跑的呼声”，而是“反对”只限于“空喊”，没有具体的联系到实际工作的转变以及领导机关的真正的改造。所以新区边区的党，首先最重要的是坚决的肃清罗明路线，反对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把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向着口头很漂亮的反对机会主义而实际忠实的拥护机会主义的两面派，向着清谈两条战线斗争而与实际工作转变脱离的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对于不能立即解除自己反党武装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者，必须从领导机关中撤换，代以新的领导，保障每个党部苏维埃武装

队伍和群众组织的领导都能绝对执行党的路线和上级机关的指示。

在坚决进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必须顾及到新区边区的党比中心区要年幼得多，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特别是年轻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的时候，要充分采取同志的态度而耐心的去说服和解释，具体的指出正确的方法，特别要能作出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所指示的正确。然而这并不减轻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在进行着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这就是说"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上级机关指示的执行以及与居民群众的相互关系，都要特别严格的负责，对于游击队和红军中的党更特别重要。党员领导的队伍，应当注意到使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纪律和对革命事业彻底忠实的模范。在事实上实行为反对违反苏维埃法律的罪过之每个党员的最严厉的个人负责办法，党员比非党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恰恰相反的，说服解释的工作更能提高党员对于革命纪律的自觉的责任心，所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关于这点，（即上面的引文——作者）必须向党员和同情者进行解释工作"。

二、必须把争取党员数量的发展和创立新的支部当作组织上的重要战斗任务。有些新区边区经过几个月以至大半年的工作，党的组织还仍然极端窄狭，有些地方根本只机关工作人员中有党员，没有地方支部。为着解决这个战斗任务，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办法，如责成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特别是接近群众的工作的党员，经过他们自己的工作路线去介绍党员，给每个这样的工作同志以具体的征收党员的任务；责成支部每个党员介绍新党员，经常把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到支部中检查和讨论；在没有支部的市镇和乡村等，指定专门的同志去担任建立支部的

责任。在新区边区的环境中要尽力的扩大关于共产党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什么，但党员的吸收，必须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中采用个别征收的办法。群众大会上摆摊子式的报名入党，就在中心区也是坏的办法，如果拿到新区边区运用，是更不适宜的，因为容易使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里面来。

三、为着加强新区边区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执行“最好干部到新区边区”的口号，不只中央和省委要担负这个责任，县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区，区委对于新的和边境的乡都要严格的执行。同时对于调去新区边区的干部要尽可能经过相当的训练，给他们以初步的关于新区边区工作的策略和方法的知识，不然他们会机械的把老区工作方法搬到新区边区，不能接近群众，或则在新区边区许多特殊的以至困难情势的前面，表现没有办法。

另一方面必须培养与训练当地干部，这不只因为外地干部不能满足需要，主要的还因为没有大批的当地干部逐渐提拔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地位上来，党与群众的关系很难达到应有的密切。必须粉碎新区边区党内特别是外地干部中不相信当地干部力量的倾向，坚决提拔在群众中有信仰而积极工作的党员担任适当的负责工作，耐心的给他们训练和帮助。

四、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自己干，否则只有强迫命令。另一方面，组织上的基本原因就是群众组织狭窄，并且多半只是有空机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开始组织，

因此党与群众之间缺乏“轮带”与“杠杆”，没有动员群众的工具。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要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群众组织。组织强大的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是转变新区边区党的领导方式的基础，是在残酷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

中央局责成各省委，边区新区的县委、区委详细讨论这一指示信，并且在支部中作报告。省委、县委须将新区边区工作转变情形随时报告中央局，关于新区边区的白区工作，另有单独的指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2〕此处符号是原有的。下同。

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亲爱的同志：

除了我们给你的口头的指示以外，我们要再来一次着重指出关于福建最近发展的主要点。

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之间的协定大大超过仅只停战的范围，因为协定所载的除停止冲突外，还有重要的政治的条件，如开放封锁，应许福建白区群众有民主的权利，释放政治犯，群众有武装自己之权及其他要点。赤白区疆界的划定更加确认我们以前取得领土上的胜利。但该协定至今彼方尚未批准。

我们必须要绝对明了假使被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批准这个协定，他们也决不会执行的。党在这一点必须坚定如顽石，必须从开始就在党内和群众中克服任何的幻想。

（1）为什么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不愿和不能实现这个协定呢？因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因为十九路军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

因此，他们的压迫工农的政策会继续下去。他们不会分配土地给农民；捐税反会增加，他们要维持和增加剥削；政治犯不会释放的，或者当部分政治犯释放时，新的被捕者又再充满

牢监；他们不会让群众来武装自己而是要继续他们解除游击队的武装的企图；进攻苏区的军事准备不会停止，而是在我们有不大顺利的形势和十九路军比现在集合更多力量的时候他们还要实行进攻我们的。

（2）那么，为什么十九路军首先发动要和红军缔结协定呢？

仅仅拿十九路军军阀想借此削弱我们的戒备以便后来更好在我们背后中伤我们的意义来解释这样一个步骤是不充足的，因为十九路军领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信任他们。对这问题的答复是在于，因为中国反革命的营垒中有深刻的和不断地增加着的矛盾。矛盾的增加是由于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矛盾的深刻是由于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矛盾的加紧是由于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由于要在中国民众身上打出一条出路的帝国主义者中间有不断增加着的敌对和冲突，由于中国剥削者和军阀们之抢夺之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据地更加狭隘的缘故。这种发展并不会减少中国剥削者破坏工农的革命之残酷的企图，而是要增加反革命者屠杀中国民众的努力，同时又发生十九路军领袖们首先要与红军订立停战协定的事情。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除了上述的几个基本理由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特殊的条件。

十九路军在今年夏季与红军作战时，大大地打败了，当在上海战争时期，十九路军取得了有坚强民族革命倾向之有力的战斗队伍的声望。但十九路军军阀的领袖们害怕民族革命斗争的结果，害怕他们的士兵和群众，勉强接受了蒋介石强迫十九路军迁移到福建的命令。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要十九路军离开蒋的地盘，将他放在苏区、海洋、广东和浙江中间之相当穷苦的省份，利用它来进攻红军，放它在有日美帝国主义间紧张的

敌对之区域里面，盼望十九路军在未来的争斗中会失去它的特性而毁灭其战斗的力量。在十九路军领袖们的帮助之下，蒋介石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达到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改编”了他们的队伍，解散和屠杀活埋了革命的士兵，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他们军队的战斗力量由于铲除民族革命成分而减弱了。他们如其他军阀的部队一样成为执行帝国主义的阴谋的势力。他们初入福建时，广大群众欢迎他们，视为解放他们脱离封建军阀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救星。今天的群众则痛恨他们，因为他们已成为服务剥削者和增加福建人民担负的武力。蔡廷锴和上海战争的其他“英雄们”在意识上和政治上已破产了，他们的军事的魔力已受到红军的严重的打击，他们已经失去了发生为“中国的救主”的单独的作用之前途，他们害怕蒋介石的胜利以及由此胜利而得的处置，他们更害怕红军的胜利与苏维埃革命扩大到大部分的福建。

在这个进退两难之中，十九路军中若干领袖和政客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再得比较广大群众的信仰，企图加强他们反对蒋介石广东和福建内敌视的军阀的队伍之地位，提高他们与现在或将来的南京政府妥协的价格。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才觉得与红军谈判停战和缔结一个协定是与他们有利益的（他们在缔结协定上并不是完全一致，推迟批准协定和福建进一步的事变，至十一月半尚未宣布他们的倾向等就可证明这一点）。在形势中每一个变化，红军有不大顺利的形势或有伟大的胜利，阶级斗争之残酷的发展和十九路军士兵之革命化等都要使十九路军领袖们完全改变态度，引到对苏区新的进攻。我们的全党必须要明了这个，因为我们必须预先准备。我们方面任何的忽视，将要引到重复以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这个错误，党和群众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出了最重的代价。

（3）对于十九路军领袖们既有这个估计，那么，为什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再要与他们缔结休战协定呢？

我们主要的理由是增加敌人营垒中的对抗和进一步的瓦解，在与蒋介石主力进行最剧烈的战斗时至少取得与一个敌人暂时的休战，如有可能取得一个暂时的甚至于仅只部分地开放封锁。最后，如果党能利用的话，可以对于发展福建白区中工农之革命的斗争上给予以较大的兴奋，加速将十九路军士兵争取过来参加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

（4）为了要完全实现这些目的，福建的党要担负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不必指出已与你面谈过的一切任务，我们仅只着重举出几个主要的任务：

（甲）必须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一切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性，必须使群众了解在福建内的发展，团结他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斗争。

我们必须晓得中国生长着的革命，国民党之增加着的瓦解和腐烂必会引到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军阀以层出不穷的新的企图来欺骗群众，用武断宣传的阴谋和增加的武力来制止革命的胜利。法西斯蒂的活动是在增加着，他们的目的是拥戴蒋介石做羽毛丰满的独裁者，以便他更加残酷地进攻革命，克服国民党和军阀之不同的集团，将中国比现在更高度地放在日本的控制和宰割之下，使中国在将来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中站在日本方面。这种法西斯蒂增加的活动，表现出为中国尖锐的革命形势所产生的发展之一方面，这个革命形势是在引到敌人营垒中进一步的瓦解。促进国民党瓦解的其他方面是反对蒋介石者正在增加，各个破产的集团和政客们更要企图以“反对蒋介石独裁”、“建立民众的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平均分配

土地和土地国有”等口号来挽回比较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信仰。北方冯玉祥和他的部下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当察哈尔工农兵运动被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卖国行为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北平、南京的日本傀儡之炮火所破坏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利用冯的把戏和国民党的卖国而进一步地巩固其在华北的侵占。

福建事变大半是与北方的运动一样的。“第三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诸集团，现在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壁以阻止革命的怒潮。他们看到国民党更加瓦解，估计到目前南京政府濒于倒台，所以在工农开始建立他们的苏维埃的时候，他们就举起他们老的反革命的旗帜。为了要将群众把持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之中，为了要拦阻群众走向他们的先锋队所指示的革命道路起见，这些企图采择了冒充的民族革命和武断宣传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词句、口号、政纲。在欧美各国学得了一些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龌龊的方法之留学生也加入了这些集团，共产党的若干叛徒们也来加入他们的营垒。可是不管有扩大组织和活动的一切企图，他们依然没有进步，瓦解仍然进行。

现在这些领袖们目前形势或可扩张他们活动的范围，增加他们的力量，供给他们以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力量及比国民党更有效力的方法。无疑的是，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之力量之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因此，我们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础上竭力和这些政党奋斗，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我们必须更清楚地明了福建最近的运动又显明地表现敌人营垒中每个集团都被拉入帝国主义的利益和阴谋之轨道上去。事实上，彻底反动的胡汉民企图在福建运动中要起领导的作

用，所以他已被杉村高度地赞扬为日本可信托的人。这表示至少一派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手掌之中。我们能够推测积极发动目前运动的陈铭枢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但即使陈铭枢没有参加这派，然而十分显明的是他至少在客观上已起了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因为这些福建分子并不要想进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握在手掌之中。毫无可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要企图将它的脚爪抓入福建肥肉的更深一层。

报纸所载的一切，表示福建敌人营垒中发生进一步地不相一致。这个不一致的理由是有好几个：不大相信他们计划会成功的，不赞成对苏区红军的态度及与他们订立临时协定；对内政策的执行和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倾向亦有不同的意见，无可怀疑的是蔡廷锴倾向美国，所以福建军阀营垒中的矛盾也反映出美日间的尖锐的对立。

因此，我们的党必须要坚强地和清楚地将革命的立场放在群众面前，必须彻底告诉每个党员担任这个工作。

（乙）党的组织任务是有同等的重要，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例是：假使我们获得一个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之最短时期，党的机关和党的最重要负责干部必须保守严格的秘密，领导公开的群众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当敌人忽然反脸进攻我们的时候，他也决不能消灭我们的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最大的谨慎会保存我们许多同志来做将来的工作。党的坚强的省委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来。

（丙）但是与这些预防的办法同时进行的是要在一切活动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开展可能的群众工作，必须吸收可靠的工人贫农和其他劳动者来进行加强党的组织和建立新的组织。青年团必须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发展起来，团必须竭力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利用临时协定的事实，利用士兵们的不满，利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用十九路军领袖们和福建政府的卖国等等。必须在十九路军和其他队伍中建立小组支部之严格地秘密工作，主要的是派遣党员和团员深入十九路军，必须组织赤色工会，巩固现存的工会。我们必须在群众附和敌人及敌人占优势的工会内加紧我们的工作。工人目前的要求必须放在前面，但这些要求必须要与中国政治形势、福建的各种发展、反帝斗争和发展斗争来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任务联系起来。必须组织工人纠察队，建立行动委员会，准备和领导罢工。

一个广大的反帝群众运动必须发展。不仅要鼓动，主要是由鼓动而建立群众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工人在这运动中要起领导作用，且要没收日货，将日货分配给失业者和城市贫民。

农民中的工作是极重要的。组织农民委员会，以农民委员会为抗债、抗租、抗税、夺取收获的粮食，夺取和分配地主豪绅富农的土地之斗争机关，利用福建政府平分土地的允许来粉碎它的假面具和发动农民自己的行动。只有农民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土地革命，要拿武装来支持农民斗争。因此要在党领导之下或在可靠的贫农中农领导之下组织武装的“农民自卫军”。

派遣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这个运动要超过现在或将来福建统治者或者所给的让步的范围，这种小小让步仅只为了宣传而决不会变更农村中基本群众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群众准备拿武装来支持斗争而由群众自己来改变它，也要将反日运动、反帝运动与这个斗争联结起来。农民运动将是扩大福建革命之最重要的杠杆之一。

（5）苏维埃红军与福建省政府十九路军之间的临时协定给予我们以号召工农兵群众的伟大机会。

如果这个协定不被批准，我们必须举行一个伟大的运动要求福建政府十九路军批准它，将它在群众面前披露出来，同时要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包含由群众自己来实现这个协定）而斗争。假使这个协定被批准的话（虽然可能性很少，但仍有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机会。然后我们必须发展斗争要求实现开放对苏区的封锁，且为实现协定中政治上的要点而斗争。无论该协定批准与否，我们必须要将为实现我们的要求（包括协定所载的各点）的斗争发展到达极点，只有福建工农兵的群众拥护，才能保证反对福建军队对苏区红军新的进攻。

不论这个协定批准与否，我们都有极大机会来揭破福建统治者的假面具来发展福建群众的革命运动到达较高的阶段。当敌人还未显然表示不肯批准这个协定之前，我们不必将协定全文刊行出去。但显明的，我们应该普遍传布一个临时协定已经缔结的事实。我们应该将协定中的主要点告诉群众尤其是十九路军士兵，号召和督促他们为批准这个协定而斗争，如果被批准了，则为实现这个协定而斗争。要普遍地宣传苏维埃的政权，告诉群众必须要武装暴动，必须组织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能解决群众的土地、粮食和自由的问题。

我们请你将这个路线和我们面谈过的其他重要任务完全执行，时常注意迅速变化的形势和新的事变。你必须用最大努力来向全党说明，纠正错误的观念，养成一个一致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为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展具体的工作。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过早地发展地方武装暴动，而是在最短的可能的时期里面创造为工农的群众斗争之广泛的基础，将十九路军士兵革命化和领导斗争到较高的方式。然后我们会打击敌人的威信，破坏敌人的计划和目的。然后，即使敌人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仍能暂时保持重要的海港和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地点，我们也会取得群

众的力量，在福建最大的部分的地域内推翻敌人的势力。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为“中日直接交涉”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们！

国民党卖国贼又与日本强盗进行了新的拍卖中国的交易，实现了所谓“中日直接交涉”了！

据中外各报的消息，这次交涉是关于通车、通邮、通航、通商、设关、借款、军事等等的问题。经过冈村与黄郛、何应钦，在北平数次谈判之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认为上列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结果”，而成立了协定，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北平与沈阳直接通车，凡载客与运货所得之费，彼此平均分配。

（二）恢复中国与“满洲国”间邮务、电报等的关系。凡取道西伯利亚与满洲之邮件、电报由中国收发，而不受中国当道之留难。开办北平与沈阳间载客运邮之航空业务。

（三）恢复中日满的通商，禁止一切抵货运动。凡华北与满洲间商品的输出输入不标明产地，使日满的商品入口中国不付关税。

（四）在长城各口设立税关，以表示事实上承认长城以外的土地为日本属地，而从中国运往满洲的货物得由“满洲国”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八期。

抽入口税。

（五）日本允许以大批借款及军火供给国民党去镇压抗日义勇军与红军，作为国民党这次出卖的代价。

（六）成立中日满的军事联盟，去进攻苏联。

这个交涉的意义，当然不限于国民党公开承认“满洲国”，最后出卖了满蒙，而且把整个的华北送给了日本强盗，以此得到日本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去进行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作为这次新的出卖的交换条件。这也就是塘沽协定中所谓“内乱戡平的援助”，亦是日本外务省“新外交方针大纲”中所谓“协力剿共”！

只有最无耻的卖国贼汪精卫辈才会说这次的交涉是什么“不丧权，不辱国”，只有最卑鄙的上海市商会才认为汪精卫这个自欺欺人的声明是什么“欣慰曷极”，只有最反动的《大公报》才会说这次的交涉是为着什么满洲“人民”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国民党卖国贼和一切反动派，为了掩饰其卖国的罪恶，大喊什么关外“人民”与关内不能无“通车”、“通邮”的关系，而对于苏区民众则实行最残酷的封锁与轰炸，在“中日直接交涉”的时期大举“围剿”唯一反日反帝到底的红军与苏维埃政权，而在全国各地实行其所谓“剿匪”宣传周，无耻的污蔑红军是什么“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的武断宣传的面目，已经在全国民众面前完全揭穿了！

现在甚至瞎子也可以看到，国民党是一贯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彻底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已经出卖了满洲、热河、内蒙、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把康藏又卖给了英国帝国主义，把云、贵、南海九小岛卖给法帝国主义，把整个的中国在所谓“技术合作”的名义之下送给国联管理。在目前“中日直接交

涉”的过程中，汪精卫经过郭泰祺实行联英的勾当，使英国扶植刘文辉在四川的势力，英国也准备以“宪兵恢复长江秩序”，直接干涉中国的红军。蒋介石刽子手自认为五次“围剿”没有把握，恭请日本出来直接进攻红军，准备以中国沿海沿江各地送给日本，以便在中国准备大战，又去对付苏联。因此，在“中日直接交涉”中，冈村在平津的历次谈话特别提到日苏的关系之紧张，满洲、热河各地的日伪军加紧训练与调动，并称苏联为日伪的敌人，这都不是偶然的。

全国劳苦群众们！“中日直接交涉”已经实现了！国民党现在正忙于执行这次交涉的卖国条约。通车、通邮、通商即将实现了，长城设关已开始进行，何应钦在平津大宴日本忠实走狗——孙传芳、曹、陆、章[1]等，团结一切新旧卖国贼，以形成华北的第二“满洲国”。日本强盗在这次“中日直接交涉”之后，正在积极准备加紧侵略中国，要在大连设立临时政府，在中国极力备战，派军事专家调查中国各地物产、地形、道路、河流、军队、武器、炮台以及红军苏区等，以便进一步的屠杀中国民众和镇压中国革命，现在甚至反动报纸也承认：“今日之北平，即昔日之沈阳，今日之华北各省，即一九三一年之东三省”（《大美晚报》）。我们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劳苦群众们！我们不能让国民党卖国贼这样干下去！我们不能让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这样来瓜分共管中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国民党这样来镇压中国革命与进攻红军苏区！

摆在中国前面的只有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被帝国主义最后瓜分共管，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宰割之下解放出来，而成为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

劳动群众们！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卖国交涉，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协定，以罢工、罢课、示威去反对日本强盗的侵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红军苏区的五次“围剿”！反对侵犯中国民众的唯一的朋友——苏联！我们再次声明：只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国民党，为苏维埃中国而斗争，才能使中国民众得到民族的与社会的完全解放！劳苦群众们！团结起来，武装起来，结成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血腥统治，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释

〔1〕指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张　闻　天

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今年正月内曾经公开宣言，愿意在三个条件之下，同任何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订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的战斗协定。这三个条件就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及领土的完整。

自这一宣言发表之后，在苏维埃政府关于许多重要政治事变的宣言中曾经一再提出这一主张。最近，在苏维埃政府《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中，又重复提出了这一主张。

苏维埃政府这一提议当然不是偶然的儿戏，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这一行动是在揭破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的造谣与污蔑（说苏维埃与红军在后方捣乱，所以不能使国民党军阀出兵抗日，不能不使国民党集中他们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最清楚的在全中国民众之前表示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始终一贯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与红军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六期。

不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正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政权与民众武装。因此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争取全中国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之下，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尤其是对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与下级军官，这一宣言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同意我们的提议，愿意同我们一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压迫他们、残杀他们的兄弟姊妹的国民党军阀，他们骂他们的上级军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情形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非常普遍的。

在另一方面，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所以我们苏维埃政府向所有国民党军阀提议，只要谁真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使我们同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与相反的政治立场，即使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是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

我们这种提议完全不是我们的示弱，而是表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但是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所不了解的。他们说，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那不过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而已，难道我们苏维埃真想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订约不成！

无疑的，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由于全国的民族危机，由于他的士兵群众的革命化与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由于苏维埃与红军影响的扩大，由于他自己所处的政治的与财政经济的困境，以及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的紧张化等许多特殊的条件，这种可能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可能，而是利用这种可能，来争取群众，来取得群众的同盟者，来为苏维埃政权谋利益。

在国民党这块招牌根本破产，在蒋介石以全力造成他自己法西斯系统的独裁，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加紧，以及全国的政治经济的危机的情形之下，在国民党内部必然会发生新的分裂与瓦解。一部分国民党军阀，由于他们切身的经验，知道红军的力量是不可欺侮的伟大的群众的力量。屡次的对于红军的进攻不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兵败将亡，劳财伤命。在他们中比较开明的分子，自然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过去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敌对政策了。同时其中一部分军阀为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为要用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迷人的“左”的反革命政纲，并且可以最后抛弃国民党的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开始在相当限度内容许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并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类军阀常常不怕接受我们的条件，而且积极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好在群众前面表示他们的左倾，以争取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

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且夺取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当然，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从这种妥协，我们可以得到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东西。从这种妥协，我们还可以争取广大群众与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与我们的组织。这种妥协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容许的。列宁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对于这些人，正像列宁所说的，除了"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极端危险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有些同志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往往以为，某一军阀愿意同我们妥协，那就表示这个军阀倾向革命，表示这个军阀愿意向我们苏维埃政府投诚，相信这个军阀是我们的好朋友，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停止对于他的一切斗争，甚至说还要在政治方面向他让步。

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最危险的。这是从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老机会主义。我们丝毫不能忘记，同我们谈判的、妥协的，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军阀。这些军阀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会表示左倾，甚至会同我们暂时的订立协定。然而形势的变化，会使这些军阀立刻抛弃他们的面具，露出他们原来凶恶的真相，撕破过去他们所亲手签订的一切协定。对于这些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丝毫的幻想也用不到的。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幻想他们会变成革命者，而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们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必须坚信，只有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革命才能发展，才能胜利。那些反革命的“左”的欺骗宣传不但不能推动革命前进，而且会障碍革命的开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个别的地方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中央给满洲省委信）

在我们苏区，则应该利用这种妥协，来流通我们的商品，来集中更多的力量去对付主要的敌人。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一妥协的时间，即使是十分短促的，加速度的去准备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预备新的决裂与新的战争。对于同我们妥协的军阀

的每一新花样，每一对于群众的欺骗与压迫，我们应毫不放松的给以揭破。任何的协定不能束缚我们党对于协定对方的严格的批评的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员，在同这些军阀谈判中应该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我们的基本原则，去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如何能够在外交的礼貌与辞令中不失去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而抓住每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空隙与机会，来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

苏维埃与红军的新的胜利，国民党的进一步的崩溃，将使这类“外交事业”更加繁忙与复杂，但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对于阶级敌人的幻想，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任何的协定不能使我们失去头脑，使我们的工作松懈下来。相反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短促的时间，更努力的工作，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去争取苏维埃革命的新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江苏党的工作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

中央细心的检查了江苏党半年来（自六月至十一月）的工作，看到了工作中个别的成绩：在大破坏后的困难环境中进行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领导了一些小的群众斗争，帮助了反战大会的举行。但是，江苏的党还没有学习把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适合革命斗争扩大与生长的要求。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还不能与广大的群众组织实际的日常联系，不能在工人罢工运动中负担领导作用，没能在各工业中心——首先是在上海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没能领导江苏的农民运动。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全国和江苏虽存在与日益开展的革命形势，但江苏党不能在全省——首先是上海领导一个伟大的运动有力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的斗争。

江苏省委自大破坏后至今已经工作了半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与具体帮助之下，依靠着下层同志的积极性，本有开展工作的一切可能，然而终仍造成目前之严重局面的基本原因，不能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八期。

不归咎于××同志领导之下省委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态度的结果。

二

这一官僚主义的领导，更加强了我们落后于客观事变的严重状态，阻碍着征服我们在发展中的困难以及在全线上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进攻。

这首先表现于反帝反战的工作。

民族危机日趋险恶，引起了全国反帝的群众运动的开展。上海广大劳苦群众正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巨流。反对塘沽停战的运动，在民众救国御侮会的周围生起的反帝积极性，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之友的苏联大使的运动，拥护反战大会的呼声及大会前后的群众积极性（选举了数百个代表，东区数千人的群众反战大会，码头上的群众集会，在有些工厂和学校里的会议，作了一些抗议五次"围剿"的工作……），在这方面江苏的党是得到了一些成绩和开创了新的局面。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胜利的完成了的反战大会，应该是江苏党转变反帝反战工作的起点，但亦以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对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指示之怠工与有意的搪塞，使大会后的反帝反战工作反趋于无形的停顿，环绕在这大会周围的群众热情很罪过的任其冷淡下去。这种消极的放任政策的结果便是：（一）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三百多个代表，大部分被我们失掉，没有即刻组织起来，成为开展反帝反战工作的骨干力量。（二）大会前的群众工作是极不充分的，大会后就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克服这个极大的弱点。在一切工厂、学校和一切群众组织召集群众会议，报告和讨论反战大会的总结，以建立反帝运动的下层群众组织基础。

但省委没有动员支部及群众组织来进行这一艰苦的组织群众的工作，却向中央报告许多似是而非的事实——将赤色小组或支部用改头换面的办法称为反战团以塞责。反战大会的政治影响因此没能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三）大会后，没有注意召集各区的代表会议、选举区的反帝非战分会及把他们变成开展工作的武器。（四）由于不正确的领导，在大会上没有很好地选出执行委员会，而补救的办法是应该在各区的代表会议上分别选举，然这一工作既无任何进展。因此反战总会始终未能形成起来——就是执行总会日常事务的几个党员同志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的领导。（五）新的组织没有及时创立，而旧有的群众组织如保联、救国御侮会等又因"迎新"而大大削弱下去。这样，使党在反帝运动中的组织基础不但未能扩大而反加削弱。（六）反帝非战的宣传鼓动工作是狭隘得无以复加，即反战大会特刊至今亦未能出版。省委所发的"反战大会的总结"在党的区委和支部会议上都没有切实的讨论和规定具体的任务。工作是削弱了，反战大会的成绩没有巩固起来。中央虽一再的向省委敲着警钟，但省委本身初则是充满着凯旋和复员的情绪，不计划着今后的工作，继则躲避艰苦的顽强的工作而终于放弃。另一方面对反战大会意义估计不足与极端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创造力，而公然诬反战会的工人代表为"草包"，不足以与闻反帝的工作，种种反无产阶级的意识没有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这都表示着省委的政治领导是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没有真正了解中央论反帝运动中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的全部指示。在《列宁生活》上把这封信的基本立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事实，决不是偶然！

中央认为这封信中的基本指示依旧全部有效，并号召江苏党立即以这封信为根据来讨论目前党在反帝反战工作中的错误

与弱点，抓紧每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卖国的事实（如最近之中日直接交涉等），进行广泛的群众鼓动，揭破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开展反帝和国民党的斗争。为此，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和每一个党员在最近必须执行下列的几个工作：

（一）在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来建立各工厂学校的下层反帝非战组织，区的分会，省委应帮助区委、支部来筹备各工厂、各学校的群众会议及区的代表大会，并动员团、工会来共同进行这一工作。

（二）立即成立远东反战大会总会办事处，团结各地的反战代表并吸收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参加工作。省委应保证派遣得力的干部，以便在总会内形成强有力的党团。总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正式形成后，办事处即解散，其工作人员转入总会继续工作。

（三）省委应帮助办事处立即起草反帝非战的总的行动纲领，并分发至外地及首先保证在上海各区对于这一纲领之广泛的讨论。

（四）党、团、工会应在准备着将上海码头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警备委员会的问题及在纱厂、丝厂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加入远东反战总会的提案。

（五）反战与反对法西斯蒂是不可分离的。近来蓝衣社的盗匪们更加疯狂的蠢动起来，江苏党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揭破法西斯蒂的真面目，揭破他们所主张的“文化统制”等，来团结广大群众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到处组织反法西斯蒂大同盟。

（六）白区党工作的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党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在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护苏区，有力的帮助粉碎国民党对于工农红军的“围剿”（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的决议）。在这里，要极端反对把反战反帝的工作与冲破五次“围剿”的任务隔离起来，省委本身对这些工作的相互联系既自承认没有“了解”，而下层的同志根据东区巡视员的报告则更是“顾此失彼”，抓不到主要的一环——组织群众，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江苏的党应克服这个最大的弱点来开展拥苏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发动抗议五次“围剿”的工作。

江苏党应该了解，在整个反帝的土地革命中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处在这一个全国无产阶级的首都——上海的布尔什维克负有特殊的使命，他在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事业中的每一成功都将增加着整个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要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首先就要依靠党的领导怎样领导全体党员和赤色工会面向企业来进行工会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央认为正是江苏党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也正是江苏党今后转变自己全盘工作的起点，这是考察江苏党面目的主要尺度。

中央认为江苏省委没有推动每一个党的组织来注意工会工作，而把工会工作只认为是工联的工作，对于工联的工作又不给与有系统的具体的领导，这使我们不能抓着目前工人斗争之有利的客观形势来推进革命的职工运动。

上海的工会工作，大半年是陷于削弱的状态。直到最近才开始走上轨道，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一）十月份较九月份原有会员是发展了一倍；（二）纱总已由七个单位增至二十几个单位；（三）开始夺取一些新的阵地（在××里和××上的工作），成立丝总筹备会与码总筹备会，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工人要求“老工会”的领导，自动脱离黄色工会，加入赤色工会；（四）开始恢复失业的工作，成立了东区失业委员会；（五）在业的非党的工人积极分子是加多了；（六）工联及纱总

的本身比较健全起来，造成了转变工会工作的一个前提；（七）进行了一些政治鼓动工作，选举了几十个苏大会的代表。这些成绩是十分微弱的。工会工作还没有取得基本的转变。争取这个转变是整个江苏党的任务。

目前工会工作的严重现象表现于：（一）没有抓紧和领导一个大的工人斗争，独立的革命领导这个问题很迫切摆在我们的面前；（二）对各厂的情形没有充分的了解，与厂内的联系仍非常薄弱；（三）组织上的发展与政治的影响之间的距离依旧相差甚远，全上海仅有××赤色会员，不到全体工人××分之一；（四）下层的组织如赤色小组与各产总的分会没有很好的生活，大都还没有成为厂内工人斗争的组织者，在赤色小组里没有形成党、团小组，在党、团的产业支部会上很少讨论工会的工作；（五）厂内的附属组织没能多多地建立，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女工代表会等，这是没有执行广大的下层的统一战线的结果；（六）失业工作仅仅开始，党、团的组织没有进行失业的工作，因此到现在没能建立一个失业的群众组织，在东区茅联[1]的工作虽一度紧张，但始终没有把它更大的加强起来；（七）许多重要的阵地至今没能恢复（沪西纱厂、××烟三厂、××报馆），市政工作至今未能整顿起来，铁路工作还未开始；（八）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也还停留在决议上，没有建立一个革命反对派；（九）工会组织，首先是团没有认真的去进行青工童工的工作，江苏团省委没有动员全团的组织来彻底执行中央九月一日关于江苏团工作的决议，将青工的工作交给经斗部，而经斗部对实际工作又极不负责，使团与青工群众联系的问题成了非常严重的状态，广大女工中的工作更是无多大成绩可言。

中央认为必须依循下列的方向来转变上海工会的工作，争

取我们的伟大成功。

（一）必须改变工会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系统中的地位，自支部、区委以至省委必须将工会工作视为主要的工作。法南区委公然将工会工作放弃而专做学生运动的现象应该停止。“谁不愿作工会工作，谁就不是革命家”的口号，应该非常尖锐提到每一组织、每一个党员的面前。

（二）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到最受资本进攻，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这在上海就是纱厂、丝厂、烟厂和主要的码头及两条铁路。同时要采取有力的步骤恢复和加强我们在市政工人中的工作与创立几个重工业中的工作基础。这所谓重心不是写在决议上，挂在口头上，而是要在党的力量的分布中，在整个的工作计划中具体的实现出来。

（三）以企业为基础来改造党、团、工会的工作，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到建立工厂小组，“这是特别重要的组织。一切主要的运动力量，就在乎大工厂中组织工人，因为大工厂不仅是数目多，而且影响、发展与斗争能力，在全工人阶级中也占着优势。每个工厂应当是我们的堡垒”（《列宁全集》第四卷××页）。为此，必须建立工厂的巡视制度，来组织厂内的通讯网，有系统的切实的帮助厂内的工作。

（四）有系统的和坚决的反对工人状况极小的恶化，反对各种方式的对群众生活程度的减低，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压迫与进攻，坚强的争取对于工人的经济的政治的罢工的领导。在目前尤应抓紧冬荒年关的斗争。须要比以前更周密的和完善的准备经济斗争，必须严格的和彻底的实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路线。

（五）在上海现有的赤色工会组织没有一个是从厂内广大群众中选举出来的。应该开展工会的德谟克拉西，勇敢发展自

己的组织，这必须推动下层的自发性，残酷的反对数目字的摊派的官僚方法。应该了解“不经常的和有系统的征收会员，对参加革命职工运动工人不加以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就不能加强和扩张我们的阵地，不能消灭会员的流动性和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中强有力的因素”（职工国际八次全会的提纲）。在这里，纱总削弱和烟总完全瓦解的教训是值得特别研究。目前纱总老恰和分会的情形，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

（六）“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准备思想上坚定的干部。革命的职工运动，应该注意非党积极分子思想上的教育，不造成这部分积极分子就不会成为群众的运动”（见提纲第八段）。在上海，旧的职工干部已经不多，最近已提拔了一些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对他们的教育是非常迫切。要锻炼大批新的力量，才能完成新的任务。

在最近的时期里，这些新的具体任务是：

（一）在组织和领导纱厂工人反对减工关厂和生活恶化的斗争的基础上更大的开展纱总的工作，恢复沪西纱厂的阵地，加强东西区纱总办事处的工作，立即开始准备召集上海第二次纱厂工人代表大会来补选或改选纱总执委，使纱总执委内能包括各主要纱厂的和各派的代表及通过纱厂工人的斗争纲领。

（二）发动码头工人的斗争，将正在工作着的码总筹备会经过群众代表大会的选举变为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海上、沪东及浦东各区应在所属的码头上用一切力量开辟和加强党的工会的工作。省委应帮助海委及工联制定码头工人斗争纲领和码总组织章程。在大会开幕前必须分头召集各码头的工人群众大会，开展最广泛的群众工作。

（三）上海百余家丝厂除十四家外均已停工。江苏党、团、工会应立即经过现有的丝总筹备会及厂内的赤色小组进行广泛

的群众工作，反对关厂及要求资方、市政府救济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来扩大建立丝厂总工会的运动，首先是扩大赤色小组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建立各厂的分会。此外，必须成立反对停厂的群众斗争委员会。

（四）加强东区失业委员会的工作，创立西区和浦东失业委员会，来广泛的在失业工人群众中组织要工作、要救济的斗争，特别是要准备冬荒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才能建立包括最广泛的群众的失业组织。

（五）应动员一切力量，首先是闸北区委来建立铁路工作，最迟亦须于十二月初首先成立京沪铁路工作委员会。着手恢复市政的工作，利用在烟厂中现有的关系和力量，扩大烟厂的工作，争取烟厂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把英美烟三厂的阵地恢复起来。

（六）向工联青工部与团省委建议，必须加强在青工群众中的工作，首先筹备纱厂青工代表会，实现少共国际关于青工工作致中国少共中央的信中的全部指示。

（七）切实的开始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首先在邮务、烟厂建立强有力的反对派，恢复新闻报馆的阵地，成立黄色报界工会里的反对派。

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在基本上转变工会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整个党的工作之面向企业便是完成这些任务的保证。目前省委的领导是没有向这方面前进一步，甚至非经中央的屡次督促，便不讨论工会工作的问题，而对于工人斗争（最近的电力斗争、英美厂的斗争等）是敷衍了事，没有任何争取领导的决心与准备。这种现象虽早经中央一再指出，而省委的领导则仍行其所是，这使中央不能不得出目前省委的领导是不能保证工会工作这一坚决转变的结论。

最后，中央认为必须指出江苏党的本身情形，她的政治的和组织的状况。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江苏省委应该为哪些组织的任务而斗争呢？

很明显的，在大破获之后的第一个组织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恢复组织——首先就是恢复大产业支部。在这方面江苏省委也做了一些艰苦的工作，但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一）许多重要阵地没有恢复；（二）在破获后已经有过关系的个别的但是重要的堡垒从新失去；（三）这些产业组织的丧失是大大的打击了工会工作；（四）未将在有些厂内的个别同志组织起来成立支部；（五）许多外县党的关系至今没有恢复起来，对于外县的工作一般的是隔膜的，不能给中央任何具体的材料来检查工作。

第二个组织任务，便是巩固现有的支部——首先是产业支部，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夺取新的堡垒。但是目前（一）江苏党在产业中的组织基础不但没有扩大，反加缩小；（二）产业支部的工作没有摆在中心的地位，中央关于产支的决议至今不仅没有具体的实现出来，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讨论，都没有切实的举行，省委对产支的检查，只是写在计划上；（三）产支没有被推动起来，注意工会工作；（四）征收的工作没有经常的有计划的进行；（五）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这是支部中流动现象依然存在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区与健全区的领导。

但是省委对区的领导与具体帮助是十分不够的，在很长久的一个时期省委常委不与区书发生关系，专靠巡视员去指挥区的工作，对各区的工作从省委方面没能有计划的加以检查与在常会上专门加以具体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区之不重视工会工作没有与以有力的纠正。这便造成了各区目前严重的情形。

第四个组织任务，与巩固产业支部和区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建立区的和产支的巡视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在十月里才开始。正因为没有切实的巡视工作，使省委更加与下层情形隔膜，无法实行具体的灵活的领导。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省委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不去注意建立巡视的工作。

第五个组织任务，就是在组织上来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勇敢的发展组织。但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我们应该指出江苏党所表现的：（一）不是数目字的摊派方法，来一个冲锋，便是根本放弃；（二）征收的工作始终没有成为每一支部的日常工作；（三）征收入党后，不立刻划交支部，予以党的训练，因此形成不断的流动性。在今年十月节前后共仅发展不到××新党员，这种生长的速度的迟缓的主要原因，就是党脱离了群众的斗争，没有艰苦的在企业中的工作。

第六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群众的组织。省委对群众组织内的党团没有好的领导。群众组织是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群众组织的削弱，使党更加隔离起来，得不到群众的掩护，而一切运动之来，便只得动员先锋队去打头阵，后面没有广大的援军，这也就是江苏党不能发动一个胜利的群众运动的原因。

第七个组织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为党的存在与生长而斗争。这包含（一）改善党的秘密工作，严密自己的组织；（二）开展反叛徒内奸的斗争；（三）动员广大群众反对白色恐怖。这个任务是执行得非常微弱，区的组织和省委本身的机关不止一次地受到破获，甚至在省委个别负责的同志中表现出极不可容忍的自由主义，国民党法西斯的内奸能够打进我们的产业支部——这一捍卫党的第一道防线，这些事实都证明江苏党的阶级警惕性之不充分与没有把巩固党的组织与开展群众反白

色恐怖及其他运动联系起来。中央认为巩固和稳定党的组织——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是今后更顺利开展全盘工作的基本条件。现在法西斯蒂的恐怖配合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凶猛起来，我们应该动员群众团结成广大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应该理解：我们党之能生存与发展就要与群众结合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最后如干部的问题、党的政治教育工作，都非常迫切的摆在江苏党的面前。宣传鼓动工作非常微弱，《列宁生活》不能经常出版，各区大半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一个真正的工厂小报，党支部小组的政治生活都需要大加改善。这些工作在提高每一党员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和因此而提高整个党的战斗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应该了解：在目前猛烈开展着的革命形势与两个中国进行决胜负战的时候，党和革命之所要求于江苏党者至高且大，不提高党的水平是万难完成这些伟大的迫切任务。这使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很尖锐的摆在江苏党的前面。

中央认为上面的各种组织任务是要求新的省委来动员江苏党继续用力的去完成。这就是：（一）不使大破获后的一个失掉的组织和党员再不恢复起来，而这一工作是有一切可能完成的，抓紧各区要求恢复的积极性很迅速的去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于外县的工作，省委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恢复和加强领导。（二）真正的检查几个产业支部，从这些检查中得出整顿其他产业支部所必需的教训，产支的巡视工作应立即开始。（三）调动江苏党最好的力量去巩固区，争取沪西、沪中、闸北工作更大的成功，特别注重烟、纱、码头所在的各区的工作，保证于最近期内选择十个得力的区的巡视员，改善省委常委管区的方法与内容。（四）勇敢的以企业以支部为主

干的开始征收党员的工作，提出至明年春为要能恢复主要的阵地，增加数倍党员而斗争的任务。（五）动员全党来创立和扩大群众组织。在工会方面要为创立群众的纱总和码总的组织而斗争，青年团应该在开展青工斗争的基础之上为恢复旧有团员和新的发展而斗争。（六）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不使没有一个支部没有党校，没有支部的壁报，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群众的领袖。（七）大胆的提拔在斗争中检验过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工会的领导工作，培养大批新的干部。

三

江苏党目前的工作是很严重的，摆在江苏党面前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发展我们共产主义者的创造精神来执行这些任务呢？

中央认为首先必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与两面派的斗争。

江苏省委在××同志领导之下正是陷入了这一官僚主义的泥坑，虽经中央无数次的指示与督促，而终莫能彻底的转变。这一官僚主义领导表现于：（一）不深入下层，与实际情形隔离（不愿意直接管理区的工作，不切实了解一个产支的情形等），因此不能实现具体的灵活的领导，这就不能抓紧生活中的一切事变和变动着的情形来脚踏实地的把工作推往前进；（二）既不愿意去了解实际情形，艰苦的去进行工作，便走上了便宜的道路，一切都是命令，用数目字来代替具体的领导；（三）不负责任的敷衍，决议上的夸大，口头上的允诺；（四）没有一点自动性，对工作既不认真，又无责任心，因此不能自动的先一着的提出许多问题，自加警惕；（五）对工作和实际

情形既没有深入的了解与各方面的打算，便不能规定工作的计划，看到一定的前途，而是件件应付，潦潦草率，省委常委本身就没有好好的过着有计划性的生活，催得紧了，便定出一个包罗万象代替了一切组织的计划，失去了党的中心的领导作用，束缚了下层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的自动性，这成了包办“计划”，不是领导整个工作；（六）官僚主义的领导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不听取同志的意见，这就不能团结党的干部来集体推进工作，省委的集体领导至今并未好好的形成起来；（七）没有开展正确的自我批评（中央一再指示要把反官僚主义的问题提到全党及其他群众组织讨论，但至今并没有进行，虽然下层同志已感觉到省委的领导非常严重而且正在积极起来批评，但省委不去领导和组织这一积极性……）和用各种武断的方法来拒绝批评；（八）官僚主义者为了政治上的应付，把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条文，变成口头禅，在××同志领导之下的省委没有真正抓住一个机会主义者，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甚至已经揭出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省委也没有给以严重的打击。

由于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中央的指示便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同志每次都在口头上同意和拥护中央的路线及一切指示，但在实际上则阳奉阴违不去执行。××同志曾给中央许多好听的允许，但没有一件实现，甚至采取撒谎的方法，以避自我批评。

中央认为江苏党是中国党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在中国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荣的页子。他现在仍然是党一个最大的支柱，他有一切可能来转变自己的工作，比现在能够取得更多更伟大的成功。而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领导正是障碍着江苏党走上胜利的大道。中央引为非常欣慰的便是在江苏党员队伍的中间已经开始起来反对这一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领导，而且

这种积极性将更加增长，这是江苏党走到转变的重要因素。中央认为在省委里反官僚主义方式的领导斗争是不充分的，但中央确信省委的大多数委员已经有了这个决心，表示他们对党的总路线的忠实！

中央认为目前江苏省委的领导是不能保证执行党的总路线，须加以改组，××同志的书记职务即予撤消，以××同志担任，及吸收大批新的工人同志参加省委的工作。中央坚决相信江苏新的省委会能团结江苏党的队伍，把反对官僚主义两面派及各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正确的开展和深入到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去，以领导和组织江苏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首先是英勇的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冲破五次“围剿”，来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已经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国民党已经最公开的变成了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全中国广大的民众也从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方才能够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同侵掠中国的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保障中国的独立统一与求得中国民众的彻底解放。同时苏维埃与红军反帝反国民党的伟大胜利，在全中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了只有坚决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的道路，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最后的解放出来。因此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也是大大的增加了，他们要求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中革命的出路！

在这一革命形势更加尖锐化的情形之下，在反革命国民党统治内部的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实是不足为奇的。在福建一部分国民党的领袖，因为国民党的根本破产与广大民众的革命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红色中华》。

化，所以最后抛弃了国民党的尸体，自己创立了他们的生产大众党，把他们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并且提出了他们新的主张与新的政纲。无疑的，这是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的最具体表现与重要关键！

但是自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它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它一方面宣布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但是同时却宣布临时戒严条令以取消他们在口头上所给与人民的一切权利。它的政纲上写着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均受最大的保护，然而它对于工人与劳苦民众的生活，并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的办法。它的“计口授田”实际上只是要农民不自动起来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斗争，同时它对于农民目前所不能忍受的苛捐杂税以及一切压迫与痛苦状况，并无丝毫的改变。即是它所号召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只有空喊，而并无具体的布置与行动，它的人民义勇军实际上不过是地主武装（民团）的改名。真正武装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开始。一个月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以及全中国民众，决不相信一切口头上宣言上的革命辞句与好听的革命的名称。只有实际的革命行动才能证明一切政府的是否革命。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予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

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民众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行动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希望或期待任何上层统治者的“革命”来代替民众自己的革命斗争，结果必然是不能补救的极大的失望！

中国共产党号召福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革命工会，农民自己的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成立吸收广大工农群众与革命学生与智识分子参加的反日会，成立反日反蒋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以及各种各色人民的别动队，并且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散发武装，武装他们，联合革命的士兵群众同进攻福建的蒋介石部队与准备武装干涉福建的日本与任何帝国主义力量决战。福建的民众必须自动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刻收回日本租界与关税，宣布一切对日不平等条约的无效，开展真正抵制日货的运动，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的企业与财产，并且把它的海陆空军驱逐出福建。必须立刻逮捕一切卖国贼汉奸，镇压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来充实反日反蒋的战争经费，来分配给劳苦的民众。同时工人必须以罢工等斗争，来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与工资的增加，农民必须以抗租抗税，解除地主武装，武装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必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立刻采取紧急办法，救济城市与乡村的失业工人与贫民，并改良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此外，福建的民众应该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响应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历次反日反帝与反国民

党的宣言与号召，不再进攻彻底反帝反国民党的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联合一致去进攻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首先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福建的民众与全中国的民众，也就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民众宣言，在全中国民众前面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与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民众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一切反帝反国民党的民众联合起来！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揭破一切欺骗民众的阴谋与武断宣传！

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一、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用新的欺骗，以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来愚弄群众，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阻止群众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此来夺取反动统治中的领导权，去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最后崩溃，也就是挽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便利它们瓜分中国的殖民地化的道路。

二、福建事变表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更加削弱和崩溃：（一）国民党的旗帜和招牌已经破产到这种地步，甚至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类的军阀，都也不能够不公开的声明退出，为的要用新的旗帜和招牌（“生产党”、“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实行地主资产阶救的武断欺骗的企图；（二）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之间——反映各帝国主义的冲突——所生长着的深刻的矛盾，又爆发了一次公开的破裂。福建的十九路军军阀企图打出新的旗号，用新的进攻革命群众的方法，去讨好帝国主义，代替那些蒋介石等的军阀的头等奴才的地位。

三、但是，要知道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削弱和崩溃的加深，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的革命斗

争的强大的开展。革命斗争的开展和尖锐化，一方面使得一切反动势力团结起来进攻苏维埃革命运动，而别方面也在打击这些反动势力，使得他们中间不能不更加迅速的暴露裂痕，不能不争先恐后的抢夺“新鲜的剿共方法”。蒋介石的法西斯蒂蓝衣党、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冯玉祥的“抗日政权”以及这次福建的“人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统治迅速瓦解之中，地主资产阶级各派军阀集团的层出不穷的新的武断宣传和欺骗方法。

四、苏维埃红军正在冲破五次“围剿”的伟大的胜利，苏维埃领土的日益扩大——帝国主义进一步的瓜分中国，帝国主义间的分赃斗争更加剧烈了，而反映帝国主义利益的各派军阀间因争夺日益缩小的地盘的冲突，也更加尖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闽北给了十九路军严重的打击，福建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同情和赞助猛烈的发展——这些情形，使得福建不能够不暂时对红军“休战”，企图挽救自己的反动统治，缓和民众的反抗和革命情绪，以便准备新的力量，制造新的旗号，来继续进攻苏维埃红军。

五、国民党军阀——十九路军的也在内——最近半年来的卖国政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出卖满洲、华北，对于英、法、美、国联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的适应，断送西藏、西康、云南等等，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烈的坚决反帝国主义斗争。上海战争（一二八）、热河事变（华北中日协定）、棉麦借款、国联技术合作……不断的暴露着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凶恶残暴卑劣无耻的真相。他们的政策是，不惜用任何代价去投降帝国主义……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更大的帮助，来镇压一切反帝革命斗争，首先是进攻唯一的反帝武装——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这种真相的赤裸裸的暴露，不断的打击着他们的武断的

宣传。民族解放的反帝革命运动和战争，迅速的引导着广大民众和兵士走上苏维埃的道路。这使得蔡廷锴等类的“民族英雄”，在他们军阀自相冲突的纷争之中，更加“警心的”估计到一致进攻革命势力的任务。他们就企图用“退出国民党”、“号召反帝革命势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的新的武断欺骗，来阻止群众革命化的过程，阻止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用新式的“反帝”的假招牌，来掩蔽他们的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老政策。

六、广大的罢工潮流，农民贫民兵士的革命斗争，到处不断的发生，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和劳动解放的事实，成了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极巨大的推动力。现在不但因为世界的和中国的经济恐慌、失业、饥荒、战祸，而爆发着不断的劳动群众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这些反抗和斗争都向着觉悟的阶级的最后决战——为着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前进。全国劳动群众的一致拥护红军，反对五次“围剿”……这一切使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更加接近根本灭亡的道路。因此，所谓“人民政府”就企图用“耕者有其田”、“保护劳动”、“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普遍选举”等等的改良政纲，来同苏维埃的革命政纲对立，企图在群众之中造成一些幻想，缓和苏维埃革命进展的速度，以便利反动势力的更残酷的进攻。这样，他们在企图着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

七、“人民政府”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一）他们对红军历次宣告的抗日作战协定，始终没有诚意接受；（二）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对于日本美国，正在做着暗中的买卖；（三）他们的一切“农工政策”和“民主主义”都决不会真正实行。福建的军阀、政客、第三党、AB团等等——不说他们内部还有许多派别和斗争——都只想

用这种政纲，来开始极大的新式的武断宣传，企图获得群众的信仰，提高其反对蒋介石，广东、福建内敌对军阀的地位，增加他们现在或将来与南京妥协的政治资本。这也就是为着增高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的身价。为了这个理由，他们认为对红军采取暂时的防守政策以及对群众给予各种口头上的允诺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实行这些允诺。在形势一经变化，红军稍有不利的形势或获得更大的胜利，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以及十九路军兵士更加革命化等，都要使福建统治者立刻露出他们的原形，抛弃他们一切的允诺，实行更残暴的屠杀群众和进攻红军苏区。这是因为福建"人民政府"的阶级基础，同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它根本上也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八、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在反对民众革命，反对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对根本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问题上，也就是在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个基本问题上——都是一致的。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企图用新的欺骗来实行进攻革命罢了。它的政纲和行动完全证实着这一点。不用说它在政纲对于群众的"允诺"不会实行，就算实行起来，也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形式。对于帝国主义——它除开"否认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之类的谎骗的话以外，丝毫也没有什么别的。国民党也用这类的口号欺骗了人民好几年，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它做了一切帝国主义走狗所能够做的卑劣无耻的行动。福建"人民政府"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动，事实上都在多方阻碍，像他们这班军阀在上海战争之中出卖了兵士和民众一样。对于土地革命——他们说什么"计口授田"，然而他们对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没收地主土地

的革命行动，还是在压迫。而且他们在口头上，纸面上都不敢提起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对于保护劳动的问题——他们只说着一句空话，而接着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这意思很明显的表示着保护资本家而反对工人阶级。对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对于所谓“生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问题——他们事实上不会实行释放政治犯等等，或是旧的政治犯刚才释放，新的政治犯又要逮捕，而且他们的所谓“生产人民”显然包含着资本家地主在内。这种所谓“生产人民”的政府毫无疑问的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像欧美的一切“最民权主义的”政府也必然是资本专政一样！这一切很明显的表示着，福建的“人民政府”是企图用民族改良主义的空话，用新的“反帝”、“民权”、“解决土地问题”、“保护劳动”等等欺骗的武断来敌对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革命！

九、中国的劳动民众必须了解他们这种新的欺骗必须抛弃一切对于他们的幻想。中国的脱离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大多数劳动民众的脱离封建残余的土地制度，中国工人阶级的推翻中外资本家的剥削统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冲破和粉碎五次“围剿”，发展劳动群众自己的广大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工业，剥夺一切地主资本家的恭政权，建立工农劳动民众的自己的政权和国家！而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帮着帝国主义实行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的一种新的企图，也就是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的新的企图。中国的两条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和苏维埃革命的道路——的斗争，中国的两个政权的对立——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对立，在福建事

变之中格外明显的表现出来，更加尖锐的开展出来。中国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抗日的，反对瓜分的政府。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一切殖民地民众，要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着一切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进攻，而达到真正的解放。而福建“人民政府”，同国民党的各派一样，不过用了新的欺骗和方式，在反对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的革命，在适应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政策，适应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而取得中国的“战场”，作为一致进攻苏联，压迫世界革命发展的根据地的政策！

十、我们必须暴露福建“人民政府”的这种实质。我们尤其必须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其他各派借口福建事变而更加残酷的施行白色恐怖！我们要更广泛的更努力的在一切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革命政策。我们要同群众日常斗争联系着，提出一切民主权利的要求，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反对全国一切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资本家的一切种种压迫，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最小的剥削压迫的事实，要使得群众明了：只有群众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能够改良自己的生活，能够达到自己的解放。我们要这样动员一切群众的力量，来反对五次“围剿”，粉碎五次“围剿”……没有群众的猛烈反抗和伟大的革命斗争，五次“围剿”决不会因为福建事变而放松。我们要广大的宣传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反帝抗日的，我们要广大的宣传苏维埃政府对于全国兵士群众所提出的“抗日作战协定”的政治意义。我们要发动全国民众来赞助这种政策，要求一切武装部队都立刻停止进攻苏区，立刻解除苏区的封锁，立刻开始抗日战争，立刻武装民众，立刻停止对民众反帝抗日言论、集会、罢工、武装等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我们要

广泛的暴露国民党的一切卖国步骤，最近的中日直接交涉，请求英国宪兵帮助维持长江秩序，蒋介石的欢迎英国公使，利用美国棉麦借款等等加紧屠杀民众和进攻苏区……我们要广泛的暴露福建“人民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的每一件事实，每一次的言论行动（例如福建政府人员对路透社记者说“抗日等于自杀”等等）。我们要反抗国民党的戒严，及一切新的压迫事实。我们也要暴露福建“人民政府”的每一次压迫民众的行动，如一面允许各种自由，一面立刻宣布临时戒严条例，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我们要坚决的反抗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新的欺骗！我们要揭穿一切反动派造谣惑众的企图，明显的指出福建事变的真正意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政策。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刘 少 奇

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钱劳动者进工会来，活跃工会的组织，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职工国际屡次在决议案上指示我们，苏区的职工会决不能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为次要的或附属的任务。工会要利用工人群众为自己直接经济利益的斗争，引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造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但是职工国际的这些指示，许多工会干部还没有能够彻底了解，忽视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在我们工会的组织中还是严重的存在着。

虽然，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央苏区的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上是作了一些工作（如订立合同，开办一些合作社以及征收土地税等），但是这些工作还没有成为工会一切组织的经常工作。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并没有深入的细心的去了解自己组织内一

---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苏区工人》第四期。

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些什么不安的问题？有些什么可能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许多工会的委员会对于这些事情是茫然不知的。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讨论过工人切身的问题。工会社会经济部（这是工会最重要的一个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没有人来负责这个部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上级委员会的报告，也就常常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材料。

倘若我们向许多工会工作的同志发问：哪些工作是工会重要的工作？同志们都可回答："扩大红军、查田、经济建设等是工会的重要工作。"但是很少有同志回答，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是工会重要工作的。许多同志对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估计得不足的。所以他们没有亲密的去接触和了解工人生活的各方面，没有严重提出工人不安的问题，并想尽一切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工人已经向工会严重的提出他们不安的问题的时候，工会的负责人还是随随便便的毫不负责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这就要使得一部分工人对于工会工作，不发生兴趣，从交工会的会费到工会的会议，以及工会所号召的各种运动，都没有兴趣来参加。但是工会工作，不独是要使先进的工人发生兴趣，而且要使落后的工人都发生兴趣。这就必须要工会慎重的来处理一切工人所提出的日常问题，获取工人对工会的信仰。

胜利县有差不多两千工人（部分是铁匠）没分到田，同时又没有工作做，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他们经常要求离开本乡到外面作工，但是苏维埃不发路条给他们（为的是怕无人作义务劳动），或者只发十天半个月的路条给他们。对这个问题胜利县工会从来没有向我们作过报告，从来没有严重的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难道不是严重的错误吗？像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胜利县有，石城县的平安区、洋地区等也有几百工人未分田，甚至还

有几十个雇农、苦力未分田，他们还是靠作些不定的劳动过活，石城县工会也是没有用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此外如博生的夏布问题，乐安的纸业问题等，都是差不多的。

有的同志会向我们说，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们想不出办法。但是，同志们！并不是没办法，而是没有去想办法！现在我们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着，我们有各种可能的条件来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我们根据当地的条件来想办法，发动群众大家来想办法，提到苏维埃，提到上级工会大家来想办法，我们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今年春天工人缺乏粮食，许多同志认为是没办法的问题，但有许多地方发动了群众的互助，向富农地主借谷，以及要求苏维埃的救济等，解决了粮食缺乏的问题。但是还有的地方不去想办法的，就使工人饿死了的也有（如汀东、武平、洋地等）。福建的农业工会向中央政府借了四千元，买粮食去救济会员。又如今春纸业工人的失业问题，纸业工会想了许多办法来倒下了几万石竹麻，现在福建失业工人已经不失业了。但乐安的工会不去想办法，失业工人现在还是失业的。去年宁都的船工失业，工会组织工人到某处山上去斫木柴，用船装到宁都来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又如某处木匠失业，工会和苏维埃交涉，将山上的树斫来作木器卖，也解决了工人的失业。从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只要大家实际去想办法，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工人的困难问题，都可以有办法来解决。即使真的想不出办法，就是要求苏维埃从剥削者那里抽出钱来，救济饿饭的工人，也是可以的。今年夏季就这样做了很多。

有的同志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工作，看成仅仅是订立合同或实行劳动法。因此，他们忽视失业与半失业工人，忽视农村中大部分分了田的工人，没有去研究这些工人、雇农的

困难，以及如何帮助他们，但实际上在苏区极大部分的工人、雇农是没有长期合同的。对于这些工人的问题如果忽视了，那苏区的工会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工会。

现在我们工会工作在这一方面，还需要有更大的彻底的转变，需要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需要教育工会工作的干部，善于在工人日常问题上去接近工人、教育群众，获取群众的信仰。各级工会委员会尤其是支部委员会，应经常拿住工人的日常问题来讨论，并给以解决。上级的工会委员会应经常督促下级的委员会来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与苏维埃取得一致，取得苏维埃的帮助。对于个别苏维埃的负责同志不管这些问题，不管工会的提议，也应该以同志的态度给予批评，或者要求上级机关来解决。

现在中央政府预备从经济建设公债中拿出二三十万来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的生产，创办东方贸易公司，大开钨矿，及开办纸业、烟业、夏布、樟脑、石灰公司等。各级工会委员会必须发动工人来参加这些工作，召集各业会议，订出计划，征调干部，帮助政府搞这些建设。因为这对于战争，对于工人生活的改善，均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工会在讨论和解决工人日常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刻不要忘记从这些日常问题上来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觉悟，纠正工人中某些分子的行会的思想。必须在这些日常问题的周围来引导工人群众参加苏维埃、红军及战争动员中的一切工作，向工人说明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扩大，才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如赣东北工会工作中那样的倾向。埋头于讨论工人的日常问题，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工会的缺点就是在解决工人的日常问题中忽视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与觉悟，忽视了加紧动员工人群众为巩

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工作。他们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一切都说到了，但对于扩大红军的工作与参加苏维埃的工作等，甚至一字都没有提到。这不仅是极大的缺点，而且是一个错误。在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需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要把工人为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在目前是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突击队长和各省委县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央局检查了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十天成绩，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报名的数目，还只三千九百人，只当原定计划百分之十五六，送到补充师的只六百名左右。突击运动不能完成的危险已摆在我们的前面。中央局仔细分析了突击运动没有开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运动中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在实际上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突击队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还有重大的缺点和错误。为着保障百分之百的完成中央所给予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的任务，中央局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坚决执行下列的指示：

（一）我们的运动既要经过突击队发动，就必须保障突击队是最坚定最积极最有纪律最能深入群众的队伍。

如果突击队里面存在有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消极怠工分子、不遵纪律的自由行动的分子以至开小差的分子，那就会使突击队本身麻痹腐化，不只不能担负党给予的任务，并且要成为突击运动的阻碍。这次突击运动，的确动员了成千干部加入突击队，最大多数干部的确积极的在那里为着党的任务斗争。可是像下述的坏分子，仍然在许多突击队中发现着。

在瑞金各区突击队长中，我们看见陆定一同志的悲观失望，绝望的提出只有在支部中规定同志当红军，用罚钱来强制耕田队；谢佩芳同志痛骂区一级都是坏人，乡主席没有好人；刘海波装病脱逃；康道垠、刘盛莲的标本的实际工作机会主义；甚至在中央突击队长中，梁广同志像谢佩芳一样的咒骂石城干部；古柏同志在会昌领导上表现出来的标本官僚主义；粤赣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者迟到十号才动员突击队下区；兆征县突击队长全日在干部里面兜圈子等。此外在瑞金一部分区乡突击队员中，发现不少朝去暮归，作工半天，做零工以及跑来跑去参观的现象，并且还有开小差的分子。在瑞金正在开展反对上述现象的斗争，但这种现象在各县亦不可免的发生着。

中央局严重指出，在整个突击运动前面必须立即检查各级突击队的质量成分，立即进行突击队的改造。办法如下：（1）对于动摇的官僚主义的消极的队长必须立即撤换；（2）队员中动摇消极怠工等以及不遵守突击队纪律分子，不能立即纠正的，必须洗刷出突击队；（3）开小差的分子无保留的洗刷出队；（4）能力不能任突击队员或不能解放其他工作专门来任突击队的必须解除突击队职务；（5）不要把归队的分子编入突击队，报名的新战士中，也只能从最积极分子中选择极少几个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加入突击队；（6）上述一、二、三项被洗刷的分子，必须在当地组织中开展公开的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群众；（7）最后，突击队中的缺额要吸收在运动中表现出最积极坚定而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干部补充。

突击队必须是最精悍的组织，不在数量多而在质量好，这一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二）扩大红军突击运动是一个千百万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不是由若干突击队单独可以做成的。突击队的任务，就在

帮助和推动当地党部的领导，推动和帮助当地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去动员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一切企图脱离当地党部的领导和超过当地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动员，必然遭受到失败。这种错误，在过去是很普遍的，所以中央局在中央突击队出发以前曾再三着重的指示这一点。

这次突击运动中，仍然有许多地方重复这种错误，特别是区乡两级。如把团的活动分子会、支部会合并在党里面开，取消了团的独立动员工作；赤少队也是只开混合的干部会议，以及不动员一乡一村的苏维埃、工会、女工农妇等组织；最后突击队下乡甚至连党的支部、小组都不理的现象也时常发生。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主要的是突击队企图脱离和超过这些当地的组织，另方面就是有些地方党、团、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把突击运动看成突击队的事情，自己不积极去动员所领导的组织。

正确的办法应当是：第一，一切比较重要的问题和工作上的决定，必须提到当地党的领导机关讨论，如果属于团的，还应当提到团的领导机关，属于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以此类推；第二，突击队（无论是以团体为单位组织的或者以各组织之代表组织的）当下去工作时必须有一定的分工，分配一定的队员去帮助党、团、苏维埃、工会、赤少队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推动各个组织去动员自己的干部和群众。

推动和帮助当地党部和群众组织，当然不是一个命令可以作到的，而要经过共同的讨论与协商。并且在要动员千百万群众的突击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动摇是不可免的要遇到的。事实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的干部中以至支部中，我们遇到了动摇分子，对突击运动消极旁观的分子，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对反革命缺乏警觉的分子。在大多数干部和党员积极动员的时候，他

们却来散布悲观失望的影响，甚至施行破坏的作用。他们如果是负领导责任的，更加要直接妨害当地整个动员。我们不否认石城和合龙的干部中有动摇消极的分子，并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我们所以坚决反对梁广、谢佩芳同志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动摇消极的分子投降，帮助这些分子诬蔑积极的干部，藉此来脱卸自己的责任。

很明显的，在这次突击运动当中，党内反倾向的斗争一般的说是没有开展的，就在瑞金也是极不够的。然而瑞金的事实已再一次的证明，哪个地方相当开展了反机会主义斗争，哪个地方的动员便有成绩。反倾向斗争没有开展的原因，部分的由于突击队的领导者中表现机会主义的动摇，一般的由于没有抓住具体的事实和具体的人去发动斗争，而多是空洞的喊两条战线斗争，或者斗争了，但没有作出必要的组织结论。

为着保障突击队任务的完成，必须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怎样作呢？第一，必须很警觉的抓住每一个具体的倾向来揭发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例如下肖区群众公审大会要求枪毙一个开小差的顽强分子，而区苏裁判部长表示不敢执行；如陆定一同志提议规定党员当红军；如说人口少不能突击等等）。第二，对犯了重要错误或不愿改正错误的，必须予以组织上的结论，如果是领导者，必须撤消他的领导工作。第三，一切倾向都须公开揭发，才能教育群众，对应该作组织结论的同志，并须公开他的名字来斗争。第四，必须团结坚定的积极的分子在突击运动的前线上来，经过他们去动员群众。第五，必须注意随时提拔积极坚定的干部到指导机关，代替那些陈朽的动摇的干部，来改造或加强各种领导机关，这不仅保障突击运动的完成而且保障突击运动后各地领导机关能健全的继续工作。

在指导方式上，必须执行最紧张的工作检查以保障运动飞

速的前进。各县突击队长必须三日一次向中央和省委报告；各区必须每二日一次向县作报告；乡对区，村对乡须有更密切的关系；全县应该五天到七天召回各区突击队长作一次检查，全区应该三天一次，全乡应当每日一次。上级对下级的报告必须立即给以具体的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县委还须派人巡视。

（三）中央局在突击运动开始的时候，即指出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不只是广大的群众的动员，而且是残酷的阶级斗争。阶级的敌人不是蠢货，他们在这样伟大的群众动员中，无疑义的要起来暗中破坏，在群众中散布他们的影响，以至公开的反抗。例如瑞金十天经验中，在合龙、河东、下肖、黄柏等区发现成批逃兵反抗我们的归队运动，其中都有阶级敌人起组织的作用。在下肖、河东、合龙的某些乡，我们逮捕了反动的领袖以后，逃兵陆续归队，群众也随着动员起来。黄柏和其他的区还没有能找出反动分子或者没有采取镇压他们的手段，不只归队无成绩，动员更是落后。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必须依靠于政治的宣传鼓动，依靠于说服群众，同时还要依靠于对阶级敌人采取惨酷的镇压。如果以为要说服群众，就可对于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缺乏警觉，可以放任他们或明或暗的破坏行动，那么不只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且要铸成一种罪恶。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方式是比较以前减少了，但是反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则表现很弱，必须纠正过来。

有许多地方，逃兵是整批开小差回来的，他们之间原来就有反动的组织者在归队和扩大红军中，继续起反动的组织作用。此外有在查田运动前混入到红军中去的富农以至地主分子，他们开小差回来后，见了土地财产受了打击，更要加紧的来破坏我们的运动。所以我们在逃兵中，特别是整批的逃兵

中，必须追求出他们的领袖，把领袖与群众分开起来，对群众进行说服，而对领袖必须逮捕，公审以至对最顽强的分子执行枪决。追求反动领袖，不只要靠保卫局的线索，还要依靠群众，探听群众的意见，特别在发动群众和他斗争中来揭破他的面目，使群众了解，最好在群众前面逮捕。如果把群众或动摇分子当作反动领袖逮捕，会使群众怀疑以至反对我们，这同样是要失败的。逮捕了反动领袖，必须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宣布其罪恶，举行公审（尽可能举行巡回公审），立刻去争取他影响下的群众，说服他们（群众），稳定他们，使他们不怀疑我们而接受我们的号召。要利用公审大会等扩大部队和动员新战士的运动。

瑞金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逃兵中的党员团员依然在支部中生活。在逃兵多的地方，党、苏维埃、工会、赤少队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中，还有逃兵占着地位，以至作副主席部长等。瑞金几个月来扩大红军没有成绩，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突击运动中，必须彻底检查党员团员中开小差分子，首先在党内团内和他们斗争。坚持不归队的，开除党籍团籍，当作开小差的群众看待。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同样要归队，否则立刻撤销工作，顽强的分子同样要逮捕公审。

瑞金的经验还告拆我们一个重要事实，逃兵中的顽强分子，常常有站机关的坏分子（这些大概不一定是逃兵，常是逃兵的亲属，或者与逃兵有特殊勾结）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反逃兵和反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必须与反对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苏维埃的检举运动联系起来。

这里所指出的原则，不只对归队运动适用，对整个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都是适用的。

（四）在这次突击运动中，除上面所指示的外，还有几个

重大的弱点须得指出并给以纠正。

第一，根据现有的材料，逃兵多的县份如瑞金、胜利，动员成绩中最大部分是归队的。同时在材料中除很少几个地方外，没有看见赤少队整连整排的动员。这都是我们动员中的重大弱点。归队运动自然重要，但必须同时争取新的战士的扩大，至少要使新战士不少于归队的数目。赤少队未能整连整排的动员，表现了五、六、七几个月大动员以后，模范赤少队未能完好的组织起来，但这还不能说明这次运动中不能“有组织的动员”。各突击队和党部必须在赤少队有基础的区或乡，努力争取整连整排的动员，以保障新战士在这次动员中应有的比重，同时须在运动中注意赤少队的编制与整理。

第二，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仍是极其薄弱。兴国优待红军家属的群众运动的模范经验还没有被别县学会，耕田队没有加紧扩大和整理，特别是各级机关的礼拜六运动完全取消了，这种现象是不能继续容忍的。中央局必须再一次的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立即组织广泛的优红运动，首先每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党员和团员都要加入耕田队，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一直到支部书记和乡主席都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必须把红属组织起来吸收他们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党的各级军事部必现切实负起指导优待红属的工作，苏维埃内务部以至乡政府必须立即进行调查红属整理耕田队，分配劳动力等工作。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必须监督和检查中央和中央政府所颁布条例的执行。

第三，在胜利、瑞金等县表现妇女“拖尾巴”的许多的事实。瑞金城市有女团员公开起来强拖老公回家。瑞金许多区妇女部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表现出他应有的积极性。突击队和地方党员必须切实指导妇女部工作，并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机关。

第四，根据过去经验，让新战士散布在乡村，等候定期的大批的集中，反增加集中的困难。这次必须争取迅速的集中，有了相当的数目即送补充师，举行热烈的群众护送。在集中前和集中时，必须加紧宣传慰劳工作。必须实行检举工作，洗刷老弱残废和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把党和团组织好，事先开好党团会议，确定每个党员和团员在集中和开动时的领导作用。党和团不只要组织好，还要有详细的登记，一分送补充师，一分留当地组织保存。必须特别注意干部的调剂，使每一队伍中有坚强的领导。开小差归队的，如果他原来领有被毡衣服等，必须要他们带回归队，以减少供给的困难。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周恩来关于请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与命令全权给秦邦宪、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博古、项英同志：

一、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益以元电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

二、十二日战斗后，十三日各兵团分撤各处，晚得军委第一重新部署密令，即五军团向得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继得第二电令，以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考虑后只能击一方，于是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十四日拂晓前，六师已行，不及追回，十三师在熊村之北又奉令迟疑，虽十四日白天我们连电三、五军团，指示五军团守备任务及兵力部署（以十三师除留一营在湖坊、洵口外，主力坚守新店、得胜关支点），然直至当晚，十三师仅有两营达熊村附近。因新店失去（彭、滕[1]十四日以平电先我们十五日早始悉），我们不及知，而军委十四日十四时电至，乃又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军团坚守。夜，中央军委二十三时电又至，于是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十三师守得胜关。但五军团

两日无电至，三军团整日移动，直至现在三、五军团行动不明（五军团收我们电不答，夜中又动既又出）。六师、十五师亦不知现驻何地，而得胜关确已在敌手中。

三、依据上情，我们许多电令虽已发出，但终不知十五日我军情况究属如何，且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豪

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滕代远。

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七军团的任务等问题给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 蒋[1]敌现正分路向顺昌、延平、古田前进，李默庵师已抵顺昌洋口，其控制邵、顺之间的一个师分一部驻水口，有进窥万安寨配合其三路军击我东方军右侧翼之企图，将乐驻军是十九路军抑系马鸿宾或靖卫团，情况不明。

2. 军委令我七军团在改编完毕后应于明二十九日先以一个最精锐的侦察营，经万安寨向将乐地域出动。

3. 先头的营应伪装闽中独立营离开七军团主力三十里左右路程，迫近关明行动，其任务：

（1）与十九路军部队取得联络，在反蒋反日的共同行动下在该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

（2）侦察将乐，如非十九路军而系团匪或空城，七军团应以一部驱逐或占领之，以便迅速征集资材。

（3）侦察将乐，如系马鸿宾部应监视之，如马部自认为十九路军应逼其表明反蒋态度。

（4）特别要侦察蒋敌部队在水口及顺昌行动，如该敌向将乐、万安前进，七军团主力须迟滞拒止和侧击之，但须避免决战。其先头的侦察营应于明二十九日十三时开动，并由七军团

政治部邓[2]主任率得力宣传员十人同行，以便向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七军团首长应给该营以侦察和联络的具体指示，并由我们委托滕[3]政委，如二十九日午前赶到泰宁，给你们具体工作方案，望等到后出发。

4．政治工作原则：

（1）以革命战争反蒋反日。

（2）人民革命须给劳苦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

（3）组织和武装工农义勇军。

（4）与十九路军士兵亲善，以便吸引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关此已委托滕政委给你们说明）。

（5）总政治部将有详细指示。

5．其他部署另电告。

朱　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邓乾元。
〔3〕指滕代远。